

记忆丛书

光荣的背后
Behind the Glory

我的军旅见闻
My Observations in the PLA

刘家驹
Liu Jiaju



美国华忆出版社
Remembering Publishing, LLC

记忆丛书

光荣的背后
Behind the Glory

我的军旅见闻
My Observations in the PLA

刘家驹
Liu Jiaju

美国华忆出版社
Remembering Publishing, LLC

Copyright © 2019 by Remembering Publishing

Behind the Glory: My Observations in the PLA
Liu Jiaju

ISBN : 978-1-951135-36-2 (P - 平装本)
978-1-951135-37-9 (E - 电子本)
LCCN : 2020 902837

Remembering Publishing, LLC
9600 S IH-35, C600
Austin, TX 78748
RememPub@gmail.com

书名： 光荣的背后：我的军旅见闻
作者： 刘家驹
出版： 美国华忆出版社 奥斯汀·得克萨斯州
版次： 2020年7月第一版

字数： 230千字

作品内容受国际知识产权公约保护，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序 言

鲍 彤 心和血的记录

——《我的军旅见闻》序一 / I

高 瑜 军中董狐笔

——《我的军旅见闻》序二 / III

刘家驹 自序 我的话 / V

第一辑 战场见闻

四渡赤水 是逃窜

——彭德怀的秘书如是说 / 1

杀俘虏 壮胆气

——攻陷“土围子”之后 / 6

我军的武装征粮

——革命党代替了刮民党 / 17

志愿军尸横加里山 / 30

志愿军在饥饿中打仗 / 46

营长成了“老虎毛” / 66

上甘岭是肉磨子 / 70

来自越南前线的道听途说 / 88

红军师洗劫越南城 / 97

越战中，我军一个营被俘 / 106

我看到亩产水稻 13 万斤

——“卫星”是真是假 / 113

军营大炼钢铁

——大跃进中的解放军 / 118

第二辑 军旅札记

我军在大饥荒的日子里

——为了吃饱的措施种种 / 125

大灾中的天府之国

——我的战友和双亲 / 137

“四清”运动一瞥

——腐败干部站水缸 / 146

“好八连”好吗？

——大上海的小监狱 / 152

从查歌片到看黄片

——禁欲主义的报复 / 161

文革鼙鼓动江淮

——12 军安徽军管纪实 / 165

云南回族的恩仇

——14 军血洗沙甸乡 / 198

军人·女人·糖衣炮弹

——我军性事面面观 / 207

军队经商风景线

——反修防修的幻灭 / 221

第三辑 人物轶事

军中一霸

——我知道的罗瑞卿大将 / 233

耿飏口述

——长征前后的负面史实 / 251

贫穷逼出来的“抠八”

——某军宣传干事常仁琐记 / 257

“董永”揭发“七仙女”

——黄梅戏名角严凤英自杀真相 / 268

北极村的第一富

——村支书的权力寻租 / 273

芦花维权

——一个农妇向政府讨公道的故事 / 280

档案沉重，背负它跋涉军旅 60 年 / 286

代跋

《炎黄春秋》的历史和“历史虚无主义” / 304

序
言

心和血的记录

——《我的军旅见闻》序一

鲍 彤

刘家驹先生是军旅记者。1949年第二野战军进入四川，在重庆招募学生入伍。家驹弃学应试，从此终身当兵。从文化教员到连队军官，再到政治部宣传干事、军事记者，走过不同寻常的军旅生涯。发表的文字，被他一概视为身外。他说心血全在手记中。确实，被发表就必须被审查，被放大缩小，被美容，被无中生有。歌功颂德的初心和使命一实现，报道的本质就变化了。可以使家驹倾注平生心血涕泪的，唯有手记！

他有一位同行写了篇《最可爱的人》，惊天地泣鬼神，哺育了几代人，成为爱国者的基因。家驹不会写那种杰作。家驹他日日夜夜守在火线上，不必出差到朝鲜去体验生活，上甘岭恰好是他的阵地。他有自己的记录——非官方的记录，另一类记录，其中有人有事，有生有死，有泪有血。一群群士兵（碰巧，百分之九十是从国民军“归顺”的所谓“解放战士”），缺食、缺弹，没有冬衣，麻木，肯定有本能，不一定有意识有“志愿”，一个个被卷入死亡的磨盘，成为肉酱，冻尸、饿殍……——这是我作为读者的感觉，不是家驹的原话。

家驹参加的第一场战争，是内战！不是跟国民军作战——而是跟不愿意缴纳军粮的人作战。战场就在四川，战役就叫征粮剿匪。当年的四川人没有不知道“征粮剿匪”的，正像此后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抗美援朝”一样。征粮剿匪由中共中央下令。征哪里的粮？征四川的粮。征给谁吃？给解放军吃。征多少？三十亿斤！——入川官兵六十万，一人要供五千斤粮？天晓得。完不成怎么办？完不成就剿匪。你不缴，你就是匪，就剿你。所以征粮成为打仗。国民党为抗日征粮，

不“剿匪”，有账可查，明明白白告诉你已经预征到了“民国 48 年”（公元 1959）。共产党征粮是夺粮，没有账，没有人知道自己被征到了哪一年。这是解放军献给四川人民的第一个服务。三十亿斤任务最后完成了没有？家驹没有写，大概不知道。

都说毛泽东用兵如神。家驹也有采访手记，对象包括国防部长耿飚将军。遵义会议后，毛一意孤行非打不可的第一个战役叫“四渡赤水”。那时毛大权初握，踌躇满志，异想天开，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结果呢？主力部队（一军团）伤亡两千多。因妄想，而瞎指挥，而大败，而逃窜——这就是“真如神”的毛，这也正是林彪当年写信建议不再让毛泽东而改由彭德怀指挥作战的由来。

家驹见闻二十九篇，篇篇涉及历史，提供了不同于官史的记录。对同一事件有多种不同的记录，很好很正常，过去需要，将来需要，眼前又何尝不需要？神，用神心神笔写神史。人，只有人心人笔，只能写人的手记。有人怕另类记录不够正能量；但是在我看来，真比假更值得珍重。

军中董狐笔

——《我的军旅见闻》序二

高瑜

中共是枪杆子里面打出的政权，枪杆子的地位只服从党魁。文革中共九大确立的毛林体制算得上是标配。为什么这种标配 9.13 之后难以为继，是刘家驹先生大半生用笔挖掘的真相。1988 年初，罗点点给我介绍了林豆豆，加上豆豆和我先生互称战友，豆豆就直接把我带到北太平庄总政宿舍，这段笔缘使我得识军中一杆笔。这杆笔的分量有多重？至今并不为世人知晓。

刘家驹人生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参加过朝鲜战争军旅作家。1986 年解放军出版社拟了一个为十大元帅立传的计划，其中不能没有林彪。因为刘家驹有多年的军队文艺创作和编辑经验，善于把握政治关口，特聘他撰写林彪传。他几年内采访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和毛家湾的里里外外，终于走到采访黄吴李邱“四大金刚”时候，没想到第一个目标李作鹏，就粉碎了他全盘的写作计划。李给公安部写了封检举信“筹谋为林彪翻案”，总政立刻责令刘家驹停止一切采访活动，随后就下达了退休令。

刘家驹厚厚的箱底没有沉睡，带出一批军旅作家，包括张正隆和他的《雪白血红》。

1991 年 5 月，“六四”反对开枪的七位开国将军之一——萧克上将，84 岁筹办政史月刊《炎黄春秋》，聘请两位军旅作家洪炉和刘家驹担任正副总编辑。开办之初几年，社审稿每期都是刘家驹送到萧克家里，老将军逐字逐句终审完才送印刷厂。萧克确立了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客观、科学、“不虚美”“不掩恶”，敢担风险的办刊方针，直到他患重病住院。刘家驹在《炎黄春秋》工作 13 年，是他人生第二个

春季。

2003年，刘家驹彻底退休，72岁的老军人翻开50余年的尘封笔记，曾经必须刀砍斧削的一批“负面”记录，泛着血腥，显露着丑恶，重重地锤击着他，让他必须放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去思考，去批判。

大约是2010年，他给我送来一篇1万4千字长文《我经历的朝鲜战争》是他从文化教员到收尸排排长的经历。因为后勤补给跟不上，志愿军完全不是“吃一口炒面咽一口雪的最可爱的人”，他们抢夺朝鲜百姓的粮食，把带路的朝鲜人灭口，争抢尸体的内脏……。这还不是全部，“白大腿好吃”还没有敢写进去。泯灭人性的战争在于它的非正义性。我征得老刘的同意，推荐给何频，发表在《新史记》。至今震撼的影响仍在。

上述文章不包含在《军旅见闻》里，该书搜集了朝鲜战争的另外两个姐妹篇。需要特别提及刘家驹的最后遗作，一篇征求意见稿，这是2016年7月《炎黄春秋》杂志社整个被抢劫后，他拖着瘦弱的病体，为正版《炎黄春秋》立的传。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刘家驹一生最后阶段，用良知与大无畏记录着中国军队和战争，他堪称军中董狐笔。

自序 我的话

刘家驹

朝鲜战争结束后，军委指令全军进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强调“要把苏联老大哥的先进军事经验学到手”。学习外军经验，担心丢掉我军山沟沟里的老传统。从1957年开始，总政部署全军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同时开展大写革命战争的征文活动。我所在的12军政治部通令下属师团，列出自己战斗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和英模人物，抽出一批有写作能力的骨干组成写作组，由写手笔录当事人的口述，整理成篇，编印成册，下发基层连队。我这个高中肄业生，被团领导推荐到师，还担任了师征文组组长。

为部队立史是我军思想建设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12军文化处处长特地用总政治部的指示告诫我：下笔不得暴露我军的阴暗面，每篇文章都要紧紧把握住人民军队的“伟大光荣正确”这一宗旨。

两年间，我在这一规范下，为老军们代笔写出渡江战役后《活捉蒋军318师师长》、进军四川的《抢渡乌江》、解放重庆的《山城拂晓》、阻止胡宗南10万残军西窜的成都战役《不让敌人逃往康藏》。我还记下《大破铜鼓寨》《巧袭观音庙》等一组我军征粮剿匪的故事。

朝鲜战争，我又记录整理了《从司号员到指挥员》《在医疗战线上》《上甘岭的一支车队》和战斗英雄胡修道的小传等篇，编入《光荣的道路》。1964年，我参与写作《郭兴福和他的战士们》之后，《解放军文艺》收编了我。

我到编辑部还当了散文组副组长。从基层来到总政，眼界大开，散文组要编发大量的革命战争回忆录，面对着红军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各类稿件，我深感自己知之甚少，惶恐中只能边学边干。我阅读了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仲马父子的著作，他们的批判现

实主义对我的文艺观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文化的“诱惑”，使我对大量的负面史料有了兴趣。我走访了不少老革命，读他们的回忆录，和代笔人交流，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都已跃然纸上，血腥的、丑恶的史实，只能埋藏在自己的笔记本里。

比如井冈山时期的军委和前委之争，是朱毛之间的一场权力博弈。苏区莫须有地清除社会党、AB团，滥杀自己人近10万。长征不是什么“宣传队”“播种机”，而是流寇求生的一路打砸抢。四渡赤水是被川军打败之后的大逃窜。平型关一役，自己伤亡两千八，杀敌仅八百三。百团大战只出动三万一千人，打了几个小仗，夸大了敌人的伤亡。解放战争在东北，制造了令人齿寒的死城、鬼城。为金日成火中取栗的朝鲜战争，我军伤亡近百万……

为凸现我党我军的光辉，军史上的“阴暗面”全被掩盖。我问过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我们是一支胜利了的军队，为什么就不能向世人说出负面的史实？”他回答一句话：“揭露我军的短处就是给反动派帮大忙。”

1990年代初，我从《解放军文艺》退下来，走进《炎黄春秋》。这本著名的杂志，是一帮从意识形态营垒中冲杀出来的老革命搭起的言论平台，他们敢于违拗党的禁令，评说党的大政方针和错误决策，把党史中不敢示人的秘闻，和自己的苦难经历捅向社会。一篇篇振聋发聩的文章，引发了我心灵的共鸣。老革命谆谆引导我，要我摒除“党文化”，远离立场观点的偏见，用刘知几“不掩恶”“不虚美”的史德审视王者之师。

多年来的编辑经验告诉我，一部史书面世，首先要经受官方的三堂会审，不合乎主流意识形态的，要么枪毙，要么刀砍斧削。要突破“党文化”的束缚，实非易事。由于党史军史规模宏大，事件繁多，要写出众望所矚的历史，得翻查大量的资料，走访众多当事人。我读过一些作者的回忆文章，他们仅追求发表，不顾史实，绕过禁区。这些人写的党史军史，有以讹传讹的，有半真半假的，有演绎虚拟的。更甚者，想在自己头顶闪现光环，用垃圾史料取悦读者。

2003年，我从《炎黄春秋》退下来，想写出些文字以度晚年。我打开尘封已久的笔记，搜寻些记忆深刻的、值得一提的人和事，审

视它们的典型性和社会意义，遵循“一滴水见大千世界”的理念，提起了笔，记成独立短小的篇章。

《长征组歌》中有一首“四渡赤水出奇兵”，彭德怀的秘书王亚志用他的亲历揭穿了这个神话，我把他的口述整理成《四渡赤水是逃窜》一文。事实是，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改组，组成了以周恩来为首，王稼祥、毛泽东为辅的三人军事指挥团。毛泽东刚愎自用，不听林彪提出的吃掉新打鼓场川军一个师的建议，硬要去攻打驻扎在土城的三个师。结果吃了败仗。不足两万人的红军，只好在川、黔、滇三省边境流亡。

抗日战争结束，太行山下的“土围子”还在顽抗，我军打开后，把众多的俘虏当靶子，让战士人人刺刀见红，以提高士气。《杀俘虏，壮胆气》所记录的，就是这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

国民党退出大陆前，四川的田赋已征收到 1959 年，我军 1949 年入川后，全国大城市出现粮荒，中央向掌控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邓小平要粮，邓立即下令在四川征收 30 亿斤。军队出动，武装征粮，把两百万老百姓逼上了梁山。

朝鲜战争，是为金日成火中取栗。《志愿军在饥饿中打仗》是反映我军后勤供应不上，饥饿不单嚼草根树叶，还让人失去本性，抢夺朝鲜人的口粮，吃死人的心肝。一支威武雄壮之师，变成了土匪。

朝鲜战争的第五次战役，为攻取加里山，我所在的 35 师是用三千战士前仆后继的血肉之躯堆上山的，我是掩埋组组长，面对自己的战友横尸异国山野，血泪在心底流淌。这是一条通往加里山的血路，我军付出了血本。

军史记载的上甘岭战役，把惨烈的真情实景描绘成一曲惊天动地的壮歌。守卫上甘岭的 15 军军长秦基伟的人海战术，把我军两万多人送进了战争磨盘碾成齑粉，我把此文起名为《上甘岭是肉磨子》。黄继光、邱少云、胡修道的英雄事迹让人质疑。

越南人忘恩负义，驱逐华侨几十万，又入侵柬埔寨，教训他们一顿是天经地义的。可我们的惩罚手段很丑恶，《红军师洗劫越南城》说明，我军打进越南的城市，如同鬼子进村，把一座秀美的同禄县掠夺一空，洗城的总指挥就是后来当了总参谋长的张万年。

《越战中，我军一个营被俘》记叙了我军10万大军打进越南，拥有人员优势、装备优势。人家几乎全用民兵对付我们。这场战争我军伤亡两万二千人。一个建制营被俘释放后，干部战士一律开除党团籍，送回老家，不得提干、不得进城、不准当基干民兵。

从1960年代开始，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全军的各级政治机关，为防止部队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禁唱抒情歌曲，认为是靡靡之音。部队采取扭曲人性的极端做法，战士丧失了做人的尊严。这个故事我写进了《从查歌片到看黄片》。

1960年代初，全军开展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让连队都成为红色堡垒，“南京路上好八连”成为学习榜样。好八连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在上海滩的繁华闹市，千方百计地保持了“一尘不染”的封闭式管理，战士们如同蹲进了一所大监狱。我深入“好八连”探访，告之世人真相，于是有了《好八连好吗？》一文。

荒诞的大跃进年代，全军在“三面红旗”指导下，从机关到连队大炼钢铁。我所在的团机关和连队，自制小高炉，投料不足，就去拆地方的厂房，拔铁道上的道钉，砸桌椅板凳。把炼出的铁渣，抬着向师党委报喜。我参观了江西鄱阳县三庙前公社“水稻亩产13万斤”的现场，愤怒的社员向我们揭发：丰收的“成果”是几百付粮担绕着村转圈称出来的。

大跃进带来大灾难，《我军在大饥荒的日子里》记述了三年困难时期，军队的粮食供应虽比地方强些，但是指战员们也深受饥饿之苦，为了填饱肚子，我军不得不出各种办法，从开荒种地、挖死猪油，到走进深山老林找吃要喝的奇闻逸事。

《大灾中的天府之国》记述了我回乡探亲时，见到的重庆家人的苦难，以及和我一起拿过枪的战友是怎样背负政治的枷锁，在“人祸”中经受煎熬。

党指挥枪用于战争，也要枪杆子为政治斗争服务。文革兴起，280万解放军投入“三支两军”（三支：支持左派、支援工业、支援农业，两军：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文革鞞鼓动江淮》写12军进入安徽支左、制止武斗、镇反、打压造反派和建立军政权的过程。为了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12军

还和其他省比赛杀人，现行的不够，就到劳改农场去翻出历史反革命，每月必杀一批。

云南个旧县沙甸回族，在文革中清除“四旧”时，汉族造反派侮辱了可兰经，还把猪头扣到回族代表的头上，把他们游街示众。回族人奋起反抗，“支左”的14军先后派出步兵、炮兵镇压，杀死杀伤1300多回族村民，我这把一惨案记入《云南回族恩仇录》之中。

人对性的渴求为常情，军人尤甚。《军人 女人 糖衣炮弹》，记叙了我军从司令到士兵，在严格纪律的约束下性乱难止，风月之事有如万花筒。

《军队经商风景线》，是写缩减军费后，军队走向市场，军人们小捞大捞的故事。连队有了四菜一汤，首长们有了补品和高级小楼，然而，美好的日子却没过多久。

我记叙的知名人物中有罗瑞卿，他是我军人人敬畏的锄奸、镇反能手，残酷的政治斗争反把他整得跳楼残身。他之所以四面树敌，是他手握生杀予夺的大权，滥杀无辜，性格又孤傲，身兼党政军八大要职，威风八面，连老帅也不放在眼里。《我知道的罗瑞卿大将》就是揭示他的霸气的。

黄梅戏之花严凤英，文革中被列入“牛鬼蛇神”，她已知自己无法在专政下生存，临死前还昭然向社会表白：“我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她的死，我算半个见证人，我记下那些不为人知的死因细节。

我还记下了军队中的一个小人物——外号“抠八”的常仁。他家世代贫农，当初欢天喜地迎来解放，可翻身之后的生活比当初还贫困。公社化时，连他祖上留下的一棵树也要充公。他利用探亲的机会，悄悄地将树锯了给二老做寿材。早就相中了这棵大树的公社副社长假公济私，给部队发来公函，说他是资本主义尾巴，侵占了公家财产。军队容不下他，打发他回乡重扛锄头。

芦花，一个烟台的农村妇女，我的远亲，她的丈夫和邻居口角，被关死在派出所。进京告状无果，回到家披麻戴孝向市委申冤，得不到回应，她愤懑难平，只身在烟台市的车站码头大街散发“还我丈夫”的传单。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政法委书记上门安抚这位“敢把皇帝拉

下马”的姑奶奶，发给她 40 万抚恤金。

历代的人事档案，都是为了选贤任能，而我党我军的档案，却是对使用干部的政审。出身地富资产阶级家庭的，三亲六戚有各种社会问题的，都被列入另册，在委屈与不幸中度过一生。《档案沉重，背负它跋涉军旅 60 年》就是我在这方面的经历和见闻。

本书集结的文字，都是我一生经历中的负面故事，它仅是历史真实的一个暗角，见微而知著。

第一辑

战场见闻

四渡赤水 是逃窜

——彭德怀的秘书如是说

《长征组歌》中有一首“四渡赤水出奇兵”，无论党史、军史都把四渡赤水说成是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中央领导人的传记、年谱，以及众多亲历者的回忆则用它来论证毛的军事天才，在革命战争和革命历史题材中，四渡赤水则成了毛泽东用兵如神的永久话题。

四渡赤水前前后后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它在我军史上的影响却是巨大深远的。尽管当时我军没有重蹈石达开的覆辙，但是连遭重创，仅剩下万把人，而军史却把它说成是毛泽东“力挽危局”“拨正船头”的旷世壮举。彭德怀的秘书王亚志用他的亲身经历揭示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一

遵义会议召开，第一个议题就是前堵后追的红军下一步的走向。几个四川老总（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提出北上“赤化四川”，得到了中央新军委周、毛、王（稼祥）的一致赞成。

但是，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毛泽东就组织指挥一军团莽莽撞撞地进入赤水的土城。敌人是川军很有战斗力的两个旅，一军团在青岗坡打了整整一天，伤亡两千余人。两门山炮丢进了赤水河，伤员无法抬走。林彪哭了，博古也站出来骂毛的指挥是狭隘的经验主义。

退出战场的我军被迫一渡赤水，往西从大渡口和江安两县之间寻求渡口，幸好国民党 50 军军长郭勋祺借口要整顿部队未追，要不我军必成石达开第二。郭之所以不追，是因为郭早年和陈毅是同学，又和刘伯承、杨闇公很有交情，川军刘湘要搜捕共产党，郭派人把

陈毅秘密护送到了武汉，让陈毅躲过了一劫。1947年，已是15绥靖副司令的郭勋祺在襄樊被我军俘虏，陈毅念恩图报，释放了郭勋祺。这是后话。

赤化四川已无可能，毛“寻机北渡长江”，又让林彪打叙永。叙永有国民党一个旅守备，防御严密，以逸待劳，结果我们又吃了亏。彭急电中央再不能北渡长江了，他以“伤亡大，落伍多”为由，切望中央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党史、军史至今也不敢公示这一电文。

红军伤亡惨重，溃不成军，仓皇逃到云南的扎西（今宣威，当年叫石坎子）休整。一军团缩编为6个团，三军团编了四个团，五、九军团各缩编为3个团，加上干部团、警卫团共18个团。人数已不足两万人，可毛不甘心，还要“寻机重占遵义”。于是，又在太平渡、二郎滩渡过赤水。

二

红军二渡赤水后，又是一番苦战。三军团的参谋长邓萍牺牲，才再次夺取了王家烈坐镇的遵义城。这时，吴奇伟两个师蜂拥而至，要夺回遵义。红军一三军团全数出动，坚守城外高地。恶战三天三夜，10团团长张宗逊负伤，参谋长钟剑伟牺牲，11团团长邓国清负伤，12团政委钟赤兵打断了胳膊，打得三军团四个团每个连只剩下五六十人。正当三军团面临崩溃之时，林彪不顾自己的安全和他担负的正面防御，把一二师的兵力都掉过头来打敌人的后背，迫敌攻击三军团的两个师后退，不但解救了三军团，还出其不意地追击到乌江北岸，打垮了吴奇伟的一个师，俘敌一千多人。

这不是毛的“得意之笔”，而是红军被毛置于死地之后林彪的求生之举。林彪顾全大局，解救了红军，让彭老总感激不尽，应大书一笔。

一军团的斩获，并不能改变红军的危局——蒋介石看得很清楚：“朱、毛部队不及（两）万人，粮弹两缺，状极疲惫，已无战斗力。”我军遵义保卫战结束时，三军团遭到了从未有过的重大伤亡——10团、11团的各个连只能编成4个班，12团编了5个班。三军团要军委补充兵员。想当初，红军第一次进占遵义时，小青年都争当红军，

扩红扩了4000多人。可第二次到遵义时，人家看到红军死伤这么惨，都不干了。军委哪还有兵员补充给你？！

彭老总预计到敌人会卷土重来，向中央提出，赶快移师秀山、酉阳，靠拢二方面军。毛不理睬。5月12日在会理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把彭的电文拿出来，作为“右倾动摇”的证据，对彭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林彪看出来，毛重占遵义，是想打掉中央军周浑元的纵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这是用鸡蛋去碰石头——周的纵队，无论装备和战斗力都远胜于红军。毛眼大心肥，为了在遵义立足，想一口吃掉周部。

林彪不敢正面冲撞毛，3月10日他给中央发报，提出一军团为主，三军团为协助攻打新打鼓场。彭德怀很支持林彪的建议，新打鼓场只有王家烈的一个师，没有多少战斗力，如能吃掉一个整师，既能鼓舞斗志，又会让敌人生畏，还给我军一个喘息的机会。可毛就是不同意。为什么？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日的中央批判林彪会上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新打鼓场，大家开会都说要打。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但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大家都不听了，半夜里，毛提着马灯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晚发，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第二天，一起开会把大家说服了。”

既然一致通过要打，毛私下找周就改变了主意，周是新“三人团”有最后决定权的人，毛为什么能独角拗众？周至死也没说明个中原因。

张闻天的说法就不一样了，攻打新打鼓场，“毛泽东认为是啃硬的，损失了部队不值得。大家还是坚持要打，有人对毛说，‘少数服从多数，你不干就不干。’我主持会议，通过了打的决定，还撤销了毛的指挥权，前敌指挥由彭德怀暂时代理。第二天开会，同意了毛不打的意见，军委马上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打鼓场的指令》，毛泽东恢复原职，还向我提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即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

张闻天也是在批林批孔时说这番话的，他措辞隐讳，不敢说毛在会上要撂挑子，遭到众人批评，张才决定撤销毛的指挥权的。第

二天开会，张为什么又同意毛不打的意见，还向一三军团发出不打的指令？毛还就势提出成立三人团，这是让张拍板的。张不能说，也不敢说，因文革中毛的权势炙人，张要保护自己。

毛为什么要一意孤行？我找不到历史的真凭实据，但可以从毛的权欲观作出推定，如按他的意图打垮周浑元，在遵义立下足跟，他马上就可以取代张闻天的地位。毛是将将的能人，摆兵布阵远不如彭、林。打周浑元完全是从他个人的政治利益考量的，他没有任何的敌情分析，就让一三军团去“啃硬的”。

一三军团怎样打周浑元呢？3月15日红军总攻鲁班场的周浑元部。周有三个师，他的军官都来自中央军校，有良好的军事素质，敌人还派来飞机帮忙，结果像土城之战一样，红军伤亡两千余人，撤出战斗，扔下伤员溃退，仓皇地三渡赤水。

三

鲁班场战斗失利后，彭总又向中央提出，红军应向西南转移，调动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以寻求战机。毛不听。彭在对中央的电报中多次对毛的指挥提出批评，说是他“攻坚乱碰”，毛都积存于心，秋后算账。

四月，红军渡过北盘江南进，一路上，像惊弓之鸟，一天行军120里，不知目的地在何处。有人提议到广西百色，4月28日，在寻甸鲁土村军委开会，再次决定渡过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合。4月29日，中央军委发布《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5月3日到9日，红军四渡赤水后，又渡过金沙江到达会理，沿途还补充了新兵1600多人。

1935年5月12日，在会理城外的一家铁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批评了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只主持大计，前敌指挥由彭德怀来担任的建议。毛说，这是缺乏胜利信心和心存怀疑的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是背离遵义会议精神的。

当时，林已领教了毛的指挥，没有任何追兵我军就窜到云南、四川，一个多月的急行军，拖垮了部队，掉队加上逃亡，又是几千人。加之

毛指挥打土城、打鲁班场，让他的一军团伤亡了五千多人。林一股怨气爆发了，要毛挪开指挥位置，让懂军事的彭总来指挥。

林彪信的原文是：“……这段时间以来，部队在云贵川东奔西走，行军太多，而且走了许多不必要的背路，部队弄得精疲力竭，这样下去，部队会拖垮。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建议换一个人指挥，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几个军委负责人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

林彪当时是借“走了弓背”为由头，写信给张闻天的。那年林彪才 29 岁，毛怀疑是彭和张闻天有勾结，批评林彪说：“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

四

在 1956 年的八大上，毛泽东只检讨了两句：我犯过错误，比如打仗……长征时候的土城（青岗坡）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即鲁班场——离茅台 20 公里）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1959 年庐山会议批彭时，毛旧事重提，林彪坦然声明：“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我写的信彭不知道。”

早在 1929 年，朱、彭、黄（公略）和毛为前委和军委的权力不断发生争执，文革中有人说是彭要把毛赶出红军，毛是个记小账的人，对彭一直心存芥蒂。

彭德怀对毛很坦然，他给我们说过：“对鲁班场、土城两次战役，我是不同意打的，结果都没打好。都是背水而战，还仓促应战，又慌忙撤退。”

毛的权欲和猜忌，酿成了红军四渡赤水的悲剧。

杀俘虏 壮胆气

——攻陷“土围子”之后

1999年，我受命到南京组织编写部队史，访谈数百名当事人，遵照领导的意愿，只拣“伟大、光荣、正确”的口述资料，整理汇编成册。回到北京，我的“不掩恶”史观也回归，打开访谈笔记，原汁原味地整理出一篇血腥的故事。为了不给受访者找麻烦，我用拼音代替他们的姓名。

L(时任某旅政委)：我们这支部队，是1945年11月初在太行山组建的。“八一五”日本投降，毛泽东看到了机遇，要我们“寸权必夺、寸利必得”。国共两军摆开了战场，上党一战，我军歼灭阎老西三万五；察绥之战，吃掉傅作义一万二；在邯郸又打败了马法五、高树勋。仅两个月，就得到了在重庆谈判桌上得不到的胜利。尽管签署了“双十停战协定”，我军依然跃马横枪，开打势在必行，中央军委紧急指令各战区扩军备战，我们纵队应运而生。

S(时任纵队作战参谋)：抗日战争结束，我军前方根据地最大的是晋冀鲁豫，人的资源不缺，组建一个纵队并不难。军区决定从几支老部队抽来三个团(其中有两个还是红军团)，集中4个县的独立营，提升一批区武装，补充一千新兵，17天就集合了9000人。刚组建的纵队，地方武装多，战斗力参差不齐。刘邓首长最关心的是如何把“二茬”部队，最快地铸成打老蒋的铁拳。

纵队王司令提出“祭旗”，就是执行刘邓意图，通过打一仗检验来自各个山头人马的实战能力。打仗就是打干部，看干部的组织指挥、协同及应变能力。老部队久经战场，拖不垮、打不烂，使用起来得

心应手，地方武装新兵蛋子多，一听枪响就放羊，只有战场才是他们练胆的课堂，经历几次血光磨砺，增了见识，长了胆量，软蛋也会变铁蛋。

T(时任纵队副政委):王司令说的“祭旗”，是攻打太行山脚下的萧山镇，这是日本人长期在我们眼皮下经营的土围子，6000户人家，保甲严密，就在我们准备出击的前些日子，太阳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土顽头子叫杨四子，此人在军阀混战时期当过营长，日本人来了封他为冀南保安司令。这支土顽一点不土，过去，日本教官经常来督训，日本人投降，又给了他们丢下一批装备，人人手中都是三八大盖，班用机枪是歪把子。杨四子最炫耀的是他有8门“九二”步兵炮，相当于我们两个纵队的重火器。他的班长以上的骨干全是些亡命之徒，都有多年的战场经历。土顽编制正规，有4000多人，战斗力超过国民党的一个旅。

王司令部署第三旅主攻，第一二旅为二梯队，他没有更多的具体交代，目的是考察干部临战的运筹本领。打土围子就是一场攻坚战，只要破开口子就大功告成。三旅旅长组织干部看了一天地形。萧山镇土围子周长4公里，用黏土合生石灰筑成。基础是半人高的砌石。寨墙高三丈，宽一丈余，墙上四角的碉楼都有机枪工事，围子外是护城河，河宽两丈，深一丈，蓄满了水，人不能涉。土墙上射界开阔，周边无任何地物遮蔽，攻击部队很难靠近。

S(时任某旅作战参谋):部队新组建，有的班还搞不清相互的姓名，更不知战斗技能的根底。我们武器差，人手一支汉阳造，才十几发子弹，一个营有一挺重机枪，还是德国人一战时期的马克沁，开了火还得往枪肚子里灌水。旅长让三团打头阵，这个团底子薄，是独立营、区干队和新兵编成的。旅长是红军过来人，打仗从不计人的成本，经历告诉他，战斗越残酷就越磨炼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就是好样的。

W(时任二营营长):我的营最先投入战斗，二连担任第一次攻击，他们原来就是当地的区干队，土生土长，熟悉地形人情。但是，这帮伙计大都是只抓过汉奸，或到日本人炮楼下放两枪就跑的角色，参与这么摆开架势的大战还是头一回，你看他们的接敌运动，个个弓着腰，

半天挪一步，拥着挤着，没个战斗队形，给人家机枪一扫一大堆，前进没半里地，就稀里哗啦腿肚朝前地垮了下来。

我又组织一连上，他们似乎接受了二连攻击的教训，连长出了个馊主意，从老百姓家弄来八张方桌，每张桌面上捆了五床棉被，以为可以挡住敌人的子弹。四个人顶起一张桌子一齐往前冲，神乎乎的竟然冲了好几百米，敌人的小钢炮是直射的，一炮一个准。团长来了，骂了一阵娘，说顶着被子打仗是蠢驴干的事。

我们改变了策略，组织夜间攻击，三连冲到围子前无法过河，我又让他们抱高粱秆去填。敌人在护城河边生起火堆照明，我们上去一个给打趴一个。团长让我们的进攻停下来，部署一三营挖堑壕接敌。

这个工程大，全在夜间作业。两天下来，进度不到50米。敌人发现翻起的新土，知道了我们的意图，一边组织射手打，一边用九二步兵炮猛轰。

旅长急得无计可施，请示王司令说，这个本我们赔不起了，请求撤出战斗。

王司令火冒三丈，骂旅长，你连个土老帽都拾掇不了，还有本事去啃国民党的硬骨头，你不打就滚开，让二旅上。

H(时任某团政治副主任)：三旅在前面打开了，我们二旅在后面没有消停，一边观察战场，一边在做投入战斗的准备。三旅伤亡500多人，大家心里都在打鼓，团长说，不能再这么蛮干了，他支了新招，掏地道去炸土城墙。办法是一个连干他娘的一天，24小时轮班作业。

L(某团三连长)：我们连是最先投入挖地道的。地道口开在萧山镇西南有600米的一个小村子里，那里有房屋和树丛遮掩，出土隐蔽，挖的洞高五尺，宽三尺，边往前掘还要挖转换洞，给过往的作业人掉转身用。我们团十几个连轮番干活，足足挖了一个月，几个参谋拿来绳子反复丈量距离，确认已经挖到土墙根了才停下来。副团长弄来两口棺材，填满炸药，在他的指挥下，前头用绳子系住往前拽，后面用杠子顶住推，好不容易送到土围子墙底下，等到拂晓时分，团长一声令下，轰然两声巨响，等冲天的浓烟散去，我看到土墙给炸出了一道三四丈宽的大口子，只见伏在护城河边的一营突然跃起，踏着事先绑扎好的浮桥，从缺口冲进了土围子。我带着三连跟进，土顽依

托街垒顽抗，我们就边打手榴弹，边拼刺刀，逐户逐垒争夺。这时，天已大明，每一条街上都布满了敌我的尸体，没打死的在呼天喊地。旅长进来了，命令把自己伤员赶快抬走，土顽的尸体全拖到大街示众。我数了一下，打死的土顽有七八百人。

S(时任旅作战参谋):我们搜查藏匿的土顽,两天就搜出2000多,纵队有要求,凡是中队长,大队长以上的官,交给群众批斗后再处决。开会时,一个老大娘拿着把剪刀,走到一个胖子俘虏跟前,用剪刀直往他下身扎。胖子狂叫,扭动着被捆绑的身躯,大娘毫不手软,直扎得他鲜血染满裤裆才罢手。老百姓告诉我,这个胖子是大队长,奸污了她的闺女。

W(时任营副教导员):纵队又来新指示,班以上骨干都要处决。杀多了怕群众反感,要我们把土顽押到附近的煤窑去收拾,那里的窑井都是竖的,几十米深,把土顽带到井口,先给他腰上插一刺刀,然后用脚一踢蹬,土顽刚叫出声就栽下了矿井,还省了子弹。那天晚上,我们营杀了300多。

Z(时任某团教导员):我们开始是先挖坑再捅人,很费事,后来,看到别的连都拉到煤窑去干,我们也找了一处矿井。我们的杀法不一样,把土顽推到井口前,让两个战士分别对准土顽的前胸后背对刺,一挑一落,俘虏喊不出声就落井了。有一个土顽跪下来向我们请求说,他要先给自己老娘磕个头,再让我们动手。我答应了他,他朝着萧山镇方向磕了三个头,战士才把他挑下了井。那天,没有月亮,我们执行的很认真,杀了300多人。

W(时任指导员):萧山还没开打,教导员来给我们传话,说上头通知,三种人要杀,一是手里有枪的;二是班以上的骨干;三是穿毛衣的(石狮子给有战功的老土顽每人发一件毛衣奖励)。当土顽谁没有枪啊,都该杀。打开土围子后,我们连抓了50多个俘虏,怎么处死呢?大白天当着老百姓下手,不好看,我们决定像别的连一样,把土顽带到窑井跟前去杀。我怕新兵手发软,就让新兵三人干一个。动手前,先让副连长做示范,他在太行二分区刃刺比赛得过奖,出枪姿势好,有力度。他刺土顽时,蹬脚的同时拔出刺刀,动作干净利落。

杀到最后,剩下个小不点,模样有十一二岁,是一个大队长的勤

务兵，我想这小子不会有血债，要求连长不杀。连长向营里告了我一状，说我右倾，立场有问题。教导员来了，劝我，还是杀了吧，放出去他会到处讲的，影响不好。再说，你放了他，给别的营抓住也活不了。小家伙由你来处置，别弄得血淋淋的。

正好李副连长端枪过来，小家伙腿在不停地抖动，哭喊着要回家。李副连长摸了摸他的头，然后用手在他脸上一抹，让他闭上眼，说，谁叫你当土匪的，还是跟他们一起去快活吧。他的刺刀尖没有指向小家伙的心脏部位，只在屁股上点了一下，抬脚一踹就下了井，很长时间才听到一声落地的闷响和传上来的惨叫。

H(时任纵队管理员)：上头命令杀土顽，说是邓政委指示。我们就挨家挨户把男女老少都集合在大街或大院里，要他们脱下外褂查看，凡身上穿毛衣的都拉出带到一边。没穿毛衣的，就让土顽来指认，是不是同伙。那些天，我到处转，看到部队白天黑夜都在不停歇地杀人，干部战士的手上衣襟上都是血污，开饭时，有的把自己的手在身上蹭两下，有的就用带血的手抓住馒头吃开了，我看得腻歪又心惊肉跳。

Z(某团八连新战士)：我是新兵，刚补到连里，枪栓都拉不开，打萧山，班长头里领着我，顶着“嗤嗤”乱叫的子弹进了土围子。我们连冲杀了几条街，伤亡了一半，我还没有打出一颗子弹，班长、连长都杀红了眼，见人就杀。我被街上的死尸、血污吓蒙了，爬在一户人家的墙根下不敢动弹。第二天，班里分来两个俘虏，说是给我们新兵练胆，班长问我敢不敢扎，我知道要我杀人，吓得不敢吭声。班长把一个土顽脱光了衣服绑在枣树上，然后把上好的刺刀交给我，要我上。我双手已不听使唤，端着枪，闭上眼，枪尖刚顶住土顽的肚皮，再也无力捅了，班长上来持住我双手，一用力，扑哧一声捅了进去，一抽刀，血喷出来洒了我一身，土顽嗷嗷叫开了，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班长紧催我，快捅第二枪呀，我的手发抖了，还是班长上来把我，连扎了土顽的肚子好几下，直到土顽没气了。接着，拉过来第二个又蹦又叫的土顽，两个老兵死死地把他摁在地上。班长叫我去脱他的裤子和鞋袜，那家伙怎么也不干，班长上来几下就扒得他一丝不挂，叫我压住土顽的头，他用膝盖顶住背，呼唤旁边的两个新兵过来，

命令他俩一起下手，班长喊着口令：一二，刺！两个新兵战战兢兢地端起枪，正指向土顽的腰部。我怕明晃晃的刺刀刺着我，我一躲闪手就松开了，土顽趁机跃起拔腿就跑，尽管他双手给捆住，还是连蹦带跳地钻进了草丛。一个老兵放了一枪，班长说，算了，回去后都不准说人跑了。接着，连里又送来了一个俘虏，说是给胆小的新兵补课，班长怕土顽再逃跑，先在他肚子扎了一枪，再让两个新兵捅。我们班终于人人刺刀见红了。

放跑了土顽我一夜没合眼，第二天，班里又分来了几个俘虏，一股虚荣心支配我，为显示我不再是熊包，主动向班长请求让我先来。班长说，我不帮忙，就看你的了。我把一个土顽弄到河边，跪在河沿上，他吓晕了，不喊不叫，像是失去知觉，我更加壮了胆，两枪刺就捅他到河里。那天晚点名，指导员还表扬了我。

杀土顽为什么还要土顽身上一丝不挂呢？老兵说，就是要你看到鲜血从白净净的肉上汩汩冒出来，看多了，胆气也大了。

Y（时任某团副团长）：新兵一见到土顽死前那双恐怖的眼睛，自己就先瘫了。我去看处决土顽的现场，给二连还做了示范，我对新兵讲，你不敢杀人，人家就要杀你。我拉来一个土顽，一枪刺就穿过他的脊梁，然后往下一压，空气进入胸腔，血从刀刃的血槽喷出来，我往上一挑，轻松地拔出了枪。新兵看得脸煞白，腿发颤，还是不敢上，我决定改变杀法，不让新兵看到土顽的眼睛，我召开各连参加的现场会，先让老兵挖出一排坑，把几十个土顽带上来，衣服全给扒光，把他们打晕后，倒埋在土里，光溜的两条腿叉开来，活像辟开的树杈，我让两个老兵拥着一个新兵，端上枪，要他们嘴里喊着杀声冲上去，出枪，刺！每人都连续刺了十多下，血从两条腿上流出来，刺刀红了，地面红了，新战士惨白的脸上全是汗。

M（时任某团参谋长）：我首要任务是抓土顽头子杨四子，没料到这家伙在我们进到土围子之前就带着几个人从地道跑了，二营在他家抓了30多名女子，都是杨四子的家属。有人指认其中有几个是杨四子的小老婆，还有女儿女婿三亲六戚，二营长已杀昏了头，根本不去想什么妇孺无辜，他让几个老兵把女人身上的衣服扒光，倒栽在地里，老兵很兴奋，都奋勇当先，一个不落的全给捅了。尸体不让老

百姓看见，当夜就埋了。

C(某团通信参谋)：团长怕有的连干部心慈手软，要机关干部下连监督。我到七连去看俘虏的处决，他们抓来的土顽，先是关在老乡的大院里等到晚上再杀。我到一家大院时，正批斗杨四子的老婆，他是从一户人家搜出来的，主持会的是七连的副指导员，他准备会后当场处死。我不同意，要他避开群众。开完会，副连长不由分说，就带领几个老兵，把这个女人拉到地里，一扒光衣服，几把刺刀一起往她下身捅，顿时，白净的躯体满是血污。老百姓不敢近前观看，站得远远的皱着眉，摇着头。

Z(时任某团特务连连长)：在处决土顽时，我发现有个13岁的孩子。他不哭不叫，好像什么都不懂，我问他是在干什么的？他说，是吹号的。我把连里的号兵小何叫来，要小何的号给他吹，他吹了几个调，音色挺好，比小何强多了。我有意留下他，又怕营里知道，我让小何把他悄悄地带回连队，给换了身军装，他就这样躲过了一劫。后来，当了班长、排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给美国飞机炸死了。

D(时任某团政委)：我们团是后进土围子的，清查时抓了土顽一百多人。上级不让白天杀。晚上，我们杀的方式不用刺刀，为了不让俘虏喊叫，就先用木棒把他们一个个打昏，给活埋了。我是从红军时期过来的，战场的经历和见闻不少。当年，国民党抓住红军，不少人遭到剥皮抽筋，日本人俘虏八路，当活靶子练刺。我们对部队进行这种活的政治教育，就是要战士仇恨阶级敌人。

慈不掌兵，这是古训，一个勇于拼杀的指挥员，他带出的兵，大都有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的气质。我不反对战场上讲人性，但不能脱离我国阶级斗争的现实，老百姓对这帮人有切齿的痛恨，战场报复越残酷越具有无产阶级的本性。

Y(时任某团教导员)：我们营的每一个班都分了十几个土顽，我把党员、老兵召集一起动员，要求党员带头，下手不软，给新兵做出榜样，谁不愿杀就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不准入党。今晚开第一刀，我先上。

白天，我们先挖好几个准备埋人的大坑，晚上，通信员提着马灯，我们把土顽带到土坑前，我先挑出一个土顽，让他站在坑沿，此人

人高马大，是杨四子的教导队长，他知道自己大限已到，不卑不亢，身体也一点不软。我提上三八大盖，一刺刀捅过去，血卣地从他光秃秃的胸口喷射过来，他硬挺挺地倒在坑边。我去拉来第二个，正准备出枪，他的嘴没堵好，嚎叫开了，我身边的通信员眼快手疾，上去一枪就把他挑倒了。

后面正临刑的土顽们吓坏了，死命地挣扎，挣脱的就向四处跑，老兵们追上去就捅，半个时辰就杀的一个不落，营长还特别赞赏说，要他们平时练刺杀，怎么也拿不出这股子劲来。第二天，土顽的尸体不见了，被老乡拖走了。

我住的房东家有个小孩，他姐夫是土顽，小孩天天煮红薯给我们吃，要我们不杀他姐夫。

α(时任某连司务长):打进土围子后，营长要我们杀他个鸡犬不留。后来，王司令来了，他站在土墙碉楼上一看，到处都在杀人，萧山镇成血河镇了。他心软了，才下令不让杀了。他要我们铲去地上的血污，赶快把尸体都埋掉。埋在地里的土顽尸体，都给野狗从坑里拖出来啃咬，满地留下一片白花花的白骨。好些天，我都睡不着觉，老做噩梦。

Z(时任某团卫生队医助):那时缺医少药。一天，队长叫我去，他带我到一家大院，院里摆了五六具尸体，都是胖胖的。队长指着一具尸体说，他是萧山镇的财主，肚皮里油脂多，你把它取出来。我用小刀剖开腹腔，挖出了一大块，接着，又在其他几具死尸中挖取，足足割下来大半桶。

那几天，我就带着卫生员从尸体腹中剥离下来好几桶人油，熬制成了油膏。后来，我们在大别山打开了一座县城，抓住了伪县长。我先让几个战士给他几刺刀，我才上去撕开衣服，切开肚子取人脂。

我们在中原战场转战，我的药箱里只有一些普通的药物，连柴胡这种普通针剂还是太行山唯一的一家药厂生产的，阿司匹林都没有，我们利用人脂，解决了部队战伤很多困难。邓政委说过，救活一个红军战士，等于增加了一个连的战斗。人道主义只能为阶级斗争服务。

Y(时任某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把我们困在太行山区，两次出击陇海线，都被打了回来。根据地的72万军民生

存都成了大问题，中央决定我们千里跃进大别山找活路。进入大别山，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土豪，目的不是为穷人分田分地，而是军队初来乍到，要吃要穿求生存。其实，大别山真正的土豪没几个，中农居多，凡有猪的，有牛的，不管成分如何？都给弄来保住我们的肚子。老百姓反感，组织起来刀枪相向，我们下到地方的工作人员被杀的不少。

大别山原本是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十多年后回来，竟成了老百姓的敌人。老百姓口传：一怕中央军，二怕还乡团，三怕共产党。尽管这一左的政策只有三个月，老百姓心目中的红军形象已大大丧失，直到淮海战役胜利，老百姓对解放军才开始笑脸相迎。

M(旅作战科长)：我们在大别山抓了100多地主和还乡团，带着走了几天，实在累赘，就决定干掉，我把他们带到一座山上，找一处悬崖，我让战士用枪刺挑，挑一个往沟里踢蹬一个。下面全是黑森森的树丛，不须去掩埋，我们是夜间杀的，用手电照一下，一刺刀就完事。

那一年，我们和国民党在大山里兜圈子，条件恶劣，天天行军，带着的战俘就成了包袱，凡负伤的，还要扶着架着，更是累赘，我决定一律处决。人道不人道，只有天知道。

B(时任某团宣传股长)：我们刚进大别山，要生存，什么人的利益都可以去侵占。到一个地方，把老百姓抢个精光，吃个精光，人家就跑到山上去骂我们，说跟日本鬼子进大别山一个样。你骂你的，我干我的，看到哪家房子好，就进去搜刮，有米就煮，有猪就杀。我们团长穿了件日本军大衣走在大街上，一个老百姓以为他是中央军的长官，跑 come 向他报告，老总，我们刚抓到一个共产党。团长一听，抡起马刀就把这个老乡砍下半边脑壳。

L(时任某团后勤管理员)：我到一家布店，老板见我又是倒茶又是递烟。我向他借布，老板问要几丈？我说，通通借，全国解放后，政府会来还给你的。左说右说老板就是不行，团长来了，见我光动嘴不动手，火了，怎么还不动手？老板娘见我们搬走她全部家当，跪下来抱住团长的腿哭嚎，老总啊，留下点吧，我们要活命呀！团长说，我们的命更要活。一脚踢开了她，一挥手，统统抱走！

L(时任某旅组织科长)：当时，我们在大别山对待乡绅、地主也

讲政策，通常用了四种手段，就是白、黄、黑、红。比如搞粮食。见普通财主家库粮有十来石，就掏白——三四块大洋。财主嫌银子少，不干。马上又掏出黄——一只三四钱重的镏子，财主也不干。然后拿出一块黑——烟土，斤把重，既不是川土也不是云土，是当时打家劫舍来的本地种的老土。更是不值钱。如若财主还坚持不要，就来红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这帮人不需要请示，谁都可以动手。

W(时任团后勤处长):我们还有一招,就是把地主的小老婆抓来,要地主拿粮食来换。地主要是耍赖、顽抗,就当这个地主的面,把他小老婆宰了,然后再把刀架在他脖子上。这个办法很奏效,地主都能乖乖地交出藏粮来。有些人是不是地主,我们也弄不清,反正不交粮的就一视同仁。当时,我们远离根据地,没有任何后方支援,为了部队生存,不得不干些日本人干的事。

X(时任某旅旅长):我们打开了长江边上的一个县城,俘获了敌人两个保安团3000多人。对土顽,我从不发善心,也不怕杀错人,凡要杀的,都是由我验明正身,那时无法搞什么政审,由我来看他们手上是不是有茧,没茧的,绝不是劳动者,宁杀勿放。

我们用了十几条船,把俘虏分批地拉到城北的一个大湖的当中,用木棒打俘虏的头,敲一棒就往水里一推。那几天处决的大约近三千人。保安团的家属都远远地站在山头上大喊大叫:“不能杀啊,他们为了有口饭吃才当保安团的。”阶级斗争是我们的尚方宝剑,不杀就会有人指责我的立场有问题。后来,国民党来了,从湖里捞出尸体,拍了照,他们在武汉的各大报纸上大肆宣传,硬说我们杀了6000多人。

后记:初稿落笔,虽系受访人的实话实说,仍忧惧文字风云的不测,敬请几位朋友斟酌指正。一位熟知军史的长者,毫不留情地指责我离经叛道:“为什么要这样写?”“你这是反党乱军!”另一位是70后的军旅作家,疑惑“我军哪会有这种事?”“难以置信。”如若将此文见诸网上,很可能招致“官二代”怒不可遏的抨击。

我军滥杀之事,是不会被记入史册的,仅在几部回忆录中略有披露:1930年代初,两次清除莫须有的“AB团”,毛泽东率先杀掉红四军干部战士一千八;鄂豫皖的张国焘,整肃红四方面军干部两千五百多;夏曦在湘鄂西杀的只剩下六个共产党人(三个苏区就杀掉11万人)。红

军仓皇长征，行动路线保密，邓发下令，把数以百计走不动的伤员一律处决。残杀自己的人手下都不留情，何况杀的土顽是日伪蒋帮多重的敌对身份。

我的访谈者对这段史实的叙述，都无顾无忌甚至是理直气壮的，认为军队就是开打仗铺的，杀人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土顽罪有应得。在战争年代，当事人都有卓越的功绩。建国后，有的已是大军区、军兵种的司令政委，有的转到地方当上了国防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其中有三位政治局委员，三位中央委员），一般的也位居军师两级的中高层，他们都是我尊敬的前辈，我既不能回避不光彩的历史，又不能把已去天国的魂灵拉回来接受当今文明社会的“洗礼”，只能隐其姓、埋其名地就事说事。我要告诉公众的是，这场反人类的屠杀是党的意志，是党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上留下的遗迹。

20 世纪的 50 年代初，败落到台湾的国民党，将捕获的中共地下党一千余人杀害。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执政后，对此做出了人性的反省。中共也亟须对历史反思，但愿腥风不再吹起八一军旗，我军的建功立业，不再是血洗阶级仇、民族恨。

我军的武装征粮

——革命党代替了刮民党

重庆刚解放，进入四川的人民解放军，都要到这座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来吸收一批小知识分子。重庆的110多所大中学校的布告栏里，三天两头就有军政干部学校的招生广告，内容大体是，为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需要，有志报名投效的，须经家长、学校的同意，考试录取入校后进行军政培训，学食杂费全免，还每月发给学员津贴，结业后分配到部队担任各种职务。这一征召很有吸引力，我就读的南林中学，不到半个月就招走三批，上课时班里的座位空了一半。大势所趋，我也认定当兵是良策，既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又提前谋得一份公职。我到35师的干校招生处报了名。

一

考试那天，附近7所院校200多学生都集中在我学校的礼堂，试卷两张纸，有名词解释和问题回答。如，说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你是怎样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你的志向是什么？

我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回答一般的社会问题和形势，都能粗略应对，只有名词解释让我犯难。我偷瞄邻座的试卷，他在“布尔乔亚”后面写下“这是个政治经济学名词”，对“阶级”的解释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如军队的连长排长，或工厂的厂长科长。我照抄不误。交卷时，我随其后观察他，年纪和我相仿，十七八岁，矮胖，戴了副深度眼镜。我对他笑了笑，以示谢意。

第二天发榜，在录取的35人中，我是倒数第五名。

又过了一天，来了两名军人，召见我们学校被录取的七名同学，

要我们马上入伍。我急忙回宿舍把被子衣物打成捆，给家人发信，说我已参加人民解放军了，让他来取走我留下的行李。

就在这天下午，我们一行给带到土桥镇一家大院，军干校从各地招来的新生都集中在这里，100多人编成三个区队，大学生为一区队，中学生为二区队，女生为三区队。

没想到，考试时邻座的那个小胖墩也来了，还跟我编到一起的第六班。他一见我就像见了熟人，兴奋地告诉我，他叫姬云，父母坚决不让他参军，把他关在屋里，母亲哭红了眼，他是半夜逃离的。

我被姬云的行动感染了，说：“你比巴金《家》里的觉慧还伟大。”

傍晚给我们发放棉军服，我俩都争着挑小号的，左挑右选，穿上身还是大了一圈，把裤腿挽起，勉强强像个军人。

班长是浙江入伍的，要我们晚上开个班务会，谈自己的家境和个人简历。他借来房东的大脚盆，直径有一米多，盛上副班长烧的一大盆热水，全班十个人围坐在盆边，边烫脚边开会，方法新鲜，唤起我们说话的热情。

姬云激动的第一个发言：“我是璧山县人，是个八百多担租的大绅粮，父亲在重庆做酒生意，是川康银行刘航深的股东。我弟兄仨，大哥是国民党空军机场的上尉机械师，跟国民党去了台湾。二哥在南京上大学，我在学校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青社，我是为共产主义理想来当兵的。姬云还说自己性格强，好跟人抬杠，出语伤人，今后大家要多多包涵。姬云的自我介绍明迹坦心，一圈人搅动水的脚停止了，眼睛都望他那张胖乎乎的小脸——他已经不再像是个孩子了。

这时，35师组成璧山军分区，战斗部队都在军分区所属的铜梁、璧山、大足、荣昌、永川、江津等县，展开剿匪。军干校拉到永川县开始了政治教育，由师宣传科长给我们讲社会发展史。一天，我们正出早操，城外枪声大作，是土匪攻城，我们给带到住地后面的小山上的竹林里隐蔽。仅个把时辰，土匪就给打垮了。

一千余人土匪来攻打永川城，城里只有一个警卫排和担架连，再就是我们教导队一帮手无寸铁的新兵。这帮土匪由一个“一贯道”的点传师组织指挥，他们都喝了朱砂酒，神志迷茫，人人手握一把大刀，口念咒语，神神乎乎地向城里冲来。留守的师副参谋长不信邪，带警

卫排和担架连和土匪对抗。土匪虽神勇，到底是乌合之众，我们人数虽少，都有战争经历，战斗仅几个小时，大刀片子是敌不过冲锋枪的。击毙匪徒 41 人，我军伤亡 11 人。

师政治部抓住这一胜利的机遇，宣传我军的强大和威慑力，就在公园布置了展览。正是星期天，教导队学员三三两两的自行前往参观，我和姬云一起去了。在公园中央的广场上，摆列了四排土匪的尸体，都是浑身血污，瞪眼咧嘴的，形象十分可怕。

在广场边的一排平房里，传来呼天唤地的哭喊声。我和姬云赶过去一看，一百多土匪伤员，正在由县医院和师门诊部的医护人员进行治疗。在公园西侧长长的花廊里，席地坐满了被反绑双手的俘虏，由警卫排的战士看守着，约 300 多人。当我和姬云走到他们中间，土匪们一个个都仰头怒目而视。

我见一个中年匪徒面善，便在他身边蹲下，问：“你是哪个乡的？”不答，又问：“你们为什么要来打我们？”

对方突然火起：“是我们打你们？你们不先动手，我们会还手？”

周围的匪徒都靠了过来声讨：

“告诉你这个小共产党，我们不是土匪，是老实巴交乡里人，是你们的工作组把我们逼的没法子了，才和你们对着干的。”

“国民党给赶走了，还以为你们真是李闯王，哪有这么好的事哟。共产党才来几天，屁股还没坐热，就迫不及待地向老百姓要粮。”

“过去，我们叫国民党是刮民党，现在呢，该叫你们是刮命党了。”

这帮人上断头台还如此猖獗，我心中怒火升起：“你们都听着，谁反抗共产党，就去丰都城见阎王。”

姬云不再让我说下去，拽了我一把：“走吧。”

我给他拉出公园大门，火气还未消，姬云说：“你听了看了，明白吗？他们不是匪帮，都是有思想的农民。”

“你怎么这样说啊。”

“要是真正土匪，求生心切，哪会对你恶言恶语？前些年，我乡下的家，县里下来加收赋税，被佃户们撵走了。这些人上山落草，都是乱收粮款引起的。”

“那是反国民党啊，现在竟然敢反共产党？”

“真要是我们党的政策跟国民党一样，农民就会用锄头把共产党赶出川。”

二

在回队的路上，姬云像是心事重重，说：“你陪我去一趟我二舅家。”

“你在永川还有一门亲戚？”

“我二舅家就在城里，他受我母亲之托，今晚要接我走。”

“开小差？”我惊恐，“那得了，抓回来要枪毙的！”

“璧山那边已来人等着我走，二舅要我马上表态，我要你一起去帮我说说。”

姬云又说，他二舅是中央大学毕业的，对共产党有看法。

我们走进一条巷子深处的一家院落，两进门，很宽敞。在堂屋见了姬云二舅。他50开外，一脸络腮胡，胖胖的，穿了件阴丹蓝长衫。

姬云向二舅介绍我：“这是我同班战友，重庆人。”

二舅点了点头就说开了他的正题：“云云，你娘决心已定，无论如何你得马上走，形势很危急，棒老二还会来的，璧山老家那边给你准备了一抬滑竿，来的人脚力好。你娘说了，先回重庆，待不住就去上海，或去美国。远走高飞谁也奈何不了你。”二舅又说，“你出身地主兼资本家，在共产党军队是待不长久的。我认为，你娘的安排很合适，不要让你妈伤心，你要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好好想想吧。”

“你要帮我妈的忙，不会绑架我走吧？”

姬云的调侃引起二舅笑了：“那该怎么办你？”

“好办，我给妈写信，就说你二舅已经仁至义尽了。”

“听听我的忠告吧，国民党走之前，永川就给他们把田赋收到民国48年了（公元1959年），老百姓已是困苦不堪，共产党来了，要安抚民心，就应该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没想到，他们一进来要的粮还比国民党多，拿不到粮就抓人，要活命就得拼命，你看看，光永川四乡，到处是梁山。我支持你娘的做法，她要你走向自由世界，那里天高地

阔，可以发挥你的才干，你想留在共产党的圈子里，就凭你的地主资本家出身，只能干耗你一辈子。”

“二舅，我也忠告你”姬云已不顾长辈颜面：“你要不改变你的反动立场，你也难在新社会生存。我有我的人生道路，走革命的大路是不会回头的。”

二舅没词了，无奈地说：“好，好，十头牛也拉不回你了，好自为之，去走你的路吧。”

二舅进屋拿来文房四宝，姬云扶在桌上，用毛笔疾书了两页纸装进信封，写上“母亲大人亲收，儿姬云跪禀”交给了二舅。

我和姬云告辞出来，在院子见到一乘带篷的滑竿靠在墙角，姬云说：“要是今晚我坐上它，也许就跟你永别了。”

回到教导队，我一五一十地把姬云拒绝当“逃兵”的事，向班长做了报告。第二天，教导队集合早点名，队长站在队前对姬云做了专题表扬。说他立场坚定，不为家庭诱惑，已具有革命军人崇高的品质，要求全队向姬云学习。青年团组织也来找他谈话，填了组织发展对象表。

姬云在我们这批重庆入伍的兵中，已成了一颗耀眼的明星。

三

匪情越演越烈，从敌情通报中得知，永川各乡土匪已聚集三万多人，教导队再不能闭门论道了，受命和战斗部队一起清剿土匪。

我们这群刚穿上军装的学生兵，没有一点使枪弄炮的本领，上阵前，师派出警卫排给我们搞了三天的战术教练，如利用地形地物、出枪、射击、卧倒、起立、冲击。最后，还让我们对着山壁的石灰圈打了三枪，于是，我们就成了武装战士。

我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在临江场的一片石谷子滩上。那里有座独立的地主庄园，有石墙，有碉楼，一股有枪有炮的土匪坚守在那里。我们教导队把他们团团围住，就是不敢攻击。

队长是战争过来人，他看到庄园前后都是开阔地，我们这帮半拉子兵冲上去就是送死。他派出通信员求援，找来了一个战斗连队，

战斗连身手不凡，攻击有序，在小炮、机枪的掩护下，动作敏捷，冲到院墙根的一个班，迅速投出一排手榴弹，硝烟还未散，碉楼里就伸出了白旗。

从大院里押出的俘虏有 23 人，穿的是国民党军装，原来是国民党正规军垮下来的一个建制排。

姬云说：“幸好队长冷静，硬是要让我们冲锋陷阵，全给打趴了，赔了命还得了胜利。”

第二次战斗更出奇。

一天，有三支部队一起宿营跳石乡。从泸州过来第 10 军的一个连住在场尾，住场头的是我们师著名的老虎连，我们教导队住场中间。这么强大的阵营住在一起，是在剿匪中少有的事，大家都放心地高枕无忧了。

半夜，土匪专选教导队住地摸进来了，我哨兵正抱着枪睡觉，土匪抓走三男两女，放了几枪就跑了。三支部队在惊恐中乱打一气，打到天明，才发现自己人在打自己人，互有伤亡，又互相指责，军分区处分了我们队长，说是他的失职。

被抓到土匪窝的两位女同胞，当了压寨夫人，三位男同胞，在土匪营垒中出任要职，一位当政治部主任，另两位是副主任，给他们做宣传，揭露共产党杀人、夺粮。几个月后这几位又被我军俘获，批判了他们的立场，就打发回家了。

师领导看到学生兵集中一起，只能作无谓的牺牲，决定分散放到战斗连队当催粮员。我们班分到 03 团的警卫连，一个班一名，我在二班，姬云在一班。这个连全是老兵，武器优良，班有机枪，班长副班长配冲锋枪，战士手中有日本人的三八大盖。学生兵仍背汉阳造。

刚进战斗连队，又经历了一场生死之战。

土匪对付我们是小股分散游击。匪民难分，你闻枪声追过去，他们把手中枪扔进草丛，等你到跟前，他已拿起锄头锄地，让你没法抓人。西山是土匪的大本营，为打击土匪，我们转移到来苏镇西的一家地主大院，每天外出催粮，都是一个班集体行动。

一天，我们二班进山催粮，刚进一条山沟，两侧山上枪声骤起，头顶上子弹在嗖嗖横飞，我吓得滚进了路边的水沟，环视四周，全班

都各自找了个坑坎蹲下来举枪还击。这时，躺在田埂后的班长猛然一声喊：“全班跟我走！”大家跃起，勾着腰向后撤退。我没战争经验，竟从水汪汪的稻田，连滚带爬地跟了过去。他们都在一片坟地里停下来，各自选了个卧位，霎时，机枪，冲锋枪响成一片。

我是最后跑到坟堆的，也伏在一座坟上，懵懵懂懂地打了一枪。正射击的副班长回头看了我一眼，喊道：“姿势低些，向我靠拢。”我爬到他一侧的坟堆上，迷迷糊糊的又放了一枪。副班长又喊开了：“瞄准射击”。我见他把腮帮子紧贴枪托上，沉住气在用冲锋枪在点射，我这才通过缺口、准星向山上的人连连放枪。

山上的土匪是从三面夹击我们，我被子弹掀起的土块，扑打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我们和土匪相持了个把小时，增援我们的一三班赶来了，强大的火力像炒爆豆，土匪招架不住了，排长起身一挥手：“冲上去！”我们冲上山，土匪们跑了，留下7具尸体和13名伤员，排长要继续追击，令二班副带我和姬云留下看管俘虏。

俘虏伤势不轻，都躺在草地上呻吟。姬云撕下他们的衣袖裤腿包扎，问土匪些眼前的事情：“你们是那一股棚子？”不答。

“司令是谁？”不答。

“你家住哪里？有多少地？为什么不想缴公粮？”

姬云走到二班副眼前小声地说：“我们能不能放走他们中间的一人，要他回去带人来搬走死人。”

副班长一听瞪大了眼睛：“那怎么可能？要犯错误的”。

“我们应当讲人道主义，况且他们还不是真正的土匪，上头要问，我来承担责任。”

二班副望着姬云那张天真的胖脸笑了：“你要是当了团长营长就能办到。你好好干十年，我就听你的发号施令。”

姬云说：“我们总不能不讲点政策吧”。

二班副认真了：“讲政策是上级的事，我们当兵的只有执行，小姬啊，你还是个小兵杂子，嫩着呢。”

大队人马回来了，连背带拖地押走俘获的伤匪。把几具死尸留在那里。

四

武装征粮，组织严密，每个连队都有征粮领导小组，成员有连长，专负责剿匪；指导员，抓思想教育；来自师的组织干事，负责调查民情；团的军务参谋，收集匪情；他们三天两头要向上汇报。地方来的是一位收赋员，专管缴来的公粮过秤入库。组长是团后勤副处长，抗日老兵，我们几个学生兵叫他老总。

国民党在城乡的统治，一直是实行保甲制，政权垮了，我们不再依靠保甲长，仅用保甲户口上门，所欠粮户催粮要款。根据保甲住户的分布，战斗班分片包干。我们班包干的第11保，有57家欠粮户，住户都是山区的单门独院。每天一大早，每人带上一张饼，一壶水就上路，跑了十几户人家天就黑了，天天无功而回，还累得腰酸腿疼。

我们没招了，向处长报告：“地主都躲了，留下老太婆和我们磨牙，家家叫苦，要完成征粮任务，得牛年马月。”

处长没指责，也没指示该干什么，只说：“明天我跟你们一起去。”

第二天，他跟我们进到一户小地主家，在屋前屋后转了一圈，就用手中的一根铁条，捅了捅堂屋的一堵夹墙，说：“打开！”

我们用枪托砸出条缝来，伸手一摸，是谷子，大家七手八脚地从墙里弄出十几挑谷子。

又到一户人家，处长见厢房一排立柜下的地面有异样，要我们掘开，弄出几袋麦子来。又到一个大地主家，在后院山坡林子里的深基里（停灵的地方），处长让我们撬开石地板，取出了一包细软，还有一支金簪子和一百块银圆。

处长的精明和高超本领，让我佩服不已。晚上，我到他的住屋找他闲聊，处长兴致勃勃，诉说了他的见闻和经历。他说，在战争年代每到新区，我军都得采用非常手段筹粮筹款，军队要生存，要打仗，仁慈不是军人的本分，军人的天职就是听从党的命令。错了，党会纠正，不会让你我承担责任的。你知道吗？四川确实有粮，国民党的田赋多收了八九年，未见有人饿死。今年，全川要完成征粮30亿斤，永川是大县，要缴两千万斤，比国民党还征得多。我们要粮，不只是为了入川的60万人民解放军，俘虏起义的国民党50万，和百多万公教旧

人员。还为了支援那些出现粮荒的地区。这么大的群体安顿不好，天下真会大乱的，我们今天要粮，无非是死几个人，牺牲小我，顾全大我，不要怕人家骂我们在抢粮，为人民利益就是要抢，这是党给我们的光荣又艰巨的任务。

处长一席话，除了令我感动。也增强了我对共产党的理解——共产党就是会共产。

处长又说，大别山穷得叮当响，我们还能搞到粮，为什么在天府之国却征不到粮？我看还得用大别山的老办法，掘地三尺搞粮。

山里人，家家有狗，我们每天一进山，狗的吠声就震山响。欠粮户一听见狗叫就打开笼圈，把猪牛羊鸡鸭鹅赶到山林岩边野放。我们班花了半天时间撵山捕捉，抱住了三只鸡牵回一头羊。

傍晚，姬云来叫我，要我去炊事班去看稀罕。我俩来到炊事班的后门前，见阴沟边有一条死狗，墙根下躺着一只瘦骨嶙峋的小猪，我莫名其妙，问姬云：“你让我看什么？”

姬云说：“这是处长今天的杰作。”

“怎么说？”

“处长今天跟三班出去催粮，这就是他从农民家收来的最后的家当。”

我说：“我们可能还不了解处长，他的好多做法是来自上头，就是牵猪宰羊，也要折成粮款。”

“你听他说的。我看是他自己为邀功别出心裁。”

我们正说着，来了几个战士，七手八脚把墙根的那只哼哼的猪拉了过来，炊事班长端来只木盆，战士把猪的头部摁在盆边，班长用手中的一把尖刀使劲地插入猪的胫窝，随着嘶声狂叫，一股血从刀口处喷出，猪四蹄踢腾了几下就没声息了，炊事员提来热水，反反复复地往猪身上浇了一阵，就动手刮毛，卸下猪头，破肚取出下水，劈成两半拉。我估摸 50 多斤。接着，这伙人如法炮制，也把死狗收拾了，剥出的狗肉有二十来斤。

忙活了个把小时，领头帮厨的一排副洗了手，走到姬云跟前，说：“打牙祭了，你满意了吧。你们小知识分子，就喜欢没天没地地指责她，指责那，好像就你正确。”

“难道我不该说？这里的猪、狗都是从农民手中抢来的，还有理吗？”

我看要争吵开了，赶紧把姬云拉走。

收赋员很辛苦，每收百十来挑谷子，就让连里派出一个班，武装护送到县粮库。半个月过去了，来苏镇收缴的公粮才150挑，收赋员说，收上来的公粮不到2%。

收不上粮，处长很挠头，要各个班抓几个顽抗分子回来由他来对付。

五

没几天工夫，每个班都抓来三五个抗交公粮的，大都是些地主的婆娘或帮忙看守家院的三亲六戚。四五十人都关在厢房。

我们住的地主家，进门是块百十多平米的院坝，连队每天的早晚点名，一日三餐都在这里进行，自抓来抗粮户，这里就成了刑场，行刑由处长做示范，全连列队观看。

施刑对象是二班管辖区一个有百十担租的地主。处长执刑，二班全体出动当助手。班长先端来张条凳，一端顶住院墙，两个战士把那个约六十多岁的地主带来，让他贴墙坐下来，一只腿脚平放在条凳上，一个战士用根棕绳绕了十几圈固定，两战士拿了根竹杠过来，横向地死死抵住地主的胸部，处长脱衣挽袖，伸出双手抓住凳上那只脚往上提，并吩咐身边的战士：“放砖！”战士放了两块，地主痛苦地嗷嗷叫。处长问地主：“好受吗？”对方只是叫唤，没回答。处长又抓起脚跟提起：“再加砖！”战士忙又塞上一块。地主叫声更是惨烈，喘着气说：“饶了我吧，我回去卖田卖产给你们”。

“再加一块！”

地主在嚎叫中昏过去了。处长挥了挥手说：“先停一下，给他浇点水。”

副班长端来一盆水洒在地主头上，没多会，地主缓过劲来，处长俯下身问：“你想不想交？”

“我家实在是没有了啊！”

“你来再添块砖！”处长吩咐在他近前的姬云。姬云不动，愣愣地望着处长。“你傻了？”处长气得眼都红了。

姬云依然纹丝不动，处长火了：“你给我滚开！”

全场人都愕然地注视着走开的姬云。

处长昂起头，对大家说：“都看见了吧，共产党人就要这样斗地主，不斗我们就翻不了身，打下的江山就不稳固。谁右倾，谁同情地主，就不是个革命者。”

不一会，二班又带来一个40多岁的地主婆，给她的惩治不是坐老虎凳，是让她跪在条凳前，两个战士压住她后背，一个战士反扭住她的左手，班长把她右手掌摁在凳面上，处长用了根炊事班拿来的擀面棍，使劲地来回碾她的手指。

地主婆痛苦不已，拼命地挣扎，呼天唤地，那声音尖利扎心，我连连地打了几个冷战。我注视周围的战士，他们打过仗，见过流血牺牲，眼前他们也闭上眼，有的掉过头，不忍目睹这幅惨景。

地主婆痛晕后回过神来，说“放我回去，我会去借来八挑谷子给你们。”

处长说：“给你五天时间。”

处长转过身来对全连观看的人说：“从现在开始，都照我做的办，粮食就在板凳上。”

放手让大家干，连长担心动刑动过了头，走到队前告诫：“手不软也得留点情，千万别给我整死了人。”

连队散开，各班都找来条凳，找来竹杠，找来绳子，从厢房各自带来抗粮人，学着处长的做法，在受刑人脚跟下一次次的添砖。一时间，小院坝里哭声震天。

我们班由班长主持行刑。我负责压腿，刑罚了三人，叫喊声撕心裂肺，都口头承诺交粮交款。

一天光景，抓来的人几乎人人都过刑一遍。

六

晚餐是在院坝集体开饭，以班为单位，围住菜盆扒拉，我快吃

完了，指导员端着碗到我跟前说：“吃罢饭，你、姬云，我们一起到院子外走走，交交心，你是他好朋友，多开导开导。”

我洗了碗，便跟指导员到了院门口，姬云正坐在石阶上等我们。我们沿着田埂，到了对面小山上，那里有几块光亮的石头，就坐了下来，指导员先说开了。

指导员是山西人，1946参军，贫农，他跟我们谈起了他家乡的土改：“地主是压在农民身上的大山，不清算地主，农民得不到翻身。我们村的地主批斗后，撵出家门，给他安了个窝，让他们自食其力。我家分得五亩地，两间房，还得了些箱柜衣物，叫浮财。”指导员说着，脸上露出喜悦之情。按姬云好争辩的个性，指导员的话会引发他抗争的。但他却很平静地说：“斗地主，侮辱人格，抢走财产，我的看法是不合法的，我认为，应该是减租减息，让地主交出过多的土地。比如，一个地主给他留下二三十亩地出租或自己劳动，和和平平地相处，有什么不好？非要弄得你死我活的，国家还能长治久安吗？”

我没想到，姬云的思考要比我们高出一大头。我同情他的观点，说：“今天我们把人整得太惨了，就没有别的法子要粮？交不出，明年再来不行吗？”

“我们要粮，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光靠一张嘴是不行的，对付地主阶级，就得给点伤筋动骨，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他们就皈依佛法了。”指导像在上政治课，一本正经。

姬云问：“其他地方也像我们这么蛮干？”

指导员说：“这是邓小平政委的决心，我们完不成任务，就是我们的失职，要追究责任的，谁也不敢怠慢。”

姬云不再言语了，他的头偏向一边，望着下山的落日。我也无话可说，站起身来：“回家吧。”

第二天，挑粮救人的来了一串，还有送来银圆和黄货的。我们班看管的一户地主婆上门来央求处长，请求宽限些天，她去重庆向儿子要钱来折粮。处长问：“你能去要来多少？”

地主婆说：“三十块大洋。”

“够吗？”

“不够再想办法，我还有的几户亲戚，他们会救我的。”

处长见她确实山穷水尽，严厉地说：“去吧，下不为例。”
地主婆磕了个头，胆战心惊地走了。

就在我们用刑惩征粮之时，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我们紧急收兵回营整训，准备上朝鲜战场。我们离开后，由区县新建的武装毫不手软地继续在老虎凳上“征粮”。

志愿军尸横加里山

在我军军史上，关于失利的战役，很少有翔实的记叙。那些有损我军“伟大、光荣、正确”的败绩，不但史实简略，还给修理得面目全非。比如，解放战争的1948年春，刚组建的西北野战军，仅有5个纵队七万五千人，彭德怀急欲打一次大战显显身手，他以配合我军的大反攻为由头，不惜老本地率4个纵队5万人马，3百里奔袭宝鸡（古称西府），想出其不意，钻进敌人老窝捞一把就走，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遭到胡宗南联手马家军11个旅的夹击，损兵折将两万三（伤亡14973人，失踪、逃亡、病故8407人），要不是警卫人员的机敏，彭老总和他的夫人浦安修也成了胡宗南的阶下囚。这一史实，在我军厚重的军史记事上仅留下了两百字，“西府战役”的称谓没有了，改名为“外线出击”，不敢指出是彭老总指挥的失误，只说：“被敌人切断后路，处于被动态势”，“突出重围”。如此混淆视听的军史，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都少见。

一

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亲历的朝鲜战争的第五次战役，这本是一场一败涂地的战争，被描绘成我军的“惨胜”，载入军史的是颂扬我军英勇顽强，战绩显著，是毛泽东的决策英明，损失不可避免，是面对最现代化敌人的必然付出。

我参加过五次战役，我所在的参战部队是12军第35师，李德生是师长。当时，我是师野战医院的文化教员。战争开始，我临时受命登记伤员和带领挑夫班掩埋死者，我目睹了我们师5000多人，仅在两天的时间里是怎样倒在加里山战场的。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参加

了12军的军史写作，搜集的第五次战役史料均真实可信，我采访的亲历者都说了真话，为我这个幸存者还原历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朝鲜战争一开始就在彭总身边的作战参谋王亚志告诉我，第五次战役是毛泽东确定要打的，彭老总把时间提前了。因为彭总担心刚从美国调来的两个师可能在元山港登陆，切断我军的后路，于是我军在损失惨重的第四次战役之后没来得及休整，又匆忙从国内抽调来第3兵团和第19兵团，接着打第五次战役。彭总在给毛的报告中说，即使伤亡五六万人，也在所不惜。他认为可以牵制更多的敌人兵力，迟滞敌人的登陆企图。

战役前，我军在三八线上摆开了10个军，4月22日开始，先从西线发起突击，我们师是先头，一直打到汉江边，斩获甚微，彭总不甘心，5月6号发出打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预令，把主战场放在中线，用我6个军去吃掉南朝鲜的4个师。我们马不停蹄地移师昭阳江边，12军作为“强的军”划归九兵团指挥，兵团司令宋时轮给我师规定的任务是突破加里山，切断洪川通向杨口的公路，配合27军围歼伪五师。

朝鲜三八线上大山纵横，加里山是群山中的主峰，海拔高1050.7m。侦察分队探明，山上的防御阵地在半月前就筑成了，敌人在我进击的15公里长的道路上已布下雷区。让李德生揪心的是，比地形更险恶的是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35师入朝时兵员有16000，经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穷追猛打，全师伤、亡、掉队3000多人，兵团要35师在24小时内拿下加里山主峰。

这是一场血拼。师参谋长张镰斧战前作出准确的预测，至少要用5000人的生命代价才能越过这道天堑。攻打加里山，35师的部署是，O4团开路，O3团攻山，O5团阻击。李德生立下军令状：谁要是不按规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师团有权就地处决失责的干部。

战场纪律是严酷的，巨大的战斗力也由此产生。你要往后看，是自己人的枪口；往前冲，是敌人的子弹。每个干部都知道自己面临生死，人人惊惧，拼死向前是最好的抉择。

二

1951年5月16日晚6时30分，35师涉过昭阳江向加里山接敌。从昭阳江边到加里山山脚，是一条山间小道，行程10公里，沿途地雷密布。O4团是师的前锋，侦察连在前头清除敌人的警戒，工兵连紧跟其后排雷。敌人设置的雷品众多且隐蔽，踏雷、挂雷、绊雷，防不胜防。效率就是生命，发现疑点，就撒把炒面做标识。冲锋的战士在干部的吆喝下几乎都在小跑，地雷在他们脚下响起，硝烟起处，一个班炸光了，另一个班立马跟上去，一个连趴下了，接替的连队继续向前突击。鲜血染红了一路，尸体也摆满了一路。空中有强击机俯冲轰炸、扫射，地面上是千百发炮弹织成的一道道弹幕火墙，炸裂声在山间轰响，狂飞的弹片削光了两侧山坡上的树林，整个山沟是烟的天空，火的海洋。

我们医院在O4团后面边跟进抢救伤员，百十号人全都上阵，我们包扎了两百多伤员。我的任务是登记伤员，带领挑夫班埋葬死者。沿途已牺牲了好几百人，我让挑夫班将死者顺到路边，给后续部队上来处理。

已是下午时分，敌侦察机发现了跑在我们头里的一个运送弹药的辎重连，炮弹如雨点般飞来，顿时，50多匹牲口和百余名驭手，在烟火覆盖的三百米地段上，被打得马嘶人叫。炮火刚稀落，我们的医护人员立刻奔过去抢救，存活的已是肢残腿断，气息奄奄。

医院投入的三个救护班是战前组织的，她们都是刚参军的女孩子，原服役各个团的宣传队，战争要求她们救死扶伤，都集中到了师医院，只经过几天的野战救护训练，就走向了弹光血影的战场。她们要为伤员清理伤口，注射破伤风疫苗，包扎或上夹板，虽不熟练，都做到了尽心尽责。

我的同行俞寒，他不但要登记伤员，还担负着清理死者遗物的任务。凡担架抬来已无法再挽救的，俞寒就在死者身上搜寻遗物。经他搜出的物件都注记上死者的姓名、单位，卷成小包大包，交给担架队长转送团的组织部门。他工作细心周到让我感动。我说：“你太认真了。”他说，“他们都上天下地了，我的工作就是让他们魂归故里。”

我正带领挑夫班搬运死者，一个老护士跑来呼唤我，说玛丽牺牲了，我的脑袋轰然嗡响。教导员要我去处理，我急忙领着两个挑夫，随老护士跑到一处干涸的水坑边，见到玛丽侧身躺在那里，头发散乱，面容惨白。老护士告诉说，玛丽在她一侧包扎一个炸掉左腿的驭手，血止住了，为了防止他再受到创伤，玛丽把昏迷的伤员背到低洼处，刚放下伤员，一发炮弹落到她身边的一块岩石上，她倒下了，再也没醒过来。我让两个挑夫把玛丽的尸体抬到一处山壁脚下让她安息。

俞寒听说玛丽牺牲，赶了过来，他在玛丽身上翻找了一阵，从颈脖子上取下一条带十字架的金项链。他告诉我：“玛丽是我们医院第一个牺牲的，她的献身是有颗仁慈的心，下葬要隆重些。”他的语气沉重。我马上让挑夫班长按规格挖坑，长两米，宽 50 公分，深 50 公分。我们抬起她的躯体，轻轻地放进坑底。俞寒不想让泥土污损她那张安静美丽的脸，找来些石块架在她的头部上面，然后才盖上土。一个圆圆的土堆垒成了，没有标志，没她的名字，她将永远躺在这块她不该来的土地上。

玛丽本姓李，是个大学生，父亲是一家银行的高级雇员，母亲是华侨富商的女儿。她背叛家庭走进革命阵营。她来到医院，特立独行，性格豪爽，一说话少不了 yes, no, 称呼战友前置词都带 miss, mister, 老兵说她是布尔乔亚，外号叫她玛丽。晚会上，她跳的百老汇的踢踏舞，姿势健美，她曾希望像邓肯一样，做个现代舞蹈家。来到医院后，她又想当南丁格尔。我喜欢她的热情奔放，劝她争取入团，她放声大笑着说：“我是个自由的小鸟，不会进你们笼子的。”

俞寒两眼含泪地说：这只小鸟无声无息地结束了她美好的年华，她本不该飞向战场。我也心生悲悯，视野模糊了，眼帘上仿佛垂下了一缕黑纱。

俞寒对待玛丽之死感情真挚，让我对他从心底生出好感。这么善良的人为什么不能入团？俞寒从军政大学毕业后分配来医院的，和我一样任职文化教员。他 23 岁，大学肄业，当过小学校长。我们相处才两个月，他举止庄重，待人和善，文化素养要高我一头。入朝前，我在一次团小组会上提出俞寒应入团。小组长说：“他人团的事由党支部来考虑。”我问：“为什么？”小组长说：“你就别再过问了。”

我找到教导员，教导员回答：“他有历史问题拖累，当前又出现立场问题，不但不能考虑。而且你们对他还要有所警惕。”

俞寒和我聊过他的家，父亲当过伪保长，哥哥是国军的下级军官，去了台湾。教导员指的立场问题，是入朝前，全部队进行仇美教育，小组讨论会后，他和教导员有一番辩论。俞寒认为，三八线是国际条约界定的，金日成借边境纠纷大举进攻韩国，想一统江山，联合国出兵是有理由的，美国人不是侵略者。教导员辩不过，记下小账，要我们团小组对他提高警惕。进入战场后，他工作一直是兢兢业业的，找不到他有任何阶级异己行为。

三

天已暮色，我们进到加里山前的一条山沟里，院长决定在这里集中收容伤员。我在沟口点上盏风灯，插上根粗壮的树枝。树枝上挂了块有红十字的白布，担架队抬着伤员急急地来了，卸下了伤员又匆匆地离去。不到半个时辰，抬来的伤员已布满了沟。我和俞寒紧张地登记，只记姓名、单位、血型，昏迷的就划上×××。到午夜时分，我们已记下八百多。

伤员都躺在潮湿的草地上接受简单的、快速的救治。伤口疼痛难忍，有的放声大哭，有人在骂娘，还有打护士的。一个伤员在高喊：“快毙了我，我不想活了！”几个精神分裂的在唱歌，歌声凄厉，撕心裂肺。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哀鸿遍野”。

在登记伤员时，我发现一个老兵是枪伤，子弹是从后背贯穿前胸的。我很惊异，这10公里的战斗，他们是在驱赶敌人的前哨，很少停下来和敌人持枪对垒，受伤的几乎全是弹片崩的。

我问：“你是怎么受伤的？”他还能说话，就是不吭声。

我追问：“是不是身后战士走火误伤的？”

他像是为了纠正我的说法，才吞吞吐吐地说：“是指导员打的。”

我骇然：“为什么指导员要打你？”

他说：“冲在头里的一连，没剩几个人了，营长要我们连接替一连快速前进。我们顶着飞机打、炮弹轰，勾着腰跑了几百米，我们连

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了。班副在我前头，我见他弯下腰，在一个牺牲同志的脖子上抓起一把血往脸上抹，抹了几下，就一头栽进沟里，我也跟着副班长往沟里跳，指导员跑上来用枪指着我，要我上来，我说起不来了，他骂了一句：‘你他妈的想腿肚子朝前，见鬼去吧！’顺手就给我一枪，我一躲闪，子弹打在背上。副班长一见，爬上沟又向前跑，我就给担架抬来了。”

“指导员是在督战？”

他听我话中带有同情，告诉我：“我原在国民党干了三年，国民党的师、团都有督战队，他们在后面用枪逼着你冲锋，没想到解放军也这么干！”

我又问：“只有指导员一个人在督战？”

他说：“班、排有党员骨干监督，指导员带一个班跟在后面，非要动作迟缓，就骂‘装熊啦，当心你的沙罐（指人的脑袋）。再不听，就是一枪，给你算了伙食账。”

我疑惑了，有人常说，我们的战士英勇无畏，前仆后继，是阶级觉悟高。一个负伤的排长真诚地对我说，谁愿意找死？战争就是在鬼门关上跳舞，敌人的子弹没长眼，你想向后转，有人就用枪顶住你的腰，你要是向前冲，或许有条活路。排长说出了老兵的生存哲学。

四

午夜，03团上来接替04团开始向加里山主峰攻击。经我和严寒登记的1500多名伤员，给担架队陆续转移到后方兵站医院，我们又尾随03团上山收容。从山脚到山顶，是5公里的山路。

天黢黑，下着小雨，我们从一条大坡度的冲积沟向山上一步一点头地爬去，子弹在耳际“嗖嗖”地尖叫，炸声震得耳鼓嗡嗡作响，漫山是火链飞舞，弹光闪烁。为了减少伤亡，我们拉开了距离，女同胞们像登山队员一样，用一根长长的废电线相互牵引，她们背负大捆的夹板、绷带，艰难地行进在乱石中。我带领挑夫班在前头开路，他们的挑担都有七八十斤重，全是手术器械和布匹敷料之类的救护必需品。我一路都在提醒他们要谨慎小心，稍有闪失，野战医院就会缺失战

地功能。

挑夫都是些身负刑惩之人，有的是开小差抓回来的，有的淫乱违纪，有报复伤人的，有说“反动”话的，他们发配到挑夫班，尽管是苦力，但比起战斗连队，他们就像进入了一个安全的港湾，因此都感激天赐，干活卖力，也最好管理。

在夜色中行进，一路都是跌跌撞撞的，走着走着觉得脚下软绵绵的，我打开蒙着绿布的手电一看，震惊了，是自己人的尸体！我用手电扫了一下，沟里的尸体几乎个挨个，人叠人，面目狰狞，浑身血污，肢体扭曲。我要挑夫倍加小心，每迈一步，都尽量踏在尸体间的缝隙里，千万别再踩着死者。尽管步步谨慎，还是不断出现连挑子带人摔在死尸上的事。跟上来的女同胞不少是经历过战争的，见死者成堆，也惊愕得连连不断地发出“啊啊”声。

天已放亮了，我们还在无以计数的尸体中间跋涉，我的感情麻木了，迈着沉重的两腿，仿佛脚下不是死者，而是一块块石头，只是下意识地避开。好不容易在半坡上找到块平缓的草地，我让挑夫们放下挑子歇息，他们没有坐下，也没喝一口水，两只猩红的眼睛望着山下那一沟死者。那里有人还在呻吟，有人在蠕动，有人在摇动手臂，像在呼唤我们。此时，院长、医生、护士都在死尸堆里找活人包扎、注射、止血、整肢，我赶紧跟过去登记。伤员太多了，那些喘着粗气呻吟的，说不出话的，五个人我就写出一个正字。不知过了多少时辰，满沟一片白色的星星点点，都是伤员身上绷带映衬的。活人和死者交集在一起的图景，让人惊心动魄。

担架队上来了，我无法告诉他们谁登记了，谁没有登记，时间就是生命，都让他们抬走。

我正紧张地登记，突然在我侧方的山坡上，一声轰响，我抬眼望去，黑烟起处，有人在地上挣扎。我赶紧跑去一看，倒下的是护理员小黄，她从一块巨岩上背下伤员时，不幸踏响了地雷，左腿炸断了，医生很快过来用绷带在她断腿处扎住了正在射血的腿动脉。她昏过去了，两个护士托住她的身体。被她救助的战士身上还有枪、手榴弹，她竟然用自己瘦弱的身体把他背负了二三十米，她爆发出的能量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担架很快地抬走了她，我永远留下她那纤巧、活

泼、美丽的身影。

我估量了一下，03团死者约一千多人。他们的攻击路线就是沿着这条冲积沟上山，死者密集在沟内，那一张张满是硝烟，眼珠突出，牙关紧咬，让人心悸的脸，像在迸发胸中的悔恨之情。教导员要我让挑夫们薅来茅草，撅来树枝，盖住他们的脸。教导员是抗日老兵，他知道，满山遍野的死者形象会影响后续部队的战斗力。

俞寒此时也跟来和我们一起忙活，他不是薅草盖尸体，而是从死者身上取下遗物，大都是些雨布和鞋袜，他集一起打成捆，放在路边，待收尸队上来带走。凡信件、纪念品或贵重金属，都放进他挎包，由他交给师的组织科。此刻他正坐在一块石头上喝水，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过去，他让我坐在身边，从挎包里掏出个纸包打开来，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照片是四寸的，上有一个站着的青年妇女，身边还有个五六岁的女孩，妇女一身短布衫，面容清秀，孩子穿着布背心、短裤。母子俩的表情孤寂，仿佛心中都纠结无限的痛苦。俞沉重地说：“这又是一家孤儿寡母。”他用手指了指四周的死者说：“这场战争下来，背时的千家万户，说不定其中还有你和我。”俞寒说着，从胸口袋摸出张二寸照片来交给我，说：“这是我的堂客和娃儿。”

我端详照片，俞寒夫人很俊美，花衬衣西裤，怀中抱着个一岁左右的男孩。俞寒说：“拜托你了，要是我在寅时卯刻革命到底了，你就给她报个丧。”

我说：“我的命不比你大，都彼此关照。”

“那就听上帝来安排。”

我们一直干到傍晚，盖了300多死者，医院又要行动了，只能放弃。后来听说死者的掩埋，是由军文工团的人来处理的。他们从舞台走上战场，背扛肩挑送粮送弹，埋死者、抬伤员都很尽心，安葬时，都要擦净死者的脸，还找来石头垫在死者的头下，让他们安详的走向天国。

五

中午时分，我们上到加里山的半山腰。03 团团团长王西军，带着他指挥所的七八个人上到半山腰了，跟上来的 15 瓦电台在他身边摇响，他拿起话筒，蹲在一块巨石边放声呼叫，脸色铁青，他是背着十字架在打仗的。

五次战役的第一个阶段，他带先头营追击敌人，发现土耳其旅在汉江滩边宿营，王请示跟随他的师参谋长张镰斧：“打不打？”张说：“你自己定。”王不愿意血本无归地让自己的 700 人去拼杀 6000 人，眼睁睁地看到敌人睡一觉又跑了。12 军政委李震大骂他畏葸不前，不敢去碰三流的兵，可耻！给他的处分是撤职留任。

这次李德生把他当拳头使，要他拿下加里山主峰，将功赎“罪”。

他也是心里窝着火在打仗的。他的团从午夜开始打到现在，已整整 12 小时，一营顶着子弹往上拱，打得只剩下 70 多人；三营接着攻，几乎是用一个班的生命去换得一个阵地。拼得生还的不足 60 人，二营跟在后面，还没投入战斗，就被飞机炮弹炸得伤亡近半。眼下要向山顶冲击，敌人在这里的设防更为严密，前有交通壕、铁丝网，后有盖沟、暗堡，火力交叉，配置有序。

日本有本朝鲜战争记事本，就记录加里山主阵地的工事设施，用了沙袋 23.7 万条，铁丝网 385 捆（每捆 10 米），铁桩 6000 根，地雷 3955 个，他们还把上千株大树砍倒做成鹿砦，如一道天堑，怎么穿越？

战后，二营营长杨官保告诉我，他的营有个叫雷青山的战士，给炸断了腿，知道自己活不成了，为了给战友开辟条通路，他爬到一处高坎上顺势一滚，引爆了三颗雷，壮烈牺牲。我至今不信，战士的勇气我不会有任何的质疑，但是敌人设雷，最近距离也在 5 米以上，一颗雷就可以你把躯体炸飞，要一个人的躯体开辟出一条通路，只能说是出于想象，让战士的形象更加高大完美。

二营长是现场见证人，是否夸大史实，我无法再作考证，姑且记下这一壮举，当时最为真实的是，他们营已无法再前进一步，反给依托工事的敌人从各个角度形成的交错火力死死地压在沟里。王团

长陷入绝境，要求李德生投入预备队，尽快地拿下加里山主峰阵地，否则前功尽弃。李却斩钉截铁向王西军下达死命令，你别指望谁来帮忙，把你的机关勤杂人员全拉上去！

李德生战斗的一生，几乎仗仗都是在死打硬拼。1937 年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1940 年的百团大战，李是 769 团的连长、营长，每仗都是身先士卒。1945 年春，李已是太行二分区 30 团团长，他不用一枪一炮，带领 81 人的大刀队，半夜摸进正太铁路上的马坊据点，砍杀了 80 多个鬼子。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表扬了他的英勇无畏。

王西军此刻血冲脑门，在他身边的副团长张二胖，一把抓过话筒喊开了；“一号（李的战场职务代号）我是二胖，我上，拿不下加里山，提头见你！”副团长回过头，要二营长杨官保给他组织敢死队。二营长从六连挑出十几个老兵，他从一个战士手中抓过一挺机枪，领着敢死队成散兵线冲了上去，他们边投弹边射击，二胖身边的警卫员倒下了，敢死队也给打的剩下几个人，还在拼死拼活往山上冲击。二营长杨官保怕副团长有失，让六连二排也跟上去，又是一阵猛冲猛打，进到了主峰脚下时只剩下七个人。

主峰突兀如帽，高约 10 米，四周是悬崖绝壁，二胖用机枪压住敌人侧面射来的火力，掩护 6 个战士攀缘绝壁。战士搭起人梯，把刺刀插进石缝，相互提携支撑，一步步地攀登，终于爬上了峰顶。这里只有一个机枪工事，敌人想不到我军会从绝壁爬上来，正一个劲地闷着头向山下射击，战士抛出两颗手雷，炸掉了敌人的机枪，占领了加里山的主峰阵地，时间是 17 日下午 3 时 10 分，按兵团的规定提前了两个小时。

我还要交代张二胖的一个小故事。1949 年 11 月 27 日，在解放重庆的南温泉战斗中，他率二营也是抱着挺机枪冲在头里，二营战死三百多人，才打开了进入重庆的大门，重庆人在南温泉立碑纪念死者，张二胖在死难烈士碑上列为第一名。2000 年我主持写 12 军军史时，重庆巴南区文史馆来人访问，才把死人改成了活人。1960 年代，二胖是从 27 军副军长任上退下来的。

03 团打下加里山后，王团长把残兵们迅速组成一个战斗集体，

营长当排长，连长当班长，在他率领下，如下山虎般打退了迎上来阻击的法国营，当晚就占领了洪杨公路两侧，还在公路上埋下了地雷，等待后撤的敌人。

王团长完成了战斗部署，又有出色的战场发挥，军党委发出电令，撤销了对他撤职留任的处分决定。

六

05团是预备队，它的任务是在切断的洪杨公路阻截逃敌。从加里山垭口到洪杨公路有3公里，05团翻山后，进入一条叫茅老谷的深沟隐蔽待敌。18日凌晨，美国人的侦察机发现了他们这么大的部队在集结，如获至宝，用了16个炮兵营的火力狂轰，炮弹像蝗虫般飞来。霎时间，茅老谷火焰迸射，雷鸣般的炸裂声响彻四野。美国人的战斗是立体的，还派出7个架次的强击机投入攻击，扔下的新武器是空中开花的空爆弹，和能烧毁200平米地物的凝固汽油弹，浓浓的烟团在空中滚卷，石块伴着肢体在烟雾中上下翻飞。韩国的军史记载了这一战例，说美军发射炮弹一万二千发，飞机投下的炸弹有一百吨，创造了自二战以来战场上弹着点最大密度的轰击纪录。

到中午时分，密集的炮火稀松下来，我们的医护人员全部出动奔向山沟，百十号人散布在这条3000多米的冲积沟中，见一个伤者就包扎一个，跟来的担架队抬上就走。我带领挑夫班也参加抢救，我和俞寒还收拣残肢断臂、人肉骨头，用牺牲战士身上的雨布包好，选择土坑石缝填埋。俞寒心细认真，每当他埋下一处骨肉时，都要找块石头写上“烈士遗骨”。

敌人的炮时打时停，炮火下，人人命悬一线，都在拼着性命忙碌抢救。绷带没有了，就撕下自己的衣袖给伤员包扎，夹板没有了，就折断树枝代替。在这里，平均每平米的土地上，就要落下两发炮弹，死者多半已血肉横飞，很难见到一具完整的尸体。一个护士正给一个伤员捆扎断臂的手臂，突然扑哧一声，一个肢体从空中落下来，砸在她身边，她惊叫一声，又给伤员继续捆扎。我过去一看，是一条人腿，血糊糊的腿肌还在跳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的生命在最后的挣扎，

我把它拾起来放进一条石缝中。

我看到俞寒在对面的沟边，正把一个胸部受伤的战士从一道石穴中奋力地拽出来，很快给他做了包扎，伤员大概出于感激之情，忍着疼痛，用颤抖的手把系在腰间的一双新胶鞋解下来递给俞寒，俞寒接过鞋，没说什么，迅速地把伤员脚上的那双旧鞋脱下，套上了新鞋。

正在此时，一个护士奔过来叫住我，要我去帮助她做伤员的工作，我叫过来俞寒，她把我俩带到一个伤员跟前，伤员炸断的一只小腿已结扎了，躺在弹坑里还抱住一具尸体哭泣。护士告诉我，死者是他的叔伯兄弟，一起参军的，哥俩曾有约，生不离，死不别。他要求我们把他和死者一起抬下战场，找个地方安葬，有朝一日他还要来把尸骨取回四川老家去。担架员不干，放声吼开了：“活下来的都弄不走，还要我们抬牺牲的，太不像话了！”俞寒劝导说，他是个新兵，亲情比自己的生死还重要。他说服了担架员，抬走了战士和他死去的堂弟。

军的担架营也出动了，和师团的担架连一起出没在弹烟中，劳累了一天，两百副担架抬走了一千多伤员，俞寒那张灰色的脸舒展了一些，庆幸地说，他们算是活下来了，残了，就回家颐养天年吧。

俞寒富有人性的话语，在我心底泛起一股热浪。

茅老谷山沟里丢下一千多具尸体，生命在这里只是一个数字，他们大多没名没姓，更不知籍贯在哪里，他们中多数是从国民党俘虏来的，他们生命终止了，只是在连队的花名册上留下一个名字，两侧青山埋下了他们的白骨，也埋下了人们的记忆，后人会认为他们是国际主义战士吗？

12军政委李震来到现场看了，他流着泪说：以前我们常说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没想就在我们脚下发生了。

李震是北大学生，1938年入伍，是我军杰出的政工干部。他告诉我，12军的连以上干部1500多人，他都能叫出名字，有的还了解其性格特征。我曾和李震有过一次长谈，他坚信五次战役是光辉的战例，对毛泽东御敌于国门之外更是赞赏。我为他遗憾的是，文革中，他当了公安部长，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他仁厚的“失责”，让毛泽东索走了魂魄——那是1971年，毛泽东获得一份揭发陈伯达“托派”的材料，让谢富治交给李震立案侦查。李震把它锁到文件柜里。李

的秘书告诉我，这份揭发材料都是些不实之词，李很正直，认为陈伯达即使罪该万死，也不能给他泼污水，以为拖一拖就了事。哪知，毛久等无消息，大发了雷霆。李吓得胆战心惊，没两天，就自缢在公安部的地下室里，中共中央发出通报，说李“畏罪自绝于人民”。

七

18日上午，美2师23团和38团的大队人马从华川退下来，他们以为把我阻截部队一顿狂轰滥炸就可以夺路逃命，用了30辆坦克开路，引领250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向南突围。一路机声隆隆，尘烟滚滚，刚进入我在洪杨公路大小平川的阻击阵地，03团班长吴建德突发3发无后坐力炮弹，击毁了最前面的3辆坦克，接着05团战士梅永红，用手雷打掉跟进的3辆坦克。敌人车辆全给堵下了，车上慌乱的美军纷纷跳车逃命，军官用旗语和哨音指挥他们奔向南山，在那里竟没有我们的一兵一卒阻击。按兵团规定，南山的堵截应由27军担任，他们没有按时到达指定位置，给敌人网开了一面。35师堵住了洪杨公路，可全师战力耗损的剩下已不足5000人，只能分散地守住现有阵地，用机枪小炮乱打一气，眼看敌人像放羊一样向山上奔命。我们只打死敌人400多，俘虏130多人，放跑了5000多人。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出新闻，说我志愿军某部在大小平川围歼了美2师5600多人。这个放大十倍的成果，刚好是我们师的伤亡数字，一场巨大的丧讯变成了盛大的喜闻。

毛泽东和彭德怀有个共同的心结，都想成建制的消灭敌人，一张口就要吃掉人家三至五个师，结果不但没有如愿，我军的攻击部队反遭到重大的伤亡。本应歇手补充休整，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彭总却以个人意志使我军遭到更大的挫败，他令移师中线的，已疲惫不堪的六个军全线向南出击。我们师血染加里山之后，元气大伤也得遵命。

李德生收拢残兵，组成的一支三千多人的突击队，挥师穷追到横城。美国人见我已是强弓末弩，把他们早已准备好的5个快速纵队同时撒出来，从我军回撤的军与军之间的间隙切入，抄到我后方，

切断了我军的退路。此时，我军队形大乱，指挥失控，师团各自慌不择路地逃生，我们师穿沟越涧，爬山过岭，跑了三天三夜，终于奔出了包围圈。60军180师陷入了美国人的重围，惊慌失措的师长郑其贵砸了电台，扔下了部队带上13个人跑了，全师7200人成了俘虏兵。师代政委吴成德脱逃时，他带了33人跑错了方向，只好在南朝鲜打游击，一年后还是给敌人捉了个活的。我华川的兵站医院收容的4600个伤员，也给美国人连锅端走。

五次战役经历50天，我军伤亡86000人，被俘15000人，溃退到三八线以北。

八

1970年初，王西军从江苏省军区副司令的职务刚退下来，我到南京北固山军休所去造访他。提起五次战役，他依然愤愤不平：“战争就是拼命，拼到什么程度？在国内战争，打大杨湖，一个连只剩下5个人，都望着锅米饭流泪，最后我们纵队还是吃掉了赵锡田的整三师。打汤阴，我的营全躺在城墙的突破口上，我哭了。我们虽然牺牲多，获得的胜利果实是围歼了孙殿英的八千人。当年，攻加里山的危急时刻，我向李德生要求支持一把都不能，我们缺粮、缺弹，没炮火支援，硬是用三千人的生命堆到了山顶，守敌仅是一个营，打死的敌人不到十人。局部战争应赢得什么，是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拼出血本要有所得，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敌我伤亡比例是1：300。这在我军战史上是沉痛的一笔，我无法向死者交代。”

老团长已远离战争，远离他在军队的高位，也不敬畏已是党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王能在暮年坦诚的倾吐出自己的心声，令我感佩。

我转告了李德生，他诚恳的自责：“我最大的错误，不该在进攻、出击时，只选了条独路。我们不懂现代化的战争，美国人制造了火路、火墙、火海，我们还是用老八路的战术应对，5000人的伤亡我有最大的责任。”

我为这场战争的责任作一补充：朝鲜战争是金日成挑起的，这是一场不义之战，中国根本不该打这场为金家王朝火中取栗的战争。

九

五次战役侥幸生还，我们的命运又安排到了没有枪炮声的战场。部队在谷山郡休整，从机关到基层开展了一场阶级队伍的清理。凡国民党起义的排、连、营干部，大都给遣送回国“另行分配”。我们这帮在重庆参军的小知识分子，也要查出身、查成分，社会关系复杂的、有海外关系的、直系亲属被斗被镇压的，被清出了600多人，这些人也通通地打发回原籍。

我有两位熟识的朋友也在此列，一位是军医老李，他原是国民党的中校军官，最初，我们要他到野战医院来，是看中他的人品优秀，手术高明。在五次战役，他全副身心都投入手术台上，晕倒了，浇浇冷水，又连轴转。他私下对我说，是金日成在6月25日打响了第一枪的，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用错了地方。另一位是俞寒，清除他的主要原因是他当过国民党三青团的分队长，我们的组织部门把他列为反动党团的骨干。

俞寒临行前，我和他有一次交谈。

“您是怎么搞起的嘛？”我为他惋惜，“年纪轻轻的，政治上就靠拢国民党。”

“我不是学生娃儿，我是校长，人是群居的高级动物，我要在社会上立足。”

“您非得要参加反动组织？”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反动组织？共产党不也敬奉过三民主义吗？我信仰它有什么不可以？国共两党对立了，打起来了，就说人家的组织是反动的，这通情达理吗？”

我无法和他争辩，他只能脱下军装回家了。

他交给我一张已上交烈士遗物的清单，和他登记的1000多伤员的名册。文字工整清晰。他的走，给我留下了解不开的心结。一个满怀革命热情的青年，战场上兢兢业业，就因为出身背负十字架，陷入了不可翻越的深渊。

文革中，我去他家乡看望过他，他是街道民办小学的教师，有了儿女，生活过得紧紧巴巴，很清苦。公安还不断上门监护他的行迹。

他见了我，表示无怨无悔，还感激上苍没有把他的命留在朝鲜战场。他宽容地说，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活下来就是大幸。

我还去过一些烈属的家。当年，战争没结束，他们的门前挂上“烈属之家”的牌子，逢年过节，街道干部，三亲六戚都来慰问。虽失去亲人仍感到光彩生门户。这些年人们都淡忘了，门前也冷清了，晚辈们不知烈属是何物。一位烈士的老父亲从箱底翻出发黄的“烈士证书”给我看，说，这还有什么用?!

有被俘遣返回来的，怎么也不愿见我。在洪杨公路最先打掉美国人3辆坦克的吴建德，他是受伤后被俘的。他的一等功被取消，开除了团籍，回乡后一直在扛锄头。一个越战被俘的美国军人被释放后，回国还能参加总统选举，我们为什么连起码的公民权利都被剥夺?

我还看望了小黄，她在加里山上被炸断腿后，复员回家，靠残疾金无法生活，在一家纸盒厂做工，挣些补贴，生活起居由母亲照料，她最大的愿望是想换一张轮椅、能折叠的，她的住房只有11平米，希望扩大一点空间。

死者长已矣，生者有何求?我看到大批复转军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当年，我等小知识分子在重庆参加人民解放军的有9600多人，除死伤、整治清理的之外，转到地方的都是有功劳的人，至今他们的养老金都在1600—2400之间，吃饭、穿衣、看病，度日艰辛。12军政治部一位秘书，文革结束转业一家造船厂，工资待遇450元，要靠战友月月接济。

志愿军在饥饿中打仗

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维系我军发展壮大的三大要件是：人马、枪炮、粮饷。人马不足，靠征召和俘虏补充；使的枪用的炮，战场上可以缴获；搞吃穿用最麻烦，根据地穷，征粮派款供不应求，隔三岔五还得到游击区去扫荡，国民党“刮”过了，我们接着“刮”。

一

在战争频仍的年代，我们通常使用非常手段筹粮。哪管你是团结对象、依靠对象，绝不会教条式地讲什么阶级路线，我军的生存第一，不该拿的要拿，拿不到的就抢。比如，红军仓皇长征，生存靠沿途的打砸抢，清野贫雇农地头的红苕苞谷，搜走地主老财坚壁的鸦片大洋。到陕北立足，靠挤出农户三升五合的小米是养不活万儿八千红军的，毛泽东竖起“抗战图存”的大旗，率军东渡黄河，到阎锡山的地盘上打饥荒。直到解放战争开始，我军仍然没摆脱粮荒，太行山地区 72 万军民衣食无着，中央军委决定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转移到外线为生存而战，对外宣称是向蒋管区大反攻饮马长江，真实意图是向穷得叮当响的当地群众口中夺粮。绵延鄂豫皖的大别山，是三十年代红四方面军的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当年，革命群众用南瓜汤养育的子弟兵，返回自己的家园却成了还乡团，打家劫舍，把数百万曾相依为命的乡亲搞得鸡飞狗跳墙。

1950 年春，解放红旗插遍大西南，60 万大军、数以百万计的新区干部和国民党留用人员要吃要穿。共和国初创，巩固政权不单靠枪杆子，还要手中有粮，财政税收以粮为主，连年战乱，中原地区已出现饥馑，连南京、上海也闹粮荒。新成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迫不及

待地指令人民解放军深入区县武装征粮。不管你是大户小户，只要有地有收成，就得纳粮，不交的就吊打关押。四处抗争纷起，仅四川逼上梁山的“匪患”就有 200 万。

1950 年秋，我军开进了为金日成火中取栗的朝鲜战场，大枪小炮换了“苏式”装备，吃穿用不再愁了，刚成立的共和国是大后方，可战场上却依然出现断粮。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人拥有制空权，开战三个月，就把我军的运输车打掉了一半，仅靠 800 辆车供应百万人打仗，要把战略物资运送到三八线，都是昼伏夜行。挥军南下到三七线作战，就只能用我军的传统战法：武器，不增加一枪一弹；吃的，每人自带 7 天干粮（炒面）。这种不要后勤的打法，被美国人嘲笑为“一星期的战争”。一个战役何止打 7 天啊，弹尽粮绝还得拼死拼活地持续作战，每到这一时刻，红军时期培育的流寇作风，就会光大发扬，我军所到之处，掘地三尺，凿壁捣墙，打翻坛坛罐罐寻找口粮。

二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是从 1951 年 4 月 22 日开始的，到 6 月 10 日结束，历时 50 天，中间只给我们补给了一次干粮，就是说有 36 天缺粮，我们生存凭借些什么？有人说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我说是人的死里求生的本能，我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

战役一开始，我 60 万志愿军迅速突过三八线，别以为我军进攻势如破竹，那是美国人为了拉长我们的补给线，有意不和我们对着干，他们驾起四个轱辘跑，我们放开两条腿追。7 天就追到了离汉城 10 公里的汉江北岸，丝毫未受损失的敌人知道我们开始饿肚子了，他们在汉城外圈的预设阵地上组织起重兵阻击，想把我军拖个精疲力竭，再收拾我们。

我所在的野战医院，一上战场总是尾随先头团收治伤员。先头团在汉城边上激战了一天一夜，指挥员看到粮袋光了，进不了城了，赶紧下令回撤。这天拂晓，我们医院竟懵懵懂懂的还在往前闯，炮弹不停地在身边炸响，枪弹在头顶上呼啸乱飞，要不是夜幕，我们就会撞到敌人的枪口上了。院长一接到后撤的命令，他掉过头带领我们

百十人撒开两腿，一气跑了10多里还未停歇。我领着挑夫班急追快赶，还是掉队三五里。

战前，我的本职是文化教员，一上战场，既不能提枪打仗，又不会救死扶伤，教导员分工我跟着司药老吕管理挑夫班。挑夫班有10人，10付挑箱里装的是医药、手术器械和敷料布匹。老吕分管医药用具，随用随取。我分管埋葬死人，凡抬到医院的伤员不治身死，由我指挥挑夫们进行掩埋处理。挑夫都是军法处轻判的犯人，有开小差抓回来的，有枪走火伤人的，有奸污妇女未遂的……都给发配来以苦役代刑惩，教导员对我和老吕有特别交代，说他们都是没改造好的解放兵，又犯了罪，要处处警惕他们。教导员的忠告我毫不怀疑，战役开始以来，已通报过好几起战场报复凶杀干部的案件，都是这帮人干的。我和老吕身上都带有一支20响，每天行动，一前一后地盯着他们。休息时，也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特别忧心的是挑夫班长，大前天，部队追到汉江边上，担任先头团的05团团团长吴彦生被敌人冷炮袭击牺牲，尸体送来医院交我处理。按规定，团以上干部牺牲不得就地掩埋，要拉回国，葬在沈阳的烈士陵园。我让挑夫班长给我三丈白布裹尸，他很不情愿地从挑子里取出一匹布来，用右手食指和拇指牵住布头的一角，左手沿布边拉动到左肩胛，丈量了10次，是10公尺的量。我说，他是个老红军，还是你的团长，再给他添加一丈吧。他脸上泛起愠色，嗤的一声撕下他刚量好的布扔给我。我压住火不和他理会，赶紧给死者包裹，我包完头部，要给死者翻身，我让挑夫班长帮忙，他气呼呼地说：“我干不了！”我只好让随担架来的吴团长的警卫员搭个帮手，才给死者全身裹上白布，填了一份牺牲鉴定书插在死者身上，又从公路上拦住一辆送弹药返回的卡车，送走了死者。这件事，让我对挑夫班长产生了警觉——他仇视自己的团长，也会仇视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捅我一刀，或撂下挑子远走高飞。

三

紧急转移，医护人员没有多少负重，身上携带只有一个救急大包，一张雨布，一把挖防空洞用的小镐。长距离的跑动大都支持不住，

开始三三两两地掉队，像是一群溃退的散兵游勇。挑夫的担子都有五六十斤，虽慢下来好几里，他们的耐力都良好，肩担闪闪悠悠，前后还能相互照应。消除我防范他们借机逃跑的疑虑。此时，一个人影在我前头一瘸一拐地跑着，突然“咣当”一声摔倒了，一听“啊呀”的叫声，是个女孩子。我疾步上去扶她，是护理员小冯，她痛苦地躺在地上，我怎么也拉不动，老吕从后面赶来，给她包扎了膝上破了皮的伤口，她缓过了劲，爬起身来走了几步，突然转过身回到摔倒她的地方，抽出背负的小铁锹，猛力地砸了几下那块绊倒她的石头，飞溅的火星伴着她的愤怒：“你是混蛋，你欺侮人，你是帝国主义……”她那稚气的动作和骂声，让我心底升起阵阵酸楚，一个刚从城市走向战场的小家碧玉，承受战争的苦难比我们男孩子沉重得多。她不想走了，蹲下来放声大哭，还苦苦的哀求说：“我一天没吃东西了，例假也来了，实在是走不动了，你们先走吧。”饥饿正在瓦解她的意志，我急了：“你别犯傻了，这是什么时候，我带着你！”挑夫班长停下来，放下肩上的挑担，打开箱子，取出半袋炒面。他是有战场经验的人，视粮食如生命，这是他的“库存”。他摘下腰间的瓷碗，从袋里挖出一碗来，又从箱里撕下一块裹死人用的白布给包上，递给了小冯，他没有语言，挑上担子赶路了。小冯像上天赐了一把灵芝，抓起炒面拼命地往嘴里填塞，等她吃完最后一口，我才拽起她来，牵住她的手，说：“快走！”

我的腹内空空，血糖升起，周身乏力，支撑自己的力气都快没有了，还要顾及小冯。小冯身体本来就纤弱瘦小，加上饥饿，每跑一步几乎都要我全力牵动。我的胃开始翻滚，不住涌动的酸水，从口里鼻腔往外冒，又苦又涩，老吕见我难受呕吐，上来悄声告诉我说：“不要吐，咽下去，那是胆汁，胆汁没有了，生命也没有了。”我听他的，一口口地往回咽，喉管像火燎一样难受。

天亮了，我们终于赶上了大队，医院人马已分散在一条山沟里隐蔽，休息待命。我把小冯拉到护士长跟前，这个1946年就入伍的山东老兵，圆睁两眼，光火了：“好个小冯啊，还让人牵着手回来，为什么不让人家背着你！”我从护士长疑神疑鬼的眼神里感到冤枉，我和小冯相识有半年，从未正儿八经地说过话，相见仅是点点头，这牵

手是出于关爱伸出的援手啊，我无法和这位法海式的女人争辩，只向她做了一番自信无鬼的解释，算是交了差。

离开小冯时，我发现她眼里流溢出一股感激之情，她没有说话，只是傻傻的望着我，我走开了，脑子里一直映现着她那副傻傻的眼神，手心也热乎乎的，一种逆反效应从心底猛烈升起，身上出现了异样的感觉，但绝不会是那种“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

四

我回到挑夫班，老吕正在柘树丛下召集挑夫训诫：“你们别以为是我们吃败仗了，我们的撤退是把敌人放进来打，你们中谁有幻想，谁要趁机开溜，我绝不手软，坚决执行战场纪律。”这是老吕天天都要做的功课，挑夫都埋着头，似听非听，只有挑夫班长不时抬眼望望老吕，眼里有股凶光在闪动。

等老吕讲完，我就和颜悦色地安排大家分散休息。挑夫班长靠在一棵松树杆上，两眼半睁半闭地养神，他对小冯的同情让我对他产生了好感。我走近他，勾下身问他累不累？他睁开眼没有表情，我讨了个没趣，转身要走。

他叫住我：“我箱子里还有半袋炒面，都给你。”

他起身来要去打开箱盖，我忙制止他：“我不能要你的，我还能坚持，你干的是力气活，没有你们，医院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我的话在他的脸上泛起一丝笑意。

我坐下来唐突地问：“你是哪年的兵？”

“在淮海战场给提溜过来的。”

“你还当过班长？”

“现在是犯人。”

“为什么犯事？”

“没改造好，思想反动，与人民为敌。”

他的话有真意，有嘲弄，也有不平。

我说：“犯法是指强奸的、行凶的，你讲了两句怪话就问罪，是怎么回事？”

“我说的都是真话，还是人家传来的。”

“你说了些什么？”

他目不转睛地注视我好一阵，似乎看到了信任，才说：“朝鲜男人裤子不大裤裆大，房子不大炕大，国家不大惹的事大，金日成肚子不大心眼大……这些顺口溜谁都在讲啊，我一说就不得了了，我是个国民党啊！还说我思想反动，带坏了一个班，军法处判我是思想犯，发配到这里来劳改两年。”

我心想，各种传言的蔓延，不及时作出处理，将会涣散部队斗志，可为什么不是批评教育，动不动就动用刑罚？

我问：“你为什么不申诉？”

他面无表情，说：“能申诉吗？共产党一贯正确。”

他胆子够大的了，戴着枷锁还敢揶揄，我怕引出他更反动的话来，想起我在为他们团长裹尸时他那副凶相，问：“你们团长怎样？”

他平静地回答：“是个老共产党。老是把我们这号人看成是敌人，保卫股抓我那天，他站在一边训我，说我侮辱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是破坏了国际主义，反动透顶。说真心话，我还感激他呢，我要不给逮起来，还得上前线吃枪子。现在，我到了福地，虽比一般人苦累，但保住了命，即使伤了，这里有医有药，能得到及时救治，打仗啊，就图个活命！”

简短的交谈，我对他有了了解。我不能劝谕他，更不能教训他，他是个有自尊的人，只能和他和平共处，共生共存。我要他好好休息，起身找老吕去了。

五

老吕在一处深深的茅草窝里撅着睡了，我没惊动他，靠近他躺了下来，浑身骨头像撒了架，饥肠辘辘的，倒头便睡，不知睡到什么时候，突然有人摇我：“快起来，他们都走了！”我睁眼见是老吕，忽地爬起来四下张望，太阳正下山，天上有架侦察机在低空盘旋，远处轰鸣的炮声依然不断，四野是空寂的，我不知所措地问：“怎么办？”老吕说：“这是挑夫班长的报复，故意不叫我们，快走呀，追他们去！”

我俩跑出了山沟，前方的山峦上有一片森林，我们以为医院大队人马已转移到那里隐蔽，我和老吕飞奔过去一看，这里生长着参天大树，林木阴森，似进入绝境，强烈的恐惧感令人浑身发冷，我们不放弃，冒着胆向林间深处搜寻，走了一程，路面开阔起来，脚下出现了一条宽敞的神道，尽头约50米处是一座庙宇，我们疾步过去，上到台阶，便是大殿的正门，门楣上有“大成至圣”四个金字，是座孔庙，高大的殿门是敞开的，透过幽幽的光亮，见到殿堂中央有一尊孔夫子站立的塑像，头上有冕，身着飘逸的彩色袍式官服。我们小心翼翼地进到殿内，老吕走在头里，他一到孔子像前，虔诚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战争在这一带拉锯了近一年，韩国人崇敬的孔夫子都得不到祭祀，老吕的祈祷更是不逢时运，我上去拽他赶快离开，说：“孔圣人帮不了我们的忙，快走吧。”说话间，我发现供桌上堆满供品，很杂乱，满是尘垢，想寻些吃的欲望驱动我上去胡乱翻找了一阵，果品大都腐烂，我看到一只木盆中有块打糕，是朝鲜人用蒸熟的糯米放在木臼里砸出来的，我们称它糍粑，已长出一层长长的白毛，我揭开霉衣，露出洁白的糯米茸来，我用手指拈了一小块放到嘴里，很硬，硌牙，像嚼骨头渣子，咬了几下，软了，无异味，我兴奋地抓起打糕，约斤把重，剥去皮层，揪了一半给老吕，我们急急地退出了大殿，太阳快落山了，我判断出北方，边咬着打糕又开始小跑。

我俩上气不接下气一直跑到入暮时分，发现我们后尾上来了一支小分队，我惊呼：“是敌人！”老吕是老兵，沉住气说：“是自己人就合伙走，要是敌人就束手就擒。”路旁已找不到隐蔽的地形地物，只能站在路边听天由命。他们过来了，突然传来一声：“前面是谁？”一听声是自己人，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老吕答话：“是师医院的。”对方大步过来一人，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站定，似乎辨清了我们的面目，才把端在胸前成战斗状态的冲锋枪送到身后，问：“你们是掉队的？”我说：“是掉队的，你们也是？”对方说：“我们是04团二营收容的。”我心里涌起一股热浪，命悬一线时刻碰上救星，感激之情正要出口，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过来了，用手电在我们脸上晃了晃，验明了正身，命令式地说：“你们跟着走。”他侧过头对刚和我们打交道的战士说：“三班副，你带着他们。”小分队从我们身边走过，11人，

还有一个韩国人，50多岁，手杵根本棍，是带路的。

副班长说：“你们俩跟在我身后，拉开距离。”

万籁俱寂，只有脚下的沙沙声，正行进间，走在我头里的老吕停下来附在我耳朵上说：“你看！”我紧张地抬眼望去，夜色中，副班长正用手捋下一把路边小树上的树叶，放到嘴里，我知道，他已饥不择食了，一种报恩之心油然而起，我几步走上去从袋里取出我剩下的打糕，掰下一半给他，他三下两下就塞到嘴里，只说了声：“快走吧。”口气和缓多了，他悄声告诉我：他们的任务是保障大部队撤退的安全，警惕敌人的跟进，又不让有任何人掉队，带队的是营参谋。我跟在副班长身后，保持着五六米距离行进。恐惧已消除，可我的打糕马上没有了，我学着副班长，从路边小树上摘下几片嫩叶放到嘴里嚼了两下，苦味满口串，干呕了好一阵。我想起入朝前教导员的谈话，要我经受住党赋予的生死考验，吃大苦、耐大劳……我还是个正被改造的小知识分子，要脱胎换骨，起码还要三年五载。可眼下当紧的是免于饿死，哪还有心思去想什么政治命运。

六

已入午夜，前面出现几点星火，在星光下影影绰绰的见到一座村庄的轮廓，小分队在路边停了下来，参谋派出人到村子里去搜索，看看有没有人掉队。没多久，派出的战士回来了，参谋问询了战士几句，就带领我们进了村，来到一家院落。房子里的火光透出窗户，参谋推开了房门，我看到炕中央正燃起炉火，两个战士围在火盆边烧烤着苞米，两支步枪扔在一边，参谋对他俩发话：“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大个子战士停下他手上的拨火棍抬起头来：“04团三营的。”“为什么不赶队？”“饿的走不动了，天亮再走。”“你们现在就跟我走！”参谋在下达命令。“十多天没睡觉了，睡一觉再走。”另一个瘦瘦的战士回答，说话慢条斯理的，很油。“敌人很快过来了，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我们又不是新兵嘎子，你别唬人了。”“你们想不想走！？”“你想干什么？我们在国民党那边还没人敢逼我们呢。”大个子说话更傲气，说完，把他扔在一边的步枪拉到自己身边，似乎在显示他的自主能力。听得

出，这两人都是解放兵，战场的历练给了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参谋发出警告：“你们究竟走不走？”瘦瘦的战士说：“走不走我们自己决定，用不着你来给瞎子点灯。”参谋火了：“你们想当俘虏？”大个子说：“当就当呗，无非是第二次解放！”参谋气得“砰”的一声猛地关上房门，退下台阶来，一挥手说，我们走！刚走出院落，参谋回过头来，叫：“三班长。”一个敦敦实实的战士走到他跟前，参谋吩咐说：“你带着小李马上去处理了他们。”参谋转身领着我们出了村，上到路口，突然间，从我们刚离开的那家院落传来几声叫骂，接着两声枪响，我的毛骨悚然了，心像重重地压上了块石头。

我们又开始行进，脚下是一条牛车路，路面坑坑洼洼的，本来就绷紧的神经还得全神贯注的盯住地面，生怕稍有不慎摔倒爬不起或走不动就得吃枪子。班长带着那个小李战士回来了，快步从我身边通过，那黑森森刚开过火的冲锋枪，成了我加快步伐的动力，肚子又开始饥饿了，步子却是疾速的。

拂晓前，我们来到一处山垭口，在两侧的山头上一支殿后的部队正在构筑工事，清晰的镐锹撞击声，在夜空中传得很远，他们在准备迎击跟上来的人，我意识到已到达安全地带了，参谋停下来用手电看了看手中的行动路线图，走过来告诉我和老吕说，现在已进入三营的阻击线，他的小分队已完成任务，要从另一条小路下去就归队了，那里是他们营的集结地。参谋要我们径直往前走5公里，就是04团团部的位置，到了那里就可以打听到师医院所在地。我俩表示了感谢正要走，参谋叫过来三班长说：“把带路的老乡带到背静处去解决了。”我一听惊恐了，老吕忙转过身到参谋跟前求情说：“放了他吧，他带路我们才走出来的。”参谋提高了嗓门说：“你放走他，敌人跟上来就不会放过你，这里不只你和我，还有上千人的安全！”他急迫的命令班长：“带走！”那个韩国人，见班长在推搡他，又气势汹汹，已意识到什么，喊叫开了，班长连推带拉地把他弄到不远的一个小沟边，我不敢看了，枪声响了，子弹像穿过我的心脏，我的全身发出阵阵的颤抖。

七

天光大亮，我和老吕终于回到医院的新营地，这里是一处被炮火摧毁成疮痍般的村子，一个坑洞，一处断垣，一间塌房，都有我们的人藏身，他们把身体蜷曲成一团呼呼地睡去。老吕是党员，组织观念强，他领着我去找教导员汇报掉队的事。教导员正躺在地边的一个土坑里睡觉，老吕叫醒了，向他报告了我们掉队赶队的经过，教导员张着双惺忪的睡眼说：“你们活着回来就不错嘛。”他的话语冷漠，也许他在为自己的生死存亡忧心忡忡，战前他那种“政治工作的活力”已经荡然无存。我心里有几分怅然——战争把人情都扭曲了，你死了，如同工作调离。你历险归来，就像出差回队，一切都平淡无奇。生生死死的此时此刻，党的关怀麻木了，人的相悯相惜已不如动物。

我找到了挑夫班，他们正蹲在一间半塌的牛棚里，有的靠着墙在睡觉，有的围在炊事班的灶前捉虱子，我清点人数，9人，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问：“你们班长呢？”几个挑夫都抬起头望着我，感情是漠然的。半晌，一个挑夫用怪怪的声调说：“跑啦，没走多远，你快去追吧。”他面对灶火的脸上似笑非笑的，我听得出，这是在调侃我，我平静下来，问了问他们一路的情况，没人回答我。

医院已断炊，炊事班在这里生火支锅，只为大家烧几锅开水。这场战争一开始他们就不做饭，现在大家没干粮吃了，烧水只是尽职尽责。挑夫班长回来了，手里拎着一草袋鼓鼓的东西。他来到灶前，提起草袋就往锅里倒，我一看全是老百姓当柴火烧的苞米芯子，倒了满满一锅。不多会煮开了，苞米芯在锅里热气腾腾，几个挑夫迫不及待地用树枝各自拨出一个来，托在手上呼呼地吹着、啃着，还把捉住的虱子也放到嘴里，拌着苞米糊吃。他们都当过国民党兵，吃虱子是常事，从不畏惧什么回归热的传播，还认为是以血还血，既增加营养，也惩治了虱子。他们围住火堆，把脱下的内衣内裤，翻来覆去地找着，嘴里接二连三的咬虱子，咬得扑哧扑哧的，像吃五香豆，咂巴得有滋有味。人常说：虱子多了不痒，我身上开始反射，感到虱子在爬动，我也脱下衣裤收拾起来，捉住的虱子，不像他们放在嘴里，而是扔进火堆，捉一个扔一个，实在太多了，我就抓住衬衣的领肩往火炉里使

劲地抖动，火堆里立刻闪现出一片火星子，发出了噼啪的炸响，我感受了一种惬意。

八

心情刚安稳，棚子外面响起一阵急促的哨子声，有人高喊，准备出发。是管理员的声音。我的神经又绷紧了，马上穿好衣服、叫起躺在墙角的挑夫，挑夫班长把锅里的苞米糊糊捞起两个塞给了我，他说：“你太斯文了，他们都在抢着吃，你为什么不动手？”我感激地向他点了点头，他让一个挑夫和他一起，把一锅苞米芯子拎到路边，给医护人员分发，一人一个。院长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说：“好样的，你在立功赎罪。”挑夫班长面无表情，木木的，像是很不愿意接受这种赞誉。

出发了，医院不是班排连的编制，各自招呼自己的小集体，人们稀稀拉拉地啃着苞米芯子上路了。这是第一次白天行动，说明情况是紧急的，谁也不顾及饥饿疲惫，步子再沉重也要咬着牙关跟进。路边有人倒下了，后面上来的人不扶也不问，无所顾忌的从他身边走过去。我们医院年轻女同胞多，有的边走边哭，老兵骂骂咧咧，拽着推着催她们赶路。

太阳刚升起，传来口令，人人要戴防空圈，我们就动手弄些带叶的树枝来，扎成一顶伪装帽扣在头上，很大，像个斗笠。敌机果然来了，四架油挑子（美 F86 佩刀式歼击机，翼下有副油箱，我们称它为油挑子），发现了目标，直朝我们前面一支正行进的步兵分队俯冲扫射，还扔下几枚炸弹，硝烟起处，有人倒下，更多的人四处狂奔，等我们走到飞机袭击过的地方时，伤员已抬走，留下两具尸体，死者浑身是血，鞋袜已被人扒走，胸襟是敞开的，腹腔已开裂，白花花的肠子突露出来，肠的破处都是些草团子，女同胞捂住嘴扭着头快步通过。

我们到死者跟前，挑夫班长放下了挑子，蹲下来看了个究竟，他扒拉开肠子，把一只手伸进死者腹腔里去摸了一阵，退出手来，整个手臂都是殷红淋漓的血污，他用力地甩了几下，对我说：“心肝都没有了，肯定给他们掏走了。”

我不解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人打死了，人肉不好吃，人的心肝要比猪羊身上的细嫩。”
“你吃过？”

“吃过，战场上没吃的就得吃死人身上的，什么都要会吃，何况这是好东西啊！”

这个来自国民党的老兵，身处绝地，他有自己生存的法则。

我小的时候，常去刑场观看刀砍枪崩犯人，人们都争着去弄些死人的血回来辟邪，我也去弄过一回，刽子手刚砍下一个大烟贩子的脑壳，我们一群孩子就奔过去用草纸或小铜钱蘸上鲜血，拿回家压在床头。挑夫班长说吃人的心肝，让我不寒而栗，战争，把人变成了野兽。

九

夜以继日的强行军，天天蹲山沟，在一堆草边，一棵树下，刨个坑撅着就睡。肚子里没有食物支撑，每迈一步如同背负三箱弹药一样吃力。人人都瘦了一圈，形容枯槁，面带菜色，颧骨突起，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如同一具具活僵尸。人在绝处都有求生的欲望，连路边的小草也给连根拔起，抖抖泥就放进嘴里。老吕煮了一饭盒灰菜，倒去苦水，我俩分享，算得上一顿美食。我们在一条山沟停下来歇息，他把我带到沟口一处断壁残垣的村落里去找吃的。韩国人早就把食物给藏进了深山老林，但是，仍然有几十个战士在村里村外东寻西觅，奋力地翻着、刨着，盼望能找到一口吃的。

我跟着老吕在一处残房中撬开炕石，脑子里不断地出现幻觉，仿佛每掘开一块炕石，都有一缸白花花的大米。一次次希望，又一次次地失望，我们已别无所求，只有不惜余力才有活命。正刨着，见几个战士围着一个坐在房前台阶上的韩国老人说话，老人背靠残壁，闭着眼，战士说的半通不通的朝语，一个战士认定他坐的台阶下有隐藏的东西，就抓住老人的手臂拉扯，老人举着不动，几个战士一齐上去举起老人的胳膊腿，硬是抬出了十几米，放到一个草堆上，回头就抡起镐头，砸碎了台阶的石板，露出一道阴沟来，一个战士急忙卧下身去掏了一阵，拉出一个草包，这是朝鲜人盛的稻子。旁边的两个战士

抓住草包的一角，提溜了出来。那个掏的战士又伏下身躯，不一会又拉出一包来。

这时，周围正在搜寻的十几个战士蜂拥而至，七手八脚地撕开草包，稻谷散了一地，战士们都忙不迭地脱下衣服裤子，把稻子往自己的衣裤里拨拉。我和老吕眼热了，也脱下军装挤进人堆奋力地哄抢，好不容易弄到三四斤，如获至宝，生怕被再来的人夺走。我们抱着军衣包着的谷子转身跑到一处残墙下，找来两块炕石，抓出一把谷子放在石板上，再压上另一块石板搓磨开了，磨了一阵，揭开石板，吹去稻壳，拣出了一把米粒，急不可待地塞进嘴里。然后再抓出一把稻子来磨，边磨边嚼边咽，忙活了个把时辰，吃下了有斤把的生米，一股清香味在口腔里久久的回旋，恐慌情绪抑止了。剩下的稻谷我用块布包起来系在腰上，找了个草多的地方，美美地睡开了。

半夜，炊事员来传信息，说03团的几个连队在山上的洞里找到了不少粮食，要挑夫班长去给他们说说，弄些过来。挑夫班长从睡梦中惊醒，带着挑夫班就向山上奔去，我和老吕怕他们出事，紧跟在他们的后面。在山半腰他们见到一个班的战士正抬着两个草包下山。

挑夫班长来了精神，三步并做两步冲了上去：“站住，放下，这里是我们的地盘。”

走在前头的是个老兵，可能是班长，也毫不示弱：“谁规定是你们的地盘？”

“我的规定！”挑夫班长举起手中的扁担。

那个像班长的老兵，忽地从身后把冲锋枪顺到胸前，拉动了枪栓：“你想找死？”

他身后的七八个战士放下抬草包的杠子，也端起了枪。

挑夫们高举着扁担，眼看火拼一触即发，老吕慌忙举起双手连连往下压，高喊：“都给我放下，出了人命谁都活不成。都是自己人，我的意见是二一添作五，和为贵。你们留下一包，走人。”

对方没吭声，我站出来晓之以理：“我们是医院，伤员多，大家都在挨饿，总要给伤员留下一口吃的吧。”

我不由分说地招呼过来几个挑夫，扛上一包就下山了。那个班长明知遇到了拦路打劫，又斗不过我们一伙不要命的，气愣愣地站在

那里。我们回到营地开包，全是苞米，炊事班熬出了两锅半稀半干的苞米粥，全院每人分得两碗夺来之食。

十

我们紧急转移，不是北撤，而是挥师东向，到中线地区寻机歼敌，这是彭老总的新部署。我们是6月12日到达三八线上的重镇华川的，在那里补给了7天的干粮。

补粮的那天，我们医院的大队人马是半夜开进兵站的，在一个山坡的树林里，每人用自己的面袋盛了9斤炒面，装袋时都迫不及待往嘴里填，像是盛宴。腮帮子、鼻子上都粘了一层香喷喷的面粉，一咳嗽就像是嘴里喷出一朵蘑菇般的云烟。没有一口水相伴，全是干咽，我一口气吃了两碗，多少天来一直贴着脊梁的肚皮鼓起来了。

挑夫班长警告我：“千万不能喝水，喝了就要膨胀，撑死你。”我打嗝都小心翼翼地护着肚子。

挑夫班长在生存自保上比谁都精明，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个惊人的信息，说在另一处山沟里还有一个特供站，专给机关首长提供高级食品的。他领着挑夫班和我去了，到了沟口，有哨兵守卫，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在路边高声询问：“哪个单位的？”

挑夫班长理直气壮地大声回答：“920司令部的。”

920以打砸抢让人生畏，名声威震全志愿军。对方没敢再问，放了我们进去。进沟约百十米，沟的两侧出现了十多个货堆，堆上盖的都是青草，还能辨出袋装的米面和箱装的蔬菜副食，已不少人在拖袋搬箱。挑夫班长从一个货堆里拖出一箱，撬开一看，全是猪肉罐头。我们相继行事，都拖出一箱来砸开，然后急切地脱下裤子往里装，我装了二十多筒，用皮带收紧裤腰，又扎紧裤脚，码到脖子上就急匆匆地往回走。没人拦，没人问，奔出了沟，心里像得了唐僧肉一样兴奋。挑夫班长力气大，整整扛了两箱，回到路边，他一人一筒，分给了医护人员。医生们高兴地抚摸着挑夫班长的手，女同胞举手敬礼致谢，挑夫班长笑呵呵的像是在给大家授勋。我突然想起了小冯，跑到护理班找到她，悄悄塞给她三筒，剩下的我又给了挑夫班长和老吕，我留

下了三筒。

路上，我问挑夫班长：“你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下几筒，是不是为了立功受奖？”

他说：“我绝不承认我有罪，也不需要立功，我箱子里有吃的，他们都饿成了皮包骨，还要抢救伤员。”

“你的心肠太好了。”

“我在国民党里当了八年兵，升了班长。再艰苦，我的班从来不会饿肚子。人要结善缘啊，上天就会保佑你。”

我这才理解他有一颗纯美的宗教般的心，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天人感应。

十一

五次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我军打开朝鲜中部的屏障加里山，切断了洪杨公路，在小平川围歼了美军第38团的一部。

此时，担任后续部队的05团刚翻过加里山，在一条冲积沟里隐蔽待命，给敌人发现了，15个炮兵营万炮齐发，打得这个团人仰马翻，伤亡2000多人，我们的医护人员都投入了抢救，跟随先头团的副师长、作战科长和团参谋长，也都被炮击牺牲，尸体抬来交给我处理，我让护理班守尸。

挑夫班里有叫小李子的犯人，见到死者中有武参谋长就哭开了。他告诉我，成都战役时，他是俘虏，武参谋长那时是营长，给他们动员说：“我们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你们愿跟我们打老蒋的，就掉过枪口，不愿意的就发给三块大洋走人。”我留下了，还打了一仗，伤亡了几个刚过来的弟兄，武参谋长很仁义，给死者挖坑垒坟，还上香奠酒。”小李说话时很带感情，眼泪哗哗的。挑夫班长感动了，他打开挑箱，倒出里面所有的纱布绷带，说：“白布没有了，就用这些来包好他们。”边说边动手，我们三人把三具尸体裹了个严严实实的。天下起小雨，小李子拿出自己的雨布给尸体盖住。

挑夫班长感动地说：“人心是肉做的，谁对我好，我也会用十倍的恩情报答谁，小李被判的罪是报复杀人，是他的排长骂他打他，

他无法忍受屈辱，枪杀排长未遂，他是个懂得恩仇的汉子。”挑夫班长的感言让我领略：带领他们，无须用阶级斗争的思维，就是一个“仁”字。

晚上，我去拦了一辆送弹药返回的车，把三具尸体装上了车。回过头，身边已无干粮了，我又忙着去找吃的。

小平川是一个村庄，村前有一片开阔地，美军一个营在这里被全歼，到处是尸体，一百多顶帐篷东倒西歪的，这里早就被战斗部队打扫战场清洗过了，我在死人堆中翻找了半天，最大的运气是从一具死尸的腰上拽下来一只铝质饭盒。我又沿着洪杨公路搜索，发现一辆美军的中型吉普翻到有六七米深的沟底，我下到沟里去一看，车身已变形，浑身血污的驾驶员僵直地横躺在座椅上，两条腿悬吊在车门之外，车厢内空空的，尾箱锁着，我用石头砸开，里面仅有一只木箱，我轻轻地托出来，我最大的担心是伪装炸弹，敌人知道我们都是饿鬼，把爆炸物制成如打火机或罐头之类食品来诱杀我们，我曾用过美军飞机撒下的传单擦屁股，肛门红肿流血，痛苦了好些天。

这次，我倍加小心地把木箱抱上公路，从路边拾来一根长约30米的电话线，一头捆住箱子，我从另头拉着在公路上奔跑，没有听到箱子有动静，我仍不放心，又抱起箱子扔到路边的坎下，赶紧慌忙地伏在地上，只听到“啪”的一声，箱子开裂了，我爬起身向下望去，见沟底散落一地的饼干。我欣喜不已，下到沟底，把饼干装进破箱扛回营地。

老吕打扫战场先我回来，他从炊事班弄来一只大盆，把他捡回来的十多听罐头煮了一锅，稀稀的，我忙把刚弄回来的饼干全倒了进去，想让挑夫班的人来共享我和老吕的成果，熬了一会，我迫不及待地用瓷碗舀了半碗，不顾滚烫，就放到嘴边吹着喝着，刚喝两口，一阵难受的苦涩味，龇牙咧嘴地对老吕喊道：“不能吃，毒药。”老吕也惊愕了，他用手指蘸上放到嘴里品了品，也吐了。我赶紧去找来郝军医，他是白求恩大学来的，懂英语。他拿起老吕开过的空罐头看了看标识和文字说：“不是毒药，你们拿回来的都是人家的战伤用药，你看，这是沙发米德，我们也在用嘛。”老吕脸红了，他是老司药，脸上露出难为情的样子，说：“怪我没认真地看，饥不择食了。”

我后悔不已，捡来的一箱子饼干全报废了。

十二

我们又开始后撤了，传来的命令是十万火急。美国人已摸准了我们的补给已断线，他们不再像战役第一阶段那样不敢尾追，这次竟放心大胆的撤出了五个快速纵队，从我们6个军的战斗分界线切入，用坦克开路，迅速深入到我后方，俘虏了我们一个师（第180师），我们兵团的20万大军阵脚乱了，撤退已无序，滚滚人流都争先恐后地挤在一条公路上逃命，实在跑不动的，就倒在路边呻吟、叫骂。公路边的沟里，几副遗弃的担架上，伤员呼天唤地哭嚎，谁也顾不上谁。

我的体力严重透支，困倦已极，跑动中连连摔跤，我突然想起挑夫班长担子中有鸦片，我要他放下担子，给我弄出一小块来，我用纸卷起，点上火，猛吸了两口，烟味实在难闻，又满嘴苦涩，咳嗽不止，走在我身后的老吕上来警告说：“这是生烟啊，止痛用药，你要吃死的。”我惊恐地扔掉烟卷，挑夫班长递给我一盒万金油，我抠了一点抹在太阳穴上，凉凉的，神志开始兴奋了，从路边掰来一根树枝拄着，挑夫班长让我揪住他挑担上的绳子跑，还要我闭上眼，果然我神情懵懵的，两耳已听不见周围的马嘶人叫，两条腿已成惯性地迈动。迷糊中有人在我身后推了一把，说：“前边有匹骡子给飞机打死了，赶快去看看，搞点来吃。”我一听是大好事，跌跌撞撞地跟着老吕向前奔去。

果然，公路边大约有三四十人挤成一团，有吵嘴的，有打架的。我和老吕怎么也挤不进人堆，我转着圈找人缝，终不得逞。老吕眼尖：“你看，一条腿。”我从老吕指处发现从一个战士的两腿间露出了一个骡蹄子来。老吕抓住骡蹄子又拽又扯，怎么也不得手。我上去用头顶住那个正抢夺的战士的屁股，帮老吕合力拽住蹄子摇晃了一阵，也无能为力。突然我身后伸进来一双大手，左旋右转几下，猛力地一顿，扯出了骡子腿，我回头一看是挑夫班长。老吕用双手紧紧抱住骡子腿起身便跑，几个挤不进人堆的战士像见到希望，跟在老吕身后紧追不舍，老吕跑下了公路，在一条小溪边停下来，等我上去一看，他扔在

地上的骡腿上白净净的，几乎没一点肉，几个追来的战士失望地掉头走了。

老吕不死心，说：“哪怕敲骨吸髓，我也要吃上几口。”他从身上取出一把小刀来，在骨头上刮着，真给剔下了几块薄如纸的软组织，他兴奋地说：“不错嘛，还有点油水。”我从腰间取下铝质饭盒，把他刮下的就往盒里装，我又找来一块尖棱的石块刮骡腿骨，刮了半个时辰，已盛了半饭盒。老吕拾来些干树枝，我支上饭盒，点上火熬了起来，刚开锅，我的喉里像伸出了手，迫不及待地端起滚烫的饭盒倒出一半，狼吞虎咽地喝开了。我突然想起挑夫班长，我向老吕建议给他留一些，我们各自匀出一半来，我提着饭盒拼命地赶上队，递给还在跑动的挑夫班长，他怎么也不要，说：“还是你留下吧，你再不增加营养，真要倒下了。”

他真诚的话有情有义，谁说他是罪犯呢？我又想起小冯，把剩下的骡骨汤端到她跟前。她患了夜盲症，护士长用一根绳子牵引着她，跟在护理班的班尾，那纤弱的小腿，举步似千斤，口边流着涎水，她一见我捧着半盒热乎乎的骨汤，两眼泪花涌动：“你真好。”护士长回头一见是我，那双挥之不去冒着火的眼睛变得和睦了，善意地向我点了点头，我永远记住了这充满人性的一瞬间。

我们真像拿破仑从莫斯科的大撤退，千军万马不成列。人们挤着拥着，吵架的、打斗的，已乱成一团。路的两侧，有人坐着，有人躺着，分不清是死是活。一个战士坐在公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双肘抵住膝盖，手掌托住腮，两眼睁开，安详地望着每个行人——他死了，没有倒下，像一尊雕塑。人们走过都要敬佩的向他注目致敬，我和挑夫班长走到他跟前，默立良久。挑夫班长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他了不起，人都死了，还为我们送行。说不定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一样，为你们送别的。”

挑夫班长的话果然成了谶语。

十三

已疲惫不堪的败军们经两天两夜急行军，到达了清川江，江桥已

给美国人飞机炸断，一个工兵营正在伐树抢修，大部队都给堵在江的南岸。这是一条独路，一边是绝壁，一边是临江的悬崖。祸不单行，我们的后方桦川，已给美国人的快速纵队占领，开设在那里的兵站医院给连锅端。4600 伤员和 300 医护人员都成了人家的战利品。从桦川到眼前的江桥有 30 多公里，敌人坦克正迂回过来断我们的后路，我们已派出一个营去阻击，在这生死关头，脚下就像踩着火盆。

我们医院挤在人群中间，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突然间，护士长在人群中高喊：“快给我们让路，前面有伤员，我们要去抢救。”她带领几个老女兵在前边不住地喊着，冲撞开路，牲口挡路，女兵们为了夺路就掀翻了驮子，还把一辆大车推下了悬崖，饲养员破口大骂。女兵们出语更凶：“闭住你们的逼嘴，你挨了枪子，老娘也不会给你堵洞！”女兵们一路冲冲撞撞得到了桥头，江桥中段的桁间已整体断裂，要修复恐怕要等到天明，炮弹在江岸附近不住点地爆炸，弹片在头上“嗤嗤”横飞。护士长又发了神威，她振臂高呼，女同胞们，不要等待了，赶紧蹚水过河！她纵身跳下水，女兵们紧随其后，接着呼呼啦啦的一帮人马都进到河中，炮弹在河水中升起水柱，求生的人像过江之鲫，噗噗地扑向对岸。

步兵分队都跟着趟开了水，一时间，清川江上像开锅的水饺，几千人在水中扑腾。地面上，敌人的坦克炮在不住点地轰击，天上，敌人的飞机，借着照明弹的光亮狂扔炸弹，水面上不时地激起了几十根水柱，死的伤的都让水冲走了，侥幸上岸的惊呼狂叫，庆幸自己还活着。

我们医院徒涉过江，一些不会水的女同胞站立在江岸，急得直叫唤，挑夫班长突然一声喊：“我们班都放下挑子，背人过江！”他带头背上哭叫声最高的小冯，扑扑啦啦地游向江心，挑夫班的都背上人跟在他身后，他们一连来回背了三趟，医院的人都上到了北岸，院长马不停蹄的又急速带领大家继续突围。

他们走了，我和老吕停下来等挑夫班，他们背人过河后，又返回南岸搬取自己的挑子，他们回来了，我清点人数，9 人，少了挑夫班长。

我问：“你们班长呢？”

一个挑夫抓住两副挑子哭开了：“他把挑子交给我了，说不过来了。”老吕又惊又气，发火了：“为什么他过不来？他想干什么？”

挑夫们都闷不吭声，半晌，挑夫小李子高喊：“还不赶快走，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此时，江岸上黑压压的堆满了从水中爬上来的人群，嘈杂的呼叫声响成一片。我催老吕快走，老吕气呼呼地挑起班长留下的那副担子，领着我们融入了溃逃的人群。

奔跑的路上，小李子告诉我说，班长告诉他，他箱子的半袋炒面是留给我的。

我问小李子：“他为什么走？还说了些什么没有？”

小李子说：“我们回去搬桃子，他对我们说：‘你们都是有妻室儿女的人，还要顾家，就好好地接受改造，活着回去。我什么也没有了，我走了……’”

到了后方休整，教导员在总结会上说：“这场战役，我们医院冒着敌人炮火，忍饥挨饿，收治转运伤员 3700 多人，有 17 名同志为保家卫国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出现了叛逃的……”

十四

挑夫班长被定性是叛逃者，可在我的心目中，他只是一个没有过河的卒子。

拉远历史的镜头，人在战场上的命运就是生死，挑夫班长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选择了自己的路。据说，改革开放后，他回大陆开办了一家粮食加工厂，过起了小康人家的生活。

30 年后，我出差路过上海，顺便探望了小冯。她逃过了战争的劫难，幸运地随夫——五次战役时师的卫生处长走进了东方大都会，担任一个部门的人事处长，也许是对战争伤痛的感怀，她特地做了一席丰盛的家宴款待我。一再嘱咐：“要吃饱啊！”

战场缺粮，战争行动受到制约，尽管我们以人的生存极限在维持战争，精神也没有崩溃，但得到的仍是一个惨败的结局——五次战役我所在的 12 军伤亡 22000 多人，他们中有半数腹内空空走向黄泉路的。

营长成了“老虎毛”

一边打仗，一边搞“三反”，这是我在朝鲜前线难忘的一次经历。

1952年春，大贪污犯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被枪毙示众，震动了全国，中央决心把“三反”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毛主席有明确规定，贪污一亿元（新币一万元）以上为“大老虎”，一亿元以下至一千万的为“小老虎”。党中央要求各单位分摊“打虎指标”，列出“打虎预算”，发动亿万军民大批判、大揭露，制造了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一

志愿军正和美国人作战，上级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打仗也要人人过关。军队在战争环境，不具备有养“虎”的条件。当时，我刚到山炮营三连任副排长，师政委来前沿阵地给我们动员：“你们不管钱、不管物，可能抓不到‘老虎’，‘老虎毛’总有一把吧？大家都要‘脱裤子’露丑！”

我们正在第一线作战，大打一四七，小打三六九，战事天天有。在干部战士中很难找到贪腐，即使管吃管用的师团后勤人员，粮油和生活用品都是由兵站配给，从未有一张钞票过手，就是他们中有人多吃多占，无非多抽几盒烟，多吃几听罐头。连队干部战士都围着一口锅转，谁多吃一口，大家的眼睛都会把你盯住。政委说的“老虎毛”是指的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是指我们战场的缴获不归公。

我军入朝作战，都亲身体会到我军与美军在物质待遇上的巨大差异。美军有现代工业支持，物资供给丰厚，一个美军士兵的鸭绒睡袋，比我们的老棉絮被子轻巧得多，一顶用生丝织成的蚊帐，只有四

两重，三餐是纸盒包装的高营养食物，有抽水菜蔬、肉酱、奶油、面包，还有香烟、手纸、巧克力。我们只要打开美军阵地，干部战士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吃的拣用的。金银首饰弄到手的也会打埋伏。

运动一开始，连队都要进行检举、揭发，还要搞一次干部对战士搜身，细查每人的小包袱。我们连就搜出美军军用的饭盒、水壶、小刀、钢笔、扑克、降落伞（照明用的）之类的各种小物件几大袋。我主动交出了烧了个窟窿的睡袋。连长交出了只手表。师团机关清查范围要大得多，一位师的组织干事告诉我，师长李德生多买了一块手表，准备给留守在国内的夫人。手表是从香港买来的进口名表，有三度士、英纳格。李德生向大家解释，这是他花21元买下的，机关干部们说，违反现定的购买，也是多占。师长为此检讨了三次。

二

师机关搞运动都这般认真较劲，让基层深受震动，大家都想到了营长，认定他是个“老虎尾巴”。我们把缴获的战利品上交到师团，都会登记在册，师团干部很难有机会伸手。唯独营一级，我们的战利品都上交给了营长，没有任何登记手续。营长的通信员揭发，说营长身上藏有一块金砖，是从二连上交物品时窝下来的。营教导员在运动面前不敢袒护，由他主持召开了全营的干部扩大会，对营长进行批斗，逼着他交出赃物。

追查会是在营的指挥所靠山壁的一间草棚里开的，这个会场能紧巴巴地容下二三十人。批斗会气氛热烈，营长是抗战时期的老兵，挨斗不下十次八次，很油，他先是要赖不认账，赖不掉就说已丢失。参加批斗的来自各连的班以上干部，其中不少是“炮手”，运动有上级党委支持，更让他们有恃无恐，有的骂营长的娘，有的要上去挥拳动脚。二连五班长高喊，先把营长给吊起来，看他招不招！

随着他的一声呼唤，有人找来根绳子，几个班长上去就把营长五花大绑地捆吊在草棚的梁上。草棚低，营长的脚离地不到半尺。

营长平时好酒贪杯，酒后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人。有人就记下小账，那几个冲锋在前收拾他的，都是被他骂过或处分过的。有人还

给他算老账，连抗战时期他当班长时，偷杀过老乡的狗，受过处分的事都给端出来了。可是，不管你怎么逼，怎么问，营长就是一声不吭，他脸上青筋突起，冒出了虚汗，通信员心软了，搬来一块石头，趁人不注意，悄悄地塞到营长脚下。会开到下午三点，教导员宣布会明天继续，要求大家高抬贵手，把营长放下来吃饭，几个有成见的班长就是不干。

三

晚上，传来战斗命令，是营长的声音，连长告诉我，是师政委批准把他放下来指挥作战的。我们山炮营的任务是配合 04 团打椅子山，营长大概饿极了，边吃饭边发布命令，他大口大口吃饭的声音连长都能从电话里听到。火炮袭击地域的射击诸元是现成的，8 点整，三个连同时发炮，战斗就像往常一样，10 分钟后步兵就上去拿下了阵地。接下来，步兵上去后要构筑工事，我们炮火延伸，打敌人的增援，还要压制敌人的炮兵。

已是午夜，营长突然下达了一道命令，把二连五班的火炮搬到最前沿敌人的侧后去抵近射击，打掉椅子山侧翼的一个对我威胁最大的机枪工事。那里是火炮间接射击够不到的，只能靠直接瞄准打击。同时，还让我带一个班去协助五班，把火炮卸下的部件搬运到新阵地。时间紧迫，天亮前必须完成，在新阵地火炮的射击是突发的，半分钟就得打完三发炮弹，然后马上拆下来赶紧搬回原阵地，否则敌人一还击，我们就会炮毁人亡。

营长出奇兵，我们是接受的。但是，我怀疑他为什么偏偏要把二连五班拉上去？五班长在批斗会上倡议捆吊他，是不是他心生报复？我打电话给教导员说了我的想法，教导员批评我无事生非，还说：“营长绝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你有意见打完仗再说，先执行命令。”我领着一个班去协助二连五班，只抬运火炮的身管，240 公斤重，我分成两组，6 个人一班轮流，一路跌跌撞撞地争时间抢速度。

我抽空问五班长，营长为什么要这样做？五班长告诉我，他已经是第三次到前沿了，他认为用他是信任他能完成任务。

五班长为人正直，他对营长的坚信不疑也感染了我，我想营长虽有农民的自私，但还不至于把对自己存有意见的同志往敌人枪口上送。我们按时把炮送到野战阵地，这里没遮没拦的，只凭夜幕掩护，火炮部件在五班长指挥下十分钟就组装完毕。他代替了瞄准手，我们蹲在一边看他操作，这个曾在胡宗南部队干过16年的老炮兵，技术超群，三发炮弹发发命中。

打完，他一声令下：拆炮！

我们上去三下五除二地又卸成几大件，正在捆绳子，敌人的炮弹飞过来一群，在我们周围炸开了，气浪把我掀到一条小沟里，接着泥土石块砸下来，身上连疼痛的感觉都没有了。我爬出沟来，见五班长正用急救包在缠绕自己的右胳膊，他负伤了，血已浸出染红了纱布。我上去要帮他，他说，你别管我，看看大家有负伤的没有。我急忙找我带来的兵，发现副班长已打折了右腿，还有一个五班战士牺牲了。

五班长表现了一个老兵的沉稳，他让我领着我带的那个班，背着伤员，抬上牺牲的同志走在头里，他的班把火炮部件连拖带扛撤出了阵地。

第二天，营教导员通知，批斗营长的会不开了。说营长已交出金砖，是他从自己衣服下摆拆开线拿出来的，他交出的金砖比麻将牌大一倍。

不久，五班长提升为副排长，我为他庆幸，也证明营长心地是光明的。十年后，营长当了副师长。

四

我军用批斗、捆吊来治贪腐，在战争年代是常事。方式野蛮，悖反人道。但是，我至今对它念念不忘，一直把它看成是我军朴素的民主作风。君不见，当今中国的“老虎”，已成遍布赤县神州，北京肯定不只万只“老虎”，要是像炮兵营似的，把他们捆吊到天安门广场，来个集体示众，相信比新加坡的“鞭刑”更有效。

上甘岭是肉磨子

三年的朝鲜战争，是人和钢铁的较量。我仅从我军奉为经典的上甘岭战役，摘取些采访笔记，以一家之言，解说双方的战斗利钝。我坚信，我的记述更接近真实。

这场战役刚结束，成川的志愿军总部举办了战役展览会。我去参观了一天，看到从上甘岭战场 537.7 高地取得一平方米的土，厚度有三十公分，土层里有 2300 多块弹片，还密布着人的碎骨。我们常说的“炮灰”在这里得到验证。正因为这一战役具有前所未有的残酷性，美联社记者把上甘岭更名为“伤心岭”，并得到了举世瞩目。

一

朝鲜战争我军先后动用了 119 个师(含空军和特种兵师)195 万人。与美国军队相比，我军人数虽占优势，但在武器装备上差距天壤。

解放战争，我们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枪炮无计其数，但远不如美国人的武器先进。尽管改变了小米加步枪，装备依然是杂牌的。我们的枪支有日本人的三八大盖，国民党的中正式，清末民初的汉阳造，一个营才有一挺马克沁重机枪，还是一战时期德国人造的，行军三人抬，开火要灌水。入朝作战前到了鸭绿江边，才给我们换了一批苏联人在二战中使用过的家伙，有防冻性能良好的水连珠步骑枪，有装弹 70 发的转盘冲锋枪，重机枪带轱辘，一人就可以拉着行军。

我军的班排火器和美军不相上下，师团的火力配备就差了一大截子，美军一个步兵师已是多兵种，有炮兵团、坦克团、舟桥营，大口径（105mm 以上）的火炮就有 140 门，240mm 直径的弹丸，穿得透 5 尺厚的土木掩体。而我们步兵师兵种单一，只有一个骡马牵引的山炮

营，一个步兵团才有 82mm 口径的迫击炮 4 门。机动程度更是小巫见大巫，美军师编制输送车 400 辆，摩托行军。我们靠两条腿，累得人仰马翻，一宿才跑百十里。全师有 30 辆送粮送弹的卡车，还是用新疆羊毛跟苏联换回的处理品（150 公斤羊毛换一辆嘎斯 51 型），拉上两吨物资就放屁，边跑边修理。

通信联络，美军的排连用对讲机，我们的师指挥所才有一部 15 瓦手摇电台，团营之间的联系靠徒步通信。打仗指挥，营用号，连用哨，听不见就打出旗语。

战场救护，美国人有直升机，我们靠担架辗转，不死也成了残废。唯一的优势是我军人数众多，步兵师有 16000 人，最大特色是战斗连队拥有 90% 从国民党那里俘虏、起义、投诚过来的解放战士。我们刚结束国内战争，入朝的干部战士都有良好的战斗意志和单兵作战技能，而美国大兵是雇佣来的，没有实战经验，枪一响就成了兔子，我们叫他们叫“少爷兵”。

二

上甘岭之战是美国人发动的。美国人为什么要攻打上甘岭？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已一年多，我方想从谈判桌上获取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我方坚持两条：一是要求遣返全部志愿军战俘；二是要美方归还占据三八线以北 1200 平方公里的土地。美方认为，是金日成发动了这场战争，联合国主持正义出兵讨伐，付出了巨大代价，得到的土地应划归韩国，以示对朝鲜的惩罚。战俘是去台湾或回中国，均由战俘自己决定。谈判陷入僵局，只好再诉诸战场。

10 月 14 日，美军第八军军长范佛里特组织了“金化攻势”，虚张声势要夺取五圣山。这天凌晨 3 时，在朝鲜中部的五圣山前，发出了雷鸣般的轰天巨响，大地在抖动，上甘岭战役揭开了序幕。

43 天的战争，我 15 军、12 军以 6 万人的血肉之躯，抗衡美 7 师和韩 2 师 3 万人的进攻。美国人使用了 16 个炮兵群，280 门大口径火炮，150 辆坦克，发射 190 万发炮弹，3000 架次战机，投下 5000 枚航弹，我军以两个炮兵师百门火炮，用了 40 万发炮弹还击，作战

地域仅是两个山头，面积仅有 3.7 平方公里，美韩军死 8 千，我亡两万五。毛泽东赞扬说：“历史上没有攻不破的防线，上甘岭防线没有被攻破，这还是奇迹。”刘少奇也称颂：“上甘岭开创了一个世界纪录。”奇迹也罢，世界纪录也罢，都来自我军将士的数万具尸骨，而我军用超过敌人数倍的牺牲换来的却是“美国不过是纸老虎”的自欺欺人和自我膨胀。

上甘岭战役是怎么命名的？11 月 7 日，战火正炽烈，毛泽东在致彭总的电文中说：“五圣山附近的作战，已发展成战役规模……”上甘岭是两个作战山头之间的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的名字，有人想起滑铁卢也是村庄，就以上甘岭的名字来称谓这次战役，在媒体上大肆宣传。

美军先用他的第 7 师打了 12 天，再由韩军的第 2 师接替，攻击部队都是小兵群，每天却用数十架飞机轮番轰击，像下冰雹一样倾泻炮弹。他们之所以选择五圣山前面的两个小高地，打的又如此猛烈，就是让我们知道，他们有更大的领土企图，觊觎五圣山后 300 平方公里的平康平原。迫使我投入重兵阻击，借此消耗我之有生力量，以便赢得战场和谈判桌上的双重效益。

战后，我们对美国人的战略目的本应有真实的认识，可谁也不敢说，也不能说，都怕头上那顶可歌可泣的花环谢落。

三

从这场战役展开的时刻起，双方的厮杀就一天比一天严酷，坑道打塌了，交通沟填平了，土木工事已无踪无影，来来回回的争夺，阵地成了焦土，山石成了粉末，残碎的肢体裹着泥土，把两座青葱翠绿的小山变成了万人冢。

秦基伟率领的 15 军，阻击半月就遭到了重度伤亡。兵团副司令王近山再也不能容忍秦的人海战术，令他把阵地交给 12 军。力不从心的秦基伟还要表现出一股义气，说：“我要交给 12 军的阵地，绝不会让它少一寸！丢了阵地就是丢人，我更输不起。”

解放战争时期，王和秦都是第二野战军的纵队司令，王打的仗，

战战漂亮，电视剧《亮剑》就是以王的经历为背景编的。淮海战役后，王升任三兵团的副司令。入朝作战，王是秦的上级，王十分注意他们之间的关系，命令往往变成商量的口吻（三兵团司令是陈赓，未到职）。王一再忠告秦，敌人打的是消耗战，我们多使用小兵群对敌，节约战士生命。秦似听非听，他杀鸡非用牛刀不可，王在关键时刻，不得不使用自己一手培养的能攻善守的12军。

王善于用兵，长于用人。跟随李德生到上甘岭前线的张军参谋回忆说，时任12军副军长的李德生，是志愿军司令部（下面简称“志司”）上甘岭前敌总指挥。10月29日，由他率领12军4个齐装满员的主力团，奔赴五圣山接替15军的防务。李是王的老部下，打仗果断老实，深得王近山的信任，使用起来也得心应手，王通过“志司”点名要他上，就是为了贯彻自己的作战意图。

李接受了王的战斗部署并表示：“我全力把战打好，和秦军长的关系会处理好。”

10月30日，李德生率领10名师团干部来到五圣山观察所，观看秦基伟是如何指挥他的15军，从美国人手里收回失去的两个阵地。

五圣山如一尊巨佛盘坐在平康平原的南端。山高1061.7m，山前有两个突出的小高地，像是巨佛的两个膝盖，右边的高597.9，左边的高537.7。敌我两军的争夺、拉锯就一直在这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个山头上。

眼下，他们只能看到15军要夺回的是满目疮痍、灰烟迷蒙的579.9高地，山头上美国人三三两两正拖着麻袋垒工事。15军反击的时间选择在下午3时，因临近夜晚，夜间的防守和巩固阵地是我军的特长。

15时整，五圣山后方我军火炮齐鸣，15分钟就发射出13000发炮弹，579.9高地火光闪闪，浓烟滚滚。15军一个营分成多路上去了，敌人反应很快，趁我军立足未稳，他们的数百门大炮也发出剧烈的吼声，高地上又是一片烈焰火海，石头土块伴着人的肢体冲天而起。仅10分钟，美国人的炮火停了，硝烟散开来，我们上去的一个营不见了，在土层中还有几只抖动的手臂。敌人一个营成散兵线上来了，他们踏着松软的土层，在半人深的积雪中爬行，动作缓慢，趑趄趑趄，

手中的冲锋枪无目的地向山上扫射。敌人的先头刚爬到我前沿，我们反击的炮火又呼啸而去，团团硝烟覆盖了山头，覆盖了敌群，几个活下来的美国人，连滚带爬地溃逃下去，倒下的又埋进黑色的土层。接着，我们又上去一个营，几百人像群蜂出巢，尽管是多路进击，可敌人的炮火依然是铺天盖地，霎时间，我们的营又在弹光火海中消失……

15军的人海战术，让观战的12军干部们看得发怵，都摇起了头，这种阵仗在国内战场谁都没经历过，李德生心里更是沉重，说，我们的人上去，不能再打这种肉磨子战了。要改变战术，用添灯油的办法去打。李德生的话简单明了又很形象，一座小高地的你争我夺，确实像在推磨，敌人用钢铁大磨把我们的人碾碎。李提出用添灯油的打法，是国内战争的经验，用班排、单兵对付大举进攻的敌人，和敌人打消耗战，这是最经济的打法。

战斗进入傍晚，敌人的进攻停止，15军后续部队上去利用弹坑做了些简易工事，午夜，阵地移交给了12军。

四

12军派出91团的8连接防579.9高地。8连上去的是135人，他们按照李德生的意图，分散兵力，在各个阵地只放小组，单兵，单打独斗，人自为战，倒下了由后面上来人“添灯油”。他们终于顶住了一天的恶战，伤亡95人。战后，我访问了8连指导员刘怀珍，下面是他的讲述：

我们是11月1号午夜进入579.9高地的。山头已被千吨炮弹犁过数十遍，地面已是一层松土，脚踩下去，像踏在三尺厚的积雪里。阵地没有了，人也没有了，敌人的探照灯帮了忙，黑夜成了白天，我很快确定了13处阵地，配置了单兵、小组共27人，其余人后撤待命。阵地土层松软，无法构筑工事，我看到成堆的死尸，有敌人的，我们的，我让通信员向各阵地传话，用死尸做掩体。十几具尸体垒一圈，就是简易的机枪工事。

天明，敌人攻击开始，先是大炮轰击，接着四架F—86歼击机在头顶轮番扫射，飞机刚离去，敌人一个营在10多辆坦克火力的

掩护下，缓慢地爬了上来，我让通信员向各阵地传话，打近不打远，打多不打少！手榴弹、冲锋枪、爆破筒、手雷，专对付靠近 30 米的敌人。就这样，我们打退了 13 次敌人的进攻。

到了下午 4 点，我们连的预备队还剩下 10 多人。一号阵地告急，这是 15 军的一处防御阵地还没来得及撤走，那里又上来了两百多敌人。副连长身边只有两个新战士，一个叫朱有光，一个叫王万成，都是新兵，刚从四川补来，战前他俩只学了两天手中武器的使用，第一次上战场，炮弹从天而降，死人遍地，两个新兵腿发软，浑身战栗。副连长扶住他俩进入阵地，见到战友一个个都倒下了，射击，懵懵懂懂向山下放了两枪，投弹，忘了拉导火绳。在生死的临界点上，恐惧的本能陡然间转化成了无畏，当他俩听说友邻要求支援，只给副连长说了声：我们去！就跳出了弹坑，奔向 1 号阵地。副连长担心他俩闪失，尾随过去。此时几十个敌人正蜂拥上来，离山顶只有 20 米了！他俩同时扔出手雷，硝烟阻不了敌人迫近，朱有光情急，操起手中的爆破筒，拉响了导火绳，冲向敌群，巨响声中敌人倒下一大片。王万成见自己伙伴和敌人同归于尽，也操起爆破筒冲进了敌群……他俩的名字留在了上甘岭的石壁上。

8 连指导员的讲述就这么简单，这个故事我绝对相信它的真实，不少新兵进入死地，求生欲望迫切，一颗夺命的子弹，一滩殷红的鲜血，都会促使他在绝望中雄起，超越恐怖去拼命。

五

与 8 连同时投入战斗的是 93 团 3 连，战后，我采访了它的三班长，下面是他的讲述：

我们接防的 537.7 高地北山，只相当于城市一个小公园的面积，3 连上去时，工事、交通沟都削平了，泥土岩石树枝全变成了褐色灰粉，迈动双腿，一步一个深坑，一步升起一团灰烟，衣服、脸全是墨黑，枪口已灌满了土，炮弹在身边不停地炸响，耳朵失聪，说话用手势，根本听不见指挥号令，没有工事依托，就把半个身子陷到土里，两只眼睛全力盯住坡下的敌人。

我们都是单兵作战，各自坚守的阵地间隔仅几十米，不通信息，敌人炮火打来了，无工事依托，我从一个老弹坑跃到另一个新弹坑求生存。我是淮海战役解放入伍的，经验保住了我的命。比如，敌人刚炸开了一个坑，我马上跳进去，尽管硝烟呛鼻，我认为那是最安全的，一般规律，第二发炮弹不大可能落到原位，但我还是受伤了。一块弹片嵌入我的左大腿，疼痛得人都麻木了。敌人不打炮了，我心里反而恐惧起来，我要呼叫，没人能听到我的声音，我爬到二号阵地找人，那里已是黝黑的尘土裹住一大堆死尸，分不清是敌人还是自己人。我发现前方一个小土堆在蠕动，急忙爬了过去，是三班的老金，我和他原来都是黄维兵团18军54团的，战前我们预感这场战斗是有来无回，他送我一双新鞋穿上，还在我腰间系上一绺红布，说上苍会保佑我有个全尸。老金是河南人，家里还有妻儿老小，我们生死有约，谁打死了，都要给家里报个丧讯。眼下他的右大腿已断折，白花花的肠子从腹部突露出来，他用一条裤腿布把肠子扎在腰上，死亡临近，他安详地闭着眼睛。

我抱住他，贴着耳朵大声地问：“你们班还有没有人？”

他没力气回答，只摇了摇头。

我告诉他：“只有我们两人了，你要坚持住，我去拾弹药。”

我轻轻放下他的身躯，向死尸多的地方爬去，一具具地翻动，拣到的手雷、爆破筒，我从尸体上撕下几条布捆住，拉到二号阵地，我接连拉了两趟，敌人开始进攻了，急袭的炮火把阵地打的翻江倒海，炮弹掀起的尘土，盖住了我的身子，炮刚停，上来有30多韩国兵，我高喊老金：“快打呀！”

没有应声，我爬到他躺下的弹坑，他只剩下半截身子，脑袋也劈去半拉，我只能一人独斗了。

敌人爬的很慢，近到了30米就不敢再上了，担心山头上还有活着的人，我看打的时机已到，抬起半个身子，扔出一颗手雷，接着又送出去一根爆破筒，突然，眼前轰的一声，我昏过去了，等我苏醒过来，有人抱住我，我缓缓地睁开眼，半晌才辨认出是二班长张象山，我的泪水涌出眼眶，我活下来了，有人来接替我了。

张象山的出现，我马上感到连里最后的预备队也撤出来了，不会再有人了。二班上来要守到天黑。

我敬佩二班长，半年前，我们在金城前线阻击敌人，他的班打退敌人17次冲锋，他手握机枪，打死打伤敌人70多，被“志司”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志司”指派他回国向祖国人民汇报，一个记者采访时问他：“你在危急关头为什么这么果敢？”张回答说：“这有什么，我在国民党那边也是这么打共产党的。”这真心实意的话，让“志司”领导们尴尬万分，认为此人没有阶级观念，取消了他回国做报告团成员的资格，还得不到提升，要他从思想上改邪归正。

这次他出现在我跟前，很平静，他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叫来一个战士背我下战场。战士个小背上我走不动，只好放下我身躯，拽住一只脚拖着走，土层是松软的，背上擦着灰土地在移动，没有硌着的感觉，好不容易任他搬弄了两个小时，生拉活扯的才把我拽到一条小山沟，这里是营的包扎所，救我的小战士放下我就要走，我拉住他不放，他救了我，我要让他活下来，他说：“我一定要回去，我是替补，该我‘添灯油’了。”

他走了，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他再也没回来。

包扎所的卫生员给了我半截萝卜，我用舌头舔舔，算缓过来一点劲儿，我开始注视我的周围，横躺竖卧的有20多个伤员，有人用手在空中乱抓乱舞，我的耳朵已不灵，听不清他们在叫唤些什么，似乎在发泄创痛。有人已一动不动，可能进了天国。天开始罩上一层暮色，山头上炮声枪声时起时伏，又一批伤员背下来了，放在我身边的一位，他在歇斯底里放声大骂，骂排长对他报复，分配阵地不公，排长躺在后面弹坑里，把他放到最前沿吃枪子。我和他聊起，他也是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举手过来的。他和班里的几个中央军抱团，惊动了团的保卫干事，还遭到连长队前的严厉批评。走上战场，排长无时无刻都对他进行监视，他感谢上天有眼，只在他身上钻了两个枪眼，留下了一条性命。半夜，担架队上来了，我俩都给抬到了后方。

3个月后，我从后方医院回到连队，见到活下来的几个人，痴痴地，这场战争让我们失魂落魄，大家见面没少语言交流，但是都不愿提起上甘岭，后怕一直紧紧地揪住我们的心。我们连一百多人没有了，新的连排干部和战士来自其他部队，连队又齐装满员了。指导员说，我们随时准备再拉上去。

六

我还采访了O2团的三营副营长，下面是他的讲述：

我们营在炮火掩护下，拿下了537.7高地的北山，部队伤亡大半。我正来回地组织人给伤员包扎转运，伏在塌陷的掩体里的营长叫住我，要我把牺牲的同志搬到山后坑道存放起来，保持他们肢体的完整，待战斗结束后再择地安葬。

人的死有天葬、土葬、水葬、火葬，而我们在上甘岭是炮葬。敌人的飞机大炮一天数十次轮番轰击，人死了，又被撕成碎片。

进入战斗之前，营长就在全营队列前许过愿，说，人要死得其所，一定要给死者垒个坟。他的仁慈心肠很是鼓舞军心的。我记得在国内打国民党整编7师，这是一场拼杀战，我们旅长就做了300口棺材，让人抬着跟队伍一起走向战场，战士们见了，有人心里发怵，有人却高兴。那年月，只有旅长、团长的牺牲，才享有这般优待。一般干部战士死了，收尸时，就利用堑壕或工事，丢进一大堆尸体，用土填埋了事。营长用善后做动员，感激的人说，我们升天也能和首长一样，感到很光荣。

我遵命领着一个排不停歇地在炮火堆中连拖带背，把百多具尸体搬进了坑道。这是一条存兵的坑道，长约50米，还有几个支洞，我先把尸体塞到支洞，主坑道留给伤员用。哪知陆续搬来的尸体很快就把支洞填满了，我只好把尸体排列到主坑道，放一层，撒上一层土，不让人进出时踩着。50多米长的坑道，没多久又放满了。我们开始把尸体码第二层，不到天黑，已码到三层，洞里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剩下80公分高的空间，我们还在爬进爬出地存放尸体，安置伤员。

敌人又上来了，营长从表面阵地撤下来，还带来11个活人。营长的胸部给子弹穿过，不能讲话，是两个战士扶进坑道的。我让他们挨人的坐下来，坐下也直不起腰，脑袋歪着抵住洞顶。没有一丝光亮，山头上的炸裂声浪，透过岩层不停地摇动着我们的身躯，疲劳饥饿袭来，让人打个盹都不可能。吃的不困难，都有几块压缩饼干，口渴是难耐的，《上甘岭》电影可以组织人出去抢水，真实的上甘岭是没有水源的，靠支前战士背来萝卜、西红柿，十有八九都倒在路途

上了，我们生存只能靠自己。

伤员们开始互相喝尿，最初还能挤出一些来，没有碗，生怕浪费，就用自己的嘴衔住别人的小鸡子，等着撒尿人憋足劲压迫尿囊，哪怕挤出一星半点的，也是甘露。

洞口周边，敌人已布下铁丝网、地雷、机枪在不住点地射击，封住了我们的进出。我们与团部已失去联系，只能在焦急中等待部队反击。坑道的处境越来越让人揪心，空气稀薄得让人窒息，伤口发出腐味，有人疼痛地张着沙哑的嗓子呼叫，有人不停地用手轮番拍打自己难受的胸脯。营长爬到我跟前，附着耳朵说，要我把几个一息尚存的重伤员安排到洞口，给他们吸上几口新鲜的空气，作为临终前的慰藉。

生与死之间，选择求生是人的本能，几个老兵不信邪，怎么也劝不住，硬是爬出了洞，三个人在洞口下的坡地上躺下来，大口大口地吸着湿润的空气，尽管空气中有浓重的硫磺味，他们的狂躁一下变得安静了，仅几分钟，敌人机枪响起，洞口前扑扑地闪现出簇簇灰烟，在照明弹雪亮的光线下，我清楚地看到，三个战士在滚动、挣扎，哼了几声，不动弹了。我急忙让几个战士去把他们三人拖回来，血水正汨汨地从他们的胸脯上冒出来。刚拖到洞口，拖的战士就急不可待地拨开死者衣襟，把自己的身体伏在死者身上，嘴对住伤口吸吮着死者正在流淌的鲜血。不知为什么，我也掏出块压缩饼干，放到一个死者的伤口上，让血浸泡，饼干饱含了血水，软软的，我掰成小块放到嘴里。我身边的几个伤员，学着我的样子，也掏出压缩饼干，蘸着血水，他们的嘴也开始蠕动、吞咽，像有了生命。

战争的残酷、恐怖、血腥，摧毁了生命，也摧毁了人性，我们在绝望中等待死亡。在坑道里，我们坚持了三天三夜，活下来 15 人。一个记者采访我，我告诉他喝尿饮血的事，他们睁着大眼，不往本本上记。他们的笔下故事，都是美好的，把我们说成如何爱国，如何有党性。天知道，我们从没有组织过党支部开会，也没党团员喊过毛主席万岁，更没有豪言壮语，我们的求生存是无奈无助的，一切作为仅是为了活下去。

七

战后，我采写过《上甘岭的一支车队》，歌颂了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上的英雄业绩。十多年后，我重访了当年上甘岭前线指挥部的一位后勤处长，他说出了一个真实的后勤：

现代战争，拼生命、拼钢铁、拼后勤。上甘岭战役打了半个月，15军伤亡19000人，给打成了残废。我12军上去接替了他们的阵地，也接替了后勤，我们投入了90台车，4000人的运力，苦斗23天，送上前沿的粮弹1500多吨，我们比前线幸运，只伤亡1300多人。

我是后勤处长，从受领任务起，就担负起保障我军参战的指战员人人手中有弹药、个个不饿肚子的重任。一切为了前线，物资需要是第一位。志愿军的后勤部，只负责把战场物资送到水塔里，我们每天从那里领得上百吨物资，送往第一程的德山涧。从水塔到德山涧有30公里，除了车运，我们还用了两支人力运输队，一支是由兵团、军、师、团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组成，有1500多人。另一支是江原道（省）人民委员会动员来的8000人，老人赶牛车，妇女用头顶，十多岁的孩子用支架背。上甘岭的运输线，就是用上万人的血肉铺成。

敌人有现代装备支持，只用一个装甲输送团，轻轻松松几乎毫无损失的就能把足够的粮弹送到一线作战部队手里，而我们每天在这条线上要倒下一百多人。生命和胜利不可得兼，要确保胜利，就得付出生命。

战争环境突发事件多，我常常跟班作业，解决现场问题。11月1日，是我们接手后勤运输的第一天，我带上警卫和一个助理沿线视察，一路上，只见汽车、牛车、马车、人流混杂，见不到头，看不到尾，前去的是送弹送粮，返回的是担架队，来来回回，相拥相挤，人堵车、车别人，道路弹坑密布。美国人使用绞杀战，企图瘫痪我后勤补给，每天不分昼夜地空袭，尽管我们在公路两侧都挖有防空的猫耳洞应急避难，每天的伤亡还得有百十人。

那天，我刚到师野战医院设在路边的一个救护站，敌机就来了，是三架B29重型轰炸机，机肚下出现了数百个小黑点，一瞬间仿佛变成了扑向地面的一群“苍蝇”，我三个高炮团同时迎空开火，可是射

击的高度只有 5000 米，人家在 9000 米高空投弹，炸弹都是重磅的，且是地毯式轰炸，密密麻麻的弹着点，火光闪烁，山在摇，地在动，浓烟起处，汽车燃烧，人在喊叫，马在嘶鸣。救护组赶到了，把几十名死者抬到坡上停放，赶紧包扎受伤的，工兵连全力从山壁间取土填公路中央的弹坑。弹坑直径 15 米，深 5 米，一个排要忙活两小时才能填平。运输的人流绕过了弹坑，踩着炸裂的碎石，像洪流般向前奔跑。

到中午时分，敌机又来袭扰，这次他们投下的是子母弹，还在公路、山沟、山岭撒了一片像香烟盒般大小的小地雷，脚一踏上就炸，工兵连无法清除，就竖上几块牌子警示，人们路过都盯住地面，小心翼翼。隔三岔五，敌人飞机还投下些三角钉，是专用来刺破你车胎的。

公路要通畅就必须减压，我决定，各级机关干部组成的运输队 1500 人改走山路，腾出公路给汽车和朝鲜的运输队。走山路，要付出更大的劳累，山顶上的交通沟和小路曲折又高低不平，有的地段积水过膝，每趟要多走 15 公里，好处是伤亡人数减少，但是，每天要倒下一些体力不支的人。

一次我去跟班，和朝鲜的支前队一起行进，我和一个赶牛车的阿爸基（老人）聊起，他已 68 岁，劳动党党员，是班长，他的班 12 人，由四个家庭组成，都是军烈属，老人的儿子已经在前线牺牲了，他家享受烈军属待遇，每年能得到两百斤苞米，这是金日成的恩赐。他的报答就是把老伴和媳妇留在家，自己带上女儿和孙女来支前，住歇山沟，吃自备干粮。江原道来支前的已死了 1800 多人，他死了不算什么，只希望女儿、孙女能活下去。他还说，他们支前有小队、中队，每天要汇报运粮运弹的成绩，差的要批评，优秀的奖一面三角小红旗。

一周后，我又和朝鲜人的支前队伍走在一起，问起阿爸基一家，支前的说，他们三口人已被美国人的凝固汽油弹烧成了一堆焦炭。朝鲜支前委员会一个干部告诉我，战争的车轮一直在三八线附近碾来碾去，金化郡没有存下一间好房，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山山水水都埋葬着尸体。支前队的人天天在减少，运送三箱弹药，就付出一条人命。这个民族在承受着一场毁灭性的打击。

我最大的顾忌是德山涧往前沿两个阵地的粮弹输送。如在 537.7 高地开打，我们投入 6 个连队支前，如同时再打 597.9 北山，我们就

要投入 12 个连队，他们往上送弹药，回来还要背伤员，劳累不堪，还要遭到飞机打、炮弹轰，每天死亡百把人不足为奇。

一个白天，我和送粮弹的七连上前沿的一营指挥所，距离是 10 公里。从一处山口望去，通向前沿的道路在叠嶂之间环绕着，时而爬坡下坎，时而走交通沟，还要防空、防炮。人人命悬一线，一路上拉开 3 至 5 米的距离行进。走在我前面的几个战士，都是负重两箱弹药，三根爆破筒，4 个手雷，我估计有 110 斤，他们步子慢，正艰难地沿一条已打得稀烂的交通沟前行，步步都要踏实。我扶住一个战士的背架，过坑上坎还给他助一把力。我想和他说话，我问，他不答。我以为他耳朵给炮弹震聋了，赶到他前面，见他闭着双眼，只是迈动双脚，原来睡过去了。我摇动他的身躯，他才慢慢地启开眼帘，一见到是我，不好意思地说，啊，处长，你也来啦。

他是新兵，从四川大山来的，不在乎走路，他诙谐地说，四川的老太婆爬山比猴子快。他向我请求说，处长，你要是让我睡一两小时，我就有劲干它三天三夜连轴转。

前两天，发展他火线入了团，政治力量驱除了他的恐惧。我说等打完战，我放你长假，让你长睡 7 天 7 夜，你现在要是睡下了，前方的伙伴就没有命啦。他很听话，嗯嗯两声，又迈开沉重的步子。

炮火破坏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前面一座隆起的山头被炮弹削成了峭壁，山坡上堆满了滚下来的石头土块，脚踏到活动的石块，腿肚子打战，跌倒了，奋力爬起，爬起的又跌倒。我问一个班长，为什么不互助？班长气呼呼地说，完不成任务，连长要算账，自己都顾不上，还能去顾谁？越往前走，弹坑越密集，路旁的尸体增多，沟边、坡地都有被炮弹撕碎的肢体。我感觉麻木了，尸体像是路边的石头。

在一条交通沟的拐弯处，一个战士正靠在沟壁上哭，他肩部负伤了，弹片钻进肉里，他一只手护住伤处，仰起脖子嚎叫：“死了算了，活着受罪啊！”我去扶他，他怎么也不搭理，我让警卫员卸下他的背架，要他回去，他也不肯，还放声大骂：“都是你们这些当官的，把我们不当人！”我好说歹说地劝了一阵，他才诉苦地说，昨天，他背 3 箱弹药，在半道上实在走不动了，副连长上来骂他怕死、装熊，让他班长用绳子捆住他的手臂拽着上了前线。他的自尊受了伤害。他毫不隐

讳地说：“会有那么一天，他要让副连长不得好死！”

连队常因管理不善引发报复隐患，我让警卫留下来照顾他，给连队领导交代，要他休息一天，做好思想工作。

我只带上助理赶路。一个班正拉开百多米的距离飞快地通过一片开阔地。敌炮群正有节奏地进行拦阻射击，我们称之为封锁线，要通过它，只能等待敌炮暂停的一瞬间，放开步子快速通过。支前战士负重都有七八十斤，连迈步都吃力，哪有能量再跑动？开阔地死人多，战士们有了经验，把自己负重的物资分成两份或三份，来回奔忙，用智慧保护了自己。我通过时，拥着一个战士加快步伐，刚闯过鬼门关，敌炮就来了。

负伤的战士躺在路边呻吟，等待返回的人把他抬下去。他们背负的弹药撒了一地，没人收拾。后面背弹药上来的人，谨慎地从伤者身边踩过去。返回时空手的，就先把这里的尸体拖到一边，再背上受伤的。

我过了三道封锁线，才到达一营指挥所。这里没有掩体，一营副营长带领一个预备战斗排，分散地蹲在炮弹坑里，另一个排把后方送来的弹药再分配到前沿的班、组，他们在坡地上分成数十堆，给它盖上一层土，防止敌人炮火的轰击。沟里和两侧的坡地上到处是伤员，有人呼天唤地喊叫，营的卫生员、医助，正在给他们做简单的创口处理，炮弹不停地在坡上炸裂，掀起的尘烟弥漫了山沟。我来到副营长跟前，卧下身来问前线情况，副营长说：弹药够使，就是人不够用，一个排上去，活着的几个人都是耳聋眼瞎的，还有人得了精神分裂症。我们给前沿运送弹药，先是靠预备队，伤亡大，就让我上阵地接替的班排自己尽量携带。不够了，就去死尸堆里找，枪已塞满土，不能用了。我们最需要的是手榴弹、手雷、爆破筒。一天不吃不喝可以顶得住，活着的回来就啃萝卜。

副营长的诉说让我感到了问题的焦点，这是一条死亡的走廊，每天要遭受到敌人飞机大炮的双重打击。伤亡都是战斗连队的人，影响了我军持续的作战能力。

我回到前线指挥所向李德生汇报，李提出了对策：把德山涧向前运物资的连队，改为短途接力，每连只担负1.5公里。就是说，一

个战士在 30 米的距离上来回接送，既省体力，可以自救、互救，连队的管理也方便集中。李德生作出补充：他要求干部全力以赴，连的干部下放当排长，排长当班长。果然，我们从 11 月 7 日起，每天的伤亡人数都不超过 30 人，这就是奇迹。

八

战后，两个参战军评出功臣、模范、战斗英雄数以千计，其中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胡修道四人被朝鲜最高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他们成了英雄中的佼佼者。我采访过胡修道，对黄继光、邱少云和胡修道等人的业绩，我是持怀疑态的。

黄继光，新兵，连通信员。据说，他所在的 6 连在攻打 597.9 高地 9 号阵地时，敌人的一个地堡里的机枪复活了，他的身上已 7 处负伤，为了掩护战友，只身爬上坡地，扑向地堡，堵住了正在喷吐的火口……给连队开辟了一条前进的安全通道。多少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会提出疑问：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要爬去堵火口，需要速度，更需要力气，且地堡在坡上，射界开阔，没有死角，黄继光是怎么接敌到咫尺之间？敌人机枪正在射击，子弹出口是连续的，一个血肉之躯能抵挡住巨大的冲击力吗？子弹瞬间就让你骨碎膛穿。为了制造马特索洛夫式的英雄，制造者已经顾不得情理上的罅漏。（我和我的朋友、武汉军区的作家王精忠有过争论，他是黄继光传记的作者，后转业到湖北省作协任秘书长）。

还有一个叫邱少云的战士。就在上甘岭战役开始的前三天，他奉命潜伏在敌人的前沿，草丛被燃烧弹引起大火，说他严守战场纪律，纹丝不动地被烧死，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保证了攻击部队的安全。问题是，他那些崇高的心理活动，是怎么知道的？含混的文字表述有说服力吗？

我采访胡修道和他的战友，写过他们的英雄业绩。他们能在焦土般的 597.9 高地的主峰阵地上存活下来，是因为那里有一块巨石被炮弹削去一半，巨石中间露出了一道能容下两人身躯的牙口，当敌人

炮弹猛烈袭击时，胡修道和战友滕土生就躲藏在石缝里，敌炮一停，他俩就爬出打击进攻的敌人，从早到晚，打退敌人41次。

而这一天，正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职的日子，为了祝贺，范佛里特发动了大进攻。美国人差不多用了一个团的兵力轮番攻击。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人都会拼死搏斗，一个连都在战斗，能消灭很多美国人是合理的。可是，请功时胡修道一个人就歼敌280多，这是一个难以让人置信的数字，我和他的连、营、团、师的政治机关干部交换过意见，众口一词，军史也照此笔录。

10年后，胡修道当了营长。这年，李德生带我到他的营三连蹲点，我和他有一次推心置腹的“沟通”，那时正是困难时期，连队一周才能吃上一次肉，平时菜盘子里见不到油花子，我跟李德生和战士同吃同住，李能忍受，我的肚子受不了，我悄悄找到胡修道，要他给我打打牙祭。一天半夜，营部通信员来叫我去他的住处，桌上已摆好了几碟小菜，一瓶烧酒。三杯酒下肚，我就提起上甘岭，开门见山地问他：“我至今还怀疑你上甘岭打死敌人280的数字，是不是他们把全连的歼敌数字都集中给你了？你能不能老老实实的跟我说个清楚？”

胡为人直率，我们又是老朋友，他说：“滕土生最初报的是打死敌人80多，我报的是160，团的张干事来给我们算了笔账，才给我添加到280多的。”

我问：“张干事的账是怎么算的？”

“他先算敌人进攻的次数和人数，敌人连进攻25次，营进攻16次，有时分三路，四路或散兵线，我一共使用了60多颗手榴弹，12个手雷，7根爆破筒，还打完五支压满子弹的转盘冲锋枪，张干事是按敌人各次攻击估计的伤亡数递加的。”

我问：“证人就是你和滕土生？”

胡修道说：“敌人怕死，死尸没有拖回去，在阵地前天天积累，大约有七八百。张干事说：‘三分之一是你们打的，可以吧。’我们只能听他的，”他还说：“这是团的荣誉，师、团领导不在现场，只能听之任之，谁不高兴多报些。”

虚报战绩是常有的事，上甘岭一役，秦基伟就报了歼敌二万五，而美军韩军公布自己只伤亡八千。

整个朝鲜战争，我们公布联合国军伤亡39万人，美军阵亡不足4万，而我军真实的阵亡数是36万。这个数字是从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写作组那里获得的。

这天半夜，我回到三连，李德生还没睡，正和指导员谈话，我跟他谈起胡修道上甘岭歼敌280人的事，我说，数字的一半靠拼，另一半靠吹。李不高兴了：“你满嘴都是酒气，赶快回去睡觉！”

李德生是战役指挥员，他有身历其境的视角，又有丰富的战场经验，硝烟养成了他性格的刚毅，他评价战争和我们拒绝战争、同情生命的人，有着迥然的差异。他对上甘岭战役，给我做过形象的譬喻：“就像十个小个子和一个大汉打架，小个子给打趴了七八个，大汉已无还手之力。这就算我们的胜利。”他的成就是把秦基伟的推肉磨子战术，改为勤添人，少添人的细作。他指挥打了25天，12军只耗损4671条生命。

1970年春，上甘岭战役最高指挥王近山因生活作风犯错误被降为师职，许世友不忘老部下，向毛泽东提出，让王出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此时，秦基伟已是昆明军区司令，李德生已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1970年春，王近山听说李德生在视察马鞍山，特地从南京赶来探望。十多年的磨难，命运把他们的职级关系给颠倒了。

老部下成了新上级，王近山没有感到有多少尴尬。20多年没见面，一上午他俩都在抚今忆昔。马鞍山市革委会主任是06团团团长，当年他也战斗在上甘岭，两位老首长在他的领地上因缘聚会。他兴奋不已，在机关食堂开了个单间，从食堂打来饭菜，又专门让伙房做了一份青椒肉丝，一份韭菜炒鸡蛋，没有酒，这在文革年代，也算盛情的招待了。王近山却不接受，他硬是跑到食堂排队买饭，06团团团长去劝说了一阵，一再说明这绝不是特殊化，是自己掏钱加的两个菜，他这才回到席间。

在战争年代，王近山见到下级总是骂骂咧咧，霸气十足地做出决断。这天，他在用温言款语反思朝鲜战场，他指挥的3兵团伤亡过半，一个师被俘，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败。他说，在国内地域广阔，我们打的是运动战，能歼敌整师整团，在朝鲜地小狭长，敌人机动能力强，只能打消耗战，我们是用人去对付炮弹。上甘岭战役，德生同志指挥了后半段，比秦基伟多打了7天，人少死1万5，给我们对付现代化敌人创造了经验。

九

残酷的上甘岭之战，是美国人教训我们的一场战争。之后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美国人仍坚持住他们的底线。1953年，我们在中线发起一场夏季战役，夺回了几百平方公里土地，才签订停战协议。志愿军战俘只回归了6711人。我们依然向世界宣告：抗美援朝我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为什么两万多被俘的中国官兵愿去台湾？当时，国内正大张旗鼓的进行土改、镇反，地主、富农、旧官僚都受到了清算，有的给扫地出门，有的上了断头台。志愿军90%来自国民党，他们的根不正，又没有杀身成仁在战场上，不光彩地回到家只能是和亲人一起受苦受难。事实证明，去台湾的都有了好的下场。

来自越南前线的道听途说

一、我们是怎么打进越南的：师参谋长说

越南人把“红色高棉”赶回丛林，又反华排华，忘恩负义，用武力教训一顿，天经地义。但我军的临战经验今非昔比，自朝鲜战争之后，我军再也没有进行过有规模的战争，中印、中苏之战，都是小打小闹，要和越南人真正的较力，够我们喝一壶的。他们打败了阮文绍，赶走了法国人，又把世界第一号军事强国打得焦头烂额，被迫撤军。越南人30年没有离开过战场，战斗技能远远超过我们。而我们呢？出动了10万现代化装备的大军，只能在边境线上短促突击。战争发动者只求政治立威，而我们得用流血和牺牲去完成党交给的使命。参战的指挥员心知肚明，别无选择，只能仓促备战。

战前，我们花了三周的时间组织部队进行实战技术的演练，营团干部天天摆沙盘推演，一切为了慎重初战。

从广西到云南的千里边境线上，我军选择了6大突破口，我师的序列在中线集团，把出击地放在水口镇。

水口镇离边境线只有5公里，镇前是一片开阔的庄稼地。越方地形占优势，都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大山，他们站在山上可看到我方纵深几十公里，我们根本无法隐蔽。

师长经历过战争，考量战场很精明，他从附近几家农场借调来几十部拖拉机，不分昼夜地在开阔地上搞“春耕”，以巨大的轰鸣声掩护我构筑工事。仅五天时间，就把全师人员、车辆、火炮、坦克，全部藏进几十平方公里的庄稼地底下，有的离敌人前沿只有百米，伪装的和地物地貌样，走到掩体前也看不出动过土的痕迹。

1979年2月17日凌晨，作战进入倒计时，我军的火炮阵地掀去伪装，坦克拱出地面，5时整，各种火炮齐鸣，以排山倒海之势倾向越南人的阵地。

与此同时，突击的坦克营携带步兵，由许光达大将的儿子许延滨率领，径直向一个山口冲过去。这是一条有十多公里长的狭谷，从未通行过汽车，越南人到边境做生意，都是用架子车连推带拉通过的。师长比喻为华容道，选择它是出敌不意。其实，越南人根本不理睬你。他们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沿途我军没有遇到任何阻击，只是行动困难，走走停停，道路不单窄小，还坑洼不平，小坑可以铺石垫土，大坑就得让坦克下到坑底，让后续坦克从它顶上开过去。5个小时才闯出山口，进入一片丘陵地，依然没有碰上一个敌人。

我们手里的地图，是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匆忙测绘的，道路地物已过时，图上连等高线也不清晰，用它只能连猜带蒙。10多年前，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就在这一带给越南人构筑各种储存战略物资的洞库，越南给的地图是1:25000的，地物地貌非常详尽，我们离开越南前，老老实实地交了回去，没有想到还有今天的战争。当下仅凭一张日本地图作战，也算是奇迹。许延滨打开地图，竟分辨不出自己所在的位置，到底是将门之子，胆略过人，他大致判定了个方向就继续挺进。

开路的坦克营通过了，后续部队乘汽车开进，越南人醒过来了，组织民兵狙击。我跟进的部队一辆车挤几十个人，人家正好一枪穿透两个。等我们到高平一算账，没有打倒一个越南民兵，自己伤亡了500多人。

二、意外战争财：一位团新闻干事说

我们军出动的三万人马，是沿通向河内的铁路线推进，沿途打了几仗，斩获甚微，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占领了一座稀有金属矿，在那里发了一笔不小的战争财。

这座矿很具规模，是越南的支柱企业，矿井的开采设备，全是从欧洲国家进口的，仅一台掘进机就价值300万美元。井下巷道宽敞，

通信设施完好无损，通向各个工作面都铺设了轻轨，采的矿石用传送带自动装车外运。井上还有各类库房和车间，街道、商店、学校一应俱全。矿区有好几十平方公里，我们进入时，4000多工人全跑了。军长来视察，指示我们把矿山的所有设备通通搬运回国。井下，由工兵营拆卸各种机械部件装箱，一个团搬运到井上，另一个团扫荡厂房，凡是建材、配件或生活必需品都装车运走，装了两列火车。

我们这个军伤亡近两千人，能得到价值数千万元的矿山设备，也是一种补偿。

撤出越南前，军长又来了，他要我们炸掉厂房、电厂，给矿井灌上水。炸药矿上有的是，水源就近取红河水。工兵营立即出动，在库房、电厂和拦洪坝上安上几十箱炸药，一阵震天的巨响，厂房、电厂瞬间化为一片废墟，滚滚的红河水从溃决的大堤奔泻到矿区，流进了矿井。

三、地道战：某作家说

谅山离我国边境14公里，人口20万，是越南北方的经济重镇，我们军攻打谅山使用了15个炮兵营的火力，进行地毯式的饱和轰击，一座不设防的城市顿时片瓦无存。我们一个步兵营进入，在瓦砾堆中清扫残敌，有人告之，说南郊公园的石洞里藏有数千人。

营长判定，越南的老百姓早在战前已闻声逃离，藏匿进洞里的肯定是撤不走的正规部队或民兵，营长找来二连连长，要他的连队四处收集破板断木，到公园架在石洞前点火烟熏。烧了一阵，烟气不往洞里去，营长调来三连炊事班做饭的鼓风机，硬是把腾腾的浓烟吹进了洞里。不多会儿，洞里窜出了十几个越南百姓，营长问他们，洞里有多少人？他们说，洞很深，看不见。二连连长想起日本人的办法，让战士扛来一袋辣椒粉撒在火焰上，顿时烟气刺眼刺鼻，连添柴架火的战士也跑得远远的。这股烟只吹了几分钟，洞里又冒出了几个人。眼睛红肿，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们也说不清洞里有多少人。

营长心不甘，要二连把火烧到天黑。战后，据传，越南人从洞里抬出了300多具尸体。

四、越南女民兵班：某营长说

先头连前进受阻，正面敌人是一个班守在公路边的一座小山上。我们边打边喊话，要他们缴枪投降，回答的是更激烈的枪声。

我们进行了两次炮火袭击，几乎把山头都翻了个遍，顽强的枪声还在一个山洞里响个不停，我马上叫来两具火焰喷射器，要他们匍匐接近洞口，在30米处发射了两枪，长长的火龙，舔蚀了洞边的草木，烈焰窜进洞里卷成团团火球，似岩浆在滚动、迸射。等热浪消散，战士们从洞里拉出了十一具尸体，还能辨出，全是女的。

尸体烧的像焦炭，似一尊尊扑在地上的雕塑，我不让战士再去惊动，让她们尊严地安眠在这里。

五、刺刀见红三女俘：团政治处主任说

通信连架线，从村子里搜出三个女民兵，指导员给我打电话，要交给团处理。我要他先派人看住，交给团警卫连会被杀掉的。

警卫连不像侦察、通信、工兵、防化等技术连队，他的任务除警卫首长机关的安全，就是执行指挥部的指令——战俘不得带回国内，一律就地处决。师长也主张杀人，在战前的一次会上，他说，日本人的武士道，不单是尽忠天皇，他们的刺刀都是用活人的血擦亮的。我们光喊“毛主席万岁”去冲锋陷阵，是打不倒敌人的。

下午，我因事去一营，路过通信连住的村子，在一户人家的石阶上，三具全裸的女尸血淋淋地摆在那里，我知道是通信连干的，找来指导员就批评。指导员辩解说，她们骂我们是日本人，还用头来顶撞我们的战士，我交给二班看管，不知什么时候就给收拾了。我火了，你们还摆出来示众，越南百姓看了会怎么反应？你别辩了，赶快处理！

我细看了三具女尸，枪刺全扎在她们的身下，像蜂窝眼一样，模糊的血肉让人惨不忍睹。她们的年龄都在20左右，也许是“基干民兵”。我担心越南人看见，没有马上离开，一直等到指导员带来七八个战士，用电线套住尸体的脖子，拉进了小树林。

我喊住指导员：“要埋得深深的。”

六、我军的伤亡：军报记者说

广西边防部队抓获三个潜入的越南妇女，农民模样，经审讯，是越军的侦察兵。

三人中年长的是组长，上尉衔。她坦诚交代，她的侦察小组是来了解中国军人在越南战场伤亡的真实数字。办法是到建立在边境上的墓园里数坟头。她们从麻栗坡数到这里，已数了8座陵园，死者超过6000人。

我问总参的人，越南人所获取的数字是否真实？

答：我军历来不会公布死亡的数字。她们这么做，只能是她们找的依据。

我又问：我们是如何计算伤者数字的？

答：战后各部队都有准确的报告，我们也不会公布的。

我再问：小平同志曾有过经验之谈，说伤与亡通常是4：1，就是战死一人，就要伤4人。

答：这是指解放战争常规武器作战条件的规律。

我还问：那就是说，我们在越南负伤的有3万多人。

答：我无法奉告。

有关数据披露，我军伤亡22000多人（其中阵亡近7000人）。

七、越军乘虚而入炸雷达：一作者到编辑部说

入越作战的部队刚全部撤离回国，越军抓住我们“胜利者”的麻痹大意，派了一个侦察营大摇大摆地过境，偷袭我边境上的一个雷达连。

这个连有一部远程高效雷达，是战前才从西德进口的，它不但扫描三千里长空，还能精确判定地面大部队的调动及工事里的火器配置。越南一个营是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过来的，边境线的民兵和群众，以为是后撤的人民解放军，还站在村口，打着灯笼火把列队欢迎。他们就这么轻而易举的炸毁了雷达，把雷达连的75人射杀的一个不剩。

八、损失惨重的奇兵：× 记者说

指挥部想出奇兵，借道老挝入越。我军就丢下后勤辎重和火炮坦克，让大队人马轻装摩托开进，不鸣笛，不开灯，一夜之间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了老挝国境，钻进了越南的后脑勺。没有给老挝人留下任何把柄，更是让越南人始料所不及。

进入越南的头两天行动无阻无碍，如入无人之境。第三天，惊醒的越南人组织民兵占据了两侧山地，拼命进行阻击。我们的人马全暴露在山间的公路上，不敢恋战，只能且战且进。越南人居高临下，用机枪扫射，小炮轰击，一天就打死打伤我军一千多人。死的伤的都得抬着前行，一支3万人的队伍，几千伤员人成了累赘。行动紧迫，白天黑夜都得小跑，苦战了五天，才冲出血路到达目的地。

这是我入越作战损失最重的一个军，干部们敢怒不敢言，都知道，这是邓小平假道伐虢的决策。

九、军事物资调包：一参谋说

在中越关系友好时期，苏联支援越南抗击美国人的战备物资，都是通过我国铁路线输送给越南的。中越打了一仗之后，苏联以为有过去的运输协议，虽关系恶化，中国人还会遵循。所以，他们依旧把援越的军用物资通过我国铁路运往越南。当时，我们已视越南为“小修”，认为“大修”给“小修”的东西是在帮助越南对付我们，我们决定利用苏联借道的方便，搞货运调包。

我们知道，苏联人给越南的是他们急需的枪支弹药和重型火器，于是，我们就组织了一支类似铁道游击队那样的小分队，把苏联人七十年代刚出厂的武器装备换成我们用过的（苏联在朝鲜战争时期装备我们的）或已报废的武器，再让火车拉到越南去。

办法是，当苏联货运列车在满洲里入关之后，我们的小分队就钻进各个车皮，因列车已进入我国国境，用不着像铁路游击队那样扒飞车，再说，列车的车头是我们的，司机也是我们的人，列车的走停，都由我们控制。苏联有押运人员，都让他们住进首车（在车尾），

那里有列车长每天用几瓶格瓦斯“照顾”他们。

上车勘察的小分队都是军需军械方面的专业人员，他们认得各种装备武器。苏联人精，为了不显山露水，把重型装备或火炮都拆成零部件装进木箱里，查看人员不得不把箱子一一打开，核实是什么装备，什么炮种？多少门？枪支的种类，多少支？记下来通知下一站，做好以旧换新的准备。

在我国，有一套专为军队战时建立的铁道输送体制，凡大站都有军用线站台，我们的换“货”就是在军用线站台进行的。一次只能更换几个车皮，两小时就得搞定，不但每箱的零部件一样不缺，包装封条都要做得没有任何破绽。然后，再到下一站换几个车皮，神不知鬼不觉直到友谊关出境。

我们从中得利多少？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做了三四回就暴露了。越南人先是迁怒苏联人不仗义，苏联人马上明白是中国人动了手脚，吃了哑巴亏。往后只要是给越南人的东西，不走旱路走水路，都到海参崴装船运到越南的金兰湾，已顾不得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监视了。

十、一个越南民兵的战斗力：一团副参谋长说

我告诉你一个越南民兵人自为战的故事。

我率一营突击前进，发现公路边的山头上有敌情，先头一连上去搜索。摸到半山腰，山上环形堑壕里响起自动枪声，接着又是一阵机枪的点射，还飞下来几颗手榴弹，一连上不去，还伤亡了几个人。连长跑回来向我报告，他两眼像在喷火，说敌人是一个排在防守，要求火炮支援。经炮兵营的射击轰炸，打得山头的红土变黑土，一连上去清理战场，仅见到一具尸体躺在堑壕里。

我上去查看，确定只有一个民兵在狙击我们。令我震撼的是，他把机枪、自动枪、手榴弹，事先放置在环形堑壕的各个战斗位置。当我们进攻时，他来回跑动使用，既造了声势，又形成了杀伤力。他是用智慧、技能和勇气和我们周旋，迟滞我们的前进。

他的一条胳膊被炸飞到壕外，一条腿也和血肉模糊的身躯分离。一连长让战士把这个民兵的残肢收拢在一起，盖上土，还把他刚使

用过的自动枪插到埋他的土堆上以示敬意。我理解一连长，他们连队正缺少像越南民兵这样的战士。

十一、战争比武：师副政委说

17天的对越作战，对手是些越南的男女民兵，一场小小的开打就让我军如此狼狈，今后我们还有多大能耐对付苏修美帝？军委领导深感提高部队的战场适应能力已迫在眉睫，决定将占领越南边境的9个山头暂不撤出，今后用它长期和越南人军事对垒，作为训练我军实战的基地。

这一设想得到邓小平的首肯，当即从各大军区抽调出最优秀的部队，轮番开赴指定的战争课堂，那里的对手都是越南的正规部队。

我去过老山，就说老山前线的战争。

老山在云南和越南接壤的边界线上，这里的以实战训练部队，倒不如说是两军临战的比武大会。

最先到老山的是一个红军团，全军的少将到大将，有214人出自该团。这么一支老资格的部队，上来就打了十几仗，胆识不如人，损兵折将400多，营连干部急功近利，虚报了打退敌人几十次的攻击、歼灭其有生力量400余人的战绩。指挥战斗的是位副师长，他是党中央一位领导人的儿子。他渴望自己建功立业，听任部下乱报敌情，军委撤了他的职。

第二支来的是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特功八连，在朝鲜战场上能坚守、能出击，人们从电影里看到他们出生入死，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的英勇无畏。可第二代人来到老山前线就变了样，夜间站哨，两人不敢执勤，干脆全班一起上，12个人端着大枪，屁股对屁股围成一圈，通宵旦旦地蹲在山坡上。那副模样，活像被狼吓晕了的一窝兔子。他们只打了一仗，一个连就被越南人吃掉了一半。

第三支上来的是硬骨头六连，这是四百万人民解放军的一面旗帜。军委命名时，称他们“思想红、技术精、作风硬”。六连战士个个身手不凡，全副武装（负重30公斤），疾行军10公里立刻投入战斗。投弹，人人都在40米开外，发发落入堑壕；射击，300个人像活动靶，

弹弹无虚发。没想到，这么一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战斗力的顶尖连队，在老山战场上却是一只经看不经摔的花瓶。越南人攻击他们的阵地，指挥所要他们反击，六连像赶羊出圈一样，冲出堑壕的干部战士满坡乱窜，班长找不着排长，排长听不到连长的指挥。敌人机枪铺天盖地的扫过来，战士就躲在班长的屁股后面拱成了一堆，正好给敌人机枪点名，120人的连队，丢掉了40多人的生命，指挥所不得不把他们撤下阵地。

这场战争，我们的兵力兵器超过越南人的十倍，但战斗的技能不如人家的民兵。虽具有正义性，却丧失了人道主义精神。

红军师洗劫越南城

127 师属武汉军区，是一支有红军老底的部队。它的 381 团 2 连，早在 1928 年朱德在赣南起义时，林彪就是第一任连长。自林彪主持军委，2 连的晚点名，第一个要呼叫林彪的名字。军区把 127 师树立为政治标杆，全区军政训练的先进经验，都要从这里出炉；全区的军政干部，大都要从这个师培育。1965 年，林彪秘书关光烈出任该师的政治委员，更是向全军彰显了林副统帅对这支部队的亲切关怀，127 师的人以此自豪了好些年。

哪知祸起萧墙，1971 年 9 月，林彪儿子林立果誓死要推翻毛泽东的独裁统治，把关光烈召到北京密商（此时的关光烈刚升任 43 军政治部主任），要他从 127 师派出一个火箭筒班，到沪宁线上的硕放桥狙击毛泽东南巡后返京的专列。尽管是纸上谈兵，“913”事败，127 师被中央专案组列为参与政变的武装力量，师团干部给整的个个灰头土脸。1979 年，中央军委组织对越南“自卫还击”作战，总指挥邓小平点名要 127 师参战，时任师长的张万年看到祥光降临，号召麾下打好翻身战，并向中央军委表态，要在战场上用鲜血冲洗昨天的污染。

127 师按中央军委的指令，在越南打了 17 天就班师回到河南新安驻地。《解放军文艺》社领导从报刊上看到了他们“辉煌”的战绩，认定这个师仍然是坚定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拳头部队，有宣传的典型意义，当即指派我率 10 名军内作家前往采写他们的英模事迹。

一、小纠纷引出大故事

我们一行被安置在师招待所，对我的礼遇从优，住进半山腰的

一幢小别墅，这里是关光烈任政委时住过的（“913”事件后，他被关押5年，脱下军装，发配到洛阳啤酒厂当车间工人）。虽是几间小平房，环境却幽静，又有服务员照应。让我惊异的是套间的床、桌、椅都古香古色，豪华富丽。我住过不少高级招待所，参观过毛泽东在南京中山陵和西湖边刘庄的驻跸，那里的家具也没有这般炫目。

负责接待我们的师宣传科副科长告诉我，这都是从越南搞回来的战利品。橱柜上镌刻的花鸟人物生动，四角还包了银饰，很像我国岭南一带富裕人家的风情。立柜衣橱是黄梨木的，还散发出清新的木质香味。品位之高，堪与明清家具媲美。更难得的是，每件木质家具的穿、斗、卯、榫丝丝入扣，几乎看不到接缝。

靠墙的一排沙发是竹编的，龙飞凤舞的编织工艺仿佛是绘画，让人耳目一新，在国内是罕见的。我最欣赏的是桌前一把宽大的藤椅，它是由四根巨藤编成，四条腿有杯口般粗，用对称的支藤编织成了座位、扶手，靠背很像凤尾，其工艺之精巧，胜似天工。

副科长还介绍说，这种藤子在越南不稀罕，但是要从千百条藤中挑选出一般粗细、支藤对称又均匀的，要花费很多心血。副科长带着骄人的口吻说，你是来我们这里享受越南家居文化的第一人。

最初，我只是认为，这是他们在战场上顺手牵羊发的小财，直到我们住下的第三天，因为伙食问题，和招待所发生了一场纠纷，我这才意识到，这个师有一个阿里巴巴出入的山洞。

我们的一日三餐，是按师的接待上宾规格操办的，中餐是六菜一汤，三荤三素。开始还过得去，三天后，菜量大减，大家刚吃完一碗饭，盘子里的菜已告罄，负责我们生活起居的是武汉军区派来的高干事，他愤然找来管理科长问责，批评他给军区丢人现眼，刮油水不看对象，克扣的都是为他们上天言好事的“灶王爷”。

科长不买账，说目前是菜蔬上市的淡季，采购难。第二天饭菜依然如故。作家们吃不饱，到小卖部买饼干啃，高干事脸上挂不住了。一天中午，服务员刚把饭菜端来，满脸怒气的高干事不由分说，把一桌饭菜掀了个四脚朝天，碎盘汤菜狼藉一地，当即惊动了师的首长，政治部主任来了，参谋长来了。高干事放声骂开了：你们领导都看看，他们是来自全军的作家，是军区的客人，你们给人家吃什么？猫食！

为什么不把你们从越南搞回来的东西拿出来待客……

主任、参谋长连连拱手，向我们赔不是。半小时后，重新端来一桌丰盛的菜肴，还上了杜康酒，两位领导向作家们一一举杯致歉。从此，我们的生活大为改善，隔三岔五地还能吃上鸡、鸭、鱼。

二、仕途经济与军长的家私

作家们常年在部队流转，和各级招待所打交道不断，深知招待所接待经费有限，生活管理人员多年来已形成边“捞”边“补”的潜规则，作家们喻为“仕途经济”。比如，接待上级机关和首长，就不惜老本往里填。住套间，有专职服务员；吃“霸王别姬”（王八炖仔鸡），瑶池（清蒸）鳊鱼或香妃（酥）板鸭之类的佳肴。要是来自下属营连干部或来办事的友邻过客，对不起，就只能是“剩水残山无态度”了。

走笔至此，我要提到43军军长孔宪礼。43军是127师的上级，孔宪礼还是《解放军文艺》一位值得尊敬的作者。军长写小说，是我军文化素质升华的表现，尽管是业余的，武汉军区的领导，还是要批他不务正业。他每次来北京，都要到编辑部来探望。高干事掀翻饭桌的事他知道了，在电话里向我深表歉意，还发出真诚的邀请，等作家们写作结束，他将在洛阳军部驻地好好款待我们。他没有食言，后来我们到了洛阳住了三天，天天游览宴请。越南战争他没有参与——他反感这场战争。

师长张万年一下战场就提升为43军副军长。此时他正搬家去洛阳履新，他的住地和我近邻，我看到古典家具和奇花异草装了满满六卡车，一股类比之情油然而生：战争年代我军一个旅长的家当，只有一驮子（团长仅是一马褡子）。前几年，我到过几位大军区首长家，都没见过有张师长如此丰厚的家私。我想起高干事说“把从越南搞回来的东西拿出来。”他们究竟“搞”了些什么东西？

43军军长孔宪礼，当年战场上为他拉回了一套高质量家具，他拒绝了。20年后，他到济南上任时，全部家当只有两车传统的床椅箱柜。

20世纪90年代末，孔宪礼来京看望我，那时43军的建制已撤销（全军裁编为24个集团军），这位尊敬的儒将降了一级，被安排到

济南军区步校当校长（因步校是副军级单位）。而此时的张万年在江泽民的提携下已是军委副主席。我为孔军长的降尊屈就愤愤不平，他却坦荡地说，我能搞军事教育算是幸事，可以经常给学员灌输些智仁勇嘛。此言引起我心底的震动，我们几十年念念不忘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我军这位高级指挥员的心目中已经褪色。

三、张万年师长拍板洗城

作家们全身心投入采访，我却把“搞越南的东西”惦记于心，每到各团转悠时，一边关注作家的采访进度，一边问起如何获取战利品的事。干部们虽意识到不光彩，只要我提起，都能告诉些片段的故事，我就点滴滴的积存于心，多年后翻出来重新组合，细节可能有出入，但基本情况是真实可信的。

对越的“自卫反击”，由广州、昆明、成都、武汉四个军区组成五个集团军 10 万人的作战部队。127 师进入作战地位时，序列编在东线集团，战略目标是占领同禄县城，造成威胁越南重镇海防的态势。

1979 年 2 月 17 日凌晨，经强大炮群的炮火准备，127 师从我国的边境小镇爱店进入越南，先头翻山越岭突入，后续是坦克携带步兵沿公母山之间的夹沟跟进。越方没有出动任何正规军进行抵抗，只是在公路两侧的山地部署三五成群的民兵，依靠喀斯特山的嶙石和树丛用冷枪冷炮狙击。攀扶在坦克上的我军士兵，成了他们的活动靶子。有战场经历的张万年懂得，如向两翼展开战斗队形反击，越南人居高临下，我军必然会遭到更大的伤亡，他决定照直前进，尽管在公路上行军被动挨打，但是师的战略实施不会迟滞。

19 日到达同禄时，127 师伤亡 600 余人，对一个齐装满员已逾万人的北方甲种师来说，伤亡属轻度的。值得庆幸的是，按中央命令准时占领了目的地，这就是了不起的胜利，几乎所有的新闻单位都进行了高调的报道，说张师长率红军师势如破竹攻占了同禄城。

其实同禄已是一座空城，早在半月前，越方已进行了有组织的疏散撤离。张万年率他的指挥所入城时，街道上我军已是岗哨林立，家家闭户，房门上贴有师宣传科印制的“民宅，不得入内”的禁令。张

万年转了几条街，见不到战争创伤的痕迹，他满意地对身边的作战科长说，我们教训了越南，对得起越南人民。

师长话音落下不到半个时辰，一辆辆军用卡车从他身边飞驰而过，车牌号显示，是43军后勤部的支援车队，他们的任务是配属127师担负人员、弹药输送的。为什么把空车开进城？他拦住一辆询问，驾驶室里一位干部告诉他，说是副军长的指示，要他们进城搞战利品。

张万年不相信，因战前曾有过决定，只收缴越军的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对民间任何物品一律不得动用或带回国内。这是战场纪律。他让作战科长找来军需处长问个究竟，确认是副军长的指令时，他无可奈何地骂了一句：闹了半天，我们是猫打翻了饭钵子，给狗帮了忙。作战科长插话，上头都能搞，我们为什么要犯傻？张万年心动了，让各团领导马上来见他。

团长政委们都来了，张万年先说了军后勤搞战利品的事，然后问大家，我们怎么办？团长们没有不愿意趁火打劫搞点物资的，理由充足：其一，我们过去无偿的援越抗美，他们忘恩负义，现在搞东西是回收礼品。其二，这是一场教训越南的战争，既不要他们投降，又不让他赔款割地，搞些战利品当成果，最能体现我们教训越南的意义。其三，越军一直和我们脱离接触，无仗可打，倒不如进城打一场无本万利的战争，还可以提高士气。政委们没有表态，他们是党的政策代表。战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从他们嘴里说出去的，如今要他们出尔反尔，将有失政工干部的大信，更怕秋后算账，要他们承担一把手的政治责任。

张万年是军事干部，我军的纪律条例对他来说，平时有约束力，这时候就不同了——“枪声一响、黄金万两”是古往今来所有军队的定律，何况眼下有上行可效，又有团长们的全力支持，法难责众，不拿白不拿。他拍板，干！命令全师集中可动用的400台车，从一线作战部队和警戒部队中抽调出6000人进城，让作战科长以团为单位划片洗城。

无需作深入的动员，张师长的决心就能唤起部队的巨大热情。入越前，政工干部们对干部战士面对生与死，足足做了两个月的思想政治工作，现在战争的恐惧已消失，为利益而争，人人奋勇向前。一

时间，参与动手的部队，在干部的带领下蜂拥入城，径直奔向县政府机关大院，市政的楼堂馆所和事业单位的银行、仓库、粮站、商店、百货公司，放手扫荡。凡粮食、布匹、衣服、医药或日用百货和箱笼厨柜等，只要能搬动的，小件装箱或捆包，大件由几个人抬，集中到街边装车。那些天，街道上堆满货物，车辆不停地穿行，士兵们穿堂入室，来了个捞财越货大比拼。

二连一个战士告诉我，他的连队在同禄城郊担任警戒，一个排看守一个村子，连长要他们在村子里也弄些战利品。别看越南地处亚热带，有山有水有林，一年种四季稻谷，可农村比中国的还穷。根本原因是越南党的社会主义农村政策处处“学习”老大哥中国，把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割的连毛都不剩。我向排长建议，只在几个村干部家中下手。

我家在河南农村，村子穷不思变，因为村干部吃喝把酒杯都捏扁了。到夏收、秋收农民交不齐税，村干部就上门牵羊宰猪，连烧饭的锅也给端走。眼下要收拾几个越南的村干部，全排都同仇敌忾，争先恐后。我们分头到三户村干部家，宰了一头牛，抱回几只鸡。这个村实在太穷了，我从村干部家翻箱倒柜一阵，才挑选了几件旧衣服，带回国内就打包裹寄回家了。二班一个战士搞了一架缝纫机，指导员说太笨，不让他带回国，他就卸下机头挂在树枝上当靶子，每天朝它放几枪。还有一个战士什么也没弄到手，也许出于对村干部的报复心理，他趴在人家灶台上给大锅里拉了一泡屎。

在洗劫全城的过程中，382团政治处主任告诉我一个新现象。他说，经过文革的洗礼，我们连队的干部战士大都由红卫兵替代了工农出身的。他们到了越南，抄家的本领又一次得到释放，价值判断比我们精明，入户拿什么，不拿什么，值钱的会藏在哪儿？他们都有一副火眼金睛，对所获得的物品，大件上交，小件归己，说是留给自己的战争纪念品。

我们这支自诩为人民的军队，小生产者的先天习性无处不在，这次掳掠物资，有的营连干部为了多捞多得，就指挥自己的分队“越境”打劫。只要是商店、仓库，不管分配给“张献忠”或是“李自成”的，谁都可以下手。只见大街小巷人如蚁动，络绎不绝，往往为一件贵重

的物件相扯相夺，差不多每天都要发生几十起对骂，甚至动开了拳脚，如打得不可开交，政工干部就上去劝导拦阻，卫生人员也赶来为受伤者包扎伤口，幸好还没有达到动枪动炮的程度。

君不见，当年红军长征时一军团一师的2团、4团在云南为抢劫宣威火腿厂，打得几十人头破血流。1948年，刘邓大军攻下襄阳，为争夺缴获的化学炮和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康泽，18旅和28旅展开了一场枪战，死伤15人，让邓小平骂了七天的娘。

其实这是遗传基因在起作用，在我军的“光荣”传统之中，就有打家劫舍一项。比如红军初创时，就是一支流寇，军饷军粮就靠劫大户的金银财宝和粮食来支持，长征一路就靠打砸抢。到了陕北，地僻民穷，一边打土围子，一边种鸦片，我军才得以生存。解放战争，刘邓大军到大别山翻地三尺，烧杀掠夺，对贫下中农也不高抬贵手。我军的大善大恶，历来取决于政治需求。平时，官兵救火、救水、救人，也是实情，对此，媒体大写“人民军队爱人民”。

四、组织分赃

张万年有先见之明，深知抢来的越货分配不均会招来各级干部说三道四。他事先把师团后勤部和所属分队集中组成接收站，让后勤部长在爱店选了镇郊一块空旷的场地，各自立起牌子定点做接收货物的堆集位置。当一辆辆车到达进场的入口处，后勤干部首先要看车上的物品种类，然后告之驾驶员开到×团的点上卸货。虽说这种简单的分配达不到绝对平均，在战时能做到这样的大体公正，各单位也无话可说，张师长不但功德圆满，还得到好评。如配属127师作战的高炮团、坦克团、炮兵团也一视同仁，分到了等同的份额。

战利品到了团，由团的后勤处长再行分配给团机关直属分队和各营、连。连队主要分得粮食、食油、副食品和牙膏、牙刷、汗衫、剪甲刀、笔和小本之类不影响军容和内务的日用品，机关所分的就贵重些，机关越高所得就越高级，如自行车、摩托、家具或高档的日用品等，如是金银首饰或越币（盾）之类一律上交到军里。

我询问过师后勤的干部，他们所得各种货物从未有过登记，谁

也说不清品种或吨位，在现场分摊之后就各自装上火车，他们只记得整整装了能挂40个车皮的五列。拉不了的，就做人情送给了爱店公社。

我走访381团时，看到所有连队把搞回来的粮食和副食，都按团统一规定堆积在室外，搭上苫布，其体积大约长10米，宽5米，高3米，形似一间工作房，和营房一起齐整整地排列，干部们指着如小山般的战利品自豪地说，粮食吃半年没问题，各种百货小件都分给了大家，人人有份。

团政委谈起搞战利品无顾无忌。他说，当部队进城甩开膀子大干之时，最初确实是抄的同禄县政府公家东西。我给部队还作出过严格的规定，不得进入普通人家。仅几天工夫，禁令止不住了，兴头一来哪分公家和私家，几乎家家都破门，人家早把自己细软金银带走了，可我们手不软，能拿的能搬的都不会手下留情。越南穷，城市贫困户多，他们把自己多年添置的家产哪怕是坛坛罐罐都看得很金贵。那些天，留守看家的越南老人、妇女，不少人紧追在战士的身后，哭着、叫着、拽着和战士争夺，有的战士脱不了身，就用枪托击打，或踢人家几脚，这岂不和当年鬼子进中国一个样子？师政委更是焦虑，把政工干部召到爱店开会，讨论如何面对这场洗城后果？会开了三天，谁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来。正巧，友邻传来信息，中线作战部队，夷平了有20万人口的谅山城；西线炸路毁桥，破坏通讯，掀翻了通向河内的铁路；我军所到之处洗光了商店、仓库，还大肆砍伐红木等名贵木材，甚至把工厂矿山成套的重型机械设备完整地搬运回国。这些消息让政工干部们兴奋不已，就像吃了定心丸，大家商定，告诉部队，越南人反华，驱赶20万华人回国，又侵占了他们的家园，我们是以牙还牙，搞点物资理所应得。政工干部再也不害怕了，天塌下来，有高个子张万年师长顶着。

我们一直干到中央军委撤退命令下达。在同禄洗城十来天，虽说大街上被抛弃的衣物柜橱等家什用具一片狼藉，但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房没烧一间，人没杀一个，街道上的树木没毁一棵，所拿走的东西，应视为物归原主。

政委所言人没杀一个，我相信，他仅是指的同禄城里。在城外的零星战斗中，他们把俘虏的百余名男女民兵，一律就地处决。

我们之所以出兵越南，更重要的原因是拯救“红色高棉”于危亡之中。就在我军进入越南作战之前的一月，他们已出兵占领了柬埔寨，洗劫了包括金边在内的18座城市。越南和他们原本也是“同志加兄弟”，涤荡式的洗劫财物比起我们是毫不逊色。处处追随中国的“红色高棉”，靠屠杀立威，国民经济搞的一贫如洗，已无法承受巨大的双重损失，提供救助的当然还是中国。

我想起民间流行的赌酒游戏：棒子打鸡，鸡吃虫子，虫蛀棒子，相克相生。

越战中，我军一个营被俘

1980年春的一天，成都军区的青年作家小罗匆匆来京，要我以《解放军文艺》的名义，给山东的临沂、莒县、日照等6个市县人武部开出介绍信，介绍他到该地采访对越作战被俘后遣返回乡的战士。这批兵，都是成都军区第50军151师A营的。

我们所称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是1979年2月17日打响的，战争只进行了17天，参战部队刚回到国内，就传出一个黑色新闻，说我军在战场上有一个整营被越军俘虏。这类事是不能让外人知道的。军区宣传部制止了小罗的采访，他竟不顾后果要独闯禁区。我问他：“你这么干是不想穿军装了吧？”他嘿嘿一笑：“无所谓，人嘛，就得有点天理良心。”小罗藐视对他的一切禁令，不在乎党籍、军籍。他的见义勇为让我肃然起敬，我也甘冒风险，给他开出6封介绍信。小罗拿到了“通行证”，压抑已久的情绪舒展了，开襟见怀地向我讲述了A营被俘的秘闻。

一

这是一场不该打的战争，仅为出一口恶气，非得以7000人的生命和50亿的军费做血本，赢得的却是政治失义、军事失利。A营的被俘，就是这场战争的缩影。

我军发动的这场战争，有10万人参战，成都军区派出的代表队是第50军。它的三个师是从西线的麻栗坡进入越南的。打了十几个小仗，对手都是越南民兵。

17天的战争结束，大部队要往后撤，绝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过，立足未稳的军队，是最容易遭到歼

灭性打击的。50军让他的151师殿后，151师又派出A营担负师的后卫，却没有给后卫营任何保护性措施。

越南人尾随A营的，已不再是纠缠不休的民兵，而是一支有良好的战斗素养的正规部队，他们刚从柬埔寨扫荡了“红色高棉”归来，对付中国军队一个营游刃有余，采用的战术就是中国人教给他们的“零敲牛皮糖”——你要撤走，他们会紧跟不舍，像狼群驱赶羊群，把你的伤员、掉队的收拾得一干二净。你要是组织反击，他们就钻进山林，用暗枪小炮对付你，一枪一个准，一炮炸一堆，零零星星地打掉你的小分队。A营就这么给打得七零八落，三天伤亡了300人。电台没有了，营的干部全都牺牲。越南看准了A营已失去战斗力，集中一个团的兵力猛扑上来兜了底，把A营团团围在一座小山上。

这是一座喀斯特石形成的山峦，树丛不高，茅草很深。惊魂落魄的A营战士，已班不成班，排不成排，散乱的拱进草丛或石缝里，谁也顾不了谁。这里职务最高的是二连指导员，他已负伤，子弹贯穿了他的大腿，是卫生员背着他随慌乱奔突的战士一起上山的。山上像坟茔一样阴森，山下已布满了敌人。指导员面对眼前的生死存亡，感到自己负有重大的政治责任，要保护好全营幸存的干部战士，必须刻不容缓地把大家组织起来，形成战斗集体。

他让卫生员出去找人，卫生员转了一圈，没带回一个人。指导员的心更沉了，顾不上伤口疼痛，用双肘支撑着缓慢地爬行，他心急火燎要去找人交谈，一三连连的干部他都熟识，他要告诉大家，趁敌人上山之前，赶快编成战斗的班组，构筑工事，利用手中的武器拼死防御，绝不能束手待毙。只要坚持一两天，大部队就会回来救援的。他边爬边向茅草遮掩的深处呼叫：“这里有党员吗？有干部吗？”没有人回应。

他在连队是党的化身，听他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在进入越南黑夜的誓师会上，渴望入党提干的战士纷纷上台表态：不怕流血牺牲，接受党的任何考验。他欣喜地看到，这是他凝集起的精神力量。

此时，这股激情竟没有再显现，让他更茫然的是所见到的人，一个个神情恍惚，不知所措，都不用语言和他交流，而是呆愣愣地张着双渴求生存的眼睛。三连的一排长，更让他揪心。这个刚从步校

出来的年轻人，在出发前的备战训练时，他给全营示范单兵进攻动作，他的卧倒、出枪、射击和土工作业截面都堪称完美，大家都称许他是连队的好接班人。此时此刻，一排长把身躯依靠在一块磷石上，泪水从紧闭的双眼里不停地流出，自动枪扔在一边，指导员怎么呼叫他，就是不吭一声。指导员沮丧已极，再也找不到人交谈了，他已无能为力了。

越军懂得围而不打是屈人之兵的上策。他们把机枪、火炮架设在最显眼的地方，不放一枪，不发一炮，向中国军队昭示，他们是真正的胜利者。

二

A营被困的第一天，还有压缩饼干，一壶水，第三天就开始嚼草根啃树皮。越军在一片开阔的地上垒灶支锅，熬起木瓜汤，越军炊事员用大勺把汤高高扬起，举起喇叭喊话：“中国同志们，下山来吧，饿死了回不去中国！”

一勺勺汤飘起袅袅热气，山上的战士看得馋涎欲滴，指导员警惕了，他在草丛石缝中间爬着，给大家做思想工作：“千万不能动摇啊，大部队很快会回来，坚持就是胜利。”

他的鼓动非但没有任何作用，还引发了极度恐惧的战士们的一片哀鸣，有人撕心裂肺地嚎叫，有人歇斯底里地呼天唤地。守护他的卫生员已是饥渴难耐，含着泪告诉他：“让我下去和他们谈判吧，只要越南人给我放开一条生路，我们可以放下武器。”

指导员入伍前是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他走南闯北串联过，又有武斗的经历。而刚入伍两三年的卫生员，从未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他在会场上的发言勇气十足，可真正到了生死时刻，就失去了战斗意志。指导员劝阻他：“不行啊，这是投降！别干傻事！”

政治忠告卫生员已听不进，生的希望在人家手里，他执意下山去是为大家谋求一线生机。他爬行到山脚，再也没有力量了。一个越军士兵过来背他到了开阔地，给他喝了三碗木瓜汤。等他抬起头来，一群越军军官围在他跟前，一个上尉用流利的中国话说：“是你们来打

我们的，我们不记仇，还是同志加兄弟，你马上回去，劝大家都下山，吃饱了就送你们回中国。”

卫生员回来了，他是喊着话上山的：“大家都放下武器下山去，越军保证我们安全回国。”

战士三三两两、战战兢兢地下了山，没有打白旗，也没有把双手举过头顶，越军士兵还过来搀扶他们，把他们都带向那片开阔地。那里已铺上军毯，极度疲惫且饥渴不堪的战士坐的坐，卧的卧，越军的医官、卫生员都来给他们调理伤口，士兵们端来一碗碗木瓜汤。战争已经结束，放下枪的战士们五天五夜绷紧的神经松弛了，他们庆幸自己走出了末日，又有了生命。

山上只剩下指导员了，卫生员去劝导他：“放下武器回国，大不了开除党籍、军籍，还可以守着老婆孩子种几亩地过日子，死了，谁来管你！”

指导员怒目以对。

指导员身上有支手枪，他没有像前辈那样，用枪对准自己的额头，他只是静静地躺在土坑里，尽管身边的人都离开了他，他坚信师的领导不会见死不救的，这是一个整营啊！他的两眼直直地盯着蓝天，天模糊了，他昏过去了。

他是被越南人抬下山的，在开阔地上，一个越军医官检查他的身体。注射、输液，他苏醒过来，看到卫生员还在他身边，问：“下山来了多少人？”卫生员答：“你是最后一个，连你一起是 213 人。”

他记住了这个数字。

三

越军用卡车把 213 名中国军人拉到一处营地，这是越南驻军刚腾出来的。每个房间安排四人，床上放的是新的被褥，新的军衣，新的鞋、袜，还有牙膏、牙刷等日用必需品。指导员安置住单间，有越军的勤务兵伺候照应。

在战俘营的生活主要是学习，由越军敌工部门的军官管理他们。学习文件是越军政治部编印的一本小册子，主要内容是两千年来中

国对越南的侵略，开篇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率军进攻交趾（古越南），征侧征贰姐妹组织义军反抗汉军的英雄故事。

A营的干部战士都不懂越南的历史，听之任之。

三个月后的一天，越军政治部来了一位少将，宣布释放他们。他们用车把213名被俘的中国军人拉到友谊关的0公里处交接，指导员领着大家走到0公里界碑，见到一群记者照相机正对准他，他猛然转过身高喊：“大家脱下越南的军衣，放下背包，干干净净地回国。”战士们都听从了他的号令，纷纷脱下了军衣，只穿条裤衩走过了0公里。

指导员的悲壮之举和他对党的无限忠诚，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命运。回归部队是三个月的“学习”，清理思想，交代被俘经历，揭发问题。谁动摇了，谁先叛变的，卫生员首当其冲，指导员负有领导责任。学习班结束，总政联络部来人了，宣布213名被俘者全部开除军籍，党员开除党籍，团员开除团籍。卫生员以叛国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其余一律送回原籍监护管理。

指导员是四川人，他的罪过仅是失职，免于刑事处分。回到家乡后，在一所民办小学任教，工资很低，经常到乡政府去接受监督训示。我去见了，他说：“当初，我为什么不杀身成仁？如今落下一辈子蹲活监狱！”

我告诉他：“你们师因为没来救你们，师长已被撤职。”

他苦笑：“谁来给邓小平一个处分？”

A营战士多是山东籍，我闻听他们的处境更为悲惨，才下决心走访他们。我要为他们的命运奔走呼号，呼唤我们党、我们军队给他们一个普通国民的待遇。在红军、抗日、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成千上万的被俘者都给打入另册，为什么美国军人被俘后可以当参议员？可以竞选总统？为什么我们的人连起码的工作权利都被剥夺？

四

小罗走后大约有十天光景，总政宣传部找上门来，指责我给小罗开介绍信是违法违纪，说，我军有那么多英雄人物，你们不去组织人写，偏偏要写被俘的，你们是不是别有用心？宣传部勒令用12

道金牌的速度召回作者。

我拖延了几天，等小罗来电话时，才告之他给封杀的消息，要他立即回京。

小罗回来后，跟我讲：“我先到莒县人武部，那里政工科的同志告诉我，说山东省军区按总政治部的指示，对这批被俘人员规定了‘四不准’：不准再入党入团；不准当基干民兵；不准进入区县机关工作。凡进入事业单位的，不得提为干部。有的县还另加一条：如外出务工，要经市人武部批准。他们的遭遇，比五类分子还惨。这五把枷锁，锁住的远不止这200多位难兄难弟。他们回乡后扛起锄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村里，见人抬不起头，说话没人听，有未婚妻的，因自己的政治失落而告吹，还遭到家人亲友的歧视，比如，一个被俘战士有弟兄三人，都是当兵的，父亲是抗美援朝的老功臣，患重病住院，被俘的儿子去探望，不让他进病房门，一个好心村干部领着他到了外乡，安排他在一处采石场开山炸石，还要他隐名埋姓。”

我把小罗在山东的见闻，写成一份书面报告给联络部，蔡部长是我的邻居，我亲手交给了他。过些天，他把信的原件退给了我，我一看，上面三位部长（有两个副部长）都画了圈，没有任何批语。蔡部长向我解释说：“我们无能为力，全军过去一贯是这么执行的。”

1950年代初，我参加过金日成挑起的朝鲜战争，我军以志愿军名义出动兵力达195万人，帮助金日成火中取栗。三年战争下来，损兵折将97万，其中战死36万，被俘22000，14000人去了台湾。

去到台湾的遭遇如何？仅举几例：

W原是我军一助理军医，在朝鲜战场被俘后去了台湾，被国民党军召用，供职到1980年复员。是时已是中校军衔，每年给他退休金合人民币14万元。他在台中市开了一间饭店，一家四口人，生活小康。

Y也是朝鲜被俘后去台湾的，在台30年从搞小店到批发，已有千万资财，回到厦门开设分店，还捐资百万办了希望小学。

1983年，台湾商人组团访问大陆，其中有82人是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我军干部，他们到达上海受到贵宾礼遇，表示此次回来都要为建设家乡出力。

一个让人难以承受的现实是，当年，被俘的战友在济州岛的战俘营里，以坚定的立场，喊着毛主席万岁，和他们分道扬镳。而当他们返回祖国，却沦为二等公民，政治上无依无靠，生活陷入困境。

我看到亩产水稻 13 万斤

——“卫星”是真是假

1958 年秋，毛泽东的大跃进热浪催动全国的工农业生产“成百倍地翻番”，一时间“卫星”满天。其中最为耀眼的一颗卫星来自江西——《江西日报》在这年 10 月 17 日的头版头条用特大标题：“巨星冲霄汉”，报道了鄱阳县三庙前公社一亩二分地收获了双季晚稻 173,544 斤零 10 两的消息。亩产 13 万斤！这个数字太惊人了。

一

在当时全国报道亩产 10 万斤以上的只有两家。是真是假，眼见为实。我急不可待地跑到团政治处请示主任，提出组织人代表部队到鄱阳去贺喜。当时，我所在的部队住上饶市，鄱阳是上饶专区的下属县，我们前往祝贺是加深军民关系的好事，主任欣然批准，同意去三人。

为了观光我军诞生地，我们绕道先坐火车到南昌，再坐船穿越鄱阳湖到鄱阳县城，因为我们代表部队，所以县委很重视，派出一位姓陈的干部陪同，步行十华里到达公社住地。公社的门口，已站满了好几百人，见我们一到，都围过来拍手欢迎。一位长者上到台阶上致辞：“解放军来了，我们热烈欢迎，你们来要为我们主持公道，你们来看的亩产 13 万斤，是鬼话，是骗人！他们骗了党中央毛主席……”陪同干部老陈一脸煞白，气得忙上前制止：“你别在这胡说八道，这是省委肯定的，中央的新华社记者验收的，你乱说，要承担政治责任！”

十几个年轻人不买老陈的账，把他连搽带推地拥到墙角和他辩

论：谁肯定的？就是你们县委几个官把新华社记者找来吹出去的，现在又把解放军骗来。社员们有的围过去和陈斗嘴，多数聚集在我们周围，七嘴八舌的揭开了老底。有人动议：“解放军同志，我们说一百遍，不如你们亲眼见，我们带你们去地里去看看，一看便知道是怎么回事。”

群众如此的愤怒令我们吃惊，为弄清蹊跷事，我们随他们来到田头，在一片光秃秃的地里，只剩下约两三平米未收割的稻子，这是专供来人参观的。《江西日报》上的照片，就是让一个小孩坐在稻穗上照的。

一个社员告诉我，最初，这里是试验田，组织了20多个人日夜管理，深翻土地，小株密植，又拼命施肥，原来的愿望是亩产1000斤，可到抽穗时，怎么也达不到规定的指标，公社书记急了，要我们把周围61亩田里的稻子都拨拉过来，堆挤在这一亩二分田里。我们用手一兜兜地排列，用脚去猛踹靠实，硬是要让一亩多地容下61亩地的稻穗。公社看稻穗密不透风，又组织人每天浇石膏水制冷，稻田上空还架起八个大风扇——把布钉在框子上，支上架子，用人轮班拉动扇风来解热。收割的那天，又把《江西日报》的记者找来拍照验证。

过秤是由专区的黄专员来把关的，公社组织了一百多人，把收下的谷子从田头挑到公社的小广场过秤。黄专员不但听过秤人报数，还不眨眼的盯住秤上的刻度是不是到位，他没想到我们的“功夫”都下在挑谷子的人身上。比如，一人过完秤后，就让他还挑上谷子围着村转一圈，又回到公社的小广场再过秤。而且一人绝不是只过两三次秤，规定他们每人要转10次，就是说，你挑来的120斤稻子，转了10圈，就能“高产”1200斤！就这样，秤出了7万多斤，公社书记还不满足，他从报纸上看到人家省已亩产到6万多斤，他一心想放一颗中国第一的卫星，就决定把仓库的存粮也拿出来过秤，就这样，一亩二分地秤出18万多斤，亩产13万斤就是这样来的。

这一席话令我既解惑又震惊。在来之前我就心存疑惑，经老乡们一说，豁然明白，原来惊天地泣鬼神的“卫星”就是这么放出来的。让我更为感动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本分的农民们，敢于直言面对权势！

这时，老陈摆脱了和他辩论的人群赶了过来，满脸尴尬地连连向我们解释：“你们千万不要听他们的，他们对成立公社不满，这事要听从省委的。”

我问他：“你相不相信？”

他说：“我相信组织的。”

一个社员马上反驳：你的组织都是在放屁。解放军同志，我告诉你一个简单道理，就是把一亩地下挖三尺，用泥土过秤也达不到亩产 13 万斤，除非长的都是铁稻子。

吃午饭的时候，由公社书记曹赛娥陪同我们三个军人一起吃。书记是个年轻的女同志，她刚从一群记者中脱身出来。

食堂很大，有几十张桌子，已坐满了来参观的人，四菜一汤，两荤两素，不交费，白吃。

我问书记：“你们每天要接待多少人？”

书记说：“这里只是一处，还有三个食堂呢，每天要招待六七百人。”

我又问：“照此下去，你们丰产的粮食还能供大家来吃多久？”

书记说：“那就看省委的安排了。”

我又问：“群众对收成有意见，你们是怎么看的？”

“那都是地富分子的造谣，你们不要去相信。”

陪同干部老陈帮腔说：“曹书记是从刚成立的县委里选拔上来的。这颗‘卫星’就是她的汗马功劳。收成不会作假的。”

我只是点点头，不敢再深问。

二

第二天，我们原路返回，我正坐在船头甩扑克，两位新华社记者来找我：“解放军同志，我们是新华社的，请你们帮个忙，一群算账派在围攻我们，硬说鄱阳放的卫星是假的，请你们去跟他们讲道理。”

那些年，我们是天兵天将，我明白他俩是来“请神驱鬼”的。我推脱：“我不懂农业，说不上话呀！”记者说：“你们是解放军啊，代

表党，他们连党都不相信，要批评他们的立场问题。”

还是记者聪明，抓住了我们军人“立场坚定斗志强”的特性。我们三人随他俩来到有三四十人挤在一起的中舱，他们正高声扬气的议论，新华社记者马上把我们推到他们中间：“大家安静，我们请来了解放军，他们和你们一样，都看了，你们好好听听他们的声音。”

记者话音刚落，一个年轻人发问：“解放军同志，你们都到现场看了，相不相信？”

又一个中年人补充：“报纸宣传是人为的，我们到现场看到的更虚，为什么硬要我们相信？”

在大庭广众中，我不得不表达军人的“党性”。我说：“是人为的，是你们几个说了算，还是江西全体人民说了算？”

“同志，”一个长者说，“你的话说大了，报纸发布的是记者写的消息，怎么能代表江西人民呢？”

我又高压：“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湖南农学院的教师，我希望农业战线在毛主席的总路线下都创造奇迹。我不是来散布‘右派’言论的，我是来搞科研的。”

“你搞科研为什么不讲政治？”

“讲科学就是讲政治。”老教师的回答很坚定。

我们另一同志说了：“鄱阳放的卫星是全国、全党的大事，大家都高兴，你为什么横挑鼻子竖挑眼？”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位教师很有涵养，他避开了“政治”，平和地说：“你们如果能冷静下来，我可以算笔账给你们听，你不信，再反驳我，行不行？”

我感到了老教师的真诚，想借他的话下台阶：“那我们就洗耳恭听，你算账吧。”

这位学者耐着性子说：“你们都知道，一亩地的面积是666平方米，我用最大的几乎不可能的种植方法，让每平米种植水稻一百兜，就是说，每10平方厘米植一兜，一兜在10平方厘米的面积上生长，下部可以，上部的生长即使不需要空间，它的枝、叶、穗是兜部体积的4倍。为了说服你们，我必须这样计算。如每兜10穗，每穗按最饱满的长势能结出稻谷180粒，18000粒是一市斤，按此计算，每

平米的田地生产 10 斤稻子，666 平米，则产出 6660 斤。就是说，在 6660 斤的基础上还要增加 20 倍的产量才能达到 13 万斤。这是可能的事吗？同志，我说的是谁也驳不倒的事实，这才是关系人民生活生存的最大的政治！”

真理盖过了“党性”，我们三人无言以对。

新华社记者找了个托词：“我们发布的新闻，都是从现场真凭实据获取来的，你们如若不信，请把你们的姓名地址留下，我们在今后适当时机回答你们。”

来自好几个省的农学院和农校的师生们都刚经历了反右，谁也不会给这位官方喉舌留下只言片语。

归队后，向主任汇报了我们的经历。主任说：“你们见的、听的、和人争辩的，都不要向大家传达了。”

军营大炼钢铁

——大跃进中的解放军

1958年，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唤起亿万军民的激情，都相信，只要“与天斗，与地斗”，加上“一天等于20年”的速度，就能“奔向共产主义社会”。

在那个狂热的年头，报刊电台天天报道全国的“放卫星”“创奇迹”。如刚成立的人民公社生产出的菜，一棵就有180斤，工厂能制造出不用油不用电的永动机……。媒体鼓动人们闭着眼睛说假话。

一

我军基层连队也纷纷搞起了自己的创造和发明。开始只是从日常生活中寻出些小经验、小窍门，如节水、节电、节煤，有的还很有实用价值。可是，一些干部搞的创造发明就不那么靠谱，如我们师的汽车连连长，他在汽车的油箱里注入一半油一半水，说可以节省燃油30%。他还用“科学”道理解说：水经燃烧后分解出的氢和氧是最好的助燃剂。当时，国家汽油奇缺，如果他的发明有普世价值，肯定是我军放出了一颗世界级的大“卫星”。

有人生疑，这么一个简单易行的道理，百年来竟没有被科学家们发现。我是炮兵副连长，经常请教他驾驶技术，我认为这位平常说话都木讷的连长，脑袋瓜里肯定有比科学家更高的天才成分。军区小报介绍了他的“发明创造”，我们团也试验了一个月，可试来试去怎么也不灵，只要开动油箱注水的车子，发动机里像是在炒爆豆，一路“砰、砰”地炸响个不停，15台车的汽缸很快成了废品。我们上门找这位汽车连长论理，他理直气壮地说：“我过去在朝鲜战场就是这

么干的，车跑到半路没油了就加水，我用的是嘎斯车，苏联的，现在的国产车的质量还没达到人家40年代的水平。”那年头，我们都是些二半吊子。

另一位是个异想天开的副团长，他带领2000人把营区前的一条小河拦腰截断，筑起一条石砌土夯的长50米、高5米的大堤，说利用它能发5000千瓦电。没想到山洪一来，冲垮了大堤，还淹没了几百亩农田。

刚从苏联进口的武器装备，有的干部自己都没玩熟，就要拆卸开来“改造、创新”，师首长震惊了，这些“卑贱者”——“聪明”起来，啥都敢干。领导们不敢批评，都怕给自己算政治账，对新事物浇冷水是小脚女人，是右倾的表现，只能劝导大家改变主意，量力而行。同时，规定了跃进的方向：全师人人动手，炼出万吨钢，促进钢铁元帅升帐。

二

口号有力响亮，合乎毛泽东“大炼钢铁”的思想，全师上下都紧跟照办。我进城参观土法炼“钢”。差不多在每条街都有一道奇特的景观，无论商店或住家门前都放置一个小炉子，炉里烧的是些铁块、铁钉或碎钢片，燃料有煤块、煤球，更多的是用木炭，浓烟满街，行人捂住鼻子匆匆过往。给我的印象是象征性地在摆样子、走过场。我回到连队就决定真枪真刀地实干。先腾出一只泡菜坛子，内外都用泥搪，做成了小高炉，又用炮弹箱制作了一个风箱。

差不多同一时间，师团机关和连队都建起了小高炉，熊熊炉火在夜间闪烁，仿佛星团落到了人间。

我们利用早晚时间在营区内拣煤渣，找废铁。风箱呼呼，火苗扑扑，干部们领班，各排轮流看守，出一炉铁水大约要三四个小时。有个连长从未见过炼铁炼钢，他自出心裁，把旧的桌椅板凳做了燃料，待修的兵器部件也投进了炉膛，烧了两天，化不出一滴铁水，大家都笑话他，说他的炉子是个公的。

每出一炉，铁水冷却后过秤，七八斤重，就郑重其事地用块红绸包好，放进一只竹篮里，像送大礼一样让两个战士抬上，全连百十

号人扛着红旗，敲锣打鼓，唱着歌，喊着口号送到师部向师党委报喜。

那些日子，十里营区昼夜锣鼓喧天，唢呐齐鸣，仿佛家家户户都在嫁女迎亲。全师有一百多个单位，天天都在报喜，有的一天报两次，正常训练课停下了，按时作息也不遵守了，军容风纪也不严格了。战士们从刻板枯燥的训练场转向嘻嘻哈哈的火炉旁，看到铁水出炉，都兴奋的欢呼跳跃，疲惫也化解了。要是在报喜时，师首长再讲几句鼓励话，他们会铭记在心，写进给父母的信里。

师部大楼的广场上，全师各单位送来的“成果”已有好几百吨，堆成了小山，这些赖里八叽的铁饼子、铁砣砣，比废品还废，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师首长只管收下。八位领导夜以继日地迎来送往，苦累不堪。师党委只好作出新规定，不让连队炼“钢”了，由团统一进行管理。也不再报喜了，由师机关派人上门验收记账。

所谓团的统管，是要团建一个高炉进行正规的冶炼，连队只担负送料，每天一百斤。

三

师解了困，连队就忙活开了，每天上交一百斤废铁实非易事，连把任务分摊到排，排分给班，班长让战士每天交一斤。这下营区热闹开了，拔门拆窗的，剪铁丝网的，有的到村子里去收购，有的要家里邮寄，营区几乎找不到一颗铁钉了，大家只好到营区外打主意。

附近有一家军区后勤的修配厂，在几公里外的东山岭脚下，是日本留下来的，专为军用机场、码头修配勘探机械设备的，它有库房、车间，两年前已关门。我早就知道那里有“宝藏”，就是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直到听说友邻已经下手了，我才带连队去想捞点剩余。我到跟前一看，仓库空空如也，车间的车床、磨床也没有了，整个工厂给扫荡得一干二净。我不想空手而归，让战士上到房顶卸下两根钢梁。

团新建的高炉肚子大，经常断顿，团领导天天向各连催逼，我们就进城要工厂、仓库或店家捐“粮”。他们不给，我们就暗中去取，白天去看看转转，用小偷的话说叫“踩点”，摸清他们钢材铁件存放的位置，晚上去一伙人翻墙越屋，弄出些来用小板车拉走。人家都

有值夜的，经常给抓了个人赃俱获。由此引发的纠纷不断。师领导睁只眼闭只眼。年终时，请地方干部吃顿饭堵嘴，或派出部队给地方义务劳动十天半月，以示军民一家亲。

浙赣铁路离营区两公里，铁轨都固定在枕木上，每块固定板上有四颗粗壮的钢钉。一个排长很“聪明”，在每块固定板上只拔取一颗钉，他带领的排沿铁路线一天就拔了三公里，十天下来就拔回钢钉三吨多。南昌铁路局知道了，十万火急告状到南京军区，军区只发了一个紧急通报批评，不了了之。在领导们看来，这是好心干了坏事。

各种找废铁的路都给堵了，我突然想起两年前在横峰大山里演习时，见到山上到处都有半裸的褐色巨石。我无师自通地认定是铁矿石，就带上连队到那座山上安营扎寨，每天挖石不止。每挖出一块几吨重的山石，就齐心合力的推下山去。山下是一片农田，半月光景，十多亩稻田堆满了“矿石”。我估测约5万吨，收兵回营写出张喜报交到团长手里，团长高兴地说：“你的方向正确，没与民争利。”

我没敢说毁农田的事，地方上也没来人抗议，团里也没派人去核实，5万吨“矿石”经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很可能还堆放在那片稻田里。也许有一天，它会成为大跃进的小见证。

第二辑

军旅札记

我军在大饥荒的日子里

——为了吃饱的措施种种

1959—1961的三年间，举国饿殍三千万，正直的史家说是人祸造的孽，上了岁数的人，多是从鬼门关回过身来的，都有着不寒而栗的记忆。军队也是苦主，但史料中没有关于我军在这场大饥荒的记载。这绝不是高层的有意屏蔽或历史的失忆，应该说，我军是党的骄子，当广大人民群众在饥饿的熬煎中，四百万人民子弟兵的生活，是大大优于人民群众的，没有出现过饿死人的事。要是拿枪人都揭不开锅就乱了窝，覆舟者首先是军人。党国领导深明此理，怎么也要确保专政工具的稳定。

一

那年月，草根树叶皆是充饥的粮食，我们待遇优渥，每天保证有一斤半大米或白面，半两油三钱盐的定量，陷入窘境的国家粮库，怎么也得翻仓捣底地如数配给。只是副食无法保障，国营市场已拉饥荒，军队不可能再来一个“南泥湾精神”，因时刻在防备台湾蒋介石趁火打劫，顾不上搞吃喝副业。一个连只能让炊事班饲养两三头猪，各个班利用早晚空隙侍弄几分菜地，一个月收下的几百斤蔬菜够吃两三天，根本改变不了连队生活的困境。

国营市场早已没有禽、蛋、肉卖，连粉丝、竹笋之类的干货也不见影，要是到街巷小摊小贩那里去采购，战士每天的三毛八分菜金，够买来青菜半斤。每餐上桌的菜，一个班只有半盆，一碗饭没吃完就见了盆底。

我是炮兵连的副连长，主抓火炮训练，还要分管全连干部战士

的吃喝拉撒睡。仅为吃一项，天天都得抓头皮，我能作为的空间很小，要是允许战士停下军训野放，让他们上山下河，肯定每天桌上都有山珍野味，可谁敢批准？我仿效兄弟连队的小打小闹，生豆芽、磨豆腐、醃制些菜根老帮子。我们炮兵连有火炮牵引车，我的野外训练，就绕着营区周边进行，省下油料和车公里，由事务长带车到山区去收购。刚成立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留给社员的生活路子少了，哪还有农副产品提供给城里人？事务长煞是辛苦，走家串户地求告，社员看在解放军的面子上，从自留地里匀出些瓜菜来资助我们，好不容易地弄回一车来打发了几顿，又愁开了。

菜里油水少，全靠主食支撑，每人每餐半斤米下锅，一锅饭抬进食堂，战士奋勇当先，都在自己碗里盛的尖尖的，动作缓慢的，吃了一碗再去盛第二碗，连锅巴都捞不着。

我买来陶瓷罐，一人一罐分蒸，菜也一人一勺绝对平均，消除了恐慌心理，可依然填不饱战士的肚子。三班副叫苦说，刚出食堂放了两个屁，肚子就空了一大截，第一堂操，课还没完肠子就全扁了。

我改变训练程式，譬如炮操的火炮成战斗状态，要全班一起动作推炮进入阵地，开架，设置后座，然后按炮手分工，卸下炮衣，安装瞄准具，搬运炮弹……连续几个月饥饿的战士，哪能经受住持久的强体力动作？我决定第一个小时炮操，后三个小时让大家坐下来听我讲课。战士们的体能消耗大大减少，可临近中午时分，坐在地上的战士也还是要睁着无神的眼睛，呆呆地望着远处电线杆上那只高音喇叭，期盼下课的号声响起。而讲课的我，到这时候也是胃液翻滚，两眼发黑，像个虚脱的病人，只能放慢说话的速度，勉强撑持。

连长出了个新点子，要事务长采购些喂猪的红薯藤回来剁碎，再从每餐下锅米中匀出半两熬成菜稀粥课间加餐，给战士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

连里的三头猪早就宰吃了，大伙已经三月不知肉味。我打听到市供应站存有少量的猪油，就向营里提出去借，先礼后兵，不给就用人民币国家牌价强行购取。教导员制止说，你想坐牢，我不会奉陪。

一个老兵提出个连达尔文都无法解答的难题。他说，人为什么不能像牛羊一样素食？兔子吃草叶，猴子吃瓜果，体力充沛，动作灵敏。

如果科学家能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性，人人都得以生存，还解决了世界的战争问题。他的“退化论”听来令人酸楚，如果我军干部战士都更替为机器人，不吃不喝常年干活不休，岂不武运长久!?

医生说，人若长期素食，一些主要的微量元素缺失，会呈现隐性饥饿状态，如不靠肉类补充，生命只能延续几个月。

我最头痛的是吃不上肉，到山区去采购，偶尔弄回来几只鸡鸭或少许的蛋类，熬成了一锅汤，汤汤水水解决不了真正的饥饿。

一天，事务长神秘的悄声告诉我，团里剩下的四头母猪死了一头，埋在后山坡好些天了，能不能去挖取回来熬些油?我已走投无路，事务长说的不失为好招数，可又担心：“得什么病死的?”

“不清楚，反正我们不吃肉只要油，不会碍身体的。”事务长还补充了他事先准备好的理论：“油温比水温高得多，什么细菌都活不成。”

“要是卫生科的人来查怎么办?”

“天知地知，你我不说人不知，他们查谁去?”

我放心不下，要事务长先带我去看个究竟。事务长势在必得，他带了一把锹，一只铁桶，和一把菜刀，熄灯号响后，我随他一起上到后山，走近一座鲜土堆前，我支着手电，他挥起铁锹就刨开了，忙活了一阵，一股薰人的臭味扑面而来，事务长放下手中的铁锹，从扒开的坑里拽着死猪后腿拉了出来。皮已发绿，他用刀砍下猪头，剖开已腐烂的胸膛，扒出下水丢在一边，然后开始剥皮，剔下骨头和瘦肉，把肥肉、板油垛成几大块，盛到桶里，足足装满一桶，然后把死猪残肢下水重新填回坑里。我和事务长拎着一桶油肉回到伙房，已是午夜，事务长捅开了灶火，给大锅里掺进一瓢水，把桶里的肥肉和板油倒在案桌上，切成小块捧到锅里熬开了。

我们的动静惊动了炊事班长，他来到炊事间见我们正忙活，问：“你们这是干吗?”

我说：“别吱声，给大家熬油水。”

“哪弄来的?”

事务长说：“你就别打听了，往后每锅菜，你都要加上一勺油。”

那些天，菜香了，战士脸上菜色消除了许多，有了笑容。

二

好景过了一个月，大油告罄，苦日子又回来了。战士们都瘦了一圈，我把炊事班的大秤吊在房梁上，找来十多年战士过秤，体重普遍下降，都轻了十多斤。指导员指责我是在干蠢事。说国家正在困难时期，战士最需精神食粮，应开导大家和全国人民同舟共济，念叨自己掉了几斤肉只会丧失斗志。我反驳他，你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吹泡泡，眼前的最大政治就是填饱肚子。官司打到营里，教导员也说不清楚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是非。只是告诫我要和党保持一致。

我正和指导员较劲呢，一个安徽五河籍的战士说他村里有人易子而食。他毫无顾忌地出示自己的家信给大家传看。信上说，他亲戚家有个奄奄一息的孩子，和邻居的一个病孩交换，半夜煮了一锅人肉汤，全家吃了好几顿。

家是干部战士心中的圣地，出来扛枪保国就是为了保家，家中的苦难怎能不让人牵挂。残酷的现实，让战士情绪更为沮丧低沉，指导员召开支委会，要连排干部都出动分头找战士谈心，消除影响，强调国家当前的困苦是上天造成的，换子而食是谣言，号召全连党员提高阶级斗争的警惕性，严防坏人钻空子。

指导员空对空的政治大话，顶不住战士实实在在的乡音苦情。我读过不少战士的家信，没一封信敢说党的不是，共同的声音都是在骂农村干部的各种劣行。从土地、山林，到农具、种子都由大队干部掌控支配，生产所得的粮食、棉花、油料和家养的鸡鸭，大都任干部各取所需。农村没有天灾，只有人祸。

在支委会上，连长反驳说，连拿破仑都懂得让士兵吃饱肚子才能提高士气，为什么我们还不如一支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军队？指导员有后盾，理直气壮地说，你的理论拿去和团政治处王主任辩去！

团政治处是掌控全团意识形态的机关，任务是巩固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一听说吃人的事，如临大敌。王主任已给指导员发出警告，要追查我们连传谣的责任。

“我是党支部书记，是连队的政治责任人，我若是不阻止，后果谁来承担？”指导员在支委会上表露了他的党性。

指导员的话就是组织的话，我们干部党员必须遵循统一认识，支委分头找战士谈话，要他们不传谣，不信谣，还说些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的套话。战士都闭了嘴，一张张满怀忧郁的脸像结了一层冰。

“党文化”把基层政工干部都洗了脑，党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掌控连队干部战士的思想，坚持党的立场、观点，宣传党的政策。上头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办。指导员在这一大事件面前，感情是矛盾的，他也有着亲情人伦，河南老家的父母都得了浮肿病，他的心情和战士一样沉重，他只能用庄重严肃的外表来掩饰内心的痛苦，而班排的愤懑和团领导的压力他又无法摆脱，只好逃避——请探亲假走人。

思想政治工作威信扫地，要改变连队持久的生活苦境，就得有自力更生的长远措施。我抓紧节假日，组织全连干战上山择地垦荒，开出了五亩多地分给各班管理，并提出年终评比生产成绩。

饥饿让战士焕发出巨大的生产热忱，他们起早贪黑地管理自己的菜地，为争夺粪肥，还展开了一场“战争”。

营区内一个营有一座40个蹲坑的公厕，是三个连和营部500多军人收集肥料必争之地。夺肥的都是各个连派出的得力干将，天不亮，几十个人就守在厕所后的化粪池边，各自手持一把舀粪勺，起床号响起，战士奔到厕所，抢占蹲坑，一阵急促的扑哧声，有的刚提上裤子，等候的赶紧上阵。大便一节节地顺着沟槽坡道向粪池滑动，几把粪勺子几乎同时伸了过去兜住，手快的先得，挑到了自己粪桶里。奈何勺多粪少，收获不大，哪怕捞到几勺也算是不小的成绩。这是一天最热闹的时刻，几乎天天如此。时不时相互间还要为这一切身利益大争大吵一回。

争粪矛盾加剧，营长招来连长协调，规定一个连守望三天，其他连不得介入。我也给全连作出严格约法，一个排一天一轮回。一场争粪肥之战始告平息。

不久，各班在粪池边自设尿桶，名曰肥水不落外人田，团长来了，见光天化日之下有人解开裤子掏出小鸡子就尿，不雅观，命令取缔。

人粪有限，我们到营区外搜寻，连老鼠屎、蛤蟆粪都弄回来，薅些青草沤成绿肥。日出日落，都在为找肥奔忙不息。

三

部队的当务之急是填饱肚子，师团领导经常召开各种献计献策会议。我想起前些年在武夷山下野营训练时，那里的一片荒山野岭上有不少野茶树，如能弄些茶籽回来榨油，将解决连队食油的大问题。

一天晚上，我去找团参谋长提出我的建议。他曾是我的顶头上司，资格老，三八式，人正直，敢说敢干，团长、政委都对他敬畏三分，只要他答应干，没有办不成的事。

已是午夜，参谋长住房还亮着灯。他夫人在南京工作，常年分居，他住的单身宿舍，我连报告都不喊就推门进屋，见他正啃着生萝卜，咬了一口，又往小碟里蘸了蘸酱油，再放进嘴里。

“好啊，参座在偷吃萝卜。”

他转过身来，“你喊什么？你找吃的，我还有。”他把桌上剩下的萝卜拿起来递给我。这是他从机关菜园子里拔出来的。

我说：“你就留着吧，我还没饿得跟你一样。”

参谋长体魄硕大壮实，他的口粮定量是31斤，月月不够，要靠参谋股长周济，夫人不在，他一日三餐都在机关食堂吃。

“有什么事，半夜三更来敲我的门？”

“找你要吃要喝。”

“上头不给，我有什么办法？你是带连队的人，我还想找你要呢！”

我不给他卖关子了，我说：“参谋长，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全团出动，开进武夷山打茶籽。”

“有这么好的事？”

我把前些年在武夷山搞野外训练时的所见所闻讲给他听。

参谋长说：“就是团党委同意，还得请示师里啊。我们和地方关系经常发生矛盾，伸手向地方要吃要喝是你的想当然。”

我说：“我们用野训为名，到那里顺手牵羊，不必请示。”

“你想到了，人家早想到了，即便不通过市领导，当地政府看你来打秋风，人家不同意，告发你，你怎么办？”

我说：“现在都是人民公社了，公社姓公，什么都是公家的。这样吧，

我去踩点，做公社领导的工作。提出给他些利益，他们动了心，到时候全团再出动。”

参谋长直率大度，说：“听你的，你先带几个人去看看，我还得报告党委，你去了，千万别跟人家争斗，地方一告状，我们就得检讨三个月。”

我说：“你放心，决不打你们领导的牌子，将来惹了事，打屁股先打我。”

受领了任务，我从连里挑了十名老兵，第二天一早带一台车就向武夷山出发。70公里行程，来到陈坊镇，找到公社陈书记，向他诉说了我们的需求。陈书记说：“支持人民解放军，我们义不容辞，只要有市委点头，你们可以要啥拿啥。”

显然，这是借口推托，我反复向他说明又恳求，要他高抬贵手，通融我们上山，收到茶籽就会给公社留三成，陈书记说：“这样吧，你们和我都向市里请示。”

这些年来，军队的用水、用地、用电总是处在优越地位，和地方的矛盾越来越深，上山打茶籽的事，市里知道了肯定状告我们侵占群众利益。我看陈书记是在转弯抹角地拒绝。我跟参谋长通了话，告诉他遇到了麻烦。参谋长肝火升起，再也不讲政策，张口就骂：“妈拉巴子，这些地头蛇算老几？鬼子扫荡那年，我走到哪吃到哪，老百姓连做种子的苞米都给了我们，你别听他那一套，我们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山是共产党的。”参谋长要我勘察山上野茶籽的分布，还说团长已同意进山。

参谋长是个不怕祸事临头的人，有他几句话撑腰，我由衷地高兴。当晚，我在镇上找了个熟悉山上情况的采药人，给了他五斤大米，要他引领我们进山寻找上山的路径。

第二天一大早，采药人背着一大束麻绳来了，上百米的绳索就是上山的路径。我们沿山间小路走了十多里，两侧的山都是丹霞地貌，山势陡峭，令人生畏。他在一个峭壁下停了下来，告诉我说：“从这里上。”我抬眼上望，石壁凹凸不平，壁缝有不少老根残存。采药人说：“我先上。”他手抓树根，脚踏突出的岩石一步步地攀缘而上。上到十多米高处的一个小格台，他抛下了两根绳子要我们系绳而上。一班

长奋勇当先，他先把一根绳子系在腰上，双手抓住另一根绳，脚蹬石壁，用尽全身力气，往上攀了十几米，力气像使完了，只得哧溜下来。我让三班副上，他是连里的单杠尖子，灵巧过人，果然他的气力没白费，上到了格台，我接着上，我是连队的球星，身手敏捷，况且在老兵面前，咬着牙也得干，很庆幸，精神力量贯注，汗湿了衣背，也上到了格台。

我向下喊话：“你们就别上了，我们上去就行了。”

人少了，采药人的负担减轻了，信心也大了，他指着几处石壁说：“往上第二站是老虎嘴，再往上就是猴子店……”听名字就够吓人的。我年轻气盛，紧跟在他身后。采药人总是先上一个台阶，抛下绳子，再让我们系绳攀登，折腾了两个小时，终于上到山顶。

这里林木茂密，杂树相间，林间光亮无多，但能辨出茶树。茶树粗壮，都是百年老树，密密麻麻的茶籽挂满枝头，像上天为我们留下的救命丸子，让我惊喜不已。

采药人带我上到岭的最高处，爬上一尊突兀透空的巨石，视界开阔了，脚下全是云雾包裹，低矮的山山岭岭，真是一览众山小。采药人指着山下说：“岭东就是福建省了。”我通过他手指望去，一大片都是林木森森，像是原始森林，上山还是缓坡。我问采药人：“这么好的林子，大炼钢铁时期，为什么没人来采伐？”采药人说：“这是福建省管的林场，是野生动物保护区，谁也不让动。”

我们在这片丰厚的林间穿行约二里地，我粗粗的估算了一下，每亩有十多株，一株能采下百十斤，在这片几十里的长岭上大干一个月，就可以收获几十万斤！

四

返回镇里，我向参谋长报告了我发现的喜讯，参谋长高兴了：“你小子立了大功，我带瓶老酒来奖给你。”

我又带领小分队连续三天勘路，终于在越过省界的一处谷地，找到了一道缓坡上山，但要比我们第一次上山的位置多走11公里。我想，大部队就扎营山上，省得每天来回奔波。

我正筹谋，参谋长来电，急召我回团，要我向党委成员汇报。当晚，

我回到团里见了参谋长，他告诉我说：“团党委会开了三天，争执了三天，6个委员，三票赞成上山，三票反对，反对的是政委、副政委、主任，赞成的是团长、副团长、参谋长，军政对峙，委决不下，报给师党委，得到的批示是，由团自定，不得与民争利。要你回来，让你来把事情说得更明白。”

一向政策把关极严厉的师党委有了宽松的态度，让我着实高兴。这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思索如何说服政工班子，他们担心地方状况，承担政治责任，甚至把师党委的松动看成是考验他们的政策水平。我要是如实说了我和陈书记的对话，这场打茶籽的行动肯定告吹，我如不说，或编着说，将来追究起来，我就是罪魁。我突然想前几年，我给师团领导中间的不少人写过回忆录，让他们来支持我，我打了一通电话，都认定是好事，希望炮团当先锋。第二天，我把老总们的话带到党委扩大会议上，说各团都要求上山，只要炮团开了路，他们都会跟着干。

“这个头，我看带不得，追究起来，我们吃罪不起。”王主任说。

“饿死人我们就吃罪得起？”参谋长火冒三丈，“主任大人，你知道我们饿成病号的，已送院17人。要是死上七八个，你担当责任？”

肠胃早已枯竭的几位政干领导，还在为自己的“守节”虚张声势，我转圜地说：“我搞了几年军史，红军长征一路，全靠打家劫舍维持生存，有谁挨处分受过的？”

团长也上了火：“民以食为天，我们比天高一大截，干！”

我怕顶牛得不到结果，说：“全师都在出动，法不责众。”

政委阴阴的脸上舒展了些，说：“既然都看成是好事一桩，我们当仁不让，就定下来吧，用野训名义上山，时间半个月。”

一把手表态，副政委、主任跟着点了头。

第三天，全团八百人开进武夷山。

我带参谋长去见陈书记，参谋长开门开山：“书记，我们部队来是为了生存，我代表团党委来和你协商，我们打下的茶籽，保证给公社留三成，还给你们修一条上山的路。”

参谋长的气派让书记脸上露出笑容，特别是要给公社修路是陈书记求之不得的事，说：“我们支持，照参谋长说的办。”

参谋长他向身后的警卫员招了招手，警卫员会意，从提包里拿出了两瓶酒递给参谋长，参谋长顺手放在书记办公桌上，说：“感谢你的大力支持，我敬奉你两颗手榴弹。”

书记笑出了声：“岂敢岂敢。”

参谋长又说：“你就别给市里报了，有了麻烦我们来承担。”

给书记吃了定心丸，又让他坐享其成，书记从屋里拿出一筐梨子，恭谨地奉到参谋长跟前说：“这是我们的山货，请参谋长不要嫌弃。”

参谋长笑纳，说：“我们一言为定。”

我由衷地佩服参谋长，仅几分钟就把事情摆平了。

在朝鲜战争中，参谋长还是我们山炮营的副营长。一次，我们炮阵地设在一处林子边，一栋完整的房屋挡住了射界，下边请示营里，要求挪一下阵地的位置。副营长来了：“挪什么，把房子烧了，服从战争需要。”一声令下，这户人家霎时变成灰烬。他的工作作风就像一把火那样干脆利落。

出得公社办公室，参谋长要我参观他的住处，我随他走了两条像巷道般的小街，进到一户人家的堂屋。一进门，参谋长就吩咐警卫员，“快去弄两个小菜，开个罐头，我今晚要犒劳刘大副连长。”

小伙子笑呵呵的应声退下，我环视堂屋，空荡荡的，中间有张八仙桌，两侧放的是农具杂物，正墙上还存留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下面是参谋长的一张行军床，床边有部电话，俨然如前进指挥所。参谋长要我坐在八仙桌前，告诉我说：“我这次出来，机关食堂拿出了老本优待我，十多斤大米白面没要钱，还没收粮票，无偿地给了一筐蔬菜，和三个罐头。今天就开了一个罐头招待你，跟我来的两个参谋下营去了，就我俩举杯邀明月。”

没多大功夫，警卫员端来酒菜，没杯盏，就用老乡的饭碗，各斟了半碗，参谋长举起碗说，“先祝你的汗马功劳。”说完，他饮了一大口，喉管里发出响亮的咕嘟声。

参谋长的豪饮全团知名，他有一斤半的酒量。此时此刻，他接连地喝了几口，拉开了话匣，先骂政委、主任为官不仁，又谴责当今的政治工作全是吹牛皮，我们军事干部中骂骂咧咧是常事，但像这样敢出格越位，团大概只有他一人。我只能洗耳恭听。

“我们带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个字，爱兵——如父如兄般地关心战士的疾苦。靠吹、靠哄、靠许愿入党提干，只有党的败家子才干这种事。”接下来讲起他的历史，“解放战争第二年，我当了连长，我们连有个解放兵老想开小差，谁给他做思想工作就跟谁对立。一天，行军路过他家，我没通过指导员，也不请示营里，私下给了他十斤米半天时间回家看看，战士很守信，回来见我就哭开了，说，全家都平安，没牵挂了，我坚决的跟你走！做这种活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是我的创造，当时，我们有个爱兵模范叫王克勤，他带兵的经验是生活互助、思想互助、战斗互助。后来，我军打汤阴，营里只给我们连三发炮弹，要把汤阴城墙打个缺口，我把一门炮推到离敌人三百米抵近射击，敌人的枪弹像爆豆般倾洒过来，一个班只剩下他和一个副班长，这个解放兵是瞄准手，三发炮弹硬是给他准准地打出了个豁口，攻击部队进了城了。后来，他当了班长，在朝鲜战争中牺牲了，他的遗物中有双布鞋，鞋里留有张纸条，上写：送给副营长。这双鞋至今还存放在我箱底。”

参谋长给我上了一课。他让我懂得，爱兵就是凝聚力，就是战斗力。

五

大部队还没安顿下来，参谋长就带连营干部上山勘查现场，区分任务。我把他带到我站立过的那块巨石顶，说：“那边就是福建省了，底下就是省的林场，我们不能过界。”

参谋长扫视了一下岭东那片浓密的山林说：“人民解放军在自己的国土上有什么东西不能拿！？把一二营放过去干，到头来有事我担着！”接着参谋长教训我说：“你就不能装傻？”

到底是参谋长，艺高人胆大，有领导壮胆，我们就甩开膀子干开了。

为生存而战，连队都在拼死拼活地干，八百人扎营在山上，悬崖陡壁间，牵起几百条绳索，把采下的茶果子一袋袋地运到山下，装车拉走，一个连平均一天采得6000斤。团后勤已和市粮食局联系好了，由他们加工，10%的油成品和茶饼作加工费用。

20天的苦战收获了80万斤茶籽，给公社留下五万斤。

路没修成，我们向公社要5吨炸药，公社出不起，也弄不来。

果然，山那边林场状告到军区，说我们践踏森林1300亩，掠走茶籽两百万斤，还猎杀野生动物300多头。军区通报，师党委勒令我们团做检讨。我们团成了罪大头，步我们后尘的其他各个团都在趁火打劫，对他们连个批评都没有。参谋长很义气，说：“不要让他们陪杀场了。”检讨书由参谋长起草，强调了“理由”：“由于省界不明，误入该区采摘，今后用助民劳动补偿其损失。”上交检讨书是参谋长亲自送去的，还给师党委和师机关送去了3000斤茶油。皆大欢喜了，这事就不了了之。

全师一万多人都分享到茶油，我们团净得茶油四万多斤，每个连分得两千斤。

大灾中的天府之国

——我的战友和双亲

1960年，我的连队在全国大饥馑中自力更生有了成果。垦荒种下的青菜萝卜开始收获。饥苦的生活有了改善，可干部战士脸上的阴云远未消除，都在忧心自己的家，他们的父老兄弟还在煎熬之中。我的老父老母月月有书信来，从字里行间感触到老两口是在苦撑中度日。他们怕吐露真言让我受牵累，措辞上尽择好话：“相信党的政策会救民于水火。”

我有一年一度的探亲假，该回家看看了。

一

我从九江乘长航的荆门轮上溯返重庆，由于食物紧缺，船上餐厅供应已不再是早些年那种自点菜饭，每餐只给你盘里盛上二两米饭，盖浇一勺炖大白菜，不饱就躺在自己铺上等待下顿。

清晨到达重庆港，山城在浓雾中隐现。我刚登岸，影影绰绰地涌过一群人围住我，我仔细打量，有棒棒客（四川方言，指靠一根竹棒和一条绳索挑背货物的苦力——编者，下同），有乞讨的，一个十多岁的女孩拽住我的衣襟：“解放军叔叔，行行好，我快饿死了。”接着十多双皮包骨头的手都伸了过来。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施舍，一个老汉拿着我给的两毛钱在手中抖动着，说：“钱不管用了，你就给我粮票吧。”

我心沉了：天府之都也在饥饿的厄运中。我抬眼透过迷雾，见近前的几堆人群，差不多都是乞讨者把上岸的旅客团团围住，动不得步。我看到难以脱身，便蹲下来和几个孩子磨蹭。

正说话间，一个身材瘦瘦的棒棒客挤进了人圈，站立在我面前：“老兄，我来给你挑行李。”他那浓浓的重庆话，那张熟悉的脸庞，让我一下就认出：“老徐！”

老徐身着旧军装，抱着根楠竹棒，棒头还系有一束棕绳。

“你怎么来了？”我惊喜地问。

“大前天，你老者告诉我，说你今天坐船到重庆，我是来接驾的。”

老徐是我中学最亲密的同学，有钱一起花，半截红苕也掰开吃，从未撒皮过（（犹豫过）。1947年闹学潮，他是我们班的小头目，领着我们上街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1949年又一起参军，一起走向朝鲜战场。1951年3月重庆镇压反革命，抓了7000人，他那当过国民党副区长的父亲被绑进了法场。那时，我们正打第五次战役，战役一结束，他就被定性为反革命子女，清洗回乡。从此断了联系，万万没想到，他竟然出现在我面前，那张欢快的脸上看不出有什么前嫌，反让我愧疚得不知所措。

此时，他三下两下把我的两只约20斤重的提包挂在棒头，拗在肩上，吆散了乞讨的人群，说：“走，边走边扯。”

上朝天门码头，有百多级石梯，雾开始消散，坡的两侧露出密集的小摊小店，到半坡，老徐指着一家汤圆店铺说：“我们进去过过早。”

店前的大锅里，汤圆在滚翻，店里四张靠墙的小桌人已坐满，等不及的人们端着碗站在过道就吃开了。

正搓汤圆的老板娘一见老徐就热情地喊开了：“老徐，来几碗？”

老徐从内衣里掏出張一斤的粮票，告诉我：“给粮票，一元钱一碗，没粮票，一碗要收两元。”

老徐把钱和粮票递给了老板娘，说：“先给我来四碗。”回过头又对我说：“别讲究了，就站在街边吃吧。”

我接过一碗，汤圆有核桃般大，四个，夹起来咬了两口，才露黄豆粒大小的红糖芯子。

老徐说：“重庆人早就没糖吃了，能吃到这点鸡屎糖就不错了。”

刚进嘴两个汤圆，突然，一只黑黢黢的手伸来，猛一把夺走了我的碗，转身就飞跑。老板娘骂开了：“你龟儿子抢人也不看看解放军。你把碗给我送回来！”

老徐制止女老板：“别叫，别叫，我来赔你的碗。”他见一群围住要饭的坚持不走，说：“你们中谁是头？是你？”他指着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说：“我给你5斤粮票5块钱分给大家，你们就别再猴着（缠着）解放军了，他是我的稀客，也在饿肚子。”

那长者像是认识老徐，没接钱，恭谨地说：“你哥子拿了言语就行了。”他转身一声吆喝：“都给我走开！”十几个乞讨的快快散去。

老板娘给我盛来第二碗，老徐端着碗过来，把他碗里的汤圆赶了两个给我说：“跟过去一样，二一添作五。”他那副乐呵呵的笑容感染了我，刚才遭抢碗的不快，如烟云飘过。

吃罢汤圆，老徐又掏出两块钱递给老板娘：“这是赔碗钱。”老板娘笑了，一挥手：“你哥子就别跟我讲义气了，要了你的钱，我就不开汤圆铺了。”老徐二话没说就把钱揣回口袋。

二

上到码头，我和老徐坐在石栏杆上歇脚，他向我摆谈起十年来的多舛命运：

“我是背着反革命家庭出身的名分从朝鲜回重庆的，我们这批政治上不清不白的人，回来的有600多，不再是最可爱的人了。市区公安局也容不下我们，我只好去歌乐山乡下跟老娘一起过。我老子给枪崩了，老娘就成了反动家属。1952年给赶回娘家监督劳动改造，她没干过农活，乡里正在搞土改，就把她当成了发动群众的法宝，没完没了地组织群众对她进行批斗，还打折了她的双腿。村里不给她一分地，人要生存，她就在野坡上开荒自力更生，把不听使唤的双腿绑上旧棉花麻包片跪着刨地。你去过我舅家，那一片都是喀斯特地貌，石缝中才有点土，她就在石窝窝里种点苞谷、红苕，三餐是青菜杂粮，还得熬成稀的喝。

大饥饿来了，老娘得浮肿病死了。我在农村也蹲不住，给生产队长塞了点包袱，一条香烟两瓶烧酒要他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我进城了，重庆的水流沙坝社会我熟悉，蹬三轮车、擦皮鞋、挑水。三年前，才闯到朝天门码头当棒棒，运货挑行李，我有的是气力。这

里，还有个难得的好处，治安管理无序，派出所搞不清谁是团结对象，谁是依靠对象，抓阶级斗争怎么也不灵。我们的棒棒客有好几百，都有自己的特殊背景，有逃出来的地富或乡保长，有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官方说朝天门码头是鱼龙混杂。上头不管，我们自己内部就抢地盘、争雇主，经常打架葛孽（争吵，闹矛盾）。我来这里，从不屈人之下，我集结了一帮有正义感的兄弟伙（重庆流行语。由袍哥语言转化而来，相当于北京话的“哥儿们”），用拳头、棒子收拾了几个欺行霸市的歪人，立了威，派出所也高看我，他们处理不了的事，都交给我协管。我在朝天门码头组织了一个马克思说的那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相依相存，敬如兄弟，我的小王国比起你老兄在连队里阔气自在多了。

“我现在一天能挣十块八块，粮票也能到手三五斤，我没有妻室儿女的牵挂，一人饱了，全家都饱了。这年头，全国老百姓在受苦受难，四川县县饿死人都是是一大摊，你说惨不惨啊！”

“你回来正好，到处走走，看看重庆人遭的孽啊。今天我见到你，了结了一个心愿：我和你是老庚（同年），共过生死，又亲切地叫过同志，现在你在搞专政，我变成了专政对象。过去，你不给我通信，是划清阶级界限，眼下我也不会去你家拜望，今后也不会干扰你的伟大前程。你回来，旧情难却，只能在朝天门码头见见，述说些衷情，我不会在你跟前骂共产党，我还要感谢党把我甩向社会底层和三教九流为伍，懂得了人生，学会自食其力，这里没有危机感了，我自由了，今天的见你到此为止，你回部队那天，我还来给你提行李。”

说罢，他起身走到长航售票处门前的停车场，叫来一辆三轮。蹬车的是位老者。老徐介绍说：“这位是杨大伯，他的儿子在朝鲜也是我的难兄难弟，被俘后，主动争取回国竟被开除团籍，还不让他进城找活路，一家几口人要吃要穿，只好让杨大伯一大把年纪，干起年轻人干的事。”

老徐把我安顿上了车，又掏出20斤粮票压在我手上，说：“见面礼，给你老者。”

三轮走出老远，我回过头，老徐还在挥手。

三

我的目的地是小龙坎，杨大伯只送我到七星岗换乘郊区车。杨大伯像遇到久别的亲人，一路上扯古话今。

他一开口先是赞扬老徐，说：“徐蛮子（小名）在朝天门码头海得开（吃得开）哟，他不是靠袍哥青洪帮的结伙，是他的人缘，他对三朋四友都讲义气，我来朝天门站住脚跟，就靠他给我撑起腰杆子的。”

杨大伯还告诉我，他也当过兵，“不是跟共产党，是跟刘子虔（刘文辉）的24军，那是民国十几年的事，刘子虔和刘湘叔侄俩打仗，刘湘从德国买回一架飞机，没炸弹就从飞机上往下扔手榴弹，炸得我们满山跑，那阵子，我们都是双枪兵，手中有汉阳造，腰上别杆大烟枪，每月关饷是两块袁大头，掷色子，推牌九，自由得很，跟谁走就是谁的兵。别看军阀们整天打烂仗，争地盘，四川天灾人祸，我们吃过观音土，绅粮都发善心，开仓赈济，哪像现在饿得村村都有人死，买不起棺材板板，用两个鸳鸯（竹筐）捂住就拉到野坡上窖了。”

“过去，老一辈人都骄傲地说，老不出川，少不入川。意思是人老了，不要走动了，留在地沃物丰的家乡享清福，外省的年轻人一进四川，生活富有就不想上进，这些话已成历史。”

“1947年，国民党统治的重庆够乱的了。”杨大伯又批判开了国民党政权，“中原地区出现大饥荒，还要戡乱救国，结果物价飞涨，发行的金圆券、银圆券，一大把纸币买几根红苕，学生游行反饥饿、反内战，老百姓就抢粮店，不管国民党多反动，没听说饿死那么多人，我家在弹子石，光去年我那个乡就有一百人的命给阎王爷索走了。”

大伯也许知道，我一身军装如铁罩衫，是防范非无产阶级思想入侵的，对社会现状不会流露出丝毫怜悯，他见我久久不语，再也不说什么了。

从民生路到七星岗是上坡路，我不忍心让这位苦难中的老人拼力蹬车，要下车步行，大伯怎么也不肯，说：“我是个棒槌，不知天高地厚，犯冲了，你别往心里去。”

到了去郊区的车站，我掏出5元钱给大伯，他怎么也不收，走时留下一句话：“你明年回来，我还来拉你。”

四

回到小龙坎陡存四壁的家，心境又升起一层浓云。解放后，我家开的茶馆歇业，母亲用了她的全部积蓄，买下一栋 600 平米的破旧的捆绑房（在河滩边用竹子捆扎的简易房）出租，正当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我家成分由小业主上升到房产主，母亲为了不污染门楣上那块“革命军属”的牌子，大义凛然地把房子交了公，仅留了两间又矮又小的住屋。听说我要回来，就把放有旧家具的七平半的房间腾出来，给我安上张小竹床，母亲和父亲住的那间也只有 11 平米，半间安置衣橱箱柜，半间放了张大床，床下堆满二炭（燃烧不完全的煤炭）和杂物。

父亲在一家纸盒厂干活，每月工资 30 元，母亲给一个街道干部照看孩子，劳务费每月 10 元，加上我寄回 20 元，老两口虽清苦，还能平静地过活，没想到这场大灾降临，物价飞涨，日子过得也含辛茹苦。

回到家已临近中午，老两口为我忙活的第一餐饭至今还记忆犹新——母亲从屋梁上取下一块约两斤重的腊肉，宰下一块用淘米水反复清洗霉菌，切成小丁，然后从她床下的木箱里拿出装米的坛子，抓了两把梗稻米放进三只小罐，盛上水，到过道上捅开二炭烧的炉火，把三只小罐坐上，待米饭半熟时，才把腊肉丁放在饭的表面上再蒸，我的罐里盛的腊肉要多得多。

桌上摆了几碟泡姜、泡辣椒、泡豇头，另给我做了一碗有几张叶子的青菜汤。饭罐里腊肉丁冒着肉香，也有哈喇味，二老吃得很香，父亲还感激我说，你要不回来，我还吃不上这顿腊肉呢！

我也感激二老的厚待，忙把罐里的肉丁分别赶了些给他俩的罐里，二老谦让了一阵，接受了。

吃罢饭，母亲带我去逛自由市场，这是她三天两头都要走的地方，她口袋没钱，去看上一阵也是眼福。

市场设在另一条街的一片宽阔的空地上，沿街排列了有好几百个农副产品的挑子，采购的人熙熙攘攘的，几乎有上千人，嘈杂的讨价还价和争吵声相伴，仿佛蜂子在朝王。

小贩带来农副产品的量都不大，要价很高，一把薤菜一块钱，

一个鸡蛋九毛五，一块猪肉斤把重，有异味，要价是20块。我掏出一百元来，让母亲自由选购，我不单为二老的口福，还要去看望亲朋好友，送些农产品是最上乘的礼物，经母亲熟练地砍价，一百元买下三斤兔肉和一斤有味的死猪肉，20个鸡蛋和芋头、萝卜。一个面盆般大小的菜篮子，就装进了我一个多月的积蓄。回到家来，母亲把购的肉和菜分成三份，花20多元买来的死猪肉准备送给幺叔。

幺叔境遇最差，解放前当过多年的巡官，现在是街道居委会的监控对象，生活无着，靠幺婶打小工糊口。幺叔60开外，又患肺气肿，看病吃药，要由亲友化缘相助。

来到幺叔家，他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二娃子来啦。”见到我带去的猪肉，眼里闪出光亮说：“我该喝到肉汤了。”

他那低沉的声音震颤了我的心灵，这是一个临近死亡的老辈子最后的呼喊，我两眼模糊了。

隔壁一位老者过来串门，见我是军人，放开了嗓门：“这年月，你们是享福的，老百姓在遭罪，你幺叔更受罪，想当个丘二（帮工）都不让干。我也干过国民党的内二警，共产党看我们这些人怎么都不顺眼，都整死了，他们就舒服了。”

幺婶出身城市贫民，性格沉稳又怕事，连连阻止邻居的打抱不平，说：“别说了，别说了，门外有耳朵，到时候要倒霉的。”

我也说：“全国都在经受这场大灾难。”

老者气更盛：“灾星就是共产党，国民党搞不好滚蛋了，现在轮到共产党了。”

我安抚他一阵，赶紧离开，怕再刺激他会发出更大的叫阵声来。

我又把剩下的两份“礼品”分送到战友家，他们只表谢意，不言灾难。

五

母亲提议到城里“颐之时餐馆”去海一顿。这是经市里批准的唯一一家专卖荤菜的餐馆。

第二天9时，我们搭车进城，“颐之时餐馆”在市中区，等我们

到达时，这里已是人山人海，据说，凌晨5时起就有人来排队。10时整，店门开启，人们蜂拥而入，有人连鞋都给踩掉了。

堂厅设有近十多张桌子，进得大堂的顾客，都拼命地争抢座位，没抢到位置的就放声大叫，我是第二轮，我是第三轮……

我带二老到靠顶墙的一张桌前排了个第五轮，我算了算时间，最少得下午两点才能入席，我用张报纸铺在地，让二老坐下来等待。

满点塞满了人，连上菜的服务员从过道通过，都要大呼大叫，空气糟透了，二老已是汗流满面。

服务员上的菜很旺实，肉多翘头（翘头：肉以外的辅料）少，诱人口水欲滴，空气中弥漫的油脂分子，通过鼻腔渗入肺腑，浑身都感到惬意。

终于熬到下午两点了，我们坐上桌，把购得的菜票给了服务员，端上来的三个菜是红烧肉、鱼香肉丝、烧蹄膀，共27元。我们三人只占据桌面的一块，因一张圆桌要坐10人，有人抢的位置少，就站着吃。我身后一位男人一只手紧紧把持住我坐的靠背椅，我心情是紧迫的，吃了不到半个时辰，就让服务员打包走人。

出得店堂，老两口心满意足，咂着嘴巴，不堪等待的疲累也消除了，母亲的脸色泛起红润，小脚迈动起快步。

走在母亲身边的一位老太婆也是刚宴罢出来的，精神抖擞地用牙签挑出一小砣牙慧，又放回嘴里咀嚼，回味，悻悻地说：“这一顿倒吃得安逸，下一顿得等下辈子了。”

跟在我身边的老头子感慨：“这简直是在吞银子，我还不算干人（穷人），也遭不住。”

我父亲似乎站在军属立场对老头子说：“这是中央没办法的办法，卖高价让票子回笼。”

老头子不以为然，反诘：“我们手里有多少票子给他们回笼啊？你看嘛，总有一天会‘若敖鬼馁’的。”

走了一程，我回身已不见老头子，父亲问我：“刚才那位老者说的‘若敖鬼馁’是什么意思？”

我说：“这是左传上的一个典故，意思是人都饿死了，楚王若敖的灵位就没有后人祭祀了。”

民以食为天，大饥饿让国人不堪忍受，都已怒不可遏，有知识的懂得自我保护，借古讽今，出了恶气，自身也有了安全系数。

六

我在家陪着父母待了七天，心中牵挂着连队，提出要归队，父母没阻拦。只说：徐蛮子那里得给人家说一声，人家要送你。去年中秋节人家还送了块狗肉来。

我不知老徐的归宿，通知的事父亲去做了，离家前的晚上，有人捎来了口信，说有好些难兄难弟要为我送别。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朝天门，还是在那排石栏杆前，一伙人正等待我的到来。一见面，他们中多数人我不相识，一位老友主动给我介绍：“这位是俘虏兵……这位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位把一只胳膊留下朝鲜了……这位跟我一样，反革命崽子……”他们都握了握我的手，脸上是苦笑，我的一身军装仿佛是我们之间的隔离层，相视的眼神是尴尬的。

当年，从重庆110多所大中学校，汇集到第12军的9600多个学生兵，从朝天门码头走上朝鲜前线，牺牲了一批，清洗了一批，转业一批，留在军队的仅有54人。同途殊归，历史在安排我们的命运。

我从浮想中回过神来，突然发现：“老徐呢？”

给我介绍的老兄平静地说：“他给请进公安局了。”

“为什么？”

“有人指控他在码头上结帮拉伙。”

“有证据吗？”

“阶级斗争就是证据。反革命崽子干什么都是反革命。”

我义愤填膺，心潮涌动，泪水在眼里转动。眼前没有被饥饿压垮的兄弟伙，仍然在政治的囚笼中。我无法用语言安抚，只向他们深深地鞠躬，依依道别，上了船，船启动了，渐行渐远，我伫立船舷挥手，人影模糊了，那一尊尊形象，永远留在我记忆中。

“四清”运动一瞥

——腐败干部站水缸

“四清”运动，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的重点放在农村，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整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公社基层干部。有人说它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有缘看到这场活剧的片段演出。

一

1965年秋，时任创作员的我，到黄海边的边防团采访军民联防，那天，我沿海堤去一个前沿哨所，光秃秃的海堤上见不到一户人家，二十多公里的行程走了一半就已疲惫，只好从地图上找了个就近的集镇歇脚。这里是边防团的防区，还是一家公社所在地，公社大门前有两个民兵把守，一大堆人聚集在门口正向里张望，那一张张脸上露出满足欣喜的神色，像是在动物园里看到了稀奇。我走进大院，宽敞的院落中央布满半人高的大缸，每口缸里都站着人，人人双手抱肩，浑身哆嗦，满脸痛苦。我近前一看，他们半个身子浸泡在水里，上身穿着棉袄，下身只留下条裤衩遮盖。我点了点数，36口缸，站的36个人，俨然像一组兵马俑。这一怪异现象让我大惑不解。

我进到公社办公室，一个穿军装的干部正和一个地方干部谈话，见我进门忙起身和我打招呼。我认识他，他是边防团的组织干事小吴，出席过军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他大步走过来和我握手，让座，倒水，那位面无血色的接谈干部弓着腰站在一边，双手捂着肚子在发抖，脚下的布鞋趿拉着，像是刚从水缸出来的。吴干事也着眼看了看他，说：“你先回去，明天再来。”干部恭恭敬敬地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小吴回过头来，亲切地问我从哪里来？有何公干？我说来海边转转，路过。他问，吃不吃饭？我说，只歇歇脚。他告诉我，他参加“四清”工作组来这里一个月了，他是组长。组员有专区的、县的，一共五个。我迫不及待地问：“院里那些蹲缸的，都是你们工作组弄起来的？他们犯了什么错误？”

“搞女人呗。”吴干事说得轻松。

农村干部这类丑事，时有耳闻，让我惊诧的是，处分乱搞女人的竟要蹲水缸，很可能是工作组的土政策。

我问：“行政、组织都可以处理，为什么非要用站冰冷的水缸来惩罚他们？”

“这可不是我的发明，”吴干事说，“是专属的统一部署。刚才，县委李副书记专程来这里看了，说，全县蹲缸的有500多人，这是最得人心的事，数我们搞得有声有势。”小吴舒展的眉宇间显露出他辛劳的成就，又说，“对这帮人，用组织处理已不产生痛痒，到头来照搞女人不误。”

我陡然记起我念小学时，同学犯了事，老师惩治我们，就是用罚站、跪童子军棒、打手心，最让我们丢人的是让你脱下裤子，趴在条凳上用竹片抽屁股，为什么这类让人受皮肉之苦的“传统”今天仍然在用？还是用来对付农村干部，这种惩罚能有多大教育作用？

“你们准备让他们这么站多久？”

“上面有规定啊，搞一个女人，在水缸里站一个小时，这比开他们的批斗会管用。”吴干事表情严肃，看得出，他是赞成这种有创意的惩罚的。

“有这么多人吗？”

“多的是，不会有假，还有没查出来的。这里只有36个，今天全亮相了，是给县委书记看的。公社脱产干部180多，他们还不足五分之一呢。”

二

我想起年前中央颁布的农村工作23条，是毛泽东制定的，他对

早先的“四清”提出了批评,要用新标准继续开展“四清”运动。我问:“中央不是要你们查干部政治、经济、组织和思想的四不清吗?作风问题只是小头,为什么搞得如此劳师动众?”

“批判腐化干部最有力的武器就得搞运动,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它比条条框框的法律更管用。”小吴用他的理论回答我,“我们公社地处海防最前线,属战区,国民党、三青团、伪军、警察和地富五类分子,早些年就扫地出门了。这里从生产队到公社干部都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可以说找不到根不正的,我们的任务一来就明确,只查新生的资产阶级。1963年第一次“四清”,我就参加工作组来到这里,那是搞的是小“四清”,查干部就查多吃多占,只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范围小。在群众中查投机倒把、放高利贷、小偷小摸。我从一个大队就查明,群众中小偷小摸,要占公社人数的92%,干部的多吃多占几乎百分之百。群众靠一毛三分钱工分过日子,偷点拿点难免,一般批评教育,干部多吃多占地让他们退赔。”说着,他打开抽屉,拿出笔记本翻开来,念给我听:“这个大队粮产7万5千零70斤,口粮是151斤,8个干部就私分红薯3250斤,茅草8750斤,扣修堤费1万零50元,大队的架子车,干部一人分一辆,还有出租的。干部平时不上地,自己就给自己补全工分(10个工分共6毛钱),大队还有一亩一分菜园,是专供大队干部吃喝的……党政策宽大,助长了歪风,他们没有敬畏之心,更是胡作非为,这回我们来搞的第二次‘四清’,发现干部蜕变了成了资产阶级,他们大把大把地捞钱捞物,搞女人成堆,阶级斗争升级了,用蹲水缸象征性的惩罚,烧烧他们的脸皮,目的是挽救,让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痛苦一回。比如,公社的社长、会计搞的女人有30多,老百姓对他们恨得直咬牙,批斗会上,这帮人都会痛哭流涕,悔过自新,猫改不了吃腥,过些年又会犯啦。让他们十冬腊月天蹲水缸,把不老实的小头冰冻一下,他们的大头会记住一辈子。”

“这么多人,你们是怎么把他们清出来的?”

“社会主义教育嘛,我们每天晚上给社员宣讲中央制定的农村政策二十三条,动员大家查根子。在内地,查出身成分,查漏划地富,查是不是阶级异己分子,我们这里是特区,干部没有那么多复杂的社

会关系，只查他们思想是不是变了质，多占多捞严重的就送法院，一般的属小农意识，批斗几回给个组织处分就了事，可搞女人决不轻饶，整治他们就得用怪招，让群众解恨。”

“他们都是群众揭发检举的？”

“群众提供线索，我们就诈他们交代问题。比如某干部被人揭发有荤事，找他来谈话，开初，都不会承认，就点出他和某某女的关系暧昧，再不认账，就掏出小本在他眼皮下晃晃说，这里有账，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不就送你去法院说清。他们一般说轻不说重，说远不说近，说少不说多，我们反复交代政策，说，你坦白了，组织处理从宽，不公布丑行。政策攻心，效果极好。其实，搞女人30或50，只是50步和100步的问题。这些淫棍只要抓住他们的尾巴，大都会竹筒倒豆子，坦然应对，不会在数字上和你个个计较的。”

“搞20个30个女人的，在缸里要站一两天，泡的是冷水，不会出事吗？”

“我们有宽大政策，他们每天自觉地来受罚，能在缸里站多久就站多久。比如有承受力强的，能一次站两小时，有的站半个小时就倒下了，我们不勉强，让他出缸回家，隔天再来，但必须站够他搞女人人数所规定的时间，我们有专人计时，就连一分钟也记。”

我问：“对这些人的人格是不是有损？”

“他们搞那么多女人，跟谁讲过人格？都是些老油条、老脸皮，道德早已规范不了他们。我们的方法不怕原始，只要群众的义愤得到消除，就不失为好政策。我告诉你，他们搞女人手段是挺恶劣的。比如，社员都穷，有人半夜上地里打秋风，什么叫打秋风呢，秋收时放在地里的稻麦、苞米，偷着往自己家扛。给民兵逮住了，关押起来，干部就上他家去搜粮罚款，见年轻女人就乘虚而入，抱住人家就上床，回头还对打秋风的人说，是你老婆保了你，男人回去还感激女人呢，女人有苦说不出。平时，社员要干部开个条子，托个门子或少交粮少交税，都要求干部高抬贵手，女人就得付出，这伙新生的资产阶级，比黄世仁还黄世仁。”

“他们站完了水缸，又怎么处理？”

“毛主席要我们到农村搞四清，就是教育他们坚定地走社会主义

道路。他们都是从阶级斗争中挑选出来的干部，是党建立农村政权的基石，他们犯了错误，党要他们回头是岸，谈何容易啊！我在这里前后有两年多，给他们讲中央文件，讲党的政策、讲党性，都是耳提面命的，他们左耳进、右耳出，不管用啊！他们以为自己在基层，山高皇帝更远，管他们的区、县、地、市不也都在捞吗？这些人搞的女人更上品。这帮人，列宁早对他们就有评论，都是见利就要捞一把的小生产者。我们管不了他们一生一世，只能按搞运动的常规办事，由工作组逐一的甄别，通常报给县委，在党内给予警告或留党察看处分，严重的开除党籍，行政处理就记过，或降职降级，开除公职，但我们处理他们，手下都会留情的，说真心话，基层干部有他们的难处，要是让你我来干干他们的角色，肯定玩不转，农村不依靠这些干部还不行。

“毛主席担心中国会变色，说，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我们以此为准绳放手整治干部。”

三

我毫不怀疑组织赋予小吴的权力，用威慑行政在眼前有它的特殊效应。我用小本记下了小吴的心得，告辞时，小吴又陪我到院里巡视蹲缸的人，当走到一个披着棉袄的干部跟前，小吴介绍说：“这位是公社的副书记，他色胆包天，敢向民兵营长挑战，三年之内要搞到一百女人。”

小吴不避讳，当着这个干部高声扬气地说。

“那是开玩笑说的，根本不可能的事。”干部嗫嚅地说。

“你已经搞了25个是假的？”

干部不认账：“你们只听信一帮人的乱说，谁能拿得出真凭实据？”

“你不签字画押认可了？”

“那是给你们逼的。”

“你敢说你没搞过女人？”

……

水缸边没有法律程序的对质，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我岔开

他俩的争辩，问干部的家庭状况，干部只顾哆嗦，不回答。

小吴说：“他家苦大仇深，三代人逃荒讨饭。前年，他已是大队副书记，我见他聪明能干，还给群众办了不少好事，就把他提到公社当副书记，没想到他一上来就往女人堆里钻。我不明白，党把他们捧得比天高，可他为什么就不给你搞社会主义？”

小吴无意中提出了个尖锐的问题，光凭阶级路线选拔干部，能执政安民吗？

我们来到大院门口，围观群众把我们围了起来，问这问那。他们把蹲缸都看成是党治病救人的良方。

一个老人说，我们脚下是黄海滩，满地是盐碱，长不出多少庄稼。一天的口粮只有四两，国家还要抽税，干部手更长，连救命的副业都霸占了，不治治他们，我们就没法活了。

有人担心，不知什么时候，虎归山林，他们还会疯狂的。

我在这里只待了个把小时，留下的记忆深刻而又凝重，“四清”运动是毛泽东的倡导，由刘少奇主持实施的，运动的中心是派出工作组，通过夺权、惩戒、羞辱等手段整肃干部，刘更为严厉地提出“追根子”，伤害的远不止毛泽东认定的三分之一基层干部，最终刘也自食其果。

四

我记下此篇，可以看出基层行政不建制度，不立法规，用运动来实现党管干部，不提高他们的素质，只求他们会专政，再怎么铁打的江山，又能维持多久？

十多年之后，毛泽东寄望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人民公社终于垮台了，经历了大苦大难的人们已领悟到它是违反历史进程的。让我们震惊的是，公社干部消失了，30年的改革开放，区、镇的新领导班子漫天的群蝇，正在最大化地攫取占有，党依然要指望他们做政权的守护神。

“好八连”好吗？

——大上海的小监狱

“好八连”原是上海警备区的一个普通连队，他们常年执勤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保持了我军艰苦朴素的本色。南京军区政治部授予其“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锦旗，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就是借助他们的背景，描写了代表无产阶级的尖兵和资产阶级在大陆最后营垒的尖锐斗争。毛泽东看了这出戏，于1963年8月，写出了“八连颂”的诗篇，赞美他们“拒腐蚀、永不沾”，于是八连从全军的四好连队标兵，又上升为全党、全军、全国的一面反修防修的大旗。

一

文革开始，来八连参观访问的人络绎不绝，我问过八连指导员，每天来些什么人？指导员扳着指头数落说，社会团体、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人民公社或零星个人，每天平均有200人，中央地方报刊电台等新闻单位的记者、作家约20人，还有三五成群的外国友人，常住的，还管吃喝拉撒睡。我们四个连干，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更让我们招架不住的是总政治部，南京军区的组保干宣文青6大业务部门，长年不断地来总结经验，指导工作，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反正我们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其实，熄灯时间到了，照样开会。

新闻单位夜以继日的来摘取、加工、拔高八连的日常生活故事，事迹越来越离奇，八连被吹捧成了庙，八连的人被树成了神。

1973年春，南京军区作家任斌武，写了一篇在新形势下的“好八连”，送来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其所言再不是工具箱、针线包之类连队艰苦生活合乎情理的情节，列举的小故事大都是些极端的、让人可

望而不可即的作为。如一个战士穿的裤衩，经多年反复修补还在穿用，用秤称，3斤重；大白天在南京路上清扫垃圾，弄得漫道扬尘，还经常推着粪车在南京路上穿行。文章批评捂住鼻子的人是资产阶级感情。我和这位朋友争执了一场，指责他名为兴无灭资，实是提倡清教徒式的苦行。我把他25000字的大作，左砍右削，留下11500字才给刊用。

二

1975年夏天，我出差去上海，顺便看望“好八连”。他们已搬到郊区的生产基地，边搞农副生产边进行军事训练，我是由警备区的老朋友余干事陪同去到八连的，接待我的是指导员，这是高规格，因我来自总政，又有常年蹲点八连的余干事陪同。一见面指导员就按他的规矩，从抽屉里拿出一摞文稿准备给我念，余干事制止了他，说：“你别照本宣科了，我们这位老编辑不是来听你老生常谈的，只是随便看看，转转。”

指导员差不多每天都要用讲稿应付来访者。他不会向参访者随意口述，话稿是经支部讨论、警备区政治部改定批准的，遣词用句都有严格的斟酌。

余干事和指导员打交道多年，他们之间没有语言的忌讳。余干事问：“你们还要在这里窝多久？不想回城里啦？”

指导员：“我们身不由己，一切都是你们政治部在安排。”

余干事告诉我：“前些年，军区许世友司令发话了，说，‘我担心好八连给捧垮了。’八连可是全军的金镶玉啊，出了问题谁也担当不起，警备区党委决定要保持‘好八连’的好，就必须搬到郊区进行封闭管理。”

“我们难啊。”指导员也跟着感慨，“全国的党政军民学，亿万只眼睛都盯着我们，稍有差池，我们就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毛主席。”

“你别以为把八连禁闭起来就一尘不染了，我就不信，和尚的脑子里还有一块小自留地呢。”

这是余干事经常用来嘲讽禁欲者的老“典故”，说一个老和尚见

小和尚目不转睛地盯住一个进香的姑娘，老和尚说，那是老虎。待小和尚长大后，老和尚问他：“你在世上最喜欢什么？”长大的小和尚答：“老虎。”

余干事要我到班排去看看，说：“你会看见八连真正的兵。”

我们从连部出来，眼前是一幅空旷的郊野景色，远远望去，菜地里有不少人正在压苗，余干事要我去菜地找战士聊聊。

刚走到猪圈门口，一个老兵拎着只空饲料桶从猪圈里出来，一见我们兴奋地叫了声：“余干事。”

余干事也高兴地说：“小李，是你值班？”

小李“嗯”了一声说，“到我的寒舍去坐坐。”

余干事说：“好。”

猪圈是一溜长长的简易平房，6个圈栏养了17头猪。余干事告诉我：“小李是‘空军司令’，他原是八班副，犯了错误才下放来这里当猪倌班长的。他手下的兵由各班派人来轮值。”

猪圈尽头的一间小平房，是小李的住所，约十一二平米，一床一桌，半间屋子堆饲料，墙角还有个小电炉和一个小柜橱。

我们刚落座，小李倒上两碗开水，余干事掏出一包大前门香烟，抽出一支递给小李，说：“来一支，我腐蚀你一回。”小李犹疑，战士抽烟在八连是绝对不允许的，余干事说：“连长来了，我给你顶住。”小李笑了，接过烟，余干事用打火机给他点了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舒展了一下身躯。

“你的事了结没有？”余干事问。

“不会了结的，”小李说，“到年底肯定打发我。”

余干事告诉我小李犯的事。

今年年初，小李的父亲从苏北老家来队，小李陪他到中百公司、先施公司采购了几大包衣物和日用品，连的领导认定小李的父亲是跑单帮的，小李不教育父亲，反帮助采购，成了资本主义尾巴上的一根毛。这算得是一尘不染的八连近年来出的大事，报给了警备区政治部，主任要八连不声不响的作出处理。把小李放到猪圈的目的，就是等候老兵复员时打发他回原籍。

余干事还说，八连的老兵，历来都被看成是部队反修防修的种

子，大部分会留下来提干的，军区好多单位都来争着要八连的人，像小李这样身上长毛的兵，肯定走人。

“我老爹就是跑单帮的。”小李很坦然，“我家在苏北滨海农村，盐碱滩上只长盐薹子，深翻了6亩多地，打下口粮只够半年吃，为了饱肚子，我老爹才做小生意的，去年，我祖母病死，欠账三百多元，至今未还清。”

我问：“你复员回家准备干什么？”

“追随牛屁股继续革命呗。”

余干事：“你就不能发展一下资本主义？”

小李笑了：“有可能，说不定比我老爹干的更出色。”

言谈间，已是中午时分，余干事和我起身要走，小李说：“别走了，我宴请二位。”

我见他室内空空如也，以为是戏言，刚迈步出房门，小李拦住余干事：“你们一定要留下来，算我跟你们的告别，我马上去打饭回来。”说罢，他从小橱柜里拿出两只小瓷盆就走了。

我来过几次八连，通常一日三餐都是挤在一间大棚子里，一边是八连的人，一边是来客，几十桌济济一堂，两菜一汤，交了粮票菜金就可以用餐，不论官大官小，一视同仁地站着吃。吃一餐八连的饭真让人经久不忘，白菜萝卜还少油花子。不少人还赞扬，这体现了“好八连”的本色。

小李把菜饭端回来，又从柜里拿出三个小瓶，是他腌制的“私房”菜，有泡黄瓜、大白菜梆子和几个红辣椒。余干事说：“看到了吧，好八连的新生资产阶级就从这几瓶酱菜开始的。”小李又拿出两只鸡蛋，拧开了电炉，支上小锅，做了两个煎鸡蛋，分给我俩一人一个。

我们边吃边聊，小李的话语无拘无束，说：新闻单位像挤牙膏一样，要我们把八连的好人好事说尽说绝，社会看我们八连比大雄宝殿还圣洁，其实虚有其表。干部间为争功摆好，明不争，暗在斗，你掏我一下肚脐眼，我戳你一回脊梁骨；班排也不断地扯皮撒气，相互争宠，小偷小摸时有发生。比如，上个月，三班战士从友邻连队偷回一双解放鞋，人家追到连部，指导员赖账，在一旁的军报记者也捂盖子，批评人家无事生非。这事惊动了师团领导，要连里不得公开

处理，把那个偷鞋的战士交给了我当猪倌，让我监督劳动改造。

“好八连”封闭性的管理，给小李留下一个永远难解的结，他说：“‘好八连’的所谓好，好在它成了大上海的小监狱。”

小李的斗胆直言，我感到了他是质朴感情的回归，余干事更为感慨：“听见了吧，我们小李还是棵修正主义的苗子。”

我们的宣传机器都是党的喉舌，像对小李这样的兵，决不会说成是“好八连”教育不彻底，而一定要强调是上海滩资产阶级残余影响造成的。让小李养猪是用劳动改造人，是让他带上“好八连”的好思想，好作风回归社会。

吃罢饭，余干事马上给我安排了另一个去处：进城去看看五班。

三

为了给来访者看到“好八连”还在南京路上，警备区决定把八连管理最好的五班仍然放在那里供人瞻仰。每天到五班参观的不下百把人，我和余干事来五班住地，这里已远离南京路中心区，在几乎快和乌鲁木齐路接壤的一家商店的楼上，只有一间寝室，一间活动室和起居室，陈设简朴，出操、射击预习都要到附近的公园里去进行。

给我第一印象是，进门一面高大的穿衣镜已糊上旧报纸，临街的窗户紧闭，几乎听不到车水马龙的噪音，还拉上道厚厚的窗帘，房间里白天也要开灯照明。我问余干事：“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与世隔绝？”

余干事说：“这是八连的老规矩，认为照镜子、观街景，都会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要让前来参观的都感受到这里是块一尘不染的无产阶级的前沿阵地。”

五班长来了，小伙子很精悍，我们来之前，他得到连的通知，要他出面接待我们。他带我们看了宿舍，床上被子的折叠、牙具、毛巾、枪支的放列，都严格执行了部队的规定。让参观者看到在军民杂居的条件下，依然能做到军营的整齐划一，人们自然会对八连肃然起敬。

余干事突然给五班长提出问题：“我从你们团报来的材料中，看到有表扬你的，说你为了防止资产阶级的影响，把战士身上的小梳子都收缴了，战士经常梳梳头，有什么不可以？”

五班长像是第一次遇到挑战，挑战人还是自己上级机关的，他红着脸说：“我们上街都戴军帽，梳头没有必要。”

我说：“出操、执勤回来，在家里脱下帽子，来看你们的人又那么多，又有人给你们拍照，总应该让人家梳两下头吧？”

五班长说：“更没有必要，我们都是寸头，时不时掏出梳子在自己头上刮两下，即使不说你有资产阶级爱打扮的习气，让人看了也很不舒服。”

余干事揶揄说：“世风如此，五班长可能是一种‘先进阶级’的管理。”

我问：“战士要买东西或发封信能请假上街吗？”

五班长：“一般都不会准的。”

我又问：“你们楼下就是百货商店，下楼三五分钟买个日用品也不允许？”

五班长：“楼梯口就是营区和外面的分界线，要买东西发个信，等上士或炊事员来送饭时，让他代劳办理。”

“炊事员、上士不也是八连的兵吗？”

“这是连里的规定。”

有逆反心理的余干事贸然来了一句：“陈独秀说过，共产党历来就实施宗教式的统领嘛。”他接着打开了话匣子，“我们警备区领导认为，好八连这个典型就必须完美，不得有任何瑕疵。警备区督促师团的政工干部，一年三百六十天都要围着八连转，每个战士身后都有我们机关的人，可以说，对八连是‘包产到户’、‘责任到人’。我们经常下来和他们同吃同住、交心谈心，确保每一个战士不生‘社会病’，八连好，就是我们的好；八连的荣誉，就是我们的荣誉；我们的升迁都和八连紧紧地连在一起。八连的支部，给我们修理的循规蹈矩，干部们都谨小慎微，绝对听命于我们，稍有异见，马上调离。八连的好，是我们全力挺出来的。”

余干事这番带有针尖麦芒的话，真实的道出了我们政治建军的现实，谁敢不识时务！

四

余干事还给我们讲述起“好八连”执勤以来的大背景：

上海警备区从入城时起，一直保持着战时的编制和体制。它上属南京军区，下辖三个师级单位，在长江口的崇明岛上，有崇明守备区；东海的嵎泗列岛，设嵎泗要塞区；由一个步兵师警备。上海是世界级的国际都会，1300万人口，经济地位又冠于全国，上海市委把抓好城市的安全管理列为第一，当年，共产党是从这里秘密发迹的，历史经验证明，国民党要复辟，也会在这里把地火点起。因此，上海管理的严密，远远超过国民党的保甲制。上海织成的社会安全网，是世界绝无仅有的，从大处说，有三万军队，两万公安干警和数十万民兵协同护卫；小处看，差不多条条街道都有群保组织，负责清查常住人口的社会关系，来往过客的政治背景，大街小巷满是带红袖箍的小脚老太，她们总是用一双阶级斗争的眼睛盯住匆匆的行人。基层工厂学校的保卫部门，手中都有一本公安条例，看守住自己身边的五类分子，管好政治思想出格的人。公安局都要在有人的地方布上便衣，安插线人。从1950年起，毛泽东差不多每年都要来上海小住，一边休闲，一边议政、议军、观测国际风云，还要会见上官云珠，李炳淑等艺人，了解文艺界的“阶级斗争”。上警担负起保卫毛的重任，毛也因有军队的保护更是放心。

军队驻市区，很难做到军事生活的正规养成，出操、训练都没有一块像样的场地。更让领导伤脑筋的是，每个干部和士兵眼里满是花花绿绿的世界，干部花心，战士也花心，生活作风事件屡屡发生，再严格的思想教育也制约不住人的本性。警备区党委下定决心，将市内部队统统移住郊区，用铁丝网圈起来，禁食人间烟火，进行与社会隔离的管理，最初考虑到“好八连”是南京路上的铁骨红心，让他们留下，不会出问题，可人心是肉长的，怎么也顶不住“南京路上的风都是香的”。八连的撤离，向全国人民怎么交代啊？最后，决定放一个班在南京路上做样子，三五月轮换一次，免得新闻媒体说三道四。十多年来，八连只有一个班在南京路上，像座小庙，仅供朝觐。

从五班返回警备区时，路过南京路上的中百公司，余干事指着

这座七层高楼说：

自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全军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动后，八连就和这家第一百货公司结成了“一帮一”的对子。1960年代初，军内外报刊经常有他们之间互动的宣传，主题多半是八连学中百公司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中百学八连的艰苦朴素的思想作风。每次活动，都是我们来导演——安排座谈、互访，或让八连给中百搞些清洁卫生之类的助民劳动，一年顶多搞一两次，主要给各报刊制造镜头。文革开始，全国人民大学解放军，中百公司已是上海的先进集体，我们搞了一次“一对红”的活动。

我们事先把意图告之中百公司党委，党委当然支持，他们早已适应我们的摆弄，只要见到报刊上有他们的事迹和照片，党委们都会心满意足的。

这场活动安排在公司营业的打烊后。参与人员都轻车熟路，公司选的是他们的党团骨干和先进分子，还得有几个上镜头的靓男倩女，时间约在夜间的11点，地点在百货大楼的二层。这里是出售日用百货的，背景架上商品琳琅满目，且场地只能拥挤在一个角落，因公司留下参与的600工作人员，其中有500人要扮演顾客，只有人头的高度攒动，才能显示出熙熙攘攘的繁荣。

八连在郊区搞副业生产，浑身是泥腥味，我们让他们夜间进城，先到师部澡堂洗个澡，换上一身洁净的衣服，到中百公司已是10点半了，我们就在堂厅里给他们解说今晚的演出内容。老兵有历练，来自农村的新兵大都怯镜头，我们就约法三章，要他们听从调度，强调要体现军人姿态，做出规定的动作，让人民解放军的光荣形象永远留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编组后，新兵由老兵带领进入指定的现场，这时，二楼商场华灯齐亮，“顾客”人来人往，八连战士都按分工的方位进入。有的站进柜台，协助售货员售货；有的做搬运、推车、上架，来去匆匆；有的站在楼梯口扶老携幼；有的拎着垃圾袋，清除杂物……另一个摄像组在一个小间里，拍几个女售货员正和几个战士亲切交谈（单独谈是犯忌的）；一个女售货员给五好战士胸前别一枚毛主席的像章；会议室里，一边是八连的干部，一边是中百公司党委，正在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足足闹腾了两个小时。公司党委发给每个战士一个面包，演出才宣告结束。

我们垄断了拍得的照片，军报、军区报刊用都要署上“尚瑾”的笔名，地方报刊还要加上“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供稿”。我们的全部政治工作就是靠吃“好八连”这碗饭，给“好八连”唱颂歌。

我把余干事的这番斗胆直言，一字不漏地记在了我的采访笔记里。

从查歌片到看黄片

——禁欲主义的报复

人祸造成共和国的三年饥馑，三千多万人饿死，高举的“三面红旗”扫地，哀鸿声中，党的大信失坠，在台湾的蒋介石，看到了机遇，叫嚷着要反攻大陆，企望唤起陈胜、吴广们的内应。在这内困外忧的严峻时刻，四百万人民解放军，受命进入紧急战备。我所在的12军移防苏北地区筑城。

黄海海岸是国防的蜂腰部，平坦辽阔，军委认定这里是老蒋首选的登陆场地，指令我12军要在这里建起有纵深火力的永备性防御体系。

这年底，我军5万官兵进入黄海岸边的村头滩地安营扎寨，餐风饮露，夜以继日地进行筑城。

一

任务紧迫繁重，又无文娱生活调剂，仅靠师的电影队每周到各团放一场电影，影片还都是老掉牙的国产片，凡有谈情说爱的，一律被视为对部队有腐蚀作用，连《柳堡的故事》也内定为思想不健康，不得在部队流通。基层的干部和战士都是些年轻人，干活的疲累能承受，生活的苦行就有抱怨情绪，他们唯一的盼望是星期天到附近的城镇逛逛街，看一场香港拍的电影。我们有个团离县城20华里，假日准予进城的，每个班不得超过两人，他们非常珍惜一个月才轮到的机会。获准进城的人，都得由连排干部带队，大早就出发步行，10点钟前进城，一般都能看到早场电影，中午啃着烧饼观览街景，下午一时左右又整队小跑般赶回驻地。香港片是写家庭、爱情和生活

琐事的，富有人情味，战士看得过瘾，他们美名为打了一次“眼祭”。

在战士中还有一种消遣方式，从街头买回些歌片放在口袋里。歌片大小类似四寸照片，一面印制歌词曲，一面是明星的玉照。歌曲有周璇的《天涯歌女》，李丽华的《花好月圆》，白光的《假正经》等几十种，闲暇时，在无人处掏出来哼上几句，再看几眼美丽的情影。战士更喜欢《柳堡的故事》的插曲《九九艳阳天》，描绘的是苏北风情，二妹子模样姣好，能让战士怦然心动（作曲者高如星，为作此歌在文革中遭到批判，肋骨被打断捅进肺里发生癌变，他是听着这首歌告别人世的）。

这正是全党狠抓阶级斗争的时刻，凡是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以这柄利剑斩尽杀绝。军队的各级政治机关把影星们唱郎呀妹呀的，看成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战士对歌片的流连忘返，是在涣散部队斗志，削弱部队战斗力。军区的宣传部更重视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他们向全区基层发出了清缴歌片的指令，还要求各级文化部门到基层去督促彻查工作的进行。

我们文化处迅速做出部署，先在直属队召开现场会试点，把各连的指导员集中到通信连观摩，由直工处长集合部队，要每个战士携带自己的装具和存放在储藏室的提包等个人全部家当，到连部前的小广场打开自己的背包行囊，指定连排干部逐个细查。歌片人人都有，少的十张八张，多的上百张，片刻工夫，搜出了两千多张歌片堆在地当央，由直工处长当众点火焚毁。

处长还当即宣读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最新指示，大讲唱“黄色”歌曲的种种危害。烈焰下，战士们的眼睛里一片茫然。

被搜过的事务长小陈对我发牢骚说：“最好我们都皈依佛法，去当和尚。”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从12军的5万人中搜出歌片40多万张，军区通报表扬了我们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的尖兵。为部队的思想建设筑起一道反修防修的大堤。

改革开放后，世界的先进文化开始涌进国门，我们从反思中惊醒，意识到用阶级斗争清洗战士对美的追求，是干了一件泯灭人性的蠢事。

二

1972年春,我调任《解放军文艺》当编辑。20多年后的1995年,小陈已是我老部队的后勤副部长,还是小有名气的散文作者,他来京送稿顺便看望我。言谈间,说起部队的变迁,他用一句话概括:物极必反,共军已变成了国军。

我不明就里,请他说说原委。

小陈说:“自你们搜缴歌片之后,我们连在清规戒律中生活了好些年,文革时期,反修防修的各种措施,像上百条绳索,把人的思想束缚得更紧。可到了1980年代,改革的大潮摇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阶级斗争淡化了,部队开始冲破思想的牢笼,一些人走进了另一片天地,我只说几件你想不到的事:

“第一件,1990年代初,我们一位连长转业到市里当了公安分局的副科长,他负责扫黄打非,收缴了几屋子的黄色录像带。一些熟练的干部经常去他那里坐坐,每次去都带回几盘黄带,先是连干们看,后扩大到排长,老兵们知道了,都争着要看,连长怕告发,干脆让老兵也一起看。这阵势比起当年战士们欣赏歌片如何?您别以为我说是个案,据我了解,我们的师、团、营干部大都有黄带,他们之间还自由交换。我把部队的这一现状写成篇通讯《禁欲主义的报复》给军报,他们不敢登,说要强调正面教育。

“第二件,部队常年住城市,大街小巷都有美容院、按摩院、酒吧间,干部们去光顾,都有三二百的人民币出手。战士见干部喝花酒,也不甘寂寞,可津贴微薄,三五人就集资包一回小姐。次数多了,无力付账,他们创造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取财办法,一人抱住小姐亲热,另一个就把手伸进她脱下来的衣服口袋,得手后,还装着很大方的有现金支付。既劫了财,又得了色。很快,小姐们都知道是‘共匪’们干的,一帮小姐集结到军队机关的大门前状告。这场热闹让城里人风传开了,争说窑姐向军队讨嫖资的故事,还越编越玄,说军队已包下多少家按摩院。

“第三件,基层如此放浪,军的一些首长就利用权力行事。改革开放后,军师普遍组建了宣传队,招募来一批能说会唱的女兵,名为

丰富部队的文化生活，实为领导提供了性伴侣。一次，柳下惠故乡济南军区的副司令来拜访军首长，一位美艳的女孩子坐在副司令的腿上敬酒。这事是上菜的厨师发现的，故事从厨房传到机关。

“第四件更为离奇：一天，参谋长办公闲暇，推窗眺望，发现隔院通信连女兵宿舍楼前晾衣的铁丝上，搭着十多件花裤衩，参谋长邀来副军长观看，然后两人打赌，谁能把花裤衩主人的姓名说出来，说的少就请吃一桌。两人兴致盎然的各自报出女兵的姓名，但无从判断谁对谁错。参谋长叫来副参谋长，要他去女兵连紧急集合，几分钟之后，女兵们闻听号令，都奔下楼来收取自己的衣服裤衩。最终，参谋长和副军长自己也无法认定谁赢谁输，只是开怀的大笑了一场。

“您别以为这类游戏令人作呕无聊，确实是我军一些高层干部生活腐朽堕落的现状。

“第五件，有的女兵才十七八岁，就被像父辈一样的首长不断地狎昵、猥亵，以至奸污，她们不知所措，感到屈辱，谁敢声张？眼泪往被窝里流。有的写信告诉自己父母，母亲们义愤填膺，来队找首长抗争，有的向地方法院起诉，法官们一听是涉军案件，犯事者都是大校、少将，谁敢立案？母亲们又上军事法院，得到的回答是：‘军事法院不管民事诉讼。’

“我曾经安抚一个受害女兵的母亲，她哽咽地诉说：‘我是戴着红领巾长大的，从小就崇拜解放军，今天他们堕落了，而且还是高级干部，伟大长城的基石啊……’

“第六件：我的一个战友告诉我，他的部队在南方一座大城市开设了三家赌场，领导理直气壮地说：肥水不落外人田，大款们都跑到境外去狂赌，我们把他们的赌资留在国内，又加以保护，上百亿的钱财就不会流走。”

三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如今我军的风貌如何？一些70后、80后退下来的兵告诉我，部队上层的堕落，远不止玩女人，他们花上一百万能买到一个少将。

文革鬻鼓动江淮

——12军安徽军管纪实

文革进入第二年，造反派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实施全面夺权，上海首先掀起“一月风暴”响应。《人民日报》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新飞跃，进入了新阶段，“将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是转折点。好些省的造反派紧随其后，声势越闹越大，变文斗为武斗，纷纷采取武装夺取政权。四川、贵州、湖北、广西，枪声骤起，安徽对立的两派，也在淮南、蚌埠、芜湖、安庆摆开了战场。黑云压城，生产停顿，交通中断。

华东是我国工业生产的重地，几千家急待安徽的煤炭发电，中央军委紧急命令驻苏北的12军入皖全面军管。并任命12军军长李德生兼安徽省军区司令，接管安徽省的军管会。军委又升任李为南京军区副司令，令在安徽的各军兵种驻军，都听命李德生统领。李像当年朝鲜战争出任上甘岭前敌总指挥一样，以战斗的姿态排兵布阵：用属下的第31师，在进入安徽的津浦铁路线上，一个连进驻一个车站，南来北往出入境的客货列车，都要上去一个荷枪实弹的战斗班保护。芜湖到安庆是长江水运的要冲，由第35师把守航道，每艘客货船都派出一个武装排护航。第34师全力集中在淮南煤矿的十个矿区，每个矿放一个营，干部战士都轮班到井下掘煤的掌子面抓革命促生产，确保每天产煤两万吨送往宁沪杭。马鞍山钢铁厂生产的特种钢，是国防工业的急需品，不得须臾停产，从车间到班组都有军人跟班。大别山里给未来战争储存大量战备物资的几百座库洞，是我军的“小三线”，由省军区的独立二师组成几十支警卫分队去看管。城市交通、治安、基层企事业单位新建革委会，均由省军区的独立一师管制。仅几天时间，8万人民解放军遍布安徽城乡，一个士兵管控一个生产大

队，一个班长行政一家千人工厂，佛子岭水库、皖西林场、九华山庙宇、黄山景区都列入了军管，军人无处不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人政权展现在江淮大地上。生产恢复了，交通也通畅了，而社会秩序却无法安然，两大派依旧是枪炮相向。毛泽东有自己的高瞻远瞩，把武斗看成是未来战争的排练场。

一

安徽的武斗，是从1967年元月造反派夺了省委大权开始的。一派认为夺权“好得很”，人称“好派”；一派坚决反对，认为夺权不搞大联合是“好个屁”，人称“屁派”。为了雅俗共赏，各自名为G派和P派。省军区反对夺省委的权，造反派指责他们是保护省委书记李葆华的“一小撮保皇派”。复员军人组成的红卫军冲击省军区，军区抓捕了红卫军头头于得水，刑讯至死，毛泽东震怒，1月21日致信主持军委的林彪，批评“军队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指令他派兵“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把军委以前下达不介入的“五条禁令取消作废”。林彪立即重新制定了8条，命令军队全面介入地方“支农、支工、支左、军管、军训”。四月，中央文革在解决安徽问题上又发出了文件，强调军队支左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得乱抓人……

8月4日，12军部队进入安徽指定的各个地位，李德生率军部住进合肥的园林式宾馆稻香楼。李找来两派头领、革命干部、新闻记者、群众代表座谈，他向与会者宣读了中央对安徽的处理政策，表明12军支左的态度。李说，12军是毛主席派来的（他给大家亮出了毛泽东签署的军委命令）。主席讲，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我们认为，G派、P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不存在革与保，你们必须执行中央的指令，双方放下武器，共同协商建立大联合、“三结合”的新政权。我们保证对G、P两派一碗水端平……

李说的意气风发，以为像对自己部属一样令行禁止。他不懂得，两派的厮打已红了眼，都自认为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渴望自己的枪杆子能打出个新政权，平起平坐就是搞阶级调和。况且，两

派在争斗的战场上已有几百人牺牲，几千人流血，不报仇雪恨，死者不瞑目，生者也无地自容。他们对李德生的口谕根本不予理会，8月8日，两派在合肥又展开了一场浴血的搏斗。

二

傍晚时分，合肥城北突然枪声骤起，我从枪声的密度和使用的枪种判断，相当于营的战斗规模。枪声就是命令，我分管的宣传车即刻出动。政治部和司令部值班人员有二十多人跳上车，车行一路，高音喇叭喊话一路：“我们是6408部队（12军的代号），是毛主席派来的，坚决反对武斗。”

广播车循着枪响方向开到肥河大堤，流弹不停地从我们头顶上嗤嗤掠过。我站立在车厢前头眺望，看到六安路路南一家机关大院楼层的窗口，和路北的市立第六中学的屋顶上，都有沙袋垒成的掩体，射孔内的火舌正在喷吐，相互对射的机枪、自动枪在入暮的天色下，像无数的火绳在空中飞舞。

司令部的刘参谋指挥宣传车开到六安路中央，这一果敢行动迫使双方的枪声稀落了下来。我们跳下了车，进了路南的机关大院。院落很大，已挤满了人，我发现坐在地上的，是些被反绑的学生，一见军人出现在他们面前，都放声哭喊开了：“解放军啊，快救我们，他们要杀人啊！”

我问一个持枪的看守：“他们是哪一派的？”

看守回答：“P派的。”

“你们抓了多少人？”

“一百多吧。”

“怎么处理？”

“带回总部。”

“总部在哪里？”

“合工大。”（合肥工业大学，G派的大本营）

这时，一个头头站立在场地中央发话：“马上撤走，各班看好自己的俘虏，缴的枪都让他们扛上。”

在头头的指挥下，看守从地上拾起散乱的枪支，退下了弹仓的子弹，把枪支挂在俘虏的脖子上。俘虏排着队，在吆喝声中被押出院的南门。

楼上G派的战斗成员，正被我们上去的人三三两两地往下赶，一个小青年扛着挺轻机枪来到我跟前，用手指做了个V字。小青年告诉我：“有人被打死了。”

他带我来到大院的东北角，这里有个石灰坑，坑里浸泡着一具蜷曲的尸体，我让小青年放下枪和我一起各拽一只脚，把死者从坑里拉到坑沿。尸体浑身是石灰浆，白糊糊的，在夜色中，还能辨出是个学生模样。小青年说：“我们G派攻进这座大院，他是被俘后给处决的。”

围观的人告诉我：死者是P派的敢死队员，外号叫小福子。

此时路北枪声又响起，我顾不上处理尸体，领着我们放映队的两个战士奔出大院，穿过马路，跑到了枪响的六中教学楼跟前，屋顶上的枪声停了，有人向下喊话：“解放军同志哟，快救我们！”

这是一幢三层楼房，两头的楼梯间正烧起大火。我近前一看，烧的都是课桌、椅子，我认定是守楼P派搞的防御性措施，自己放的火。我找来根木杆一件件往外掏，两个战士把燃烧的桌椅，用脚往楼前的草地上踢。忙活了一阵，终于掏开了一个通道，我不顾余烬的高温冲上了二楼，二楼没人，又上到三楼，也未见到人影。我仰头向屋顶高喊：“解放军来了，你们都下来！”

稍停，顶层的天窗洞开，探出个脑袋来，说：“我们下不来，还有负伤的。”

我和两个战士拉来几张书桌叠在一起，我爬上天窗，到了屋顶的平台，一伙人都拥过来紧紧地搂住我，感激之情变成了一片呜咽。我安抚了他们一阵，清点人数，一共15人，手中都有枪，其中躺下的三人腿和胳膊负了伤。

我问他们中的一个小头头：“你们守楼的有多少人？”

头头说：“一百多。”

“怎么还剩下你们十几个？”

“他们刚撤走了。”

我这才注意到，他们把一根长长的木头支搭在楼后一棵杨树杈

上，刚才枪响，可能是退路被G派切断，这十几个人才给截留下来的。我马上站到屋顶的边沿向楼下喊话：“门诊部的医生护士快上来，这里有伤员。”

回过头，我和两个战士把能走动的送下天窗，留下一个小青年照顾伤员。我和小青年聊起，他是六中高二学生。他告诉我，他们参加战斗的都是成分好，在毛主席像前宣过誓的。

我问：“为什么都挑成分好的？”

小青年答：“亲不亲，阶级分，成分好的有保卫毛主席的铁骨红心。”

我又问：“誓言有些什么内容？”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抛头颅，洒热血，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

“你们刚才还在喊救命，为什么不打到底，杀身成仁？”

小青年有些发窘，说：“让你们来解救，就是要得到你们的保护，我活下来就是为了再战斗的。”

我在想，年轻人思想如一潭清水，只要有毛泽东思想的激励，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去赴汤蹈火。

医生护士上来包扎了伤员，我们七手八脚地把三个伤员送到楼下，我看了看表，已过9时。返回时，我特意让宣传车从市中心区穿过，合肥最热闹的长江路，见不到车辆和行人，街灯清冷，已是一片萧疏。

三

第二天，我们把两派武斗的战况向李德生作了详尽的汇报。李说，派战打开了，天天都在死人，必须要两派马上交出武器，释放俘虏。他要我们去找两派头头吹风，先礼后兵。

晚上，我随刘参谋来到P派的武斗指挥部，地点在民政局的大院内，总指挥叫程明远，民政局局长，他早在1931年就是合肥县党的书记，红军干部。

P派指挥部警戒森严，我和老刘到达民政局门前，哨兵用手电对我们从脑袋晃到脚下，验明正身才放进大院。在办公楼前，一个彪形大汉在等候，在他引导下，我们走过长长的过道，两侧房间是审

讯室，从一扇虚掩的门能清楚看到审问者在吊打俘虏，殴打声伴着惨叫声撕心裂肺。

我问引导：“你们审问的是些什么人？”

引导说：“昨天俘来的。一般的小萝卜头都关到了农学院，在这里关的都是好派的大头目，程司令要亲自审问。”

“你们这样的吊打不好吧？”

“对这帮人可不能温良恭俭让，他们抓住我们的人，整的还惨，阶级斗争嘛，不能心慈手软。”

我们上到楼的二层阳台，见到一个光头大肚像罗汉般的人物，正躺在席子上摇动着蒲扇，见我们来了，才缓缓地坐起来。他就是程明远，这个当年在鄂豫皖拿大刀片子杀出来的红军战士，现已掌握了P派的百万武装力量。我们刚到 he 跟前，他身后就闪出十多个提着自动枪的卫士，对我们虎视眈眈。程没让人给我们设座，老练地摇动手中的蒲扇一言不发。

老刘蹲下身躯对程说：“程司令，李主任问候您，让我们来传达他对两派的希望和要求。”

程司令很敏感，说：“你们来就是要我们缴枪，是吧？”刘说：“我们不会偏向哪一派，将来会在规定的地点让双方同时放下武器。”

程马上说：“这是李主任的意思，还是中央的指示？”

刘说：“中央早在解决安徽问题的文件中说过了。我来之前，李主任请示了中央，中央要求你们交出武器，释放俘虏。”

程说：“康老表态了吗？”

今年初，程明远首先起来造省委的反被捕，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保护了他，程对康有感恩之心。刘说：“李主任请示过康老，康老同意的。”

程说：“既然中央文革有指示，我们坚决照办。”程又反问：“你们对两派有些什么武器都清楚吗？”

刘说：“我们刚介入支左，确实不清楚，我们可以向你们作出书面保证，如一方留下一枪一弹，我们就要追究领导者，他们必须承担欺骗中央的责任。”

程说：“马上要我们交出武器，可能办不到，我们还要开会研究。”

刘说：“李主任说，只给两派 20 天的期限。”

“同志哥，”程明远带着几分傲气说，“缴枪给你们不光是合肥，我们 P 派要在全省统一行动，那不是件容易的事，下面有数百万人，百万条枪，又分散在 14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要通知，要说服，得有足够的時間去做工作啊。”

程司令当年在鄂豫皖苏区，手下兵力是一支 30 多人的小游击队，如今已雄师百万，武器又精良，他最懂得政权只能来自枪杆子，放下枪杆子，靠吐唾沫夺权，是竹篮子打水。

刘参谋进一步告诉他说：“各县市都有部队的人，我们有统一的部署，统一的行动，下面的工作由我们派人去做。”刘站起身来又说：“就这样定了，我们告辞，请司令保重。”

刘参谋在我们中间都叫他刘铁嘴，在返回的车上，我说：“老刘，你那张嘴起到了一个师的作用。”刘嘿嘿一笑，对这伙人，就是要靠吹靠唬。

地头蛇到底斗不过强龙，一个月后，程明远还在拖着，我们以叛徒罪（他在 1932 年被捕过）把他逮捕下狱。

就在见程明远的第二天，我们又去到 G 派设在合肥工业大学的指挥部。一位分管军事的头头带领我们参观他们的工事。工事地面有，屋顶上有，战斗队员都在工事里严阵以待。头头告诉我，他们的工事都是请复员军人来设置的，每个工事设计费给 50 至 30 元不等。

我吃惊地问：“为什么这样干？G 派人数最多，难道就没有军事人才？”

头头说：“我们参加战斗的成员，以学生为主，还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五类家庭的坚决不用，使用解放干部也是如此，凡有涉嫌走资派的都不启用。”

“那为什么？”

“将来大联合、‘三结合’会处在有利地位。P 派的人大都是政治上不干净的，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出生地富或和国民党沾亲带故的。”

这位唯成分论的头头还告诉我：“G 派在全省五千万人中占多数，新生政权应以我们为主。我们不排除 P 派，吸收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参加大联合、‘三结合’。”

强烈的权力欲促使这位头头不识时务，“三结合”后，造反派的头头大都被逐出领导班子。

1980年代末，有人来京告诉我，这位G派头头在深圳买下不少原始股，已是千万富翁，他敢向身边的人说，修正主义才是我向往的道路。

四

就在合肥“八·八”事件的同时，淮南的两大派数十万人马，在八公山下列阵，决定打一场小淮海。当年谢安和苻坚的淝水之战，就是在这里打响的。

我到淮南时，武斗已停下来，葱郁的八公山看不到草木皆兵，浩荡的淮河上，也不见血流漂杵，这里绿水青山依旧，到处却是一片死寂。

34师师部驻老市委的权力中心洞山镇，接待我的是支左办公室主任李科长和张干事，他俩向我介绍了淮南的情势。

淮南煤矿有10个矿区，分布在150平方公里的一块淮河冲积平原上。文革开始，50万矿工因夺权分成两大派，34师到达淮南之前，大小战斗已打了十余次，就在我来淮南的前三天，两派正集中自己的全部兵力，从洞山到田家庵的十多公里地段上挖壕筑垒，准备展开一场生死决战。师领导分头劝说已不奏效，师长张季伦集合全师一万人，亲自带队插到两派几十万人正待厮杀的阵地前沿，组成一道人墙，一边手摇语录本，一边高喊口号：停止武斗，和平谈判！这场面十分壮观，很具有威慑作用，谁敢开枪射杀解放军呢。两派在我们强大的和平攻势下，撤离了战场。此举还得到中央文革的表扬。

李科长赞扬师长的坚毅果敢，他更欣赏两派的武装力量，建制都是按班排连营团师兵团编成，战斗成员是工人，骨干是复员军人，号令统一，步调一致，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样式。

他要我去见见P派头头张家祥，他原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的侦察排长，复员回到淮南开了家大车店。文革开始，他第一个站出来造市委的反，公安局抓了他，放出来又上北京冲中南海，他用红卫军的旗帜在淮南已聚集了数十万人马，身边有四个精锐的战斗团，依托农村

为根据地，随时准备打进淮南。

张干事对张家祥的看法决然不同于科长，他说：“张家祥匪气十足，他们一伙打砸抢烧淫掠，无恶不作，要是让他们来坐天下，我们就得受二茬罪，吃二遍苦。”

李科长用电话通知了P派，要他们对我做好安全接待，又用他的工作车把我送到长丰县（水家湖），这里是南去合肥，东到蚌埠的铁路交叉点，P派的部指挥就设在县郊的一家拖拉机厂。接待我的是P派总指挥部的李参谋长，他人很瘦小，脸上有枪伤，约50开外的年纪，话语练达，不卑不亢，还保持军人的仪态。让我惊讶的是室内的布置，几乎和我们师作战指挥所一个模样，墙上有巨幅军用地图，图上标识清晰，用红蓝纸条区分出两派的军事分界线，双方防区还注记有番号和兵力。房间的一侧有五部电话通向外界，几个守机的女孩子在记录通话。屋中央七八平米的沙盘内，微缩的地物地貌十分精致。

参谋长把我让到会议桌前坐下来，一位似参谋人员的过来为我沏茶。参谋长自报家门，姓李，原是晋冀鲁豫军区七纵的，和我们12军前身六纵曾在攻打羊山集时并肩作战过。那是1947年，国民党宋瑞珂的整编第六十六师坚守羊山，六纵攻击了三天，伤亡了三千人才爬上羊腰，七纵上来继续往上攻，代价更惨重。这位李参谋长当时是连长，连队给打掉了一半。他形容是踩着遍山的尸体上到羊头的。地上死人的脑袋，像地里长的西瓜，一不留神就让你踏上一脚。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我是敬佩的，1954年，他从副营长的职务上转业来到淮南。他真诚地向我表示：“昨天我为党的事业活下来了，今天我会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身。”“党文化”的传承，让他还存留有一颗忠诚毛泽东的心和坚定的战斗精神。

正说话间，有人来报：“张司令到！”出于礼貌，我随李参谋长到门厅前恭候。

放眼一望，厂门口正跑步过来一支步伐齐整的队伍，都着一身军装，肩挎自动枪，头上戴着俨如钢盔的矿工帽，一到办公楼前就自动分列两旁。张司令出现了，他从侍卫的行列中大步走过来，尾随他身后的的是一个女兵班，人人腰上别有59式手枪，身着灰色军装，红色娘子军模样。张司令来到我面前，参谋长迎上前介绍说：“这位是

6408 部队的首长，从合肥来，是李德生主任派来看望您的。”张家祥威严的脸上现出笑意，伸出的右手只显露出两根指头，他的傲慢让我激灵了一下，我很快恢复常态，伸出手握了握他那中指和食指。他没有谦让就先进了屋。落座后，李参谋长可能见我有些不愉快，忙给张司令做了补白：“刘同志是李德生主任身边的高级参谋，是来了解两派情况的。”我无须辩说，这种虚妄的身份对造反派有着特殊的作用。我马上说：“我带来李德生司令对张司令的问候。”我有意把两位不相称的司令的称谓并列，给对方一种满足感。

张家祥微微起身说：“岂敢岂敢，祝李司令身体健康。”

我开始介绍合肥的武斗，用劝导的口吻，希望淮南两大派都放下武器，听从中央部署，搞好大联合。张家祥没有正面回答我，大讲淮南你死我活武斗的来龙去脉，说 P 派已伤亡好几百人，此仇不报对不起淮南的革命群众，还向他表示，他有决心把 G 派赶出淮南，赶过淮河，政权必须用枪杆子取得。

我来这里仅是观察些感兴趣的人物，没有带来官方解决派性的任务，面对这位眷恋战场的 P 派头头，只是逢场作戏的说说。

我问：“你们将怎样执行中央关于停止武斗的指示？”

张说：“江青同志最近有个讲话，主张文攻武卫，江青的话代表了毛主席，现在阶级不分，阵线也不明，怎么能联合？”

我说：“你们这么打下去，谁也消灭不了谁，后果是什么？”

张提高了嗓门说：“我们不是打了 22 年的战争吗？外打小日本，内打老蒋，后果就是革命者的胜利。我请您转告李主任，淮南炮轰派（G 派）举手投降，我就交出武器。”他那双红红的眼睛里闪出一股杀气。

我又问：“你要打进淮南，你准备出动多少人？”

“四个兵团，一百万人！”

张家祥利令智昏，他在向我吹嘘他握持的军事实力，我再和他对话也无意义。告辞时，我调侃地说：“安徽凤阳出了个朱皇帝，你要是像你老乡一样，中国就归你了。”

“哪能这么说。”他不懂我的揶揄，还谦让地说，“天下永远是毛主席的，我是他的马前卒。”

有评论家说，共产党能冲杀的军事干部，大都出身游民阶层，

张家祥实实在在的就是这一类型。三年解放战争的生生死死，他成了我军的侦察排长，造反半年，混成了十万造反大军的总司令，为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又在奋不顾身。如果他脑袋稍微有些清醒，收敛却步，大联合时，也许有他淮南市革委会副主任的高位，可惜，人心不足蛇吞象，最后走上了断头台。

我在淮南待了两天，到各个矿井去转了转。炮轰派十分注重政治影响，他们的旗号是“抓革命，促生产，一切听从部队的安排。”以此得到了34师官兵上上下下的好感。我看到井上的机械修理车间、发电厂，井下巷道的运输，掌子面的掘煤都有人在生产，军人在跟班，确保了每天两万吨煤的生产。

第三天，刘参谋突然来淮南，他才是真正代表李德生来的，李德生得到淮南武斗的新动向，张家祥已秣马厉兵，即将攻打淮南。去年张率军攻进淮南，洗劫了市委大楼，损失尚小，这次要是打进去，死人多且不说，各个矿出不了煤，华东三省工业停产的后果不堪设想。

李德生派出刘参谋是来劝谕张家祥的，同时要求34师防患于未然。张师长十分警觉，马上调动两个团，在进入淮南的大通矿一线部署了一道阻击P派进攻的防线。

我关注战前的未雨绸缪，跟随刘参谋去了水家湖。

五

这里已呈现出一片出征前繁忙的景象，在火车站的各个附线停车道上，七八列运煤的车皮里已挤满了整装待发的战斗人员，大约有两万来人。车皮里的斗士们，一见军人到来，马上举枪对空鸣放，枪支如一片森林，似在向我们显示力量。

刘参谋令小车开到正待出发的第一列车的轨道前停下来，他跳下车，对着列车上的人高喊：“我是6408部队的刘参谋，我恳求你们通通下车，不要进入淮南！”

坐在车头的张家祥从车上跳下来，指着刘参谋：“你是什么人？敢来堵我的车？”张见我站在刘参谋身后，缓了缓口气说：“我们是回老家闹革命，保证不打第一枪。”

刘说：“你们回去可以，等全省的造反派都交完枪，再回去也不迟。”

“你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战士是不会答应的，我们是给炮轰派赶出来的，要回去恢复自己的家园。”

“不答应也要执行，这是中央的命令！”

“你说的中央不是毛主席的，是刘少奇的。”张态度转为强硬，他转身一挥手：“车开过来，向淮南前进！”

车头喷发出一股白烟，突突叫了两声，拉响了几声尖利的汽笛，车轮启动了，缓缓地从铁轨上碾过来，顶住了我们的小车。刘参谋气急了，喊道：“张家祥，你有本事从我身上碾过去！”他走到小车后的轨道中央躺了下来。

这下把张司令给镇住了，他没想到世间上有比他更不要命的人，猛然间，他恶向胆边生，高喊：“开！压过去！我的命抵你的命！”

刘参谋横躺在轨道上，闭着眼，火车头挤兑了小车两下又停下了，正在这时，李参谋长出现了，见我也在现场，知道刘参谋有来头，知趣地附在张家祥身边一阵耳语，张愤然地走开了。李参谋长过来蹲下身子对刘参谋说：“请起，请起，我们让火车停下来，有话到我们指挥所去说，你是军人，躺下影响不好。”

刘坐起身来说：“那请你们武斗兵团通通下车，列车开到附线，我们不进你的指挥所，就在这里谈。”刘很有心计，这是他和造反派打交道积累的经验。

在李参谋长的张罗下，两万多战斗员骂骂咧咧下了列车，张司令再没出现。

刘告诉李参谋长说：“我们在大通矿部署有两个团，谁先动武，我们就还击谁。”

这话有绝对的威慑力，军人出身的李参谋长懂得，一群乌合之众，是不可能撼动正规军的。李参谋长表示立即罢兵。

刘参谋原是我04团的作战参谋，朝鲜战争历练了他一身是胆，这场淮南的大规模武斗给他单枪匹马制止了。李德生进一步作出部署，交枪的同时，清理两派的坏头头。

当时在全国各地造反派查出的坏人数以万计，淮南的张家祥首先

被清理出来。第二年，军管决定枪毙他时，我特地赶到淮南去看他，为他“送行”。

张被关在田家庵我100团司令部驻地的后院，是团的金干事陪我去见他的，金让看守（团警卫排的班长）把张从小屋里放出来，没有给他带刑具，我和他站在院中央说话。

我观察他身体依然很壮实，没感到死刑对他的威胁。我问他：“你还记得我吗？”

张点了点头。

“你知道自己的下场吗？”

“知道，定了我死罪，已上报中央了，等待吃枪子。”张面对自己的结局很坦然。

“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没有犯罪，我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反的，罪行是他们强加的。”

“我看到了你的罪行，说你在卢桥拖拉机厂抢了十多公斤铂金，枪杀了六条人命。”

“抢铂金是下边人干的，已如数交还了。杀人是在双方枪战中打死的老百姓，谁杀的，不清楚，都算在我的头上了。”

“你的手下还奸污了上百名妇女，是事实吧？”

“吹牛不犯死罪，梁山泊好汉的旗帜是‘替天行道’，我的旗帜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张家祥是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兵，绝不会让我的战士去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是总指挥，你就得承担首要责任。”

“你们怎么说都占理，就是为了要我的命。我告诉你，枪毙我那天，我会高呼毛主席万岁。”

他已视死如归，毛的革命路线把他举向浪尖，现在又跌到谷底。明天，他就要从这个世界消失，我向他挥了挥手算是送别。

第二天，市军管会在大通矿召开临刑前的万人声讨大会。张家祥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被34师警卫连的一个班带到一座石矸子小山跟前，他仍然昂着头，没有下跪，我们的一位警卫排长用枪顶住了他的后脑勺。解放战争中，他的战友大都倒在中原战场，文革的这场

搏斗，他也是在浴血，他得到的不是光荣牺牲，而是对罪犯的处决——排长扣动了扳机，枪声响处，脑浆迸出，张家祥一头栽倒在矸子堆里。

淮南平静了，大联合的权力却集中在军人手里，造反派都回归矿井工厂，他们得到的报酬就是努力干活，高产出煤。

历史不会对张家祥作出真实的结论。40年后，刘参谋对我说，我们是为了淮南的社会安定，不考虑法律程序，杀他是为了儆猴。

六

与此同时，芜湖的两派正打得火热。李德生带着苏参谋去了，他坐一辆苏式吉普车在枪林弹雨中穿行，车头上有好几处弹孔，制止武斗的权威性受到挑战。两派头头都把精力集中在战场，根本不理会李德生上门传达中央的紧急指令和苦口婆心的劝说。实力强大的“三筹处”，把“联总”赶出了芜湖，一万多人去了上海、南京流浪，两千人上北京告状。李德生求助中央，康生出面把军代表和造反派的头头50人召到北京谈判，周恩来到会讲了话，强制两派签署协议，保证“不打架”“不抓人”，被打出芜湖的“联总”由12军保护回城搞大联合。

“联总”要报仇雪恨，集中了一千多人到滁县琅琊山建立了武装训练基地。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葱葱，当年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就在这里写出名篇《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欣赏山清水秀。明朱元璋选择它是做夺取政权的根据地，他从这里练出了精兵打倒了元军。造反派向往历史重演，他们找来一批复员军人担任骨干，在峰回路转的山涧安营扎寨，为杀回芜湖展开了大练兵。

35师师政委赵元昇告诉我，为说服“联总”回芜湖，他们派出了20多人的工作组到琅琊山。令他们惊讶的是，这里真有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的阵势，沿山沟溪边几百座小茅屋，住的战斗组织一律按军队编制，军事管理，三餐野炊，24小时作息的号起号落，射击训练，土工作业，战术演习都有统一的进度。“卧薪尝胆”“杀回老家去”“练兵场就是战场”“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流血牺牲”等巨幅标语，用石灰刷在石壁上。

为迎接工作组到来，他们专为工作组安排了训练成果的汇报表

演。那天，演示场地设置在一条山沟里。第一组出场是几队英姿飒爽的女“战士”，她们用立跪卧三种姿势快速射击山缝或树丛间的人像靶，命中率达90%。第二组为了体现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展示的是在山野战斗的技能，一百多人同时攀缘十多丈高的悬崖。只见他们一手抓住葛藤，贴身绝壁，一手在半空中举枪指向山上的活动靶，枪响靶落，让打过仗的行家们也禁不住拍手叫绝。

最后摆出了营进攻的战术演练：三个连成品字形交替掩护攻击前进，射击、投弹、拼刺动作规范，不亚于部队用郭兴福教学法教练出来的战技水平。

基地头头们骄傲地说，他们已具备打回老家的实力。

工作组赞扬他们的训练成果，是我军名副其实的后备兵员，也推心置腹的劝导他们放下武器，平心静气地坐下谈判，搞好两派大联合。

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开导，“联总”终于有条件地接受了工作组的意见：两派放下武器必须在行动上对等；确保“联总”人人生命安全。回芜湖后，住地由军队派兵24小时保护。接受他们中间热爱解放军的年轻人入伍。

这天晚上，醉翁亭下开起了联欢会，有歌有舞，每个节目都是对伟大领袖的歌颂。女孩子联唱的《心中想念毛泽东》，如泣如诉的歌声，工作组为之动容。一个小青年唱起《红灯记》“狱警传”片段，有板有眼，声音高昂，感情深厚。宣传科长最为感动，招来小青年询问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出身……小青年十分敏感，第二天交来一份他咬破手指写的血书：“参军报国！”

赵政委对这场精心安排的晚会评价说，如果要动员他们上战场去冲锋陷阵，这就是战前最生动思想政治工作。

这支武斗组织在工作组带领下回到芜湖，又在部队的保卫下在大街上示威游行了一圈，他们在P派群众欢呼中得到了满足。

庆幸的是，他们不是用枪炮杀回老家，否则这千把人肯定会抛尸芜湖街头。

李德生从北京回来后，告诉我们，说毛泽东接见了，毛对李和平解决芜湖事件很感动，并教导说：“明其为贼，贼乃可服。”

这是《汉书》上的话，意思是制止了武斗，别忘了阶级斗争，还要向群众公布坏头头的罪恶，群众对党的怨恨才会得到消除。

这正是毛的高明之处。

七

八月下旬，安庆 G 派集结市下属八个县的十万民兵把这座江城团团围住，声言不投降就破城。P 派一边倾城坚守，一边向省军管会告急。李德生迅即组成工作组前往解围。成员有 12 军副政委宋佩璋，副军长李长林，司令部政治部各出一名处长再配上参谋、干事、助理共七人，干事就是我。

李德生召集我们开会告之，安庆武斗大乱难止，两派背后都是军队的人在组织指挥。城郊有十多家大工厂，是海军、空军的军工企业，工人都追随 G 派，手中武器全由军队工厂和人武部供给。G 派庞大的兵力是民兵，班排连营的骨干几乎全是复员军人，总指挥是转业到地方的一个师参谋长，他是经历过抗日战场的老兵。P 派也不弱，它的核心力量是由南京军区第二工程团、军分区独立营，和市民、学生混编成的 20 个战斗营，他们在安庆城内筑起街垒，高楼墙垛都设有工事。这场攻防战要是拉开架式打开来，安庆将是人亡城毁。李德生看到了它的巨大危害，亲自出马，控制住这场正在燃起的战火，从源头给以扑灭。

李德生带领我们赶赴安庆。他在安庆已布下了 12 军的 03 团，他知道，仅靠两千人的武力是镇不住造反派的，反会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所以派出一个高级别的工作组，意图是用组织和行政首先束缚住军队这只看得见的手。

我们工作组一行进入安庆外围的月山，就看到公路上岗哨密布，山头上到处是堑壕和掩体，这里已是 G 派的前线。到了安庆城下，我们进入了 P 派的防区，到处是明碉暗堡，掩体全是用沙袋垒成，战斗员们脸上都布满硝烟，蹲在工事里转动着两只眼睛盯住我们。十多间房屋余烟未烬，像是刚刚战斗过。城门口有几个 P 派的联络员，他们过来查看了我们的车辆，确认了是 12 军的工作组，才热情的引领

我们入城。满街是放置的路障和街垒，我们的车从他们跟前走过时，P派的战斗员都跳出工事，举枪高喊：向6408部队（12军代号）致敬！向6408部队学习！

03团已为我们安排好住地，地点是人去楼空的专区行署。我们还没解开被包，李德生就告诉03团团长，说他马上要见当地友邻驻军领导和两派武斗的总指挥。团长熟悉两派和各家驻军，半个小时就在电话里安排就绪。会见地点设在临江的一座大楼上，那里是两派交火的前沿，团长已派出了警戒，保证来人的安全进出。

我们随李德生来到这座四层楼房。站在楼顶，滚滚长江一览无余，楼下是一条沿江的长街，没有行人，街角街口都是路障，各个住家的楼房窗户里还伸出黑森森的枪口。我陡然间想起60年前（1907），徐锡麟在这里起义，枪杀巡抚恩铭，当时战斗的仅是几百人，如今已是数万武装对峙。我是战争的过来人，知道一场蓄势待发的惨烈战火即将点起，战前的沉寂气氛让人不寒而栗。

找来谈话的头面人物都是单独进行，由团长引领。第一个上来的是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宗书阁。他是李德生的老部下，一见到李忙举手致礼，李像对其他对老部下一样，没有任何客套，开门见山：“我要你来，是要你约束你们在安庆的几家工厂三万多工人，让他们必须执行军队的统一号令，不得和地方造反派搅和在一起，发放的武器立即收回，也不要再支援地方造反派任何物资，这是我代表军委和南京军区给你下达的命令。”

宗副参谋长身材短而圆，他一边擦拭头上的汗珠，一边嗫嗫嚅嚅的承诺：“我做工作，我做工作，坚决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

他深知，李的话如斩钉截铁，不容有回旋的余地，在解放战争攻打大杨湖的恶战中，他的团打得只剩下几十个人，还突不破口子，李德生命令他带上炊事班和能走动的伤员也要突进去。用宗副参谋长的话说，战争就要靠死磕才会有胜利。

李德生又告诉他，“在安庆我派出了领导小组，你都熟悉他们，03团又是你带过的，你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就向他们提出。”

宗副参谋长表示：“我会全力以赴。”

临走，宗副参谋长和我们一一握手，他拍着团长的肩说：“我们

都是老庚（同龄人之间的亲切称呼），有事就关起门来说。”

送走了宗，团长带来东海舰队的后勤部副部长。尽管南京军区管不了他们，一见面，李也是像对宗副参谋长一样，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已瘫痪，许司令给造反派赶进了大别山，军委任命我为军区的领导，又接管安徽省党政军的全权，安庆不能乱，如长江航运中断，华东地区老百姓的吃穿用就要受到严重影响，军委要我明确向你们表示，军工企业不得参与地方造反派的武斗，只能在自己院内闹革命。收缴你们发放的武器，你们必须立即执行。”

这位副部长一边听李的说话，脸上的愁云越聚越密。他也是抗日老兵，虽不是李的老部下，深知在军事首长面前是没有价钱可讲的，最后表示，坚决服从军委决定。

他是下基层巡视工厂的，不想介入派性，蜻蜓点水就开溜，团长约他来，是想给他脖子上套根绳索。他是老后勤出身的部门首长，政治能力远不如宗副参谋长，造反的工人派性一发作，连老爹老娘也不买账。团长说他怎么也有几十年部队斗争的经历，又有来自军委的巨大压力，责任感会驱动他去找出路应对各种困难。

接着 G 派的作战总指挥来了，此人中等个头，40 多岁，粗眉大眼，一股虎气，步态有军人气息。他原是我 20 军 60 师的师参谋长，1960 年代初转业到安庆来当粮食局长的。他身着汗衫，短裤，头戴钢盔，身后还跟一个班的贴身警卫，都携有长短家伙，他一见李德生，不卑不亢的致举手礼。李微微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

总指挥很健谈，告诉李，他是 1940 年在苏北入伍的兵，参加过苏中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眼下安庆市和属下八个县的 G 派民兵都归他指挥，八个县的 P 派都被他统帅的 G 派武装包围，只要他一声令下，指日就可进入安庆城。

李德生平静的借着他的大话问：“你们得了安庆，安徽其他区还有 P 派的几百万人，又有湖北‘三新’、‘三钢’的支持，他们都来对付你，你怎么应对？”

这位总指挥没有品出李德生说话的滋味，仍然高声大气地说：“了不起就三分天下。毛主席就高兴天下大乱，他老人家的斗争哲学是用大乱来达到大治的，我们坚决的紧跟主席革命路线战斗到底。”

李德生说：“你们有人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农民的造反派不得进城是中央的明确规定，谁要不执行，一意孤行，我们就坚决制止。我来这里就是要求你们交出武器，和P派一起解决你们的夺权问题，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没问题。”总指挥表态干脆，“我们的武器已清点好了，说交就交，不会留下一枪一弹的，绝不违抗中央的命令。”看得出他比一般人富有社会阅历。他知道，派战不会持久，收了枪炮他还有个自身的出路问题，李对他单独召见，认为是时运已至。多年来，党内不少人已练出人身依附，就是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总指挥最后说：“只要李司令一视同仁，不偏不倚，我是坚决拥护中央的。”

当他离开时，由我送下楼。他向我表白，人多势众的好派在安庆地区就是放下武器，政治上依然是绝对优势。

楼下街道两旁都是他的警卫分队，显然是担心李德生摆下鸿门宴。见总指挥平安下楼上了指挥车，百多名警卫才放心地爬上了四辆卡车尾随，向东郊飞奔而去。

已到中午时分，安庆军分区宣传科的杜科长来了，他是P派的总司令，轻装简从，只带了个警卫。他一见李德生就掀开衣襟撩起裤腿，露出浑身累累的伤痕，含着泪控诉军分区对他惨无人道的刑讯。李安抚他一阵说，有血债的，我们都要算账的。李问他P派的现状，“你们武斗的力量有多少？”

杜科长答：“有20个战斗组织，13000多人，南京军区的工兵二团3000人和军分区独立营500人是P派最有力的后盾。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P派几乎没有战斗力，比起G派，P派人数上差了一百倍。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是不会轻易放弃武装斗争的。”

李又问：“听说你们的武器还是新式的，谁提供给你们们的？”

杜科长毫不讳言：“我们的武器确实精良，都是武汉‘钢二司’造反派车载船运支援来的，全是汉阳兵工厂制造，有的还没有装备给部队，如57式冲锋枪，1962年出厂的火箭筒，都是最新式的。”

李说：“他们给了你们多少？”

杜说：“我没有计数，都发给了个人，仓库还存放了一批。各县的

P派组织只要提出要枪要炮，我们都给予支持。”杜科长的表述是坦率的。

李告诫他：“军分区抓你是错误的，中央已为你们做了组织纠正，你现在仍是个军人，应听命军委。大联合是中央的大方向，你要让P派放下武器，要是再打下去，想从战场上得到胜利，两派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还首先要问罪于你这样穿军装的人，你要三思。”

杜科长似乎已悟出李谈话中对自己有利的成分，说：“大家坐下来平等的谈判，这是我们P派的共同愿望，有你李主任的支持，我坚决拥护，坚决听从你的命令。”

最后来的是军区工程兵二团政委，李德生直截了当的命令他，马上把工程团撤出安庆市区，支左干部也撤离。政委两眼发直，半晌才说：“我们和P派一直战斗在一起，已亲密无间，再说G派正在攻城，让我们离开，干部战士不会同意，造反派更不会答应。”

李说：“恐怕是你们舍不得，你们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给你们7天时间，撤不走部队，就撤你们团长政委的职。”

政委讪讪地说：“我回去先开个会传达你的指示，再……”

李不由他分说提高了嗓门：“我是军区副司令，我是代表军区向你下达命令。”他缓缓激动的情绪说：“毛主席在处理芜湖问题时教导我，要我公示坏头头的罪行，我不希望看到军队有坏人，你们的派性已陷得很深，再不拔出来，你政委就要承担起违抗中央指示的全部责任。”李又说：“P派的安全由我们03团全力负责，G派已向我作出保证，不再攻城。”

政委无话可说，在威严的顶头上司跟前，他不能不顾及自己的政治生命。他向李表示：“我三天内撤走，不会留下一兵一卒。”

李德生像是在战场上雷厉风行的指挥，抓住了安庆的主要矛盾，制服了两派运筹帷幄穿军装的人。当天晚上，他又风风火火回了合肥，由我们7人小组留下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八

当晚，宋佩璋给我们作出分工，由政治部徐处长带上李助理进

驻 G 派，司令部韩处长带上我到 P 派，任务是监控武斗组织，为收缴武器宣传群众做好舆论准备。

P 派武斗指挥部在百货大楼的顶层，我和韩处长带上自己被卷，住进了他们的隔壁，老韩几乎 24 小时和杜科长形影不离，我就着手处理当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一、验尸。市人民医院存有几具武斗死亡的尸体，法医要我去处理。存放在医院地下室的尸体，大热天，没有冷冻设备，满地浇水降温。房间虽大，一股腐尸味袭来，让我干呕了一阵。我掀开盖布，死者是个年轻人，腐味让人窒息。我向医院工作人员要了一瓶酒，洒在毛巾上把鼻嘴捂住。尸体有两处是子弹洞穿，一处头部，一处胸口，我用手去触动尸体的腹部，轻轻一碰就是一个窟窿。尸检了半个多小时，医生拿来死者登记表，无名无姓，只知他的身份是一名勘探队员。我当即签署火化，骨灰保留。他们已为文化大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往后会有谁来莫祀他们的英雄壮举？

二、遣返战俘。P 派把俘获 G 派的人关在一所小学里，宋佩璋要我找来两派的头头，双方谈妥无条件交换被俘人员。我的任务是把 P 派的俘虏带出城去，换回 G 派的俘虏。我来到已停课做战俘营的一家小学，看到被俘的男男女女关在十几间教室里，有的坐地靠墙，有的躺在书桌上，有伤口疼痛的在不住呻吟。我找到学生模样的战俘营营长，他给了一摞纸的名单，我点了点数，243 人。我把俘虏查看了一遍，有 20 多人腿脚受了枪伤，严重的是骨折裂，有的大腿骨露出，腿肌血肉模糊。我要营长派人把重伤员马上送院，营长怎么也不干，我只好叫来 03 团的一个排自制担架，把 20 多名重伤员抬到市人民医院。余下的两百多人，由我领着，打上一面红十字旗，出城走了三公里，来到一家砖瓦厂，这里是 G 派设置的交换地，他们把战俘关在十几座砖窑里。我清点人数，95 名，凡伤重的，由没负伤的抬着、背着、搀扶着原路回城。刚进入市区，霎时锣鼓、鞭炮齐鸣，欢迎人群的口号声响彻街头巷尾。P 派的几个头头站在台阶上向被俘者发表的慰问词，满口是“血债血还”“战斗到底”的檄文，俘虏们感动得潸然泪下，高呼口号回应。

我没想到头头们在挑起派性，又把仇恨火焰燃起，我马上跳上

台阶，高声对大家劝说：“请造反派战友们一定要冷静，把你们要回来，不是再让你们枪对枪地打下去，是为了和平，不要再计较前嫌了，齐心协力地搞好大联合和‘三结合’……谁胆敢动你们身上一根毫毛，我们人民解放军就和你们战斗在一起……”

大街上的众多亲属战友都围过来安抚俘虏，我也为自己完成一项光荣任务感到欣慰。

三、释放夏司令。安庆军分区夏司令是个老红军，50多岁，已是一头白发，造反派叫他夏白毛，他支持G派，整过杜科长。我们来之之前，P派一支小分队夜袭军分区，把夏司令绑架了，关到一处库房的楼上。宋佩璋已关照过P派放人，要我去接回夏司令。程卫东是安庆一中学生，P派的一号勤务员，由他带领我来到藏人的仓库，路上，我问程卫东：“你今年多大了？”

程答：“18岁了。”

“这么年轻就当上了P派的一把手，除了打仗，你还得管全市的经济、行政、治安，是吧？”

“我可没这么大的本事，都是杜科长在操持。开会我只表个态，讲话稿都由他们拟定。”

“那你不成了傀儡了？”

“不能那么说，杜科长在培养我掌权。”

我又问：“夏司令是老红军，你们为什么要抓他关他？”

程说：“他反对造反，还镇压杜科长。”

小程思想单纯，只会冲冲杀杀，如若权力再分配，肯定不会有人再把他高高举起。

来到仓库的楼上，一间小屋由两个造反派把守。我随程卫东进了门，夏司令一见我就下跪，我赶紧把他扶起。老头白发龙钟，衣冠不整，说话语无伦次，他边哭边说：“我对不起毛主席，罪该万死……”我看他已经糊涂了，劝说了一阵扶他下楼，交给了军分区来接他的一个干部，并关照说：“夏司令回去以后，别上班了，在家休息。”

小程心像是升起一股怜悯之心，说：“先送116医院（驻军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在那里多住些天。”

夏司令走了，程卫东像有准备地对我说：“你看不看我们的战备

物资？”

我说，“你们还有什么物资是战备的？”

他把脚下的一块木地板掀开来：“你看看吧。”

几百平米的地下室堆满米面，我吃惊不小，问：“有多少？”

程说：“有15万斤！”

“你们从哪弄来的？”

“粮食局仓库。”

“谁的主意？”

“杜科长，当年他在大别山打游击，就这么储集战备粮的。”

我住的百货大楼顶层，有个宽敞的阳台，约四十平米，每天晚上，一群来自北京的学生喜欢在这里谈天说地。正是酷暑天，我弄来十几张凉席给他们过夜，一是预防他们挑动武斗，二是想听听他们传播的小道消息。

他们中有北大“东方红”的，清华“井冈山”的，还有“红旗公社”的。这帮人都自称是江青派来的，P派聘他们当了政治顾问，长住不走。我向他们打听全国的武斗情况，一个北大的学生去过重庆，他说，那里已进入了立体战争，除飞机没出动外，兵舰、大炮、坦克都用上了。“815”派追击“反到底”派到丰都，打死打伤几百人。刚从广西来的学生说，广西造反派把俘虏罚跪在南宁街头，掰开他们的嘴当痰盂，让过路人往俘虏嘴里吐痰。一个北京部队“新三军”的成员认为，全国的武斗发端于军队。

这位学生讲述了今年5月13日北京的军队造反派“新三军”“老三军”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大打出手的故事，对我说：“你们有个错误的判断，以为全国武斗是我们北京学生到处煽风点火引起的，其实是军队带的头。毛主席要军队支左，就是支持我们造反派在全国武装夺取政权。”

这个年轻人所言不虚，毛泽东的不断革命，就是要用枪杆子改造世界。

九

10月2日，天未明，安庆长江航运站一个年轻人跑来向我报告，说武汉造反派钢二司送来一船武器，正准备靠岸。听口气年轻人属G派观点的。

我和年轻人来到江岸的大堤上，果然有艘大型登陆舰停在长江的主航道上，舰身有海军军用舰艇D字头编号，尾舱顶上有人正打出旗语。小青年懂行，翻译给我，说对方带的武器量大，是箱装，接船提货要用起吊机。我马上让小青年找来一名会旗语的水手，用缓兵之计告诉对方，说我们正准备接船，要他们停一个小时再靠岸。回过头我立马去见宋佩璋。宋说，让03团去处理，要他们坚决阻止船靠岸。我又赶到03团团长住处通报，团长要派出一个步兵连，我说，最好把炮兵营也拉出去威慑一下对方。团长问我：“这是宋副政委的意见？”

我撒谎说：“我跟他说过，他要你决定。”

“好吧。”团长找来参谋部署。半小时后，12门火炮的炮口高扬在长江的大堤上。我让旗语手警告对方，登陆船如靠近岸边300米，驻军就炮击。

对方接到我们的信息，甲板上出现了一阵混乱，十分钟后，放下了一条小舢板，载上有十多个人向岸边驶来，靠到长江客运的趸船边，我迎过去喊：“你们是哪里来的？”

对方一个中年人答：“武汉‘钢二司’派来的。”

“你们来干什么？”

“支援安庆P派，他们正面临G派攻城。”

我把他一行14人带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他们，“安庆的情势平稳，G派要攻城，有我们保护。谁先挑起武斗，谁就要承担责任！我是驻军代表，绝不允许你们的船靠岸。”

一个带队的中年人说：“我们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别说是解放军，天王老子也管不了我们。”

说罢，中年人把他腰上的手枪拔出，叭的一声扔到我的桌前，几个造反派跟着亮出了匕首，直直地插在桌面上。中年人傲然地说：“这

就是我们的决心。”

这种吓唬人的方式来自电影，纯属土匪的招式，他们以为我被震慑住了。我拿起中年人丢过来的手枪，是57式的，和我佩带的一样，我用拇指压下卡子，枪管给弹簧弹出的一瞬间，我迅速抓住护壳，手一松动，枪给分解了，我把卸下的部件丢到桌上，全过程仅三秒，14个人看我玩枪玩的那么谙熟，个个目瞪口呆，我说，“我打美国人还没用过这么好的武器，你们为什么要拿来打自己的同胞？”

他们中一个年轻人喊开了：“这个解放军是老保，是反毛主席的。”

我说：“革也好，保也好，就不支持杀人。”

中年人见我不好对付，改口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军代表。”

“我们要见你们最高领导。”

我说，“我就代表驻军的最高领导。”

“不对，”站在我身后的P派小头头说，“他们的最高领导是12军的副政委宋佩璋。”我想，他们见不到我们的领导人是不会罢休的，我说，“可以让你们去见见。”我带领一行人来到03团团部。路上，我悄声问一个年轻人：“你们送来多少武器？”

“一千多条枪，三百万发弹药，还有十几门火炮。”小青年毫不避讳。

“谁要你们来支援的？”

“安庆P派已到生死关头，要我们来救急。”

“你们还动用了海军的登陆舰？”

“毛主席让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这是军代表特许的。”

看来，各地的战火纷飞，陆海空三军大都成了造反派的后盾。

来到03团团部，我先安顿他们坐到会议室。我当然不会去找宋副政委，只能让03团领导出面处理。我来到政治处找到政治处主任徐贵，徐给我发火：“我们只管安庆，外来势力你们领导小组不管谁敢管！”我也发火：“这是宋副政委交办的，你不管就去给宋副政委说清楚。”

徐收敛了威风，只得跟随我来到会议室。我介绍：“这是安庆驻军的徐主任，你们有话就对他说。”

跟随来的有几个安庆P派小头头，都见过徐主任，一个头头发话：“他是个团政治处主任，官不大，不管用。”

我马上解释，徐主任是代表宋副政委接见大家的。十几个“钢二司”的造反派起了哄，骂开了解放军在安庆支右不支左。

我陡然想起一个救星来。他是康生的联络员，是康把他派到安徽来收集社会动态的，他原是上海警备区的文化干部，我们同行，又有交情，他调北京新华社后成了康生的耳目，我来安庆前，他告诉过我，有磨不开的事就找他。

我转身出了会议室，到隔壁的办公室向合肥通话，找到了这位联络员，他叫杨××。我向他通报了眼下紧迫的情况，他让我把“钢二司”的头头叫来接电话，我马上到会议室，告诉那位中年人说：“康老的联络员在电话里找你。”

他们不信，我说：“他人在合肥，要和你说话。”

他疑惑地来到办公室拿起话筒，对方声音很大，口气也大，说他请示了康老，要“钢二司”来安庆的人和船全部返回，不得留下一枪一弹。

这位头头从来未遇到这么个代表中央的人打电话提要求。他从对方那种首长口吻判断，不会是假的。他在电话里说，“我们马上开会，把你的意见传达给大家，听中央文革的。”

头头慑服了，放下话筒，转回会议室喊开了：“大家静一静。”等大家平静下来，他说：“刚才康老指示我们马上回去，如果安庆问题不解决，G派还在攻城，我会马上回来。”后面的话是他为自己下台阶添加的。

十几个造反派的气焰受到抑制，叫骂的声音放低了，一个年轻人说：“那我们先不走，就在船上等着。”

我马上说，“请大家相信，我们在处理两派问题上会一碗水端平的。”

他们几个碰了碰头，决定撤离。我又送他们回到江岸。

P派知道了武汉来船被强令返回，把所有的武斗组织都荷枪实弹地集结到大堤上示威。当“钢二司”一伙人上了舢板离岸时，造反派的几千条枪高高举起，对空鸣放送行致意。堤内外响起一片枪声，

大江在震荡，我长出了一口气。

十

宋佩璋看到李德生在解决安庆问题时的擒王效应，一触即发的战争已缓行，他提出马上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为收缴两派武器大造舆论。

我们充分考虑到两派的严重对立，一颗火星子就可能把战火重新燃起，会议组织必须缜密。宋佩璋提出：由03团政委牵头，我和李助理、余参谋等人组成了一个筹备小班子。我们研究决定：

一、03团全体出动担负警戒，维持秩序；

二、对与会的两派群众作出纪律规定，违纪者由头头承担责任，切实管好自己的群众组织；

三、凡是入场的都由支左干部带队；

四、大会由李副军长讲话。

我们找来两派头头宣布我们的决定，强调会议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规定双方不得携带武器入场；不得辱骂、呼喊口号攻击对方；不得散发传单挑动派性……还要求两派头头上台表态，讲话内容将印发全省，上报中央。头头们是敬畏中央文革的，都表示坚决执行我们的一切规定。

李助理勘察了会场场地，精心部署一个营在场外维持秩序，一个营在场内四围警戒，一个营组成丁字形人墙，隔出两派群众听会的位置。

他告诉我说：“但愿安庆从此无枪声。”

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最不愿看到两派的流血厮杀。有一年他回家探亲，陪老妈去了一趟教堂做礼拜，回来后受到组织的警告处分，党员是不允许顶礼膜拜耶稣的。这次，他是本着博爱精神来安庆的。

仅两天，安排就绪。

开会的时间是上午，在低音喇叭播送《东方红》的乐曲中，9时整，

G、P 两派群众组织，各自从东西两个入口处进场到指定位置。李助理特别尽力，手提只半导体喇叭，把 G 派进场的人指挥得秩序井然。最爱找事的 P 派，也老老实实在地听从军代表的号令，没有出现任何骚乱，两派都在显示政治热情和彰显自己的实力，十万人把偌大的广场挤得满满的。

大会 9 时开始，03 团政委主持，他用五分钟讲了开会的宗旨和程序。接着由两派头头上台讲话，他们都是照稿子念，遣词用句十分斟酌，高调地讲团结。各派还推荐了一名革命干部上台讲话，也是照本宣科，用语都是摘自报纸上现成的。轮到李副军长上台了，两派拼命鼓掌，像是在比拼他们对军队支持的热度。足足鼓了三分钟。

李一走上台就敞开心怀，没有一般人讲话的开场白：“我今天来是告诉你们造反派，别再打了，有什么鸡巴好打的。”

我一听心发紧了，安徽人都不懂“鸡巴”是什么意思。场内出现一阵嗡嗡声。

“为什么不把子弹留着去打蒋介石？你们你死我活的打了半年，今天你杀我一坨，明天我杀你一堆，杀来杀去都死光了，你们老子娘靠谁养去……”李副军长满口四川话，安徽人对他的方言似懂非懂。

李助理生怕大会砸锅，跑过来问我，你们怎么不给李副军长准备个讲话稿？余参谋也过来说：“是我忘了。”他转身对主持会议的政委说：“你想法先让副军长的讲话停下来，我们马上想办法。”其实我没有忘，我的注意力在台下，只要 10 万群众和平共处两三小时就是胜利。台上的表态都是些形式。

政委很机敏，他站到李副军长身边对公众插话说：“我们李副军长是老红军，当年他就战斗在鄂豫皖苏区，是全国著名战斗英雄，毛主席接见过他，说他了不起……他是四川人，说话不好懂……”

政委一边打圆场，刘参谋紧急的从他皮包里掏出一摞白纸，就动手起草李的讲话稿，他快速地写了两页开场白，我就快步送到李副军长手里，趁政委还在对群众说话之机，我嘱咐副军长说：“我们正在给你起草话稿，你就照着慢些念。”

要是平时，李会不顾盛大场面大光其火的，这回他已意识到自己说的不对劲，不得不按我们抱佛脚的方式应对自己造成的“危机”。

我和余参谋你一言我一句凑句子，几句话就写出一页纸，我就不停地往李副军长那里送。他的嗓门大，念的一字一顿，很有气势。

我们心中有个大纲，先让他讲中央精神，强调毛泽东对安徽问题的关切，第二层意思，就说我们6408部队（12军）保证贯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端平一碗水，要求安庆的两大派放下武器，通过谈判促进新生政权的建立。

尽管李副军长念稿不成章法，群众知道副军长是老红军、工农干部，也都能平心静气的倾听。他一气念了我们写的五十多页讲话稿，念完还赢得阵阵热烈的掌声。

大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结束，从此，我对余参谋的智慧很是赞赏，改称他余高参。

把打得分外眼红的两大派集合在一起，平平地和地相处了两个小时，成效迅速显现，群众对军队增强了信任，坚持打下去的两派头头，受到舆论的抑制。我们得出一条经验：要争取主动，就得学会掌握群众，运动群众。

会后，武斗降温，却没有平静，两派依然在对峙，枪声天天有。

十一

安庆下属太湖县的P派，从造反开始就势单力薄，他们想在大连中中得到对等的席位，利用夜间突袭进城，包围了支持G派的人武部，抢走了全部枪支。人武部告急，驻G派的军代表徐处长，马上从03团抽出一个连，由他带去太湖。P派见军队压境，仓皇逃离，徐带着连队一直追到湖北的宿松，打死打伤二十多人。徐回到安庆就向宋汇报，我们也去听会，随同徐处长征讨的李助理放声大哭，他阻止自己连队开枪，徐处长骂他，说他同情反革命。我们的韩处长当着宋佩璋的面也指责徐，说他不该动用军队力量去武力干预，杀伤了这么多人，破坏了大好形势。徐说，两派已有口头协议，必须执行令行禁止，谁乱来我就镇压谁。

我们争执了半夜，用徐的名义向李德生发报，说这次镇压行动是天经地义的，李当即回电，说，这简直是乱弹琴。我和韩回到住地，

韩说，看来又要大打了，我们管不住了，让老徐一个人去擦屁股。

一天清晨，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起，我迅速赶到现场。这里是城外，激战双方之间有一道高高的土埂，都利用埂里埂外楼房的窗户为依托对射。这时，我见到一个身着军装的人，正站在土埂上高喊：“你们打吧，朝我开枪！”

他的军装已撩开，袒露出了胸膛。我从声音听出他是李助理，我放声喊他：“老李，你不要命啦，快下来！”

他不理会我，继续高声呼喊：“你们谁有种，就朝我这里打！”

两边的射手们像是被他的行动镇住了，枪声稀落下来，我不顾一切地爬上了土埂，拽住他往下拉，他怎么也不干，我连推带搯才把他弄下来。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哭开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打死这么多人谁知道？”我劝了一阵，他听不进，大骂中央出了坏人。我怕他骂娘的话给造反派听见，叫来两个战士，把他送到行署领导小组的住地，让他把心里话给宋佩璋说去。

我分别找两派的前线指挥调查，双方都不承认自己打的第一枪，我发出警告说：“我还要查，查出谁，谁得承担责任。”

晚上，我去领导小组驻地看望李助理，他躺在宋副政委的床上，见了，两眼愣愣的，我在他眼里仿佛成了陌生人。我连叫他几声都没回应，眼珠子一动不动，身体是僵直的。我出得外间来，宋佩璋正在和合肥通话，他在向军管委汇报今天的武斗情况，等他放下电话，我才问：“李助理怎么啦？”

宋沉静了好一阵才说：“他不能留在安庆，马上回合肥住院去。”

在一旁的余参谋在我身边悄声说：“他精神失常了。不吃不喝，还尿在裤裆里。”

我心里一沉，说：“他经历过朝鲜战争，眼前死几个人就承受不起了？”

余参谋说：“他从不杀生，见到死人几天几夜都不安宁。”

十分钟后，一辆救护车来了，车上有一组医护人员，七脚八手把李助理料理上车。他躺在车里的担架上，我给他拉了拉手，算是告别。

后来，我回到合肥去看望他，他人瘦了一圈，语言正常了。他告诉我：组织上已决定让他转业，他选择去贵州山区，他的小舅在那

里种植药材，他的后半生可以用药济世。

宋副政委很有耐心，穿梭似的找两派头头谈话，可相互的兵戎摩擦还是没有停止。我突发奇想，组织第三势力。我找来了以五纺兵团为首的13个和G、P两派不同观点造反组织的头头开会，他们属下有七八万人，知识分子多，要他们甩开两派先联合。这当然不现实。

我在会上谴责两派的讲话，很快传给了G、P两派的头头，他们都来找宋副政委，指责我在釜底抽薪，破坏文化大革命，要我向两派公开检讨，否则他们联合宣布我为“不受欢迎的人”。宋批评我事先不请示，让领导小组处在被动地位。我说，我惹了祸，做了错事，我马上撤离。宋当即同意。

第2天，我离开了安庆，回到合肥。

十二

10月下旬，李德生部署缴枪行动，两派武斗组织，在统一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向当地驻军交出全部武器。我们在全省21个市，57个县收缴了20多万条枪、数十门炮，弹药以亿万发计。热兵器的武斗得到平息。

一场动乱后需要持久的社会稳定，省军管会根据中央精神，发布“清理阶级队伍”的命令。指出，武斗期间，社会沉渣泛起，它将危害新生政权，必须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各机关团体、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和造反组织，都要从自己内部揪出坏人，凡是打砸抢的，杀人放火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有反动思想言行又出身不好的，都得认真清理。仅半月之内，全省揪出各类“反动分子”十多人，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专案组甄别。该管制的、该发配的、该判刑的、该绑赴刑场枪决的，都要及时处置。

12月的一天，我到合肥市省的体育场去看公审大会，十多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押到后台，一个青年犯人被推下囚车就高喊：“冤枉，我没有罪！”几个战士跳下车把他摁在地下，一个公安上来掰开犯人的嘴，另一个公安从口袋里掏出把钳子，伸到犯人嘴里夹住舌头，拉了出来，又从口袋里掏出根像筷子粗的竹签子，从舌头中间猛插下去，

钳子松了，舌头给别在嘴唇外，鲜血不住地滴。犯人怎么挣扎也动弹不得，只能从喉管里发出呜呜的吼声，接着三个战士他拽起来连推带拉拥到主席台前和 50 多个犯人跪在一起。

公检法的军代表通过高音喇叭宣布了 13 个犯人的罪行，会场上响起震天般的口号声，接着有两个群众代表讲话，都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公审会开了一个半小时，13 个犯人用 13 辆卡车拉着游街示众。然后又拉到东郊的刑场领刑。枪毙人是公开的，一人头上打进一颗子弹，暴尸三日。“反属”来领尸，还要交付一毛五的子弹费。

后来我打听到，给锁喉的犯人是地主家庭出身，罪行是攻击林副主席，说他秃头斜眉，像个奸臣。

到了 1968 年春，“现行反革命”杀得差不多了，又从劳改农场、工厂矿山的劳改队和监狱清出一批关了十多年的“老反革命”。中央强调，阶级斗争的弦要绷紧，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国各省每月都要杀一批，保持镇压势头是最有效的稳定社会。

一次，我因正在筹建“万岁馆”有事要请示李德生，他正在公检法大楼开会。我跑去那里碰见了好朋友李练恒，他是公检法办公室主任，他把我带到会议室，在座的 12 个军人都是公检部门的头头，我都熟识。李德生坐在首席，面前放列一摞卷宗，手里拿本小册子，正在发话。李练恒告诉我，李主任今天来这里，要由他来决定明天该杀些什么人。他面前的档案，是我们清出来的，有 30 多份，都是准备二月份要杀的。李主任是来做最后的审定，只要他同意，我们就执行了。

此时，我看到他翻着手中的小册子，口中念念有词，——×××当过保长，思想反动，又调戏过妇女，可以杀。

李又翻开一页，×××是书记长，罪恶不大嘛，是不是留一留，放到下个月再议。

李用手指放在嘴唇上沾了一下唾沫，又翻开了一页，×××当过乡长，破坏统购统销，还贪污公款，这人也可以杀；

×××地主，反攻倒算，搞过敲诈，可以杀……

李练恒悄声告诉我，他们在全省管的犯人有 20 多万人，都是国

民党的残渣余孽。在白湖的劳改农场，就关了七万犯人，他去挑选过三百多可杀的供每月上报做备用。

我问李练恒：“你们每月上报多少？”

“三十多。”

“你们杀人的程序就这么简单，为什么不让法院来审理呢？”

“我们公检法是三家一块牌子，一统天下，过去监督、审理、判决有分工，现在全由我们军队决定，李主任来只是复核，省人省事。”

李德生给上刑场的人验明正身，是他每月例行的公事，差不多用了个把小时就圈点完了，这才掉过头问坐在他身边的公检法革委主任张铭法（张是34师的政治部主任，去年介入公检法军管的），李说：“一共多少了？”

张主任记着数，回答：“有23名了。”

李又问：“浙江这个月杀多少？”

“27个。”

“江苏多少？”

“25个。”

“够了，我们不要去超过人家，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执行死刑的23人的名字都公布在《安徽日报》的头版下角，罪名是统一的：“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清仓式的月月杀“反革命”，是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体现专政的威慑力，要让人们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李德生仅是提朱砂笔画勾的。

云南回族的恩仇

——14军血洗沙甸乡

《炎黄春秋》2007年7月号刊载《骇人听闻的云南沙甸惨案》一文，作者周康，是参与惨案善后处理的地方干部，不足4000字的文章只是简述了事件的经过，对惨案的骇闻，仅用几句话带过，也许作者至今还心存余悸。因制造这一惨案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当地第14军的一支部队，发布镇压命令的又是复出主持军委的邓小平。任何人、任何新闻单位要揭露“伟大长城”的丑恶，历来为天条所不容。这一事件在国内外多有风传，我的听闻来自参与者，算得上半个知情人。出于良知，我不揣冒昧，给周康先生的文章补叙一笔，只求给这段历史再除却一层积垢。

一

沙甸惨案发生的时间是1975年7月29日。这年9月，昆明军区文化部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邀请《解放军文艺》光临，编辑部派我去昆明。《解放军文艺》在这一历史时期得天独厚，被奉为专政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教育阵地。全国数十家文学期刊大都因“滑进了修正主义泥潭”（毛泽东语）停刊，专业作家成了“牛鬼蛇神”（北京作家浩然例外，钦准他可以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扶持军队的业余作者担当时代大任，便成了我军各级文化部门和我们编辑部的神圣使命。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这是毛泽东教导的。这一时期的军队青年作家，大多是从文学学习班里生产出来的。每次学习班的开办，我们都要十分认真地从部队基层挑选出思想红、作风好、能提笔的

苗子，政治上还得要求没有地富反坏右或“走资派”家庭的牵累。这些半路“出家”的年轻人，都有着满腔的豪情，为写出一篇作品使出吃奶的劲，掉下十斤肉也在所不惜，他们渴望冲上《解放军文艺》，只要发表一篇，接踵而来的殊荣就是立功受奖、入党提干，一生的命运由此改变（总政有两位副主任就是沿着这条道路从士兵升到上将的）。

在突出政治的年代，从一个文学青年到革命作家，用不着多么艰辛的跋涉。有“师父”引路，有政治保障，成长之路简便快捷。我们有一套最基本的“育人”办法，用毛泽东的语录作引子，让作者在语录下套进一个自己亲闻亲见的故事。比如，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就让作者找来一个专门利人的人和事写成故事。又如，“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就让作者找来十件八件好事堆到一个人身上，编织成作品。我们学习班制造的报告文学、小说、散文大都是短小的千字文（一个观点、一个人、一件事），政治立场鲜明（今人称之为形象地图解毛泽东思想）。那些年，我们差不多年年如法炮制。在全国独此一家的《解放军文艺》，从1966年发行15万册，到1975年上升到120万册。

我们还带业余作者到韶山、井冈山、延安写出了《红太阳颂》《井冈山颂》《延安颂》等豪情万丈的专集发给部队，成了红彤彤年代全军广大干部战士阅读的“马太福音”。

不是我故意扯远了话题，这些背景不言说，是无法解读沙甸惨案迄今还不能公之于世的原因。

二

昆明军区文艺创作学习班的宗旨是“高举”“紧跟”，歌颂我军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中涌现的好人好事。比如，云南少数民族有26个，军队支左是怎样执行民族政策的；对机关、学校、厂矿、企业是怎样一碗水端平，支左不支派的；对来自边防的作者，则要求他们着重反映戍边部队是如何打击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的。

学习班第一个动作是在作者动笔之前，由组织者进行题材把关。先让学员开怀大讲自己支左的经历或见闻，他们来自第一线，收罗了

一肚子的奇闻逸事，我们编辑部要求题材具有“伟大、光荣、正确”的品位，故事要新鲜，最好是闻所未闻；主题思想要高，阶级斗争的弦要绷紧。一人讲完了，让大家公议，先是政审，符不符合“三突出”“三过硬”；再看故事的生动性，能否形成一篇作品；如果不足，大家应出以公心，给英雄人物设计，思想境界在哪里闪光，该说些什么像样的豪言壮语。

当作者写出一稿二稿之后，再由大家献上自己生活中的积累，帮助添枝加叶，涂彩贴金，力求英雄人物高大完美。最后由主持人组织文笔优秀的作者深加工之后，才送到我们手上做出用或不用的决定。上品，就带回编辑部发表；次品，由军区自己出集子。

我们如此的“创造性”，是把千百年来的人们对文学艺术的个体劳动，改变为合作化生产模式，还看成是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化的一场革命。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绝不能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只有形象地演绎它，才能体现“为工农兵所有”，“为工农兵所用”的最高指示精神。

在学习班大摆题材的过程中，一个来自丽江边防部队的指导员说，我有一个尖锐的题材。在大家惊奇的目光下，他讲述他们连三班在执行夜间巡逻时，是怎样在江边的竹林里，抓住刘少奇的女儿带着丈夫、老公公准备偷越国境的事。他们还从老公公的内裤里搜出一份缅甸地图。审问时，对方怎么也不肯露身份，只要求和省革委会主任周兴通话。第二天，省革委会要我们派车押送他们到昆明。好久，才从昆明传来话说，我们抓的是刘少奇的女儿（可能是刘平平）。

故事就这么简单，大家要他讲细些，没有了，主持人发亮的眼睛顿时失去了光泽，叹着气说，一个头号“走资派”的女儿叛国，是震动世界的新闻。可惜，可惜，没枝没叶的，要构成一千字的文艺通讯都不成，算了吧。

接下来轮到住招远的14军的一位师炮兵营教导员发言，他唯唯诺诺地问了一句：“我讲的是一个负面题材。”他看了看大家，又看了看主持人，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个月前，我们军出动了一个步兵团和五个炮营，在沙甸镇压了一场反革命暴乱，

打死打伤敌人 1300 多人……”

“你别说了。”主持人带着惊恐的声音制止，一脸严肃地说，“军区早就打过招呼，这个事件不准公布。如果被帝国主义搞到手，拿出来宣传，我们要犯大错误的。往后谁也别再提了。”

会场气氛一下僵冷下来，教导员红着脸低下了头。

文革近十年，我走南闯北，风闻军队镇压造反的事年年有，通常只是枪杀几个人、十几人、几十人，打死上百人的仅发生在四川、安徽。这位教导员爆料一千多人，真是新闻中的骇闻。它不但震撼我的心灵，甚至还让我怀疑它的真实性。晚饭后，我约他到营区外散步，请他给我讲述他没讲出来的故事。

三

沙甸是蒙自县鸡街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地处丘陵，1500 多户人家 7200 多人分布在 8 个自然村，是回民的聚居地。文革开始，公社和县的造反派把这里回族群众的信仰当“四旧”来破除，关闭了清真寺，焚烧了可兰经。一些坚持礼拜真主的回族同胞遭到关押、凌辱、吊打或扫地出门，14 人被整死，160 人被打残。为了生存，回族同胞组织了造反兵团抗争。

文革第二年，全省各地的造反派形成了两大派，一派叫“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八派），另一派叫“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简称炮派），最初两派各自通过游行示威、喊口号、贴大字报，以文斗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革命宗旨。很快，两派间的对立，发展到拳脚相向，动刀动枪，武斗蔓延全省。时任省革委会主任的是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出面表态，认定八派是革命组织，炮派是保守组织。支左的部队倒向了八派，参与八派在全省追穷寇，围剿炮派的活动。沙甸造反派一直受八派打压，他们自然站到炮派一边来保护自己。

屋漏又逢连阴雨，沙甸周边的几个县市参加炮派的干部，被当地的八派追打得无立锥之地，有 500 多人跑到沙甸躲起来，他们看好这里是避难之所。早在 1969 年，因为这里因的造反派整死整伤了一百多人，中央就关注过沙甸，作出过批示，并要求军队和造反派认

真执行民族政策。因此回民的信仰又得到保护，这 500 干部多数是回民，他们以为沙甸是自己活命的保护伞。

那年月，国家法令、政策约束不了地方当权者的，红河州的县市革命委出面，有军队的支持，强制沙甸造反派交出这些干部。遭到拒绝后，14 军派出一个营进村搜捕，抓走了干部，还把沙甸 1000 多名回族同胞五花大绑，给每人脖子上挂块“反革命”的牌子，拉到蒙自街头示众。

1970 年 12 月 17 日，谭甫仁被暗杀后，周兴当上了省革委会主任，他十分重视沙甸地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指示蒙自革委会，一是要成立鸡街地区民兵指挥部，监控沙甸“回民支队”；二是要军队派出一个团包围沙甸。沙甸回民也不示弱，筑壕封路对抗，双方展开枪战。支援沙甸的炮派，在附近的县市摆开了战场。枪声惊动了中央，中央责令云南省革委率红河州、玉溪、建水、文山、蒙自等州市县革委和沙甸民兵代表等 34 人到京，听候中央裁决。

代表们是 1975 年 2 月 17 日到北京的，中央要省革委会协商自我解决问题。会开了三个月，为谁是革命的、谁不是革命的天天扯皮，省市县革委都是穿军装的，他们站在八派一边压炮派，说炮派保皇，首先要低头认罪。炮派代表说我们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你们划线站队是错误的，首先是你们应认罪。中央看到省革委断不了阅墙事，再拖下去武斗会继续烽起，对中央不利，决定快刀斩乱麻，由王洪文率陈锡联、华国锋等十多位中央领导人集体到会，端平一碗水。王洪文严厉批评了双方的派性，宣布：军队撤离包围，双方都交出武器，取缔武斗组织，三个月内成立新结合领导班子。

四

省市革委会代表回到云南，八派各级组织不接受中央的决定，他们认为革与保势不两立，和炮派绝不能平起平坐，无法组成领导班子。省革委会又不敢公开检讨，发出的自我批评，只是在省市革委会的几个头头中传阅。蒙自的八派组织更加我行我素，喊出：中央决定是修正主义货色，我们才是真正的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派，阶级斗争是

你死我活的，八派不取得胜利决不收兵！

14军执行中央决定收缴武器的指示，派出一个营去收缴沙甸民兵组织的武器，遭到拒绝。沙甸民兵说，要交两派一起交，惨痛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沙甸民兵组织不信任军队，省市革委的掌权人都是拿枪的，从未对他们有过公正，八派打击炮派，军队暗中出谋划策，还提供武器，现在要他们手无寸铁，坚决不答应，沙甸的数千群众把部队一个营轰出了村。双方战火重新燃起。

中央闻讯，紧急召唤省市革委会和两派代表再次进京，由中央作出强制性的规定：双方立即一枪一弹不留地交出全部武器，拆除工事，解放军必须进村，谁不执行，以反革命论罪。回民代表马伯华，当即表示拥护中央决定。

回民代表一行十多人回到蒙自，刚一下车，数以千计的八派群众把他们团团包围，用事先准备的剖开的十多个猪头，全扣在代表的头上，拉着在大街上游行。

一个温良的民族自尊遭到如此的伤害，最柔弱的人也会以生命来反抗的。代表们放回村后，他们不是承诺动员收缴武器，而是发动大家去抢夺人武部和军用仓库的枪支弹药，几天时间得到各种枪支一千余支，实力大增，就在村边地里挖出了环形堑壕，设置盖沟、暗堡，屋顶也垒起了机枪掩体，做出一场有模有样的战场准备。

如果当时14军冷静些，想到对方还是人民，用循循善诱的思想政治工作去打动对方，让双方坐下来，后面的那场惨剧就不可能发生，而此时此刻，几部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围着村子转，24小时喊话不断：不缴枪投降，死路一条！并宣传省市革委会缉拿反革命的通令！

省革委会一把手周兴，正重病缠身，念念不忘这场斗争，他派出大员来到鸡街观察了两天，就匆匆向中央报告，政治解决已无可能了，请求中央批准14军消灭这股“政治土匪”。

周兴是何许人？战争年代，他和邓发、康生、李克农等人并列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主要负责人。周兴一生的事业就是杀人。他在30年代初期的中央苏区，就担任江西省人民保卫局执行部长，和杀人魔王李韶九一起，干掉莫须有的“AB团”10万人。长征中，他是一军团

保卫局副局长（局长罗瑞卿），对畏缩不前、开小差的，都由他就地处决。为了军队行动不泄密，对不能行动的伤病员也由他斩尽杀绝。到了陕甘宁，他是边区保安处长，整风运动中，他抓了“特嫌”5000多人。四方面军溃散后，几十名高级将领流浪到陕北保安，在毛的指令下，他把许世友、王近安等17人关押审讯。解放后，又与罗瑞卿配伍，出任公安部副部长，清除“地富反坏”竭尽全力。有人说他头上的顶子是血染红的。眼下镇压一个回民造反派的小组织对他来说，不但是小菜一碟，而且名正言顺。

周兴把镇反报告送到中央，正赶上“开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复出。在1975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二中全会上，决定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让位给了邓。党政军的要职都集中到邓一人手里。这是邓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政治巅峰时期。他一上台，马上抓全军、全国软懒散的整顿。

邓接到周兴报告，无须商量，当即批准由14军派出部队攻打“土围子”。

五

14军干部战士已深深地陷入当地的派性。文革以来，他们一直站在八派一边，视炮派为敌人。军队是开打战铺的，时下有中央的批准，军委的命令，周兴的坐镇指挥，这支部队自上而下掀起一股“同仇敌忾”的士气。甩开膀子干，既能扬军威，又能出恶气。

7月29日，一个步兵团进入战斗准备地位，对沙甸等8个自然村实施包围。在解放战争中，14军的军师团指挥员都是逐鹿中原的干将，他们对小小沙甸的“回民支队”根本不放在眼里，以为打几枪放上几炮，“敌人”就会乖乖地缴枪投降。没想到为捍卫自己宗教的尊严，沙甸人人视死如归。一个现代化的步兵团强攻了一天，竟遭到殊死的抵抗，付出了几十人的伤亡的代价还没进村，这是他们在国内战争中很少遇到的惨重伤亡。指挥员打红了眼，迅速调来师属炮兵团参战，火炮口径为122榴炮、76野炮和120重迫击炮，都是苏式装备，威力超过二战中美军的兵器配置。

战场报复是8月1日凌晨开始的。48门大炮瞬时发出雷鸣电闪，千百发弹丸撕心裂肺地穿越夜空，霎时间沙甸八个村子外围的山头上滚滚浓烟卷起，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天际，大地在颤抖，树林、土块、人的肢体伴着腾起的烟柱，在空中翻舞。

第一次急袭是15分钟，炮弹翻开的新土火星闪烁。炮火刚停，十多辆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又响起，

“快投降吧，不投降就等死吧！”“反戈一击，立功受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

不多会，在褐色的土层中响起炒爆豆般的枪声，回民的几挺机枪又复活了，它告诉入侵者，安拉的子民是不会屈服的。

第二次急袭10分钟，被犁开的山头上，密集的弹坑像是人头上的痼疾，还击的枪声哑了，但是没见到一面白旗。火炮开始转移，射向各个村边的壕沟、地堡。直射火炮瞄准村中建筑物上的掩体，一炮一个，直打到工事荡然无存。火炮停止了射击，步兵突击分队开始向村里接敌运动。

进攻的步兵没有炮兵幸运，村子里不断响起狙击的枪声。士兵们第一次打战、训练场上那种进攻战斗队形没有了，都拱在班长身后浑身战栗，再也不敢前行。

攻击受阻，团长呼叫炮火支援，炮群指挥员犹豫了，把几千发炮弹砸向居民区，七千人生命顿时会成一摊肉泥。他请示，周兴拍板：我们是在镇压，哪怕片瓦无存，绝不能右倾！

上千发炮弹直泻6个村子，瞬间房屋一片片轰然塌下，火海中人们哭喊着，叫骂着奔向村外庄稼地。攻击的步兵像是在围猎，机枪步枪的火舌扫向如蚁般逃跑的人群，一时间，尸横遍野。

沙甸村最大，有600多户人家，中弹也最多，整个村子已夷为平地。附近的田心、车百尼、新寨、大庄、茂克等都只有一二百户，也是一片残墙断壁，满目的死尸和伤者，在曦光中构出一幅惨烈的图景。

先头步兵进村，和残存的民兵展开逐户逐房的争夺，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冲锋枪声响至中午时分才停歇。幸存的受伤的回民们在瓦砾中呼喊、叫骂，战士上去就是一枪，让他们去了天国。

狗不叫了，鸡不鸣了，村庄死了。

后续部队涌进村子开始打扫战场，救助伤者，抬走死者。

一个活下来的妇女，突然从坍塌的房屋跃出，用砖头把一个战士的脑袋拍得脑浆迸裂……

一个连队的卫生员，从排水沟里救出一个八九岁的被打断腿的孩子，在背他到包扎所的路上，小家伙从身上抽出一把匕首，插进了卫生员的脖子……

一个老太太，浑身血污，横躺在自家的残破的门槛上，紧闭双眼，副团长上去扶她，她一把拽住副团长的衣襟，拉响了自己怀里的手榴弹……

生命不息，斗争不止。

每个村边的空地上，摆满了尸体。

14军的领导来到现场，指示每具死尸用五丈白布包裹火化，不得外传，受伤的送部队医院。

部队历来善于把丧事办成喜事。参加平暴的连队，进行了个人和集体的评功授奖，大摆庆宴。

此时14军领导，慈心大发，命令参战部队都放下枪，集中到沙甸大队安营扎寨，为回民同胞重建家园。

六

半年后，幸存者从医院支着拐杖、坐着轮椅归来，见到列祖列宗留下的陈年老屋没有了，布满在废墟上的是数以百幢的崭新瓦房，房舍宽敞耀眼，屋前屋后牛圈鸡笼齐全。街头巷尾铺上沥青，地已秋播，全由部队包干，每家每户都发放了慰问金，救济粮。

伤残的回民们望着眼前的一切，一张张木讷的，涂满泪水的脸上，突然间释放出一片呜咽，声震山野。

10年后，云南炮派的大头目，我军参加第一届全国英模大会的女战斗英雄涂勋，来京找我。文革中，她遭到八派的追捕，坐了5年牢，她此次晋京是找门路向中央申诉。她向我叙述了炮派的遭遇和沙甸惨案之后，她心底像是积累多年的岩浆迸发：“人民的军队为什么要屠杀自己的人民？！”

军人·女人·糖衣炮弹

——我军性事面面观

1949年，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城市的社会秩序由12军实施军事管制。

工商业很快得到恢复，山城的风貌依然花团锦簇，香风习习。从山沟沟里走来的老军们，一见重庆的女娃儿标致，心荡神摇，物欲泛起，纷纷打发了小脚的、不识字的、脸上有皱纹的老妻，换得年轻貌美有文化的新妇。一时间，老干携少妻，双双出入商店、戏院、公园、餐馆，其乐融融。老百姓厌恶当今的陈世美，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最为恼怒。他认为，抛弃糟糠之妻的干部是思想堕落、作风腐化，是资产阶级的俘虏。他把城市比作大染缸，把城里的女人比作糖衣炮弹。为了“防糖弹、拒腐蚀”，他抓住了“张、唐事件”作典型，向全区干部敲响了警钟。

一

“张、唐事件”的张，是张柯岗，12军宣传部部长；唐是唐平铸，12军政治部副主任。张把自己的小脚老婆换成随军名记者曾克，唐把没文化的发妻休了，娶了个大学生。他俩都是军队的高级政工干部，邓拿张、唐开刀示众对全军最具有震慑力。与此同时，12军还有48位师团级干部给老婆换了届，都遭到了同样严厉的惩治。

12军召开党委扩大会批斗张、唐二人，批斗会上，有人哼起刚在部队传唱的一首歌：什么最可怕？享乐又腐化，什么最可怕？骄傲又自大，什么最可怕？功臣自居、自私自利，到处抓一把……这首歌是张柯岗写的词，时乐蒙谱的曲，批判者哼罢，指着张柯岗问：歌词

是不是你自己在批判自己，柯岗辩解说，我不是腐化，我只是改变了自己的爱情观念。

当时，老军们对自己的婚姻离异，就像在撤换战斗不力的部属，无须通过法律的诉求，仅向上一级的组织部门备个案，然后给女方所在的区、乡、县政府发封函，凭借军队的大章和本人职务，没人敢站出来说不。

最不服气的是张柯岗，我是他的部属，见面就发牢骚，说毛泽东不要贺子珍，找了江青，连组织手续都没有。邓小平找的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厂老板的女儿，成分那么高，自己批准自己，我们为什么就该当刀头肉？

张柯岗的不满遭到了邓小平更为严厉的处置——脱下他的军装，打发到重庆市文联爬格子。

邓小平还把“张、唐事件”提到了巩固政权的高度。他责令军区所属的文工团队，大演《李自成进京》以教育部队。这出戏的剧情来自郭沫若一家之言的《甲申三百年祭》，说闯王率大顺军攻进北京，不为江山为美人，因为死活爱上了陈圆圆，把刚到手的新政权很快丢失。今人考证，说李自成的失败是因为一场鼠疫使大顺军丧失了战斗力。

当初邓的目的是借古喻今告诫部队，要是像李自成一样为女人而败落，就会退回太行山打游击。在他的倡导下，由中共中央作出部署，在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腐学习运动，从600万人民解放军中清理出数以千计被糖衣炮弹“击中”的干部。我记得，我们的一位副师长持不同“政”见，在一次批判会上放声大骂：怎么怪糖衣炮弹呢？都是你偷鸡摸狗的，管不住自己的鸡巴，瞎戳乱戳，自作自受！

二

无情的斗争是我军教育人的一贯方式。我参加过好几次反腐的批斗会。那时，我刚从军干校毕业，分配到师野战医院当文化教员，教导员很器重我，每次党支部开会批斗“腐化”干部，都要扩大我参加做记录。在我的记忆里最让人惊心动魄的一次批斗，是一对男女

护士暗恋引发的(当时团级以上干部、年满28岁才有资格恋爱结婚,她俩都是副连待遇)。一天晚上,他俩在护理值班室幽会,关了灯,一群好事捉奸的“志愿者”待机破门而入。亮灯一看,只见他俩在床沿上正襟危坐,丝毫看不出有任何床上动作。

捉奸的都是些老资格,绝不愿无功而退,为了取证,她们不由分说把女护士摁在床上,拔掉裤子,脱下裤衩,拿到批斗会上用手电筒照着给大家展示。一个很有成就感的老护士还喊着:“大家都好好看看,裤衩上有块精斑!”是真是假谁也无法判定。此时,与会的群情激昂,口号声起,高呼:“要老实交代!”“回头是岸!”“不交代滑不过去!”上台批判的人无不破口大骂:“不要脸!”“丢人!”“破鞋!”……

我的心灵震颤了,他俩的命运很可能是开除军籍、党籍或是降级降职(护士降下来做护理员)。幸运的是,掌握政策的教导员手下留情,别看他主持会批的调门高,处分却很轻,俩人都给了党内警告处分。

“防糖弹”教育,在全军上下产生了巨大的威力,人人都感到自危。医院的女同胞多,我和她们都熟识,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从不单独和她们中的谁多说几句,若有事要交谈,也一定要找个正直的党员陪着做见证。我处处注意监督男女作风的积极分子,她们都和我的关系不错,经常如数家珍地告诉我,女同胞中的种种风流轶闻,如谁有主了,谁正待字闺中等待组织分配,谁曾因腐化受过什么处分,有多少干部住院是来“点秋香”的……

战斗部队对男女之事的的管理更是严格,授受不亲成了他们的戒律。我调到总政之后,文革结束,信访处老李给我讲了他正着手处理的一件怪事:一对来总政上访的中年男女,早年是同乡、同学,抗日战争又一起参军,入伍后天各一方,1951年在北京重逢,相约到颐和园一游,两人正坐在树下叙旧,过来两名北京市军管会的执勤士兵,将他俩带走,经军事法庭审讯,认定他俩坐在树荫下有说有笑是作风不正,一直收押到文革才结束。他俩申诉说,凭什么关我们20多年?青春年华谁来弥补?总政领导批示,发回原单位处理。原单位只能恢复他俩副连级,可他们的战友已是师团职务了,而他俩的命运是复员回乡务农。

在城市，霓虹灯下的哨兵们拒绝女人身上散发的香气，硬要说成是资产阶级腐蚀军人的毒雾。执勤战士要是多看了女人几眼，在晚上的班务会上，准会受到大家的严厉批评。重庆街头有个战士巡逻，见一对男女勾腰搭背，他端枪上去用刺刀挑开两人依偎的身躯，还骂人家是资产阶级的腐化作风！

三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所在的12军入朝参战，“性”闻开始国际化。

杀鸡儆猴是我军最令人生畏的纪律处分。比如，我们进入朝鲜作战之前，一个在国内解放战争中获得战斗英雄称号的连长，因对女房东强奸未遂，在万人誓师大会上当众枪毙。入朝行军，部队大都宿住朝鲜人家里，凡是对朝鲜妇女动手动脚的，一律就地处决。我还参与破获过一起案件，一个工兵连连长来住院，趁月黑风高，奸杀了我们的一个护士。临刑前，警卫连的战士让他自己挖好坑，要他躺下试试长短宽窄，问他合不合适，枪毙时，让他跪在坑边，排长用20响点着他脑袋说：记住，二世为好人。枪响，脑浆像散花一样迸出，排长一脚把他蹬进坑里。

军纪严酷无情，却难以制服与生俱来的本能。我们在朝鲜作战一年，常和朝鲜群众朝夕相处，饮食男女之事屡屡发生。军法不再用杀人警示，把犯罪一词也更名为生活作风错误，处罚他们通常是放到机关的挑夫班、师的担架连、团的运输队，以苦力代刑罚。当兵三年，老母猪当貂蝉。军人的性饥渴无法抑制，全军腐化已逾千人（有的是班、排集体作业），法罚更难责众，凡属通奸的，都交给本单位组织和行政酌处。

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失利，我们是一支有5万人的军，伤亡近半，很快从四川补来两万翻身农民，我们这些入伍已两年又经历战争考验的学生兵，从机关、后勤抽调到连队充当战斗骨干，我到炮团山炮连任见习排长。

团长是用大刀片子杀出来的红军干部，他的外名叫老锤子，人正直无私，就是满口脏话，念念不忘女人。入朝前，因抛弃老妻把他

从副师长降下来的，新婚的女孩惧怕战争，别他而去。团长三天两头向组织科要女人，组织科从医院给他找来个护理员小纪。小纪是重庆人，和我一起参军的。开初，组织科找她，以入党提干为饵，她一听说团长是犯错误的，又没文化，年纪已47岁，怎么也不答应，师政委动了大驾，左劝右说，要她工农化，压服了小纪，小纪提出交换条件，不干护理，政委马上拍板，调炮团当民运干事。

婚后的小纪，心情不快，见我就数落团长，说他动作粗野，张口就骂人，在全团大会上讲话都带性，什么屌鸡巴、操他娘之类的。团长还有个特点，开党委会也要讲荤故事。他讲的都会在全团流传，其中有一个故事流传最广——

抗日战争中，他已是连长，他们连的卫生员，喜欢给住地的大闺女、小媳妇看病，总说人家下身发臭是长了蛆。姑娘们不谙事，吓的要求他给治病，他要女孩子把裤子脱了，说能把蛆掏出来，然后他也脱了裤子，拔出他的宝贝就径直往里捅，捅了一阵，拔出来给女孩子看，我已经给你把蛆捣烂了。这事让小媳妇知道了，人家都懂，有人报给了村妇女主任，妇女主任要大家抓骗子。她们逮住卫生员，也拔下他的裤子，妇女主任找来把剪刀，正准备剪下他的宝贝，村长知道了，赶来制止，妇女们仍气不过，找来几条麻绳，把卫生员的小鸡子系上，提溜着送到了连里。故事有挑逗性，成了大家经久不衰的龙门阵。

四

我在炮兵连还兼任团支部的副书记（支部书记是副指导员，他是党支部分工的青年委员）团支部经常要处理几个小鸡子不老实的人。

我们连的驾驶员都是专业的，给他们组成了驾驶班，便于生活和思想的管理。班长是党员，没有驾车的技能，他手下有五个兵，都是从俘虏国民党兵中挑选出来的，在档案上称为解放战士，党的组织很难吸收他们，只发展了两名团员。他们日常生活自由散漫，经常出差拉物资弹药，一出去就是三五天，沿途都住宿朝鲜老乡家。朝鲜人家的青壮男人大都上了前线，老人妇女就守家种地，我们这帮驾驶兵就乘虚而入（在朝鲜几乎所有的志愿军汽车兵都深知此道），他们

先从车上取下些食品或日用小百货之类的，送给房东青年妇女博得欢心，仅一夜间就能得手。

驾驶班每次出勤在外，班长负责捉奸，回来就报给副指导员，副指导员通常交给我处理。最初，我们把犯事的捆起来批斗，不认账的就吊在树上逼供，批判者说到激愤时，还允许他上去挥动拳脚。后来师团明令禁止体罚，我们也不再捆绑打人。但批判如何严，处理如何宽，都由我掌握。如驾驶员小罗，屡抓屡犯，斗得他成了块橡皮，大家气不过，一致要开除他的团籍，我坚持留团察看，开除人举手就通过，可人家一辈子也翻不了身。

我的宽容出现了成效，回国后处理他复员，我送他去车站，临别时，小罗流下了泪。他家在蚌埠，1967年我到安徽“支左”，专程去拜访他，他已是一家千人大厂的党委副书记，作为革命干部最先解放出来主持工作，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夫人是厂的制图员，热情贤惠，我们两人对往事都羞于提起，我感悟的是，用恩义焕发出的社会责任感正在回报社会。

我当时的心境虽然是组织性高于一切，但对待这帮人还是一手软一手硬的，爱恨交织，多了几分人情。

我们连的炊事员小陈，四川人，团员，是翻身农民参军的，他的女房东是朝鲜人民军排长的妻子，我们发现女房东的肚子大了，才知道是小陈搞的。我找小陈谈话，他认错，诚恳的表示，愿意接受团组织的任何处分，他要求我千万让女人把孩子生下来，复员了，他会来接他们到四川去。他天真又荒诞的愿望，我在批斗会上给截留了，讲开了对他极为不利。他犯的事，不但涉及朝鲜地方，还牵动朝鲜人民军，必须会同双方相关的部门一起来处理。我到团机关找到小纪，她是民运干事，是专和地方打交道的。

我来到她的办公室——朝鲜人家的炕上，也是她夫妇睡觉的地方，团长也在，正坐在炕上抽烟，满屋烟气，他一见我就骂：“你们的破屌事，天天找上门，干脆把朝鲜女人都弄回四川慢慢搞去。”

“四川人怎么啦？四川人得罪你啦！我不是给你搞了吗！”小纪肝火陡地升起，以团长惯用的粗话反击。团长不敢反抗，灰溜溜地走开了，这是全团他唯一惧怕的人。

我在电话里已给小纪汇报过小陈的事，她让我坐下来，说，“按师的规定，搞一个朝鲜妇女应赔偿 300 斤高粱米，可人家肚子里的也是人啊？我看应给 600 斤。再就是一定要让那个朝鲜女人离开你们住地，回她娘家去，一则是避开了小陈，也免得你们连的人闲言碎语。我还要去找里（村）委员长，不能让她回去后受到当地群众的歧视。”

我告诉小纪：“小陈一直惦记着孩子下地，怎么办？”

小纪说：“小陈像个男人，还有点情义，孩子生出来，他是带不走的。这事我去做工作，你回去要帮助小陈放下包袱，还要告诉你们连里，再增加 200 斤高粱米，一共 800 斤，就说给女的搬家用的。”

小纪的安排具体周到，我感到小纪成熟了，更感谢她对小陈的怜悯。我回到连，如数把 800 斤高粱米送到里委员会。

大约三个月后，小纪打电话来，要我再带些吃的去慰问那个妇女。小纪说：“她已生了个男孩，她的丈夫不要她了，当地政府对她不好，不给口粮配给。”

我向指导员做了汇报，把小纪说的都说成是团长说的。

第二天，我用车拉上 500 斤高粱米和 200 斤大米，还有几箱罐头和副食，跑了 50 多公里，到了她娘家住的村子见了她，见了孩子。孩子未足月，已没有奶水，靠吃苞米糊糊，瘦瘦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女人脸清瘦，灰色，显得忧郁，有气无力地向我哭诉，说乡亲们疏远了她，骂她，政府不管，吃的粮食少，要配些薯叶和苞米茎。她要求见小陈一面，让小陈看看孩子，她不知该怎么生活。我无法回答她，只是安慰她一阵，亲了一下“中朝友谊的结晶”就走了。回来的路上，心里沉沉的，我一直在想，战争给了她的痛苦，男人又增添了她的痛苦。如今，亲人们又让她痛不欲生，她已面临生死存亡，谁还能说她是颗糖衣炮弹呢！

我还要说一件司务长老冯的“异事”：他是山西人，老婆来信告诉他，说梦见他回家了，她已怀了孕。他拿着信给我看，问：你说说，我媳妇做个梦就肚子大了，这事可能吗？我不能跟他较真，他脾气躁，只对他讲，可能，古时候，老子他妈就是做梦才有了老子的，给中国生出了大圣人。老冯听了半信半疑。过了几个月，她媳妇来信报喜说，生啦，是个男孩。老冯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说，管他妈谁的种，只要叫爸爸就行。

五

战争让女人走开，我们还用刺刀剥离了女人的爱。

这事发生在朝鲜战争的后期，在我们和美二师对峙的日子里，营的兽医老丁留在后方看管牲口，有时，他跟随牲口送弹药来到我们连的阵地看望我，会亲热地聊上一阵。他知识面宽，懂英语，我们和美俘聊天，他当翻译，朝鲜话也流利，我们之间很有交情。

留守处离阵地不到 30 公里，他来阵地请示或办事，只需大半天的路程，他却要走上三四天。有人发现了他的秘密，在他的路途中，有户朝鲜母女，女儿是江原道（省）文工团的团员，老丁一来二去，都要在她家歇歇脚。女文工团员很有魅力，吸引了老丁，两人相识相知相爱，十天半月就相会。这事被营长知道了，把老丁臭骂了一顿，处理他却很难，老丁是起义军官，不是党员，即使撤了职，全营几十匹牲口的伤病谁来料理？女文工团员也知道老丁触动了红线，她是见过世面的女人，竟只身跑去见了我们的师政委，斗胆地提出，她爱老丁至死不渝，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这连彭德怀总司令都不会答应的问题，终不能如她所愿。

年底，我军换防，在撤出阵地之前，营长把我找去交代，要我带一个班，提前把老丁押到后方休整地再作处理。我到了留守处，收缴了老丁佩戴的手枪可尔特，这是我在战场上拾得送给他的，并通知他，部队马上转移，明天一早你跟随我先出发。老丁明白是领导的用意，坦然说，我不会违反纪律，更不会叛变革命，我只有一个请求，让我和她见一面。我同情老丁，在友情和纪律之间，当然坚守我的职责。我严肃地对他说，我劝你还是死了你的心吧，我不可能放走你。

其实，我心中无数，那女人能量大，可能有了我们即将离开的信息。

入夜，那女文工团员果然来了，哨兵堵住了她，班长来向我报告，我思量再三，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不能把事做绝，应给他网开一面。我告诉班长，要哨兵放行，一切责任由我来担承。最担心的是怕发生意外，我要全班通宵达旦地在全村巡视。

战争改变了人的常态，恐惧会使人精神分裂，善良的会变得暴戾，有人自伤，有人逃逸，有人报复。我还想起在医院批斗的那两位老护士，

入朝一上战场，就双双投向了敌人的营垒。这一夜，我辗转反侧。

第二天一大早，老丁拎着背包来了，他脸色灰黄，两眼红红的，显得十分疲惫，他俩相拥一夜，也许山盟海誓，做过种种抉择，我感到莫大欣慰的是，他终于回到我们的队列。我赶紧让战士把他的行装放到牲口驮上，给他一张热乎乎的大饼和一壶水，他没有接，没有言语，只迈动他沉重的双腿。一路上，他耷拉着头行军，宿营任他独处，一日三餐，按病号饭做好给他送去。一天晚上，他刚睡下，我给他端去一盆洗脚水，还帮他挑了脚上的水泡，涂上了碘酒，他绷紧的脸上松弛了，还出现了一丝笑意，我看到开导他的机会来了。我说：“老丁，我就睡在这里吧，说说话。”他没拒绝。

我躺下来，还没来得及及开口，他却先敞开了心扉，像一股拥塞已久的山泉开始奔泻。

“刘老弟，”这是他对我的尊称，“你才20岁，我在你这个年纪已混闯江湖，参加过青帮、贩过烟土、开过赌场。我家传的兽医本事，胡宗南天下第一军炮团聘我当了兽医主任。我在国民党军队里有的是难兄难弟，我的为人义气第一，谁犯了法，我给包住；动刀动枪打群架的，都听我调停；要开小差，我给出路费；有人要报复，我会帮助他杀人。老弟啊，我的事，我想通了，你仅是拦阻我的一张铁丝网，我不会责怪你，也不会伤害你，你还有明天，阴功积德，胜造七级浮屠，你别以为我是旧军人旧意识，人藏在心里的正气都是一样的。”

这番话，我听得心都快跳出胸膛。他有丰富的世俗经历，人生哲学却是反动的，我崇信党的教育，我的纯正受到挑战，已无法和他殊途同归，我气的无语以对。

到了谷山休整地，他很快被遣送回国。一去茫茫无消息，人消失了，他的爱也消失了，半个世纪之后，我渐渐走出阶级斗争的围城，念及老丁，生发出一种深深的歉疚之情。

我们的营长在处理老丁事件时，很像圣人。回国后他进了高级炮校深造，新婚夫人是个大学生，她常带同学来家坐坐，营长心花了，看中了一位谈吐不俗的女孩子，不断让妻子送书给她看，送着送着，书里夹上示爱的字条。有一次，夫人在无意中拆开了包书皮，发现了纸条，忽如晴天霹雳，她闹到校党委，学校交给了原部队处理。营长

毕业归队，当副团长的任命搁下了。我私下对他有个结论：“糖衣炮弹是营长自己引爆的！”

六

军队男女艳事，红军时期就有轶闻。

在中央苏区，湘赣省委书记×××，被怀疑是AB团的主要成员，遭到保卫局的关押审讯。此时，刚上任湘赣军区司令和赣西南特委两人合谋，要在书记老婆身上寻欢一回。他俩翻墙进屋，书记的老婆不乐意，他俩硬是扒光她的衣服，轮流采花。书记解脱回来，闻听此事，不要老婆了，老婆闹到临时中央，中央找来犯事的两人协商，用抓阄决定女人的归属，最后由特委委员抓到。这是组织抓阄的保卫局长记下的一则日记。

还有，某司令的秘书告诉我，在解放战争中，该司令率领的纵队在中原某县稍事休整，司令有一双慧眼，看中地主房东秀色可餐的女儿，白天眉来眼去，夜里爬上绣楼和她睡在一起。警卫员急了，报告给政委，政委跑到楼下仰着脖子叫阵，骂司令败坏军纪，司令正在兴头上，不睬不理，政委要警卫员搬走梯子，司令气呼呼地从楼上跳下来骂他：“你当政委的，就会管我的屁事！”

文革开始，军区文工团造反派抄了司令的家，把他藏在马桶里的避孕套抄出展览，有一千多只。

七

邓小平最讨厌自己部下搞女人，在他心底早就埋下一颗记恨的种子。他的第一任老婆金维映，就是给李维汉搞走的。1933年，邓在中央苏区任中心县委书记，国民党打进来，他溜了号，丢了两座县城，中央党务委员兼书记李维汉组织大会小会，批判邓的逃跑主义，撤了他的职，下放到农村薅秧搭谷子。李见金维映守空房，机会难得，跑去和金睡在一个被窝里。一天，妇女干部危秀英去找金办事，一推门见她正和李维汉赤条条的在床上翻滚，吓得她一身是汗，跑出来找到

蔡畅，蔡是苏区的妇女部长，她马上封住了危秀英的嘴，要她千万别再声张，说出去坏了党的名声。李维汉是中央领导，金维映是县委书记，这么大的官在胡搞，会在苏区造成爆炸性新闻。危秀英一直隐忍了几十年，直到邓去世，一位邓的传记作者采访她时，才说了这个故事。

1952年，邓调到中央出任组织部部长后，在处理高干们的腐化事件上，更能说明他的心境。

曾率领我军驰骋中原的另一位司令，故事更为传奇。该司令一生爱枪、爱马、爱女人，他收藏的十多支小手枪，大都是德意日军工生产的精品；他从红军时期当连长起，就从战场缴获中挑选骏马，一匹阿拉伯的纯种马，从鄂豫皖一直伴随他走到大西南；他爱的女人也数不清，我是从多年跟随他的人那里记下了他几则花花故事。

1948年10月，他带领5个旅逐鹿中原，攻打襄樊，他先夺城后攻山，歼敌两万，活捉了国民党15绥靖司令康泽。

在炮火隆隆声中，他不忘亲近女人。进城后部队还在肃清残敌，诸事要他亲自处理，他却放手交给了参谋长，自己带上作战处长过江到樊城去听人说书。他慕名的说书女人，很有几分姿色，嘴也巧，让司令入了迷。处长几次催他回去，他要处长给他买来烧饼，一直听到太阳落山，把他爱慕之情释放完了，才返回驻地。

他回师路过河南信阳，当地的豫剧团慰问部队，司令看中了三个俏美的女演员，坚持要她们参军。剧团团长死活不干，哀求司令高抬贵手，说，我的百十人的生存就靠这几根台柱子支撑，你们把人弄走了，我的一个团就散架了，老总啊，要钱我们给，人是我们的命，不能带走啊！后来，政委杜义德出面干预才罢休。

1949年10月，进驻湖北沙市，准备向大西南进军，一天，司令把他属下的军师两级干部召到一起，不是开会，而是要他们去逛窑子。30多位高干们一听都傻了眼，咧开了嘴。司令说了就得照办，谁敢不遵？

沙市有条窑子街，现代人叫红灯区，那时记者对这种行业称之为“无烟工业”。做窑户的人家门前都挂有一盏红灯笼做标志，老嫖客一眼就能从灯笼的大小式样分辨出它的等级。当司令领着一大群军队的高干来到这条已经冷落多时的街道时，行人都停下来用惊奇的目光

注视着共产党的老总们，以为他们是来“扫黄打非”的。

司令领头，每到一窑户的门前，他一脚踹开房门，然后指着跟来的一位师干说，你进去。他又走到第二家踢门，又呼叫×××，你进去。再到第三家踢开门说，该你了。几十家窑户都安排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师两级的将领。进去的人，绝不是蜻蜓点水的应付了事，他们都得坐下来和窑姐攀谈，问问这，说说那，谁也不会上床试水，他们都有共同的担心，从窑户出来要面对王司令的考问，答不上答不好，都要受到训斥。

司令站在大街中央，他等待诸将出来说说心得体会，来一个就问一个，怎么样？领教了吗？

回答是各式各样的，绝没有一个正儿八经地说什么“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之类的大词，谁要是把见到的女人说的俏皮逗人，表述得荤荤的，司令最爱听。

自从淮海渡江战役之后，我们这帮老总们，从未有这么轻松过，有人说，女人是战争的润滑剂，司令也许是在性饥渴中找到的一种释放方式。

此时此刻，不近女人的邓小平，正在郑州发表声东击西的演说，告诉胡宗南，刘邓大军入川要翻越秦岭。

司令进四川后，暗恋刚从国军接收过来的京剧团演员玉翠蓉。每到礼拜天就要这位演员到他家洗澡。他让警卫员把水烧好，支上脚盆（四川人洗澡用的大木盆）倒上热水，玉翠蓉在里边洗浴，司令在外边通过门缝往里窥视。警卫员火了，踢盆打墙地乱叫（那些年，警卫员很有党性，敢在党的小组会上批评首长的作风）。司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欣赏而已。后来他当了公安部副部长，权势炙人，性天地宽阔，两年间搞了几十个女人，最终发配到河南的一家农场看管苹果园。

战友的指责，严厉的处分，没有让司令放弃他的爱，他把年轻的保姆带到了农场。文革前，把他改良品种的苹果拉了几卡车上北京，让老部下给他推销，在小保姆的陪伴下，走家串户，谈笑风生，毫无赧颜，他像永远生活在春天里。

八

战争年代，对一般干部性的管制，只能是严防死守，对老军们，则是建立些有效的调解机制。

部队一停下来休整，组织科的第一要务，是让家属连马不停蹄地赶到休整地，稍有怠慢，老军们就骂娘，老子大头没掉，小头就得享受。

所谓家属连，不属部队的建制序列，它是由组织科把师团干部的家属编成班、排，进行集体管理，安全，有警卫排保护，吃、住、行，由后勤配大车，配粮配物，还有医护人员随同治疗伤病或接生。部队来来回回地在中原拉锯，她们就尾随大军流动，全部身心都是为自己男人的性服务。

有一回，部队在滑县休整，家属连因洪水受阻，一个团参谋长的老婆只身先到，她是坐老乡的筏子过河徒步来的，参谋长不在，正下部队检查工作。几个团干心生妒意，商量，你等不及要先上炕，我们先治治你的骚货。几个人把她诳到一间屋里，扒下她的裤子，露出“骚货”，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壶冷水，直往她阴户里灌进去，每人轮流，嘴里还念说：我来敬你一壶。直到壶水灌完，几个老总像得到快感样的享受，才兴高采烈地撒手而去。参谋长回来怒火中烧，向师党委状告，师长说：谁教你老婆抢先到，人家高兴玩玩嘛，又没有用屁捅，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对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打仗的干部，领导恩宠有加，性的管理更是松劲，甚至是放纵。如某团苟团长就有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性自由，他主张不娶老婆，他说，老命一丢，留下孤儿寡母的不如自由自在地快活。他在中原战场进进出出16个县，都能找到女人陪他上炕。干部们编出歌谣：苟团长，老屌长，村村都有丈母娘。

当我军跨过世纪之门，什么“糖弹”“走资派”都成了历史，性已是现代军人公开的生活情趣。

斗转星移，到了文革时期，几十万军队干部管治全国的机关学校企业，处处是芳草，权力寻春，唾手可得，宾馆、饭店、招待所成了逍遥宫，有人玩起过五关斩六将的游戏，有人的小蜜以打计算，性交

往如同握手般容易。2008年，国内一家著名的社会杂志，与时俱进，倡导“快速性交”。

如今我已是垂老之年，无法去展望明天我军的“性”事了。

军队经商风景线

——反修防修的幻灭

中国人民解放军曾有过经商的历程，留存军史的都是光辉的事迹，如抗战时期，军需物资紧缺，各战区的后勤部门都组织专人到敌占区去开店设厂，秘密购得医疗、通讯的各种配件和生活必需品，艰苦备尝地送到解放区，给军队注入了新的血液。不得入史的，比如解放战争开始，359旅把他们在南泥湾种的鸦片，让干部战士每人的口袋里装上两斤带到东北，从人民群众那里换得一笔可观的军费。这一史实让《血白雪红》一书披露了，曾统领过359旅的王震将军恼怒不已，声言要枪毙作者，幸运的是，作者只给关了一个月。

文革动乱之后，共和国经济面临崩溃，中央的大政方针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拿钱才能办事，国家财政已是左支右绌，国库困顿。邓有魄力，鼓励军队发扬南泥湾精神，用自己生产的产品走向市场，弥补紧缩的国防经费。

从1980年开始，五百万人民解放军，上至机关，下至连队，以得天独厚的特殊地位，放手大搞各种生产经营。十多年间，其经营手段之绝，获利之巨，史无前例。我仅记下些所见所闻的点点滴滴。

一

改革开放初兴，军队的高层领导对军队搞经营活动有顾虑。因文革十年，军队派出数十万干部“三支两军”，领导了全国亿万军民筑起反修防修的大堤。文革结束，无限忠于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老军们，却要承担起推行左祸的罪责。如今要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激愤了，说“邓小平要他们当还乡团啦！”一位老总从率先搞改革开

放的温州参观回来，调侃地对我说：“温州除了公路没有修，别的都‘修’了。”

地方的改革开放刚上路，农村开始包产到户、农贸市场日益兴盛，城市也开了禁，购物不再要票证，小贩们街头叫卖无拘无束，人们生活开始有了自由。看到社会各行各业都争相向市场取利，连、营、团领导小心翼翼地寻找生财的路子。开始只做些小打小闹的农副业生产和加工，在营区内交换自己的产品，有的还悄悄拿到市场低价出售。一向靠几毛钱一天过清苦生活的战士，桌上多了几块肉，感激之情成了各级领导主要的政绩。大军区的领导们被大势驱动，给部队松绑，放开了手脚。

北京军区在属下驻正定县的114师召开了部队改革开放的现场会，向全区部队推广生产交换统一步调的经验。出于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和好奇，我邀约了几位驻京部队作家前往探秘。

114师早已迎接过参观者好几百人，他们大都来自军区的下属24、28、38、27、65、69、66的7个集团军和特种兵师，河北、山西两个省军区和北京、天津的卫戍部队。外军区也有人慕名而来，访客络绎不绝。现场会展示的不是什么广场表演，也不是专场介绍经验，而是让你身临其境去看他们在自由市场上如何做小买卖。

这是一个星期天，天未亮，大约四点来钟光景，向导——一位团的新闻干事，就把我们从睡梦中叫起，由他领着跟随一批批军人小贩（我们给他们的命名）出了营区。

战士们三三两两，背着、扛着、挑着自己生产的蔬菜瓜果，或自制的豆腐、粉丝，或用芦苇、柳条编成篮篓之类的农副产品。师、团的作坊则用卡车拉上宰好的猪羊和一笼笼活鸭活鸡，或一箱箱鱼鳖虾蟹之类的水产品，绰绰人影，在拂晓前昏暗的公路上，汇成了一支武装的经营大军，用当时战士的豪言说：我们是去占领资本主义阵地！

营区离城五华里，一路欢声笑语，半小时就进了城。城东的几条街，是指定的农贸集市区。

定县政府有规定，为维护市容，必须在上班之前收摊子。我们到达现场，农民已开始出售自己的农副产品，军人小贩就分散在他们中间，各自寻得一块空隙放下挑子。

赶早市的居民们提着篮子，迎着曙色熙来攘往，都喜欢拥到军人的摊位前，他们只问一声价钱，就可以拎走一捆青菜，豆角、西红柿则摆成堆或用秤称。一个妇女买芋头，她逐个地捏，又看皮色，战士也蹲下来帮她挑拣，只买一斤，秤盘里堆的芋头已把秤砣压得高高挑起，她还在往盘里添，战士说，都一斤二两了，就算一斤。紧巴过日子的市民，当然欢迎军人为人民服务不计成本。

可能是星期日，集市拥挤热闹，军人小贩最引人注目。让我们最看不顺眼的是，战士们的军容不整，军帽斜戴，军衣敞开，裤脚高高挽起，有的把秤搭在肩上，有的嘴角叼着卷烟。

我向向导：“为什么不让他们穿便衣？”

向导说：“战士哪来便衣啊？和老百姓站在一起还能体现自由市场的繁荣是军民共建的。”

我感悟到，这正是他摄下的新闻图片和表述的报道文字所追求的。

这里还有一家长途汽车站，站前至少有三处军人在卖豆浆、油条、烧饼。站内有战士为旅客排队购票，有的用推车搬运行李。都要收取劳务费。我看到一个战士手持脸盆，肩搭毛巾，他身后另一个战士拎着一桶热水，在拥挤嘈杂的大厅内叫喊：“洗脸，洗脸，一毛钱一位！”声音尖利刺耳。

一桶水，50斤，从营房拎进城，仅挣一元钱，不因利小而不为，我既感动，又叹息。

大约七时半左右，军人的菜挑子差不多都空了，我见一个战士正数着手中零票，上前去问他：今天卖了多少钱？他用山西腔回答，有八块多了。兴奋的脸上露出满足感。这笔钱是他们班三个月辛劳的成绩，也相当于他一个月的津贴。

在收摊返回的路上，我和战士闲聊。一个战士告诉我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早市，通常是一个班出动两人，星期天例外，只要有东西可卖，出动七八个人连里都会允许。大家都特想出来放放风，观看一回街景。

另一个战士说，我们头天就得上地里把菜收下来，洗净捆好交司务长记账过秤，因年终评比有奖励。

“你们赚得的钱怎么处理？”我问。

“交事务长，做全连的伙食补贴。如果我们中间谁家有特殊困难，就从中拿出二十、三十地给他家寄去救济。”

“你们生活改善的如何？”

“可以，每天四菜一汤，两素两荤。”

“你们卖的价钱这么低，农民赚不到钱，有意见咋办？”

战士语塞，向导补白：“对小生产者发家致富的思想就要我们平价交易来抑制，这才叫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你没见，城里人对我们军人卖的价钱非常满意。”

相信《解放军报》对军队在自由市场上制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报道会更满意，有可能作为头版头条。

“堂堂军人，常年做小生意，风纪涣散，没有军人的举止，一个个都像老百姓，军队今后还怎么管理？”作家提出了担心。

向导说：“早在1966年，毛主席就有五七指示。今后，还要亦工、亦农、亦商，更有利于军队的全面发展建设。”向导用最高指示引导我们认识军队处在新时期、新任务面临的新课题，谁敢说“不”？

二

早饭后，我们一行人又进城参观第二类进入市场的军人是如何动作的。

这支队伍庞大，他们扛着工具，推着板车，大约有六、七百人。

向导告之，参与者多由师、团专业分队的能工巧匠组成各种小分队，负责施工、建筑、修理、装修等，为群众修理家具、电器、清理烟道，或砌墙抹灰。收费低廉，对烈军属免费。

他们一进城就沿街走动，挨家挨户地招揽生意。上门服务是群众求之不得的事，不到半个时辰，几百人都有了自己的主雇。

向导身挎照相机，也要参与市场经济，他要我们自由活动。我问他，你怎么做？他说我走街串巷给人照相，不像照相馆那样的正襟危坐，我照的是他们的日常活动，比如，孩子做自习，老人们打麻将、闲聊或打门球，只要他们乐意的，我都拍摄。收费远比照相馆低，照片当

晚洗印后第二天就送上门。说罢，离开我们寻活路去了。

我们无法闯入住户家门，只好在街头游走。每条街上，都能见到军人设摊献艺，有补锅补盆的，有磨剪子镟菜刀的，有修车补鞋的——我最感兴趣的是理发，理发挑子的火炉上坐着一壶水，有毛巾脸盆，架子上摆放的理发工具齐全，理发者坐在凳上披着条白围巾，一人理，一人洗，十来分钟就理完一人，收费两毛，快捷便宜。

在一条街的巷口，一个战士坐在一部老式的缝纫机前正修补一条西裤。裤腿上的破口约两寸，战士不用踩缝纫机打补丁，而是从裤腰内侧的扁边处，抽出一束线来，在破缝处横一针竖一计的仔细编织。一针针、一线线不走样的织出斜纹和原色，手巧如苏杭织女，丝毫露不出修补后的痕迹。活干完，只收人家五毛劳务费。

一个围观的中年人感动地问他：“你复员后，到我们店来吧，我是做服装生意的。”

战士说：“我做不了主啊，得听从组织的分配。”

战士的话是真诚的。自从穿上军装，组织性就成了他生活的准则，组织管理他的思想训练和吃喝拉撒睡，他的高超手艺，也要由军队的组织来配置。

很巧，我们看到了一支军车车队正鱼贯进城，我们打听到这是师汽车连的，他们从天津塘沽港给百货公司拉货，每吨2元一公里

一位作家问站在街上的监察干部：“地方不是有运输公司吗？”

“人家要价高。车辆要折旧，工人要开工资，还要缴纳税费，还有日常的各种开支，我们军车的成本仅是劳动力。”

“不计军费的成本，无本得万利。”作家直言不讳。

我从这位监察干部口中了解到，师团每天都要派出数十名干部进行监督管理，确保军人入市井然有序，杜绝各种矛盾的发生。

晚上，我们还要到火车站看军工装卸。

定县是个小站，货运站台上六条轨，一半是露天的。我们来到货运站站台已是晚上8点，昏暗的路灯下，一个营正在紧张卸货。一个排卸一个车皮，副营长来回跑动督阵，防止搬运散包，放列要求整齐。卸的货全是水泥，战士们在扑扑粉尘中，个个灰头土脸的，一次负重两袋（30公斤）仍健步如飞。这么脏、累的强体力劳动，我们的作家

摇着脑袋说，为的是多吃上二两肉而已。

我问副营长：“你们干一晚上怎么算账？”

副营长说：“卸一个车皮（20吨）30元，装一个车皮60元，一个连干到夜里12点，可以挣到500多元。”

“人家不是有装卸工吗？你们来岂不抢了人家的饭碗？”

“他们大都是临时工，一般都在白天干，晚上工资要加倍，站里省钱就上门求部队。”

“战士们回去睡几个小时，还能坚持第二天的训练吗？”

“没事。”副营长回答很轻松，“我们隔三岔五地才来一回。比如，今天回去明天起床时间推迟一小时，中午再补个觉，小伙子们精力充沛，生活改善了，没有不满意的。”

用马克思的理论来阐释，这就是他们创造的剩余劳动价值。

第二天是礼拜一，部队转入常规训练，参观者走留自便，留下的继续收集信息，因回去都要比着葫芦画瓢，坚决地、不走样地贯彻现场会精神。所以这帮参观者都把现场会看成是倡导改善部队生活的办法和措施，而不是什么经济改革。另一些参观者是参加过“支左”的，他们则多从意识形态想问题，现场会的各种现象牵动他们的考量——路线斗争。相互一碰面，不管认识不认识，就能听到他们的各种意见：

“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帝修反也不用反了。”

“农民种田种地，出售自家的农产品，天经地义；城里闲人做买卖，繁荣市场。我们算是干什么的？一只手拿枪，一只手数票子，倒不如都回家去当民兵。”

“这样搞下去，还有人学雷锋吗？”

“昨天让我们把资本主义尾巴割的连毛都不剩，现在又要我们去捡回来当旗杆使。”

……

三

两年后，我走访部队时，看到改革开放的思想已启开了半扇闸门，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部队因地制宜办起农场、渔场、养殖场和厂矿企业，经营规模虽扩大了，修正主义的阴云依然在他们头顶上飘动，谁也不敢越过雷池：

——在江苏徐州，我参观了某团刚建的家属工厂，五个家属每天生产儿童玩具小气球四千只。生产方式极简单，用几十个玻璃模子蘸起融化的胶液，晾干后，脱下来装袋上市，每只售价5分，获利1分。

——我在南京城郊看到一家师办电风扇工厂，车间有车床、磨具、电焊，军工正在流水线上作业，年利15万。利润由师党委管理。

——我到黑龙江漠河，这里的边防，连队天天上山采猴头、打松果、猎鸟兽，其中还有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飞龙（一种珍稀鸟）。每天上市，日收入300多元。全部补贴连队伙食用。

——在安徽白湖农场，一个师把劳改犯迁走，种下了3万5千亩稻田，1万两千人全年忙活田间，只用一个营搞训练。

——安徽省军区一位副政委告诉我，黄山顶上有七株贡茶，年产两斤，人说“扬子江中水，黄山顶上茶”。文革中，一直由军区部队管理，每年献给中央领导一斤。如若出口，比黄金贵10倍，只能做政治礼品，他们曾送给基辛格半斤。

副政委拿出他珍藏的一小筒，抓出一小撮来给我沏了一杯，15株叶片都呈三瓣张开来，似刚抽芽的柳叶。袅袅水雾，清香扑鼻，品尝一口，回味缠绵，真不负盛名。

部队的经营生产充盈了小金库，流出的油水也不落入外人田地，各级首长都添置了现代家具电器，用奇花异草美化家园，买来人参、鹿茸、茅台酒保健。还经常品尝穿山甲、熊掌，宴请一席就是万八千。更有想象力的是，一位军长把刚盖的小别墅改成水帘洞度夏，一位军区的副司令吃了牛鞭壮阳，还有一个副师长吃王八中毒住进医院……基层干部都能沾光，机会均等，收得的外快时不时能分得几百元或上千元。

到1980年代末，反修防修的堤防已被改革开放的大浪冲溃，军人心里再也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根筋了。

——在连云港，驻军守备师一个营，营长自发创新，给全营战士放长假，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寻亲靠友，千方百计找机会赚银子，

只要不杀人越货，一年拿回两千元就可以立功受奖。

——吉林省军区的一位副参谋长强取他人一株君子兰，由一个警卫班和一条猎犬 24 小时守卫，半年后，以 5 万高价售出。

——新沂驻军一位团政委在饭桌上告诉我，他的团有个班长，和地方一商人合伙做生意，由班长投资 20 万（入伍前已是小款），一年下来，血本无归，商人赖账，一气之下，枪杀了商人全家。军区指示秘密地把班长处决。

——在湛江，南海舰队某支援运输船队和地方争抢海上运货，压低运价，霸占航道，还组织几百人和地方斗殴。

——舟山海域，是世界著名渔场，多年来几经密网捕捞，资源殆尽。守备部队仍驾船出海，我看到他们捞回的带鱼一网只有 61 条。

——广州军区的万山守备师，炸山采石出售给香港。昼夜炮声隆隆，居民常年不得安宁，控告无门。

——我经过嫩江，这里拥有几十万亩土地的总后农场，是生产大豆的基地，历来为部队提供食用油，改革开放大开了他们的思路，把 60% 的大豆投向了国际市场。

——云南的武警总队，从缅甸走私玉石，武装押运至福建厦门转口，出售到世界各地。

——武汉空军，向美国旧金山空运去武昌鱼和洪湖蟹出售，每周保持一个架次。

四

到 1990 年初，军队经营发展到了托拉斯的规模，军事工业全部转产民营，是任何一个军事强国都无法比拟的。国防科工委驻成都的军代表告诉我，四川三线（1964 年，毛泽东要求按照战备的标准搞基本建设，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提出深挖洞，为反修防修备战，把大批基础工业、国防工业设迁往西南、西北。我们通称为三线）。500 家军工厂，从过去单一生产部队的武器弹药和装备装具，转向市场需求，还包括出口军火。这一转型，年赢利百亿，增加了全军的收入。各军区在大建楼堂管所的同时，也为领导们的家庭装修的现代化和智

能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财源。

总参的工程兵，在高寒艰险的西藏、新疆承建公路；水利师在长江、黄河包揽建坝工程；黄金师在黑龙江、山东、秦岭挖掘黄金，每年卖给国家的黄金就有 50 吨。

总政是全军政治思想工作的领率机关，多少年一直引领全军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自改革开放大旗在军队张起，总政首先办起了 56 家大企业。仅凭总政这块金字招牌，人、物资源便唾手可得。一声令下，就从全军抽调来上万的经营管理者，这帮人大都是管理个人吃喝拉撒睡的行管人员，摆个小摊开个小厂也许能胜任，要搞大企业就难副其名。

总政还有一个能耐，营业无须投入资金。比如，他们无偿地从大同矿务局要来一处煤矿，从驻山西的 69 军那里借调了一个连开采，煤炭部还派人义务指导。挖的煤不交任何税费，就用军车拉到天津塘沽向日本出口。一次，他们蛮干乱干把大同煤矿的巷道炸通了，造成塌方，死了几个人，总政没拿出一分钱，没赔一个礼，就把一场关天的命案摆平。

总政的食品公司向俄罗斯出口的罐头，人家认定不合格，损失了 1.6 亿，总政主任杨白冰大笔一挥：算交了一笔学费！

总政大管家是直属工作部部长梁秉治，军衔中将，此人不贪钱只贪杯。总政西直门招待所有个老资格炊事员，给梁部长记下了一笔吃喝账，梁在总政干了 8 年，在招待所大宴小请一共吃了 230 多次。结果脂肪在肠道积累过多，刚年逾半百就送了命。

总后勤部家大业大，把数以千计的军需工厂、仓库、场站组成一家叫安华公司来统领经营。公司设在深圳，专做进出口和房地产生意。我的邻居，是总政军事法院的一位审判长，他告诉了我这家公司的一些秘闻：

安华公司总经理，是由总后派出的 ××× 大校担任。财大气粗，他在香港买了别墅，包了几任二奶，香港舆论界把他的腐败捅到社会，广东地方司法机关不敢管，只得由总政军事法院立案审理。贪腐者牵连一百多名军人，还有受贿千万的 14 位大军区的领导人。这一大案，由时任军委主席的江泽民挂帅处理，他指示此案不得向社会泄露，

审判要化整为零。法院遵照江主席的指示，每次开庭就一两个犯人，法官警告说，不得上下牵连，只认自己有罪。

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他统管了海军下属的几百家企业，贪污两亿，包二奶一大群，其中一个二奶写了58封控告信才拉他下马的。

1998年的两会期间，各省市的领导群起问责军队，说军队到处强取豪夺，搅乱市场，与民争利，败坏了人民军队的声誉，对改革开放大局影响恶劣。中央不得不紧急刹车，责令军队退出市场，收兵回营，所有军办企业由地方政府高价补偿。

商场如战场，军队“善战”，没费一枪一弹，就攫得巨金亿万。

第三辑

人物軼事

军中一霸

——我知道的罗瑞卿大将

建国之初，战争还在继续，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急需整饬，罗瑞卿出任公安部长对付暗藏的敌人，得到全党的认同。他是继李韶九、邓发之后，毛泽东最器重的肃反能手。1955年全军授衔，罗战功无多，毛感念他竭尽心力地防奸锄奸，剪除异己，钦笔圈点他位列大将。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罢了彭德怀的官，让林彪主持军委，给了罗更大的信任，赋予罗出掌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八大要职，前所未有地由他一人监军。

一

老军们历来视罗如鬼神。我从口述军史的老兵那里得知，罗的杀人是职业性的，斩除 AB 团时，他已是红四军政委，红四军一夜间砍杀了1800多人，罗是握持刀把子的。长征路上，他任一方面军保卫局长，为了给部队行踪保密，凡走不动的伤员都由他处决。军史当然不会记下他这些“除恶务尽”的“业绩”。

战争年代，军队有句流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干部来谈话。”成千上万的“耳目”“线人”遍布党政军，政权维稳就靠这班人，罗是他们的头领，谁不生畏？他主持公安部后，决心将首都建成七无城市，誓把地富反坏和苍蝇蚊子老鼠一起清除。骇人听闻的克格勃手段，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有人称罗是中国的贝利亚。

有一则秘闻，凸显罗对毛泽东的赤胆忠心。

1962年1月，为平息全党对毛大跃进的愤懑，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县团委以上干部七千余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常委们商定，要开成

政治退赔的大会，共同承担大跃进酿出的苦果。到会干部，有人对毛的暴政已怒不可遏，在会场的墙角边、地毯上写出“反动”标语，号召大家都来反对“秦始皇的暴政”。

罗要抓现行，周恩来以他党内斗争的智慧，婉转告诉罗：“你抓谁啊，都是些娃娃干的嘛。”罗心领神会，让人悄悄抹去了反标。如若让罗大显身手，给七千人来一次大清洗，那个“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化解矛盾的氛围，也许会变成又一篇格杀 AB 团的血腥历史。

二

1964年元月，我在南京第一次见到罗瑞卿。我对他是高山仰止，可连说话的机遇都没有，他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浑身的霸气。

当时，我军创造的“郭兴福教学法”已引起总参军训部的重视，先是叶剑英元帅在1963年从《军训杂志》看到郭兴福的教学法，当即指示分管军训的副总长张宗逊到南京考察。南京军区特地给总参考察组在镇江181师的训练场组织了现场会，许世友司令还招来全区师以上干部观摩。在观摩会上还出了一个插曲：年近花甲的许老总，兴致勃勃地披甲上阵。他演示二百米内硬功夫的冲击，可是一跑起来，步履蹒跚。投出的一颗手榴弹，由于臂力不足，那手榴弹在许跑动的前方十多米处爆炸。许不顾自身的安危，迎着乱飞的弹片继续前冲。许老总人称“许和尚”，少年时当过少林寺的炊僧，有八年的少林武功。参加红军后，当了敢死队长，光用大刀片就打了78场仗。现场会上，许老总老将不减当年勇的举动，让全场观众惊愕又赞叹。

现场会之后，叶帅又亲自观看了郭兴福的教学演示。他热情洋溢地向毛泽东报告说，郭兴福是运用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把兵练活了。郭兴福所教的兵，个个都像小老虎。毛极为欣赏“小老虎”三个字，批示罗瑞卿，要他亲自过问，抓好典型向全军推广。

罗不熟悉军事训练，但他很用心地听取了张宗逊的汇报，又看了郭兴福教学的军教片，还让到过现场的叶帅秘书谈观感。随后，他很快作出决定，由总参出面组织一次全军性的现场观摩会，推广郭

兴福的教学法。要求各大区、军兵种、野战军分管训练的领导参加，三大总部也要来人。

这年春节刚过，各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都来了南京，到会的将军就有200多位。罗到的当晚，军区组织晚会欢迎，老军们难得欢聚一堂，一见面，我军原始的生态文化在他们身上马上显现，见面礼就是相互骂骂咧咧，拳打脚踢，先叫着对方“狗娃子”“二赖子”之类的小名或外号，接着骂道“你还没死呀！”说着，照着对方胸口就是一拳。对方回敬道：“你他妈的也快活够数了吧！”边说边抬腿踢过来一脚。有的拧耳朵、刮鼻子以示亲热，都忘了自己的将军身份。正闹腾着，突然有人高喊：“罗总长到！”顿时，全场鸦雀无声地起立，屏息四处张望。罗从边门进场，他身材伟岸，近一米九的身躯比走在他后面的许世友司令要高出半截。罗这年58岁，步伐矫健，身上发着一股煞气。将军们都用畏惧的目光注视着他从通道走过，又目送他走上舞台的中央，许世友跟他上台后，见大家都傻着眼，大声喊道：都欢迎鼓掌呀！这时，老军们才如梦方醒，响起掌声。

我见过毛、周，也见过帅字号的叶、贺，他们出场时，被接见者的眼光是亲切的、兴奋的，从未见过罗上场时的这般肃穆和令人生畏。我猜想，罗一生大都在军队里干克格勃，老军们心目中总是有消除不去的畏惧。

许老总致欢迎词，几句话：今天欢迎罗总长，欢迎各位老伙计光临南京军区，没有好的招待，有鸡巴毛炒韭菜……

当年四方面军失败，许世友逃到延安，毛泽东清算他，说他是张国焘反中央的伙计，他一气之下要拉杆子上山打游击，中央判了他一年零八个月的刑，他一直不服气。在罗大将跟前敢如此放肆，全军上下恐怕只有他一人。

罗瑞卿讲了15分钟，说毛主席要他来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就是要摒弃苏联教条主义的军事训练，提倡我军的传统战法，让光荣的传统开出新花。

罗讲完话，由话剧团演出《东进 东进》。一个半小时的演出，人们都屏息看戏，没人走动，没人说话，连个咳嗽都没有。

三

先说说“郭兴福教学法”的形成。

1957年刘伯承元帅的“坚决的，不走样地把苏联老大哥的先进军事经验学到手”的教条主义受到批判，1959年庐山会议彭老总下台，林彪主持军委，深知要巩固毛在全党、全国、全军不可动摇的地位，必须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军训上要总结历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战场经验，形成以我为主的教学内容。李德生遵照军委精神，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带领他的军训班子在训练场摸爬滚打忙活了几年，创造了以郭兴福命名的教学法。

我常年跟随郭兴福，是李德生的指示。他要政治部经常了解这一训练模式的新动向，同时对已具有影响力的先进典型要做好宣传。从此，我伴随郭兴福和他的示范班走南闯北。

郭经历过战争，教学有创造性，李德生对他又言传身教，把自己多年总结的战场经验都融进了郭兴福的教案。“郭兴福教学法”刚向部队推广，就引起强烈反响，军报不惜篇幅宣传，广州、武汉、沈阳等军区都相继邀请郭兴福去演示，观看者都肯定它是我军成功的训练方法。

郭带的演示三班，和当时所有部队的状况一样，战士的军龄一二、三、四年的都有，文化从文盲到高中，性格特征，有笨的、有聪明的、有傲气的、有懦弱的……郭通过因人施教，循循善诱，在几个小时的教学中，就把一个科目的全部内容灌输给了战士。郭的讲解生动活泼，把枯燥的军事课变成了一堂富有情趣的战斗技能和思想教育课。

老郭示范动作规范，语言幽默，他抓的“活思想”，就像演小品一样在“抖包袱”，让参观者能发自内心的欢笑，连常在训练场摸索的行家们，都深感郭的教学很了不起。

现场会怎么开？不听经验介绍，只看教学表演。

教学表演安排在南京步校的战术训练场，出发前，老郭有些心神不定，告诉我说，他一早起就跳眼。我说，跳眼是跳财，你是在跳胆了。面临这么大的阵势，我担心他怯场。

表演场警卫森严，两百多将军戎装整齐地坐在山坡的小马扎上，几十名记者的相机都对着罗总长。郭兴福在场中整理好队伍，跑步到罗瑞卿跟前：“报告总长，郭兴福教学示范准备完毕，请指示。”罗从马扎上站起，一挥手：“开始吧。”

郭回到队前宣布了科目，科目是单兵进攻。作业刚展开，郭一回头，发现罗不知什么时候正紧跟在自己身后，他像芒刺在背，浑身不自在。前不久，叶剑英元帅来观看表演，也是紧紧地跟在他身边。叶帅眼花耳背，他要看清动作，几乎把自己身躯贴在地面去看郭兴福卧姿示范，边看还边问，郭从未感到丝毫紧张，反觉得老师是对自己认真地关注。现在，罗总长的出现，他身上像冒起鸡皮疙瘩，讲解开始哆嗦，表述结巴。我坐在记者席上，见他出现慌乱，心顿时悬到了天上。

去年，郭在哈尔滨给 23 军表演，一天演示两场，把老郭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跟着他的师政治部副主任警示他：你就是趴在演练场上，也要坚持下来。今天的沉重已不是体能的匮乏，而是罗大将像块泰山石，重重地压在他的心上。

单兵进攻，郭兴福已演示过几百场，这是林彪倡导刺刀见红的二百米内的硬功夫，山坡野地就是训练实战的课堂，十几个技术动作，经他细化成生动活泼的教学语言贯注给了战士。前些年，部队推行苏军的战斗条例，把士兵当成战争机器，教练冲击时，没头没脑地勇往直前。郭的教学法富有人性，他让战士懂得如何处置战场的复杂情况，学会在生死存亡关头必备的技能，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它的内容包括战士从出击地位开始冲击的运动中，如何善于保存自己对地形地物的有效利用，如何快速地卧倒出枪射击；什么时候投弹，什么时候与敌人展开肉搏，以及自我的防护措施。一招一式，郭兴福都要耐心的边做动作边讲要领。他的动作规范令人赞叹，如球星手脚功夫那般娴熟。

罗总长寸步不离，郭兴福每做一个动作都像受到牵制。郭最怕罗大将那双眼睛，像无数的钢针扎向他的后背，他表述的语言越来越晦涩，示范的动作也越来越僵硬，操作手中枪像是在拨弄根铁棍。如果此时，罗能像叶帅那样不断向郭兴福提问，郭的心情会得到舒展、放松，教学会做得有声有色。可罗一声不吭，还板着脸，郭兴福在距

“敌”堑壕 30 米处投出了两颗手榴弹，弹体却没有落进堑壕，郭兴福看到了罗的眼里像有火焰燃起，顿时浑身冒出虚汗。他顾不得罗的反应，继续冲刺，做出抵近射击、搏斗、拼刺一系列的动作。这些动作看起来是一气呵成，但都给他紧张的情绪简化了，内行人一看仅是走了过场。教学演示结束，坐在山坡上的将军们如释重负般响起稀落的掌声。

郭兴福忐忑不安的整理好三班的队列，转身向罗报告：“总长同志，我的教学法演示完毕，请指示。”

全场静下来了，一大群记者向罗总长跟前围了过来，罗的怒火喷发了：“郭兴福，我要问你！”

郭挺胸：“请总长批评！”

“你是不是把你准备的教案再背诵给我们听？你的教学法提出对敌人要稳、准、狠，你的示范哪一件是你做到的？你的示范班战士，是不是从营、团挑选出来的尖子？你投的手榴弹为什么落不到堑壕里？拼刺仅三晃两晃就敷衍了事？……”

罗瑞卿一连向郭兴福提出了 17 个为什么！

郭兴福象遭到五雷击顶，血在脸上涌动，呼吸急速，愣愣地站在那里。许世友疾步过来打圆场说，今天这么多老总看，紧张了，重来嘛。

罗一甩手：“我再也不看了！”他大步走到演习场路边，登车走了。

全场的将军们都在惊愕中默默地登车回城，记者们也愣住了，许世友、李德生也灰溜溜地上了自己的车，演练场没有了声息。

郭兴福回到招待所心情沉重，吃饭、睡觉，一声不吭。我对他没有任何指责。他的错是压力下的失常，批他哄他都无济于事，只能让他自己反思应对。第二天，我见他缓过些劲来，才问他；你怎么就沉不住气呢？要是毛主席来看你演示，你不吓瘫了吗？

“老刘，”郭敞开心扉，“说实话，谁来了我也没这么胆怯过，就是他，全军的大将小将，谁不对他敬畏三分？”

“为什么？”我故意问。

“他是个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我是随时准备挨宰的。”

我清楚地知道，郭是旧军人出身，党的阶级路线给他设了一道坎，当了四年副连长得不到提升。

四

郭为人处世，生活上大气，政治上慎微。我和他相处几年，亲密无间，还经常下馆小酌，他对我蛮讲义气又推心置腹。也许我是文化人，和他感情上相惜相近。我们到各大军区巡回演出，通常由南京军区、12军和下属的师、团派出得力干部对郭进行监护管理，组成临时的支部，我也是支委之一。师、团来跟他的领导，对郭日常生活言行举止要求极严，因郭已是全军的典型，他的表现好坏影响到师、团的声誉，差不多每次开支委会，他的师、团领导（副主任或副政委），总要把郭身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掏出来说道三道四，我却处处维护郭，反对他们对郭的非原则性的一切指责。他们也知道我的来头，是李德生点名派出的“红人”。的确，每次郭外出演示回到军里，只要见到李，我总要就郭在外的表现和反映说些情况。

有一次，我向李德生提出，在郭兴福身边，不要配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郭因此对我更加信任。我在连队摸爬滚打10年，我们之间有深厚的共同语言，他胸中一有块垒，就直不笼统都倒给我。多年来，他在部队生活一直是感到自己处在被监控中。军队的阶级歧视政策如背负的枷锁。比如直系亲属中有宪兵、特务、保长、会道门头子及海外关系的干部，表现再好，一般都会打入另册或被清除，这是郭兴福最耿耿于怀的。他认为，自己现在虽是全军的典型，只不过是因他的一技之长被利用而已。郭还知道军队有严格的成分区隔，地主出身的干部，允许留下0.8%，中农小业主出身可留2.4%，在旧军队干过两年的都不得提干，这更伤害了他的感情。似乎自己一生的命运都被罩在一个铁笼子里。我同情他心理的重负，我的职责不允许我和他一个鼻孔出气，只能是劝导他超脱，他的教学法已有群众基础，要他审时度势，只能奋发向前，自暴自弃只会伤害自己。

五

由于“郭兴福教学法”已在广州、武汉、济南、沈阳几个大军区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充分肯定，来参加现场会的几位大区领导一再向罗总长劝说，毛泽东又有批示，罗不敢轻易半途而废。他见求情说项的人越来越多，也就顺水推舟，表示不走了，再看一回。

李德生的训练班子全都出动做郭的思想工作，郭兴福也表示要拿出最大的勇气再给罗总长演示。这天，演示场跟往常一样，参观的将军，记者都是原班人马，不同的是罗大将坐在前排的小马扎上，再也不跟班“作业”了，郭似乎也消除了畏怯心理。他一上场示范就意气风发，几乎一气呵成。会场上不断发出赞叹和掌声，这气氛让罗瑞卿平板的脸上也出现笑意。演示结束，罗兴奋的大步走到郭兴福跟前，紧紧地握住郭的手说：“很好嘛，我军就要你这样的传统练兵方法。”

罗转过身，对跟在他身边的李德生说：“你为全军做了件大好事，毛主席也高兴。”

罗总长回到中山陵住所，马上挥毫给郭兴福提了“戒骄戒躁，精益求精”八个大字。字不入流，经军报刊登，产生了巨大的政治效应，“郭兴福教学法”响遍全军，老郭很快就被任命为南京军区步校教研室副主任。

这天，郭也兴奋，他买来一瓶白酒一包花生米，我俩对酌畅饮，一扫他头顶上的乌云，熠熠的光环又开始升起。他怎么也料不到“文革”中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他的全家集体自杀。

现场会的第二天，在各组的讨论中又冒出了个“大”问题。这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日，成都军区小组在韦杰副司令的主持下，一致认为，郭兴福的教学法好，最好不要用郭兴福个人名字命名，郭有创造性，可他是旧军人出身，而且还是吴化文的汉奸部队过来的，用这样的人当典型不合适。（注：吴化文在济南起义作用巨大，减少了军民十数万人的伤亡。吴起义后仍然让他带领我军35军攻打南京。）

常年抓阶级斗争的罗瑞卿十分清楚，用旧军人塑造我军先进典

型是个敏感的难题。他马上召开区组长的汇报会，到会的有七大军区的领导和军兵种的负责人，还有几位是中央主要报刊的记者，我也忝列末位。

会场在南京军区第一招待所——AB楼。会议由罗瑞卿主持，大家不知来开什么会，罗的开场白是：“今天请大家来，有件事要说说，我也要听听大家的。”

“有人说，郭兴福出身旧军人，当典型不好，我们说他是一个优秀教练员都不行吗？韦杰，你说说，你们是怎么看的？”

这位壮族中将在朝鲜战场上是60军军长，他的180师给美国人连锅端走，要不现在已是大区司令了。此刻，总长点他的名，他听出了话外有音，站起来嗫嗫嚅嚅地说：“这是我们小组一部分人的意见，不一定正确。”罗面无表情，对韦的回答显然不满，没和他争辩，转过头，问坐在他近前的粟裕大将：“粟裕同志，你是我的前任，你说说。”

粟裕立即站起，像下级在面对上级，身躯挺得直直的，说：“我在总参时，分管训练是叶帅，我很少过问。”

粟裕答非所问，但很得体。他来参加这个会，到现在还没弄清罗的用意，他精明地采取回避。他回答的话音很轻，还带着微笑，说罢，慢慢地坐了下来。

粟裕是我军名将，他和林彪被国外的军事年鉴列为二战后优秀将领，淮海战役是他提出要打的，毛泽东非常赞赏他的指挥才能。建国之初，他接替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出任总参谋长，1957年反教条主义，彭德怀把他整下台，林彪上来后，惺惺相敬，三北地区和沿海的防务经常倾听他的意见，这次来参加现场会，表现了他对林主持军委的支持。

罗又问了几位组长，都唯唯诺诺的，说什么“我们小组意见不大，听中央的”，或“成分不好重在表现嘛，请总长定了就是”。

罗深知老军们口是心非，他又点开了名：“赵章成，你不也是举起手过来的吗？”

罗出人意料地放言，在座的将领们面面相觑。赵章成是炮兵副司令，一听总长点名，猛地从沙发上站起，红着那张大麻子脸，惶惶地望着总长，嘴皮在动，听不到声音。

早在1931年，我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后，正处在极困难时期，赵章成追随董振堂、赵博生在宁都起义，长征时抢渡大渡河，他是红一军团的炮兵营长，在泸定桥打出了三发炮弹名扬全军。罗说他是举起手过来的，让他一脸尴尬。

罗继续展示他的威仪，又连连地点名，你，怎么过来的？还有××，你不是给打散了，拽着我们的马尾巴跟着走的吗？

可以说，到会的将领们半数都来自国民党，包括罗大将自己。罗为什么糟践人？这时，我怎么也想不到，他讲起了南昌起义，说：“我军就是从国民党军分化出来的，为什么容得下自己，容不得别人？”接下来，罗发布：“教学法是毛主席肯定的，必须紧跟照办，推广执行，郭兴福的教学法是优秀的，郭兴福本人是优秀的教练员，值得全军学习。”

在阶级斗争盛行的年月，总长这番话平息了一场风波，也像一股清新的空气，吹开我们淤塞已久的心扉，我对罗有了好感，亲切地叫他“政治总长”。

六

我第二次见到罗瑞卿是这年的秋天。

为防止美蒋从我国的蜂腰部登陆，军委急令我们12军移防苏北建设海岸防区。

有六万平方公里的苏北平原，应对战争无险可守，中央军委决心要在这里筑成一道马其诺防线。从1962年春开始，我们军五万人投入筑城。广阔的黄海滩一片荒芜，无淡水，顶海风，住帐篷，冰冻三尺也不停歇地施工。

我军进行海岸防御是个新课题，大管家罗瑞卿在徐州召开济南和南京两大军区的协防会后，要来苏北视察12军防区。

得知罗总长要来，从军部机关到基层连队，紧急动员清洁营区，整饬军容风纪。总长每到一个点看什么，见什么人，见的人该说些什么？都要由师团组成的接待班子来精心安排。对住在海边的一线部队，还作出特别规定：凡罗总长经过的道路上，每一百米要设一警戒哨，

哨兵必须有两年以上军龄，五官端正，身高 1.75 米，初中以上文化，军人举止标准正规。目的一半是保卫，一半是向总长显示我们军士兵的素质。

罗总长一行由军长李德生陪同从徐州飞往盐城，又从盐城北上经射阳河口至滨海，沿线都在构筑各种海防工事。要是你站在海堤上眺望，已建成上百座的阵地，星星点点遍布一望无际的盐碱滩上，煞是壮观。所建的工事都是永备性的，由两个工程团夜以继日地忙活。李德生焦虑地向总长报告：“海滩上建成的工事年年在沉降，十年八年就不管用了。”罗总长看了两处，他提不出任何技术措施，也不做任何解释，就斩钉截铁地对李德生说：“你们就一直修下去，沉一个再修一个，直修到没仗打为止！”跟总长来的部长、专家都沉默不语。

罗总长的话，令人心情振奋，大家认为总长的意志就是浇铸在我们心中最坚强的工事。其实我军有不少军事将领和罗大将一样，对现代战争的防御不得要领。1962 年，我到福建前线去参观友军坑道工事的构筑。军区的作战参谋告诉我，这里的工事都是军区的 × 副司令来定位的。副司令每到一地，只要他看中打洞的地位，总是捡起一块小石头扔到山坡或石壁跟前，指示你从他石头的落点处开掘。一次，有位副师长向副司令提出，要是从你指定的那里往里打，坑道得多掏好几百米。副司令说，我定了，谁改动也不行。领导人一言堂，造成的浪费惊人，好些工事未经勘察就动工，冒顶、塌方、透水又无法补救，修成了也就废了。那些年，我军的海边防的防御体系花了两千一百万个亿。当时，举国上下正处在饥馑的年月，这位参谋还给我算了一笔账，如若在三年灾难之时，把两千一百万拿出一半来分给他们，每人至少能买到几千斤瓜菜代填肚子。

罗总长被列为军事家是名不符实的，他对战略部署是外行。在解放战争时期，罗是杨罗耿兵团的政治委员，他是靠抓阶级斗争慑服干部，军事上无大作为。这次来苏北，他却带来水利部长钱正英和他大胆的战略设想，意图在我军防御的两百公里的宽面上凿出一条像运河一样的水干渠，用以阻止敌人登陆后坦克和摩托的机动。

幸好这一劳民伤财的浩大工程未得到实施。多年后，南京军区一位老参谋告诉我说，罗总长当年认定苏北海岸会成为诺曼底是忧

天之举，把数百亿军费在黄海滩上打了水漂。从游击战争中练出的将领们不懂得液态战场，紧傍苏北的黄海几乎是浅海，大型舰船根本无法在这片海域活动，即使用小型舰艇载人载炮上岸，苏北地区公路稀少，水网密布，战斗部队展开还有多大的机动能力？这一不知现代战争常识的防御部署，竟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他批评了林彪“北顶南放”的方针，肯定敌人会从我国的腰部进来。

1986年我重访故地，海滩上当年我们所建的阵地都已失去战争功能，下沉得几乎只在地表面留下一个个白晃晃的壳顶，很像烈士陵园的坟茔。

七

罗总长来到陈家港。这里驻守的是35师106团，他要顺便查看防区的设施和部队生活状况。

这天清晨，晨雾刚散去，罗总在海堤上漫步，发现前方站立的哨兵英姿挺拔，兴味盎然地走到跟前，问询这位哨兵的姓名籍贯年龄，和部队的的生活状况。每问一句，哨兵的回答不仅简明有力，还有股虎虎的生气。总长最后问：你每天守望大海荒滩，苦不苦？

哨兵挺胸昂首：“苦，我们吃了苦，老百姓就少吃苦。”

这都是事先编导排练的，罗总长却被哨兵“崇高”的思想境界感动不已，他欣喜地对身边的李德生说：“我们就要这样的战士，这就是我们的接班人！”

总长的话立竿见影，几天后，这个战士得到了提升排长的任命。

罗用了5天的时间，对我海边防200多公里的正面防务逐点地查看，视察结束，还要临幸我驻淮阴的军部。

为迎接罗的大驾，最忙的是政治部，要承担起对罗的安全保卫。罗住地委招待所，地委驱赶了上上下下来往过客，由我们派出一个警卫排24小时封闭式地护卫。罗的一日三餐，由地委找来两位出身好、手艺精的厨师做。我们的保卫干事，一直盯在锅台灶间监视，每做出一样菜都先品尝留样，为突发下毒事件提供依据。锅盆碗盏，顿顿要做到开水消毒，门厅、走道由我们医院派人天天用喷雾器杀菌。

我们给罗吃的是些什么？那年月，困难还未消除，我们军队干部要优于地方，每月配给一斤肉，一斤黄豆，半斤白糖，能吃饱就算吃好，给罗大将弄来的土特产有宝应的双黄鸭蛋，洪泽湖的水鸭子就算最珍贵的了。到了后来邓小平主军时期，吃喝风的档次大大加码，刚进入政治局兼总政主任的杨白冰，他到南京军区视察，一席酒宴8千元，吃穿山甲。南京市委更上一层楼，招待杨吃一万二的熊掌席。应当说，罗在吃上没有苛求。

这天中午，李德生突然来电话，要我们给罗总长安排观看淮剧演出。李的指示让我们既惊喜又惶恐。罗在军委管军管政还管文，他对看过的电影、戏剧、小说，大都会即兴发表些阶级斗争新动向的评论，并且经常警示我们，军队文艺时时处处都要防范封资修的侵蚀，看过后，他说好，就相安无事。如引发他的一通批判，我们就会背上一辈子的黑锅。时间紧迫，容不得我们瞻前顾后，军政治部马上召开由秘书、保卫、文化三个处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我们文化处提出，赶快去购买几十张今晚的票，让罗总长和群众一起看戏，老百姓肯定会欢迎的。保卫处坚决不同意，说罗总不是一般的中央首长，他有特殊的保卫规格，警卫失控，出了问题谁负责？秘书处说，首长安全第一，我们去找市文化局，让剧场挂牌退票，由军队包场。主任如释重负，拍板赞成。

保卫处忙活开了，调来工兵连在剧场里里外外探测是否有人埋设地雷，探完了，让警卫连派人看守场地，不准闲人出出进进，保卫处长一直在现场督阵。

我们处的任务是到淮剧团审查剧目。他们上演的是三个现代小戏，其中一出叫《摘棉花》，写姑嫂俩在地里摘棉花，边摘边夸自己的女婿，老公公爬上树偷听，嫂子告诉小姑，说公公一心想抱孙子，你哥哥白天黑夜追着我耍个小子。唱词中有句“性急得上床连脚都不洗”。当时，连《柳堡的故事》这样的纯情影片都在部队禁演，这类有伤革命文艺“风化”的台词，更是不能容忍。我向编导提出抹去或换这句台词，编导不干，说这句台词是全剧的戏眼，没有它不成其为戏。我回来向处长张星汇报，他说：“要尊重艺术规律，有点情趣不碍事，我来承担责任，让他们上演。”张在我们政治部很有人望，在延安时期，

他就是鲁艺的乐团指挥（后来周恩来提出组建东方歌舞团，他出任第一任团长），他的表态，给主任吃了颗定心丸。

剧场的票已售出，要观众退票遇到了麻烦。观众到开演前才知道，闹开了。剧场经理和工作人员一起出动劝解，又不敢说明真相，眼看快开演了，我们的秘书处急了，赶紧招来警察驱赶，还派出一个连实施戒严。平时剧场前欢声笑语的小广场，马上森严壁垒，如临大敌。

剧场的座位由我们文化处安排。前十排给军的司、政、后机关干部（空第七排给罗一行和军的首长），中十排给淮阴地市首长和中层干部，后十排给军直属连队代表。

剧场是老式建筑，通风差，空气污浊，主任机敏，让秘书处即刻买100把蚊香来改变空气“质量”。这时，警卫连的战士在场内沿墙根密密地站了一圈，主任让他们每人都拿上一炷点燃的香，百十号人手持香火烟雾袅袅，很像庙里兀立两厢的八百罗汉。

八点过，罗一行才进入剧场，李德生随后。我们主任站在舞台的一角呼喊：“全体起立，鼓掌！”罗挥动手臂向欢迎的人致意，军人都循规蹈矩地目不斜视，地方干部却张着惶惑的眼睛看稀罕，还发出一阵嗡嗡的议论声。主任急了，伸出双手拼命往下压，示意大家坐下，静场。

票是我参与分配的，我的一张选择了八排中间，正好在罗瑞卿和李德生座位之间的后面，我是想对罗近距离的察言观色。我的左右自然是两位保卫干事。

罗一人就占了三个座位，大概是喝过头了，顾不得自己的仪态举止，他解开了风纪扣，把头枕在靠背的顶端，仰着上身，叉开两腿，嘴里不断呼出浓烈的酒气。

演出开始，头两个节目是表现雷锋精神的，内容都是好人好事的说教，我观看罗总，他似乎在注视舞台，可能是酒精的刺激，头在晃动，时不时地调整一下身子，也许出于礼节，别人鼓掌，他也举起手拍了三两下。

《摘棉花》是压台戏，女演员是用舞蹈身段上场的，舞姿轻盈，淮剧的小调也优美。我的注意力仍集中在罗的脸上，此时，他已聚起精神，嘴角展现出一丝笑意。当儿媳妇唱到“性急得上床连脚都不洗”

时，在树上偷听的老公公开怀大笑，从树上掉了下来，这时，全场骤然响起一片笑声。罗的反映更为强烈，他情不自禁地笑得前仰后合，还连连鼓起掌来。李德生大概是受到罗的感染，也很兴奋，歪过身来跟罗总说了几句，罗不住地点头，像是在赞许，我绷紧的弦松弛了，对罗的畏惧之心一下变成了敬意。演出结束，罗没上台接见演员，在李德生陪同下退场，全场起立目送。

散场了，我立刻赶到处长家，说出我对罗的观察感。处长却评价不高，说，罗在延安抗大当教育长，他不让学员参加我们组织的舞会，他自己却一次不落地到场，还跳到天明。

第二天上午，安排罗总给军机关和淮阴市、地专的中层以上干部做报告，只两百人，会场安排在地委的小礼堂，扩音、录音由我们文化处设置。八时半，李德生陪罗总准时到场，罗一见台角放的扩音器，马上拉长脸对着正说开场白的李德生吼开了：“谁叫你们搞录音的？我不讲了！”转身就走，李忙过拦住他，解释说：“这不是录音机，是扩音器。”

罗更火了，“你能骗我？我还不懂？”

罗的震怒，多年后我才明白，他常年处在你整我、我整你的上层斗争中，生了疑心病。1954年的高饶事件，1957年的反教条和1959年的反彭黄，批判材料大都来自录音整理。罗一直在整人，也防范被人整。此时李德生尴尬得满面通红，回过头叫我们撤走。

罗的讲话开始就带着一股气。讲起他在苏北半月的巡视，说苏北有海有边就是无防，中央重视不够，地方也不愿防，中央拨的款不多，你们——淮阴盐城都不用它修海堤、补桥路，战争需要的，你们不顾，就顾你们的老窝。一个县城才几万人口，高楼大厦就修了一条街，还给我哭穷。你们庙不穷，和尚更不穷，干部喝的双沟、洋河（苏北名酒）比小孩子撒的尿还多，我走一路，小孩子都抹土坷垃追着打我的车，小家伙活蹦乱跳的，饿死的有几个……

罗批地方，我感同身受，我曾到海边考察了两月。每年台风一来，百尺大浪常常冲毁海堤，海水灌进堤内，把庄稼地浸泡成一片寸草不生的盐碱滩，板车能经过的路桥也多年不修，海边的村落都喝不上甜水，干部只会大吃大喝，不管人民生计，县区忙建楼堂管所。我们

对此都深恶痛绝，又无处申诉。罗总是穿着军装唯一能管地方的人，我赞成他的出言不恭。

接下来，他骂开了我们军，说我们去年从浙江移到苏北时，把浙江的地皮刮走三尺（厚）。话很刻薄，他是依据浙江省委状告信中说的，可军委要我们搬家，只给搬迁费，不给安家费，苏北地方穷得叮当响，木料稀缺，一块砖头比三个鸡蛋都贵，我们不得不干些出格的事情。比如，我们在南方建的营房、工厂、环境设施和树木草皮，能搬的能动的，一样不落地搬到了苏北，地方政府来接收，见房屋四壁如洗，没门没窗，骂我们做绝了。

罗总在会上“刮胡子”足足“刮”了我们半小时。批归批，他还是有点人情味。他回去后，给我们增拨了各种经费。

八

仅过一年，罗总就大难降临。他骄狂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聂、叶、徐三位老师群起攻之，说他独断专行，连他最信任的杨成武，也打出翻天印，说他是霸王。叶剑英、叶群、杨成武一起飞到杭州刘庄，向毛泽东告状，说罗与贺龙勾结。周恩来担心罗要谋反，有野心，到处部署对罗进行监控。

毛和林商量，给罗搞了一次大批判。1965年12月8日，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由邓小平主持，没让罗瑞卿到会，却给罗一生算了总账，会议结束回到北京，不满背靠背批罗的聂荣臻，又搞了一个陆海空三军师以上干部的大会，继续对罗揭批，气势恢宏，我们叫三军升帐。1966年3月18日，斗得罗不想活了，从他家二楼的平台上，往下纵身一跳，两只脚掌同时着地，骨折。

贺龙嘲笑他：“你罗长子跳楼都不会，哪有脚先向下的，要头朝下跳嘛。”

邱会作说他是顺墙出溜下来的。

叶帅赋诗云：“将军一跳身名裂”。

文革开始，罗瑞卿被捆绑进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给文革祭旗。

文革结束，邓小平出山，罗也翻身。一次，在总后观看演出，我又一次见到罗，他一进剧场门，瘸着腿，行动十分吃力，有人要去扶他，他一甩手拒绝，自己从最后一排，沿着走道一步步地挪到了第三排。他顽强的毅力，似乎在向公众宣告，他会东山再起。

1978年夏，他秘密到德国治疗残腿，8月3日，他死在德国的手术台上。握刀人成了刀下鬼，有人说是报应。遗体运回国，在301医院开设了灵堂，我去了，那天有3000人向他告别，那遗体脸上的表情依然威风又严厉。

罗瑞卿逝去十周年的那天，我正在耿飏家听耿讲长征。罗的夫人郝治平打来电话，说罗的家乡四川南充已为罗修建了一座纪念馆，郝要耿去南充为纪念馆开幕剪彩。耿没有直接表态，只说考虑后再告诉她。耿放下电话一脸愁容对我说：“我们这些人死了都建馆，全国至少得有好几百，到处都是共产党的庙堂了。修这么多小庙花钱且不论，能有多少人间香火？”

我向耿老建议：“你还是不去的好。让孔祥绣（孔当时正在给耿飏写回忆录）给你代笔写篇纪念文章就可以了。”耿脸上舒展了，说：“可以，就这么办。”

接下来，他给我讲起他和罗在战争中的几个小故事：

一、红军长征过湘江，国民党十万大军堵截，一军团在先头突围，战斗残酷激烈，江面一片血红，漂满浮尸。耿是一军团4团团长，正患疟疾，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罗来了，他是一军团保卫局长，他的任务是督战，他疑耿胆怯畏敌，找来警卫排长杨力问：“你们团长是不是装病？”杨说：“确实是打摆子。”罗不信，又找几个干部查问，都这么说。假如当初有一人在罗的威逼下说了“是”，耿马上就成为了罗的枪下鬼。

我专为此事去青岛找杨力，他刚从北海舰队司令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告诉我，在湘江边上，罗瑞卿三次找他，都是抓住他的衣领，用枪点着他的脑门：“你们团长是真病还是装病？你说假话我就毙了你！”杨力心地纯正，三次都告诉罗瑞卿“团长确实是打摆子。”我问：“罗对一个团长都不相信？”杨说：“他对谁都不相信，长征一路他处死不少人。有伤员，有开小差抓回来的，还有胆小不敢冲锋的。更荒

唐的，我们在战壕里和敌人对射时，要战士露出半个身子，挺胸端枪射击，以显示我军英勇无畏。如谁勾腰，头的姿势低些，他见了就是一枪，说你怕死。“我是他直接管的，我的任务就是监督团长、营长们是不是执行了军团长的命令。当年，红军中像我这样的警卫排长，权力就是杀人，一切听罗的指令。”

二、解放战争初期，杨（得志）、罗（瑞卿）、耿（飏）兵团决定越过平汉线东进。耿是参谋长，一天晚上，指挥所刚穿过铁路，得知敌人上来了两个师，罗认为夸大了敌情，坚持前进，耿主张后撤观察动静。耿对罗不敢硬顶，他把杨得志拉到高粱地里分析敌情，说服杨下决心撤退。他们刚撤过平汉线，敌人果然上来了两个师。要不是耿的机敏，杨罗耿早就成了国民党的俘虏。

三、1947年的一天，罗瑞卿突然决定召开旅以上的干部会，连杨得志和耿飏都不知为什么开会。旅的干部们都来了，罗突然宣布：“把你们身上带的金银珠宝全部拿出来。”干部们愣了半天，不知为什么罗要这样做，都望着罗那双凶神恶煞的眼睛，不得不从藏在自己身上的袖里、领下、衣摆中取出各式各样的宝贝，有金条、金链、金砖还有钻石，堆在桌上（后来过秤仅黄金就有16.5斤）。罗告诉大家，这些东西全由兵团来保管，以后，你们不得个人私藏（罗的本意是防止干部在危难关头席卷金银逃跑）。有的干部哭了，这些宝贵财产是战场缴获的，各级党委都清楚，这些东西由领导干部保存，是为了在危急关头用于部队的急需，这是战争年代的一条重要经验。罗不顾客观环境，只讲左的政策，极大地伤害了干部们的感情。可他说了算，杨得志说不上话，耿更无能为力。

耿还告诉我，我军有两个霸王，彭德怀是第一霸，罗是第二霸。耿对罗的评价是四个字：刚愎自用。

罗的前夫人叫拱平，在延安时期分的手。1957年给打成“右派”，一直孤居在南京。1990年，《炎黄春秋》初创，我和她有过几年的通信。她赞扬《炎黄春秋》的文章，从不言自己一生的不幸，更不愿以怨妇发声。罗的女儿崇敬自己的父亲，和我争论过罗参与一些历史事件的是与非。她对罗的批评只有一句话，说她父亲的愚忠，害了自己。

耿飏口述

——长征前后的负面史实

1987年春，《星火燎原》编辑部主任王长龙给我追加任务——为耿飏代笔写回忆录。当时，我正给他们编辑王首道、程子华、萧劲光等人的回忆录，同时又担负着写林彪传的任务。对这个追加的任务，我虽然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但在采访耿老的过程中，深感分身乏术。因王长龙是从《解放军文艺》私聘我上马的，我的老摊子不能撒手，于是，我和王商量另找人来给耿代笔。王说：“你不能甩手。”我说：“我会全力协助。”

我很快从老部队12军借调来孔祥绣，他是我熟悉的作者，文笔是胜任的。孔祥绣是第一次参写大部头，不熟悉战史，在采访过程中，我得陪同协助。耿老不因循守旧，兴之所至，畅谈无忌。一年后，经孔祥绣尽心竭力的整理成型的书稿，都是遵循“光荣、伟大、正确”这一主旨走笔，凡是影响我军形象的，不管有多真实也决不允许记入史册。耿老的一些不得公之于世的真言只能锁进箱柜。多年后，我重新翻开采访笔记，发现耿老当年所言的负面史实虽是些零星的片段，却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我把它连缀成一篇第一人称的佚闻，其中的“我”就是耿老。

一

国民党对我中央红军第三次围剿之后，我军遭到重大损失，1933年1月，中央红军在滕田进行了改编，师缩编为团。我原是九师参谋长，安排我到一师二团当了团长。刚上任三个月，又到三团当了参谋长。三团团团长是黄永胜，政委邓华，都是刚到职，是他俩提出

要我的，我没推辞。

三团原是罗炳辉的64师缩编成的，没有多少战斗力。

三团的第一仗打宜川。宜川是个小镇，在山窝窝里，靠宜黄、乐安近，进口像华容道，进去才能打敌人，撤回时也得经过这个口子。我一看地形，这是兵家的大忌，我要黄、邓留下一个营守住这唯一的进出口，黄、邓怎么也不乐意，我坚持不让，才勉强留下一个连。

三团一下进去两千人，我们以为敌人是一个营，吃掉它不成问题。三团在黄永胜指挥下不讲战斗队形，也不顾保护翼侧，一个劲地猛冲猛打。没想到打开来人家竟然有五个营，都利用山峦土丘在伏击我们。敌人处于有利的地势，打得我们一败涂地，伤亡一大堆。

我付出惨重代价后被迫撤出。敌人一个营又出现在我们进口堵击，黄要我指挥留下的那个连顶住，拼命打了一整天，保护全团安全撤走。

战斗刚结束，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来了，狠狠地批了黄、邓，表扬我说，耿飚是个好参谋长，他的建议是对的。

第三天，就调我到四团当团长。

二

四团在井冈山时就是朱德的28团，参加过赣南起义，有很强的战斗力。这个团的团政委是杨成武，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团长了。

前任团长肖桃明，在打土围子中牺牲了。他指挥打仗不要命，学人家苏军那一套，冲锋要挺胸昂首，不准卧倒，射击只能立姿，在堑壕里战斗也要露出半个身子，显示革命者的英勇无畏。谁要是在战场上勾着腰运动，他就在后面给你一枪，大骂你是怕死鬼。他就是直着腰指挥打仗的，敌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督战官，一枪就把他撂倒了。

红军早期，我们的营团长指挥能力有限，战术上不讲章法，往前冲只会一顿猛打，打败了，就放开两腿往回跑。干部的号令也原始，班排长用口令，连长吹哨，团长用号。伤了靠自救，战死就不管了。兵员不足，抓俘虏补充。给养一是靠打土豪，再是向老百姓征粮派款。红军的巩固虽有政治灌输，主要还是靠严厉的纪律约束。对动摇的，不听号令的，坚决执行战场纪律。杀人是经常的事，它确保了红军

的壮大发展。

林彪的短促出击，是受华夫的影响，有人把军事上的战术问题放在政治上批林，是不对的，而且短促突击还有过成功的战例，他也为此受过伤。

三

长征，我们是从于都出发的，一军团担负前卫。那年，我25岁，杨成武比我小四岁。我们当团长政委的都不知道这次行动干什么。杨成武是长汀人，和刘亚楼是小同乡，杨在电话里问刘去哪里，干什么？刘回答，你还是个小孩子，不该你知道的事不准问。杨把舌头一伸，对我说，不准问还挨了批，我看这回打出去不像再回来了。没几天，师后勤发来新枪、弹药、银圆。还是七月天，就发了新棉衣、绑腿，还特地给我和杨成武一人发了条军用毛毯。我知道这是一次远走高飞的行动。

战士情绪很高，觉得老在一块地方转，吃菜吃盐都困难了。老百姓对我们的态度一直不好，我们的吃穿用，都是从他们身上硬派来的，都希望离开。

我也装备自己，弄来一双英国的39码半胶鞋（这双鞋我一直穿到陕北），和两件合身的从战场缴获的衣服。

9月下旬的一天，军委半夜来命令，我们开始走上长征路。

我们团是前锋，经粤北，进入湖南的汝城、宜章、临武，在广西全州南、罐阳北的地区，和阻击我军的桂军交火，打了一个大败仗。这应看成是冤冤相报的憾事。之前，我们干了件大坏事，这得从蔡廷锴说起。

蔡是广东人，原是张发奎十一军副军长兼10师师长。1927年，叶挺策动他率10师参加了南昌起义，南下时，还让他担任了左翼总指挥。途中他向叶挺提出：“我不能跟你们走，我坚信国民党。”叶只好让他带10师脱离革命。

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他和蒋光鼐一起率师挽救了蒋介石的军事颓势，蒋介石封他为十九路军总指挥。三十年代初，

他参加了对中央红军的二三次围剿。“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浴血鏖战 33 天，蔡被全国人民誉为“民族英雄”。之后蒋介石急欲对日媾和，调蔡的十九路军到福建剿共。

蔡到福建后不愿打内战，认为抗日必先反蒋，他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同时还发表“反蒋宣言”。又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蒋派出 15 个师入闽镇压，蔡急切请求红军支援。我们的一军团已经在福建，就是按兵不动，我们在山上，蒋介石部队从山下经过也不让出击，我军坐山观虎斗，还向党员宣传，蔡廷锴是第三势力，比蒋介石坏，让他们狗咬狗，我们坐山观虎斗。蔡的老广部队起义遭到失败，这一不仁不义的事情在广东军队中传播，都仇视红军。

如若当年红军帮了他们一把，全州南的一战，讲义气的老广军肯定会来支援我们的，至少不会吃大亏。因有历史的梁子，粤军视红军作仇人，眼看着我们挨打。

四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赶出红军，孤身独处，林派了一个班去照顾他的生活，还送去二百钢洋。长征开始，毛泽东受到“三人团”的冷落，林彪派出卫队给毛抬轿子。两万五千里的艰苦跋涉，毛在生活上优于张闻天、博古，没吃过多少苦头。

打开道州，我们住在天主堂，这里有座仓库，吃的东西很多，我都给看住了。林彪指示我，给毛主席送些吃的去，我一下就准备了十担，每担不少于 40 斤，派了一个排送去，他们不认识毛主席，放下挑子就回来了。

从此以后，每隔十天半月，一军团下属的团，都要给主席送去一挑从老百姓家弄来的食物，如糖果、糕点、油盐、酒米，还有腊肉、香肠、活鸡、活鱼等，我都要经手检查才送去。这是林彪的规定。

五

1934年底，我红四团是二师先头，奉命在猴场强渡乌江。我来到乌江边察看了地形，侦察了敌情，准备找刚负伤归队的杨成武商量渡江方案，怎么也找不到他的人影。这时陈光师长来了，张云逸局长带工兵连也来了，我们研究准备绑扎60个竹排，用一个营的兵力夜间强渡。强渡开始，在机枪和火炮掩护下，几十架竹排直趋对岸，敌人虽有零星的还击，我们很快占领了对岸。

有趣的是，军委炮兵连长赵章成信佛，一遇打仗杀生，他就点上香火，抱住八二炮弹祷告上苍：“我赵章成是执行公务，绝非滥杀无辜，死鬼别怨我。”

建国后，赵已是军委炮兵副司令。

还值得一提的是杨成武，他根本就没在第一线指挥渡河，仅听了我们参加战斗的人的述说。后来，他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剧添油加醋地大吹特吹，说他是怎样指挥强渡乌江的。

还不止此，他吹开了飞夺泸定桥的神话。

铁索桥的木板桥面已给敌人烧掉了，杨成武和王开湘带四团赶到时，敌人已退走，根本没打，杨、王的任务就是重新在桥上铺门板和树干给后续部队通过。20年后，杨竟然吹出他组织22勇士，冒着敌人火力前仆后继地冲过铁索桥。其实，死的三人是铺桥时不小心掉进大渡河里的。

六

二渡赤水后，一军团第二次打开了遵义，为了追击王家烈的双枪兵，林彪要我们红一师几个干部化装摸敌情。他弄些洋学生服装给我们穿上，他领着混在逃难的匪军中，很快搞清敌人溃逃方向，林下达命令只有一个“追”字。追击100里，最后歼灭了吴奇伟的一个师1800多人。我带的四团，还抓了一个团长和一个副师长。

二渡赤水，我们去了云南扎西（宣威），全国有名的宣威火腿就出产在这里。我们一军团把四家火腿厂抢得光光的（其中一家还是邓

小平夫人卓琳父亲开办的)。

有的战士背了三只火腿。宣威火腿重，一只有二十斤，天天吃火腿，差不多人人拉稀。离开扎西时，没有敌人追击，提着裤子一天要跑百把里，干部们都骂毛主席瞎指挥。

林彪看到下面反映强烈，写信给中央说毛让部队在弓背上跑，拖垮了部队，要他离开军事指挥岗位，交权给彭德怀。毛也霸气，为这事在大理会议上批评了林。

红军长征一路上，没有后勤补给，要生存只能靠打砸抢。我手中总是拿着根两尺长的铁钎子，只要住进地主家的堂屋，我就用它对着地面或隔墙捅几下，一般都能十拿九稳的找出粮食或金银细软，我们一路从不愁吃穿。

还有一件是看女人洗澡。一天晚上，参谋来叫我，要我去看稀罕。他带我到地主家的楼上，一间屋里点着灯，还有哗哗的水声。他要我从一条有一指宽的门缝往里看。真是让人稀罕，地主的闺女正坐在木盆里在洗浴，虽只看见光溜溜的上半身，也让人神魂兴奋，那一夜我都没睡好。

贫穷逼出来的“抠八”

——某军宣传干事常仁琐记

嘲笑人的吝啬，俗称抠门。四川方言谓之“抠八”。这一绰号通常是用在男人身上，女人持家哪怕手再紧，也会得到顾家媳妇的贤名。唯男人在人际交往中的抠抠搜搜，特讨人嫌。我的一位战友常仁，对人对己抠得不近人情，机关好些人都不呼其名，直叫他“抠八”。其实他的抠不是天性，而是给贫困家庭逼出来的。我的这篇文章，就是为他正名。

一

那是1961年秋，我刚任职炮团训练队副队长，就被借调到军部为一位副军长代笔撰写解放重庆的回忆录。军部住浙赣线上一座中等城市，我下了火车刚出站口，见接站人攒动的头顶上，一块纸牌书有我的大名，举牌的是一位戴眼镜的军人，我快步走近他，自报了家门。对方说：“我叫常仁，军宣传处的干事。”

浓重的川音使我顿感亲切，我打量他，个不高，清瘦，一脸严肃。他把牌子夹在腋下，说了声“走”，就领我出站，上了辆军用吉普。小车驶向城郊一片铁丝网围住的园林，这里我来过，军部司政后机关大楼就掩映在树林中。小车开到礼堂的边门停了下来，下了车，常仁带我进到礼堂的耳房，一进室内，满屋闷黑，堆的全是杂物，像库房，放列却齐整。常仁说：“年前军文工团解散，留下的衣服道具都交我看管，我在这里给你开辟了一块小天地。”

他走在头里，通过货栈般的巷道来到耳房的一角，果然，这里用十多个书橱隔成一个十二三平米的小间。常仁说：“本想安排你住

招待所，那里是闹市，你还得天天往军部跑，不方便，住这里委屈些，您看合适不？”我环视未来的工作起居，一张单人床上已铺上枕头被褥，床头小柜上有热水瓶，墙边矮桌放置了盥洗盆具，写字台临窗，光线柔和。我说：“很好，谢谢你的精心安排。”

他那张板实的脸上露出笑容，说：“往后，你有事就找我。”

放置好行装，已到晚餐时间，常仁带我到他们政治部的食堂就餐。他先到事务室领来一张菜饭卡交给我。卡片像月份牌，上有主食米饭馒头，副食只有甲菜乙菜丙菜，价格都是固定的，月终结账。

食堂不大，紧紧巴巴地安置了六张餐桌。厨间的案板上摆了三盆菜，一个炊事员正在执勺划卡售菜，另一个窗口由一个炊事员专售米饭馒头。常仁告诉我说：“甲菜两毛，乙菜一毛六，丙菜一毛二。乙菜不见肉，只有几颗油花子，你就买丙菜，划得来。”

来食堂就餐的人很少，都是单身汉。我买了份丙菜和三两米饭，随常仁坐在一桌吃开了。他没买菜，吃的是自己玻璃罐装的咸萝卜干，上面还有一层厚厚的辣椒面。我见他那嚼动的嘴唇和清癯的脸庞，心底泛起一阵酸涩。是不是大饥荒还在困扰着他？他见我不解地望着玻璃罐，便解释说：“我的咸菜比你的菜有营养，成本才5分钱。”

我说：“你的菜没油水啊。”

他说：“你的丙菜又有多少油水？”

的确，我的一小盘菜全是莴笋叶子，又少得可怜，差不多一片叶子伴一口饭在吃。

我问常仁：“您顿顿如此节约？”

他摇了摇头：“午餐跟你一样，买个丙菜。”

常仁边吃边告诉我：“机关干部每月每人能得到一斤黄豆、半斤白糖的补助。处长要我向部领导写报告，把你列入我们处的暂编人员，享受‘特供’待遇。”常仁补充说，“大饥荒以来，政治部就有13人得了肝炎，白糖和黄豆都是副军长从地方走后门弄来的，千万别乱传，传开了要坏事的。”

这类紧缺物资，在基层不会有份的，我感激宣传处的照顾。

晚饭后，常仁带我进城逛大街。街道清冷，主要街道的商店还在营业，上门的人不多。常仁说：“小摊小贩那里东西多些，就是要

价高，一般人吃不起。”

我们来到一条街的巷口，一群人正围着一挑西瓜购买，两毛一斤。常仁挤了进去，挑选了个小西瓜，上秤一称，二斤二两。常仁不放心，拿过小贩的秤端详了一阵，掏出一叠毛票，清点了两次，给了小贩四毛二分钱。

回到大院，常仁只要见到熟人，就举起西瓜吆喝：“老伙计，到我那里啃西瓜。”对方见到他的小西瓜都笑了，说：“抠八啊，西瓜皮别扔了，还可以腌着吃。”

回到办公室，我在他办公桌前坐下来，他从抽屉里取出把小刀，把西瓜切成十牙，我吃了两牙就歇了嘴。这瓜上市有好些天了，有酸味，常仁劝我：“便宜的东西，味要差些，你就放心吃，坏不了肚子。”他见我不动，一口气吃了八牙。

常仁分管文件，一直住办公室，他用文件柜隔成了个五六平米的小间独居。办公室大，白天有三个干事在这里办公，晚上就是他的天下。

处长来探望我，要我树立长期思想。他懂行，知道代笔撰写回忆录不是搞新闻报道，要找众多的当事人细说战斗过程和英模事迹。处长特别嘱咐说：“你没有解放战争的经历，所获的口述记录要去查询真伪，常仁会从档案室里找来相关资料帮助你鉴别。”处长把我纳入宣传处的一员，要我参加他们的组织生活，这是对流动人员的一种约束。处长说：“你的工作、思想都可以向常仁汇报。”

处长还向我介绍起常仁的历史。

常仁是1950年春从四川参军进入军干校的，朝鲜战争中立过二等功，回国后升任师党委秘书。五年前，处长下部队发现他工作作风缜密，调来宣传处做了内勤。他出身好，祖上三代都是贫农，上呈下达的文件、指示报告，都放心他收转或保管。文笔不错，对全军的政治教育，部队的思想动态，每月都由他整成简报上送军党委或军区宣传部。他还担负全处的日常杂务。宣传处有干事一大堆，分管宣传、教育、文化、文艺、报道、摄影，还有资料室、图书馆、电影站，人数相当半个政治部，粮票薪金及各种购物票证，全由他领发。

处长说：“常仁办事认真负责，是处里的好管家，年年都评为政治部的先进工作者。您的采访安排和吃喝拉撒睡由他包了。”

二

刚住下的第二天晚上，我正整理采访笔记，忽听得库房一头传来刺耳的缝纫机声。我赶过去想提醒干活人的动作放轻些，一见是常仁在一个小隔间里修补衬衣。衬衣袖口毛了，他正在锁边。见我到来，说：“你今天的采访如何？”我说：“很顺利，都是你安排得好。”我发现他修补的衬衣没有领，感到怪异，问：“你就这么不带领穿它？”他停了机，脱下军上衣，说：“你看看，我衬衣和领子是分家的。”我近前一看，套在他肩腋下的衣领是个空架子。我感动地说：“没想到你这么节省。”

常仁说：“我要是一个人过日子，会是个富农阶级，现在一大家子，不省吃俭用，全家就要喝西北风。”

常仁告诉我，他不单会缝补穿用，还会编织毛衣，他的内衣内裤床单被褥，都由自己制作；袜子也是布做的，布料是老娘织的老土布。常仁洗涤衣物从不用肥皂，一块肥皂钱可以从市场买回两斤皂角，砸成汁能用上半年。

“我家穷惯了，共产了更穷，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

听得出，他的心底似乎还隐忍着极大的不平。

差不多每天晚上，我除了整理采访笔记，翻阅资料，就和常仁闲聊，他本性质朴，又是直肠子，什么都会向你吐露。

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讲起他在山里捉猴子的故事。

大山有虎、獐子、野猪，猴子最多。常仁家在林间、岩边种脚板苕，不断被野猪拱食；种的苞米常遭猴子洗劫。常仁父亲最会抓猴子，这是他家的一项重大经济收入。

每年秋天，常仁在父亲指导下，用上百根楠竹搭成像房间大小的竹仓，仓底铺上一层苞米粒做诱饵。这帮灵长类是不轻易上当的，先是几个大胆的猴子踩点，试探有没有暗算他们的机关，以为安全了，下到仓底就发出尖利的呼叫，群猴三三两两地来了，小心翼翼地仓顶洞口窜入，进得仓的边嚼苞米粒边蹦跳欢呼。躲在林子深处的常仁，见入仓的猴子数量差不多了，猛拽手中的一根长长的拉绳，仓顶洞猛然关闭，仓内猴群像炸窝般惊呼狂叫，有的把脑袋挤出竹墙缝。这时，

常仁提着几只公鸡到仓顶，先宰一只，拎着鸡身把血洒向仓里的猴群。猴子生性怕血，哆嗦着捂住脸。“杀鸡儆猴”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常仁连连宰杀了两只公鸡，直到每只猴子身上都有血了，才抱来一捆竹鞭和套绳，他下到仓底拉出一只猴子就用竹鞭猛抽，把所有猴子打的半死不活才给他们套上绳索，再关进竹仓。商人进山来收购，以两块大洋成交。每卖出一只猴子，同时要给买主抽过猴子的竹鞭，这是猴子终生敬畏的法鞭。差不多每年常仁家能收入上百元，要不是共产党来了，常仁家的积蓄可以买下一大片山林。

常仁说：“我家要是成了地主，我敢说，我家的财产全是劳动所得，没有丝毫剥削。你看看现在，贫下中农家已一无所有，不知哪一天，中国会出现李自成，你信不？”常仁越说越沉重：“公社大炼钢铁，把山上的林子砍光了，不但抓不到猴子，连柴火都拾不到了，一天就靠一毛钱工分过活，老爹老娘浑身浮肿，我担心老两口离大限不远了，我趁春节前回去，给老人安排后事。”

常仁还提起两桩耿耿于怀的事。

一是他家成年累月辛辛苦苦积攒的500大洋存放在地主家，土改时给工作组没收了，硬说是阶级观念糊涂为地主窝赃。父亲挨了斗，还撤销了村的贫协组长。

二是他家屋前有棵樟树，是明末高祖迁来时种下的，树龄已三百多年，长的已有一抱粗。公社化后山林没有了，公社副社长盯上了这颗参天大树。去年常仁探家，自己动手砍下了这棵树，截成三节堆放在屋后墙根下。这是常仁最记挂的一块心头肉，他担心，不知哪天会给副社长弄走。他决定今年探家时给老人做成寿材。

三

一次，常仁摆起了他的家世，说自张献忠洗劫四川后，他的祖上从湖广迁来荣昌大山就没挪过窝，世世代代都给地主看护山林。地主待人宽厚，给他家不小的自由，可以砍柴、挖药、猎野物，在林间的空地或石窝窝还可以点种些红苕、苞谷。靠山吃山，挑些山货赶场上市，赚来的钱够全家零用，常仁上高中的学费也不愁。

常仁对党在农村中的政策有自己的看法：“共产党来了，先是让地主减租减息，穷人欢喜了一阵子。如若给地主留下些利益，阶级矛盾会得到很好的调节，非得要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搞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消灭地主阶级，人们拿到土地证算翻身了吗？合作化土地归了集体，很快又搞人民公社，每天的一毛钱工分，就是农民的全部利益，山上一草一木都姓了公，你要是动了手，公社干部就带领民兵来家牵猪宰羊，连下蛋的老母鸡都给抱走。”

“古往今来，老实巴交的农民胆小怕事，又最具有忍耐力，赖以生存的条件要求很低，只要饱了肚子就阿弥陀佛。”

常仁懂得生存的法则，对党的怨怼，只能私下在真诚的朋友跟前诉说。

又一天晚上，常仁边拣选刚发的黄豆，边和我聊起他的家事。他说，在他生长的山区，根本不存在地主和农民的剥削关系。他认为，千百年来地主拥有的大片山林，是自己勤奋经营积累的财富，他们的产业交给穷人照应，都遵守着祖上传下来的契约。比如，护林人不得动山上的一根林木，打柴火荆丫枝，都要维护林子。林间种杂粮、捡菌子、打野物，财富取之不竭，收入再多，地主不会向你伸手。逢年过节，地主还要给护林人家礼送腊肉、糯米粑之类的年货，关系和睦，如亲如故。常仁家山下是大坝子，佃户都种谷子，和地主是租佃关系，收成是四六开或二五开，年成好就多交点，年成差就少交，从没人催租逼债。

提起土改，常仁更是愤愤然。常仁家乡是1952年初进行土改的。父亲生性耿直，认为他家为地主看护山林，是地主提供了丰厚生活资料做劳动报酬，是有恩有德的。地主厚道就有人气，工作组组织的斗争会费了老劲，几个昧心人的控诉，竟把天降灾、人病故，都说成是地主盘剥造成的。常仁父亲上台就放声大哭，他哭的不是受压迫受剥削的苦大仇深，而是世道的浑浊，人心的沉沦。工作组还以为常仁父亲是郁结于心的阶级仇恨难于言表，安慰他，扶他下了台。

常仁家分得的浮财，有箱柜衣物和用具，常仁父亲正义又迷信，怕违天意遭报应，悄悄地送还了细软和锅碗瓢盆。地主给撵出自家大院，在一处岩边搭了个窝。十冬腊月天，常仁父亲夜间送去衣被食物。

那几年常仁还在朝鲜战争前线，这些故事是常仁回国后探亲时，二老给他倾诉的。

我万万没想到，一个党的依靠对象，竟然与党如此离心离德！常仁的这些“反动思想”要是被人家知道了，打了小报告，即便常仁出身再好，也得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前些年反右，我所在炮团的一批老兄，指责政府的统购统销，是卡人脖子的政策；骂区乡干部多吃多占，为官不仁不义。这些言论比起常仁说的要轻多了，都给划为中右，发配到黑龙江垦边去了。常仁的出言无忌，让我担心。

四

春节将至，是常仁的探亲期，他从小年开始，就忙活收拾回家的行装——把床底下积存的米面、副食装进两只大麻袋，纸箱集存的废纸订成十多个作业本给孩子用。宣传处的同志，在此时都伸出援手，有给衣物布料的，有给粮票的，处长拿出20元给孩子做压岁钱，我把分得的白糖、黄豆全给了常仁，还给了几本《龙门阵》月刊，让他在路途上解闷。

腊月二十八，我起了个大早给他送行。他挑的两只麻袋鼓鼓的，足有七八十斤，到火车站七华里，一路闪闪悠悠的没有歇气。军人优先进站，他没排队就挑着麻袋进了行李房，检查过磅之后，他帮助搬运工把两只麻袋放到运行李的架子车上，系紧绳索。这才拍了拍手，转过身来向我挥了挥手，进了站台。这是辆西去过路的快车，几分钟车就开动了。

回来的路上，我感到十分欣慰，凭常仁充沛的体力和欢愉的归心，那些积累一年的物资捎回家，他那苦难的家会欢乐几天的。

常仁走了，我也探亲，一个月后，我们又聚会在他办公室，他抓出几把花生、栗子放在桌上，算是对我的谢意。我俩边吃边聊，常仁像往常一样，又倾出一腔苦水。

常仁是大年三十到家的，父母重病，为了慰藉老人，请来了三亲六戚，摆了两大桌，还把带回的年货分了些给乡亲。过完初三、常仁就把屋后存放的三根樟木搬出来，自己动手解成板，妻子当了下手，

忙活了好几天，钉成了两口寿材，父母看了很满意，说，到了阴间有住处了。

常仁像完成一项重大任务般的喜悦，那些天脸上笑意漾动，嘴里还能哼几句小曲。

一天，我采访回到政治部食堂就餐，刚进门，正碰上常仁端着碗筷出来，一见我就附着我耳朵说：“我出事了。”

我吃惊地注视着他那张阴沉的脸问：“怎么回事？”

“吃完饭来办公室再给你说。”

我三下两下扒完饭就来到办公室，常仁沉重的叙说了他出事的原委。

他回家前找了处长，提出要求政治部出份公函，让他带回去处理双亲过世后的棺木问题。他只对处长说，山区无法火葬，请求公社批给两立方木材。处长以为小事一桩，告诉常仁：“我先给秘书处打个招呼，你用政治部的名义写个简信，交给他们盖个章就行了。”常仁却在写信时改动了内容，说他家樟树是祖上传下来的遗产，伐下后制成棺材是为双亲去世后安葬用的，请给予支持。没想到，一直在打常仁樟木主意的公社副社长抓住把柄，说常仁身上有资本主义的尾巴，砍的樟木是公家的，公函是假公济私，破坏了军民关系，违背了国家政策。这位副社长的揭发信到了政治部党委手上，成了追究常仁的罪状。

我相信常仁的陈情，他的违法乱纪是地方小官僚所逼。罪过都加在常仁身上，是不公平的，还会影响常仁的前程。我心中升起一股惋惜之情，决定去找处长，请求组织从轻发落常仁，这也是党章赋予我表达个人意见的权利。

我到政治部宿舍楼见到了处长，他那张惯常和颜悦色的脸已变得憔悴。他刚听完我表述的意见，心火陡起：“你的同情是不讲原则的。我们这里不是你那个部队，机关的干部战士都应是执行党政策的表率，谁敢容忍他这么胡作非为？”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对方有大错，常仁的错也不是蓄意的。”我辩解说，“他给全处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是不是请党委处理时多加考虑？”

处长更是震怒：“功过绝不能混同。常仁确实做了工作，可做的

都是些忙忙碌碌事务性的。他有严重的农民意识，一有空就为他家的吃穿用忙活，很少坐下来学点政治。他的出事，损害了政治部的形象，为军队抹了黑，党委不会等闲视之，如果他再不吸取教训，就会毁掉自己的一生。”

处长要摆脱自身的不利处境只能如是说。我灰溜溜地回来给常仁通气，只说：“处长对你是恨铁不成钢，这次给你处分不会轻的，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常仁心情淡定，说：“处长是我的顶头上司，政治部党委常委，又是当事人，他很快就要下到师里去任职政治部主任，他心情是复杂的。你就别再为我操心了，处分大小由他们去定，我会正确对待的。”常仁又说，“处长是进步学生到抗日根据地的，家庭是大地主，土改时父母给撵出家门。解放后，他还揭露他哥哥当过日伪税警。他背负着家庭的包袱，在政治上一直是小心翼翼地。如若思想不左，他就无法在政治机关生存。”

常仁对处长的为人有着这么透彻的认识，还能说他头脑里满是农民意识？我已无言安抚他，他只能听天由命。

五

晚上，处长来通知我参加明天“帮助”常仁的支部大会。我推辞说我有采访安排。处长神情严峻，说：“你必须参加。你们从西南参军的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经常出毛病，你不要回避受教育的机会。”处长又说，“你和常仁朝夕相处了好几个月，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应得到清洗，你要大胆地揭发，帮助他改正才是。”

处长辞严语硬，我只能从命。

支部大会是在政治部会议室召开的，到会三十多人，济济一堂的处长干事们，都是从部队精挑细选上来的政工干部，才品和嘴上功夫更胜过一般人，往后他们回归师团都会出任科长主任的，这种会正是他们展示自己立场观点的大好机会。

会一开始，常仁先检讨。他做过党委秘书，过批判关有经验，他语音低沉，说自己的阶级思想阵地给腐朽的资产阶级占领了，成了

俘虏。他还给自己带上一堆帽子，沉痛的声调真像在剖心革面，触及灵魂。处长检讨了自己的失职是对常仁的管教不严，对阶级斗争嗅觉失灵。更多的是指责常仁放松了思想改造，说常仁“是个小生产者，处处想捞一把”，忘记了贫下中农的根本，犯的错误的严重的，应接受组织严厉的处分。

接下来便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声讨：“给军队抹了黑”“破坏了党风军纪”“是政治上的堕落”，“忘了自己的阶级，是背叛，是忘本”最后，支部书记总结说：“我们政治部党的组织必须是纯而又纯的，任何人都不能玷污……”

我一言未发。我是个军事干部，没有他们那么多“党文化”的修辞。我还有点做人的义气，绝不再给常仁着火的身上泼油。幸好，处长没对我追究。

会后，部党委作出决定，常仁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从这天起，常仁思想有了重负，见我时言语少了许多，他不再提自己的家事。不久，我的代笔结束，归队前我去向常仁辞别，常仁突发感慨：“我曾庆幸自己跳出农门又披上战袍，以为会给家人带来好运，没想到，解放后的困苦生活没有尽头……我受了处分，已是穷途末路了，可能还要回到大山窝里去修理地球，重新改造自己。”

他给师党委起草过不少处分决定，都要装进个人档案里。如今他也背起这副沉重的枷锁。

我同情常仁，又感到他做了一件蠢事。我安抚他说：“你摔了一跤，爬起来接受教训就是了，不要多想，批判归批判，你是个有思想的人。”

常仁做了个黄粱梦，他的逆向思维撞到了南墙，党也容不下他，特别是称之为我军无产阶级思想堡垒的政治机关，只能毫不留情的切割了他这个异类。

大约十年之后，我被任命为军宣传处创作员，到任时，我才知晓常仁和处长都离队了。

处长转业到一个省辖市当了个工会主席。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左的思维是合乎建军建党利益的，功不可没，为什么偏偏在倡导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日把他请走了？是不是他的出身不好成不了正果？

常仁给打发回到了荣昌老家，当了公社民兵指挥部的副政委。其间，父母双双亡故，他没有用棺木，而是用竹篾编织的鸳鸯盖住下葬的。文革开始，常仁以为自己翻身有了指望，他在公社最先举起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大旗，成了造反派头头，把他蓄积在胸中的愤恨凝聚成一腔烈火，喷向那个公社副社长。给副社长戴上高帽游街示众，组织大小会批斗，出够了一腔恶气。

他没有想到，毛泽东思想救不了他，文革一结束，全国开始清理“三种人”，常仁在列，由于他出身好，又是转业军人，免了他牢狱之苦，削职为民，回到大山里当了林场工人，儿子在重庆打工，夫妻俩靠微薄工资相依为命。他给宣传处同仁来信说，我永世不会翻身了。

“董永”揭发“七仙女”

——黄梅戏名角严凤英自杀真相

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是1968年4月8日弃世的，这正是文革的火红时期，她死在我们军管的治下。

198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上有她——

严凤英(1931——1968)黄梅戏女演员。安徽桐城人。出身贫苦，十五岁学艺，演旦角。在艺术实践中不断吸取昆剧、京剧、话剧的表演艺术，使黄梅戏的表演和音乐有了丰富的发展。唱腔明朗流畅，音色优美，吐字清楚，独具一格。演出剧目《打猪草》《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等较著名。曾任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副团长。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严凤英37岁就死了，这正是她艺术巅峰时期，由于没有说出死因，读者以为是一般的非正常死亡，显然是误导。

一

就在严凤英死前的那些天，我正在合肥市郊参加12军的党代会。7日凌晨，电话铃把我叫醒，是老王打来的，他是我们军宣传处的老干事，被派到省革委会文口任军代表，全省的文艺单位都归属他统领。他从电话里急切地告诉我：“严凤英死了。”我吃惊地问：“怎么死的？”“自杀的。”“为什么？”“几句话说不清，回头再告诉你。等主任起床后，你马上向主任通报。”主任是党代会的秘书长，卧室在我楼上，我穿衣起床，来到主任房间，告诉主任：“严凤英自杀了，情况不明，王干事要我向你报告。”主任说：“给我口头说说可以，王干事必须向省的革委会写出文字，一定要清楚责任。死了人，我们支左

干部有错，就得承担下来，不要推诿给别人，你马上进城去搞清这件事情的原委。”

军队在安徽的支左干部有6千多人，都是接受双重领导，省革委会管行政和吃喝拉撒睡，部队管思想作风的建设。主任对在第一线的干部，最大的担心是“男女关系”，因和地方杂处，拈花惹草的事频频发生，严重影响我军的声誉；再就是不能执行好“一碗水端平”的政策，支一派，压一派，一旦方向路线出了问题，就会招来中央文革的指责。死人的事天天有，主任倒不十分介意，只是为日后事事都要有个交代，强调我们要留下文字依据。

吃罢早饭，我驱车进城，电影《天仙配》的七仙女的形象一直萦绕在我脑子里，尽管造反派把严凤英整得死去活来，怎么也挥之不去我对她美好的记忆，她当了“牛鬼蛇神”，也想见见，反觉得是一种幸事。一天，我有意去省黄梅剧团大院，说是找军代表，真实的是想看看严凤英。很巧，严从办公楼下来，正好在楼梯口碰见她，她的脸色土黄，突然见了我这个陌生军人，眼神是惊惧的，她的模样再也不是那天真无邪的仙女，倒像个50开外的家庭主妇，这年她才36岁，我和她没说话。我到办公室问军代表刘万泉：“严凤英放出来了？”刘说：“我们开始搞大联合、‘三结合’，关了一年的‘牛鬼蛇神’都放回家，每天要她来我这里，接受训示。”我问：“你怎么训示？”“她天天来，没话可教训了，就给她读两段毛主席语录。”

我多次见过这种训示的仪式，通常是把“牛鬼蛇神”或“走资派”集合在主席像前请罪，再由军代表数落他们的“老底”。

去年，我刚到合肥，就去市中心四牌楼看群众刷的大字报，大约有七八个专栏是揭批严凤英的，说她反样板戏、反江青。文艺口的造反派都咒骂严凤英是黄梅戏的祖师婆，指责《天仙配》是宣传阶级调和的大毒草，更多的是揭露严凤英生活作风的事。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民间喜欢传播达官伶人的这类事。我半信半疑。

来到老王的住处，这里是省革委会的办公楼，老王就支了张单人床住在办公室的里间，他刚处理了严凤英的事从医院回来，一见我就说：“严凤英一走，省黄梅剧团的P派夹起尾巴了。”他像出了口怨气。搞大联合，剧团的P派群众经常找他闹事，他对这帮人烦透了。

我告诉他，主任让我来问你，严凤英是你管的，她的死，在剧团支左的刘万泉有没有责任？

老王见我是代表组织来的，正经起来：“这事有它的偶然性。”老王先定了调子，然后才给我讲起事件的导因。

二

文革一开始，严凤英就是众矢之的，大字报批判她天天不断，从1968年的三月底到四月初，文口批严凤英升温。那些天，常把她弄上汽车串街走巷的游行，省艺校造反派对她更是轮番围攻批斗，就在这个当口，出了桩怪事。

省黄梅戏剧团宿舍都是筒子楼，没厕所，出恭得到大院西头的公共间。四月三日那天，天刚微明，《天仙配》扮演董永的王书舫拉肚子如厕，拉完刚出门，影影绰绰中见一女人往粪池抛下一包东西，还用一根竹竿往坑里杵了几下，转过身就慌慌张张地跑走了。王书舫注意这人的背影，判定是严凤英，王认为，严凤英是在消灭见不得人的脏物，决定要看个究竟。他找来粪掏子打捞，为了得到隐秘，臭气熏得他几乎窒息也不顾及，费了大劲捞出来的物件是报纸包裹的，他用树枝扒拉开一看，惊呆了，是一座碎了的毛泽东瓷像。这可是犯下了滔天大罪啊！王书舫在剧团是G派观点，和严凤英参与的P派对立，在团又有较好的人气，他虽进了牛棚，G派群众还是准备把他作为革命干部推荐到“三结合”的班子。这包罪物是天赐，就像董永得到七仙女一样，他忙端来一盆水冲洗，原封包好交到军代表办公室。

历史从这里出现了惊人的拐点，热爱七仙女的“董永”，更热爱毛主席，把“七仙女”做了祭品。

军代表刘万泉是12军住合肥一个团的俱乐部主任，他两眼内视，我们叫他“刘瞎子”，为人倒挺正气的，阶级斗争的思维铸造了他的待人处世。他一口咬定，严凤英反对江青，反对文化大革命，出于报复心理，蓄意把毛的瓷像打碎扔到茅坑，让他遗臭万年。他招来剧团两派的头头观看罪证，头头们更是义愤填膺，这是大是大非，决定共同组织召开全团大会批斗严凤英。严当即被推上审判台，打倒的口

号声、责骂的批判声响彻大院，人人奋起千钧棒，不把严凤英批倒批臭，绝不收兵。

下午，又用一辆大卡车把严凤英拉上了大街。大概是无法也不敢向公众说清严把毛的圣像扔到粪坑的罪行，脖子上依然像过去游街一样，给她挂了双破鞋，向公众昭示她放荡的历史。

游街、批判连续进行了三四天，严凤英有冤无处申，回家就捂住被子哭。她的丈夫王冠亚，原是南京军区话剧团转业下地方的，他俩把这尊像请来后像神龛一样供奉在厅里，严凤英擦拭时不小心碰到地下摔碎的。如是一般的人不慎所为，还情有可原，严凤英是“牛鬼蛇神”，根本无法向群众说清道明，只好自己消灾弭祸，把瓷像的碎片包进旧报纸丢到粪坑里。哪知道，“七仙女”竟然撞上了亲人变冤家的“董永”。

王冠亚左劝右说，都无法止住严凤英的悲愤，她已厌世，没完没了的奇耻大辱该到尽头了。她趁丈夫上厕所离开，写下几句遗言：“——我严凤英一不反党，二不反毛主席，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写罢，从床头柜拿出一瓶安眠药片倒进嘴里，等丈夫回来时，大半瓶安眠药已咽到肚里。

王冠亚发现了，马上报告给军代表。刘万泉处理造反派的事务心存戒备，怕引火烧身，严服毒自杀，他看成是阶级斗争的严重反应，马上带上几个造反派头头来到严凤英家。刘一进门见严躺在床上，就指责她犯了滔天大罪逃避惩罚，自杀是畏罪。几个跟来的造反派头头也发出怒吼，严凤英的卧室像是在开现场批斗会。

在一旁的王冠亚已是忍无可忍，把手伸到军代表面前露出手表说，都11点40啦，快救人吧！

刘万泉这才醒过神来，跑到办公室打电话，要老王来处理。王马上赶到严凤英家，要造反派找车拉严上医院。造反派听说要救反革命，一个个都溜走了。老王从大院里找来一辆平板车，把严扶了上去，老王蹬车，刘万泉在后面推，他们先到市的第一医院，这里黑灯瞎火，没人值班，又拉到市的第二医院，一听说是严凤英，门诊不接收。老王和医生讲理，也说服不了他们。严躺在车上一字一顿地说：“你们别为我忙了，我就这样了。”这是她最后的人生留言。

三

这时，已是凌晨3点了，他俩又蹬车跑向西郊，来到安徽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医生给她灌了半钵高锰酸钾液，严已昏迷，连吐的反应都没有了，老王已束手无策，5时刚过，严凤英就停止了呼吸。

老王要医生解剖尸体，医生拒绝说：“我们是不会为反革命分子留下证据的，听说她身上有梅毒，弄不好会传染给我们的。”

老王像是在给医生下达命令：“我就是取证，你不动，你就准备承担责任！”

无奈，医生打开了严的腹腔，清肠、洗胃，得到了大半瓶白色积淀物，经化验，确认是安眠药粉剂。（我和严凤英的夫君王冠亚有过沟通，王认定剖腹是查找严腹内的发报机，这显然是荒诞的传言）

为了把问题搞清楚，老王带我去见刘瞎子，走进黄梅剧团大院，造反派正怒不可遏的控诉严凤英的种种罪行，通过大院的高音喇叭传出了他们的讨伐声。刘正在主持大会，老王让他出会场来说话，刘一脸的肃杀来到我跟前讲述了事件的经过，他说的和老王说的一般无二。

我问他：“为什么不赶紧先救人？”

刘理直气壮地说：“我敢救她吗？她是自绝于人民，救她，造反派会指责我阶级立场有问题。不信，你可以听听我们正在开的批判会。”

文革后，严凤英走上不归路的前因没人敢提及，有人指责军代表缺少人性，其实，当时刘万泉所表现的一切正是我党的本性。刘不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对严的见死不救他持有充分理由：“支左就是搞阶级斗争的，死了阶级敌人，长了革命者的志气。”他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审视一切人的。

北极村的第一富

——村支书的权力寻租

《解放军文艺》社是军队的文化阵地，对政治学习从未中断过，尤其关注中央文件和报刊的重要社论。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三中全会公报的第二天，我们像往常一样，端上水杯，准时坐到会议室，主持人展开报纸，把公报声震屋宇地朗读了一遍。按常规，人人都得认真思考，道出你领会的公报精神，主持人会像灶王爷一样，把大家最美好的语言，汇集在他上送的学习简报里。尽管这种学习已时过境迁，我还是依稀留下些记忆，如给被打倒的“走资派”平反；否定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重新认定“天安门事件”；经济恢复的计划安排等等。感受不到公报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也许是风起青萍之末，公报的初衷可能是只做些紧迫性的政策调整，后来华国锋下台，有人才认定公报策划了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隐性政治过渡，改革开放的提法是后话，还谈不上下河摸石头。

一

当时一向紧跟中央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宣传三中全会并不积极。总政宣传部一位老总告诉我说，原因有二，一是军队正在深入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各级的领导班子亟须调整。同时，全军上下要进行巩固部队、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二是心有余悸。文革运动的疯狂、持续，引得举国愤怒，军队一直在用枪杆子卫护这场运动，几十万军队干部参加“三支两军”。十年的军事管制，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亿万人民群众和他们的家庭遭受到严酷的政治迫害。军委领导不敢坦然面对公众，更不敢说毛泽东的半个“错”字。

领导们更担心的是，新形势下再次跟错人、站错队，重犯路线错误。所以对付三中全会唯一办法就是一边观望，一边慢走。这位老总的解说很现实，却不涉及意识形态。

这一时期，各报刊社评蜂起。理论家们一路抬高，妙笔生花，把公报说成是“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伟大的历史转折”。一位皈依革命路线的军旅作家，愤然说：“什么历史转折？转折就是复辟，我们是军人，守望的是文革成果。”

各种社会思潮涌向部队，隔岸观察政治风向的各级政治机关，看到了在干部战士中间天天发生的“活思想”，纷纷要求总政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措施。我们《解放军文艺》，是党的舆论工具，它要直面部队。我向领导建议，应该组织一批军内作家到社会底层去，把握一下时代的脉搏，写些反映现实的作品，是对部队最好的形势教育。领导顾虑重重地对我说：“上头没有部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如带作家下去，还是到部队走走为好。”我无奈，从各大军区选了5名作家去了“反修”前线。第一站到了漠河。

二

漠河位于我国最北端，北纬度53.3度，背靠大兴安岭，是濒临黑龙江的一块小平原。漠河是公社所在地，这里驻守着黑龙江省军区的一个边防连，是我们最理想的落脚地。

作家都感兴趣这里的北国风光，爬上江边13米高的瞭望塔，可以看到对岸“苏修”军民的活动。黑龙江刚开冻，裹着腐叶的江水犹如一条黑色的巨龙在滚动，我们坐上连队的小船沿江漫游，还招来苏军的快艇跟踪。傍晚时分，我正和边防连的指导员闲聊，两位作家跑到连部来气冲冲地告诉我说：“漠河出修正主义啦！”

语出惊人，我忙问：“怎么啦？”

“漠河的一个大队支部书记家盖起小宫殿。”空军作家小宿好像和人争吵归来，一脸的怒气。

成都作家小孙补充说：“这个支书无法无天，竟敢把大兴安岭的树砍回来自家用。那些树全是落叶松，都有二三十年的树龄，他一下

就弄回家几百棵。这还了得！”

在一旁的指导员马上给我解释：“二位说的是漠河公社三大队的支书，姓李，儿子是县委的科长。林区政策放开了，儿子要父亲做致富的带头人，说往后来漠河游览的人会很多，要他盖个宾馆式的房舍做接待，县委允许他家个体经营，还专门批了他建房的宅基地。”

小宿一听指导员的解说，像是添了一把火，说：“原来靠儿子和自己的权势做暴发户，一般老百姓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小宿家在农村，一直在穷过渡中过日子。前些年，他家的一头羊啃了村边杨树的树皮，还给罚了30个工分。

指导员说：“李支书是土改时翻身的积极分子，当了20多年支书，今年他58岁了，县里不让他下来。我们这里是反修的前哨，他又是大队民兵营的政委，我们要仰仗他搞军民联防，我们和地方打交道，只要他发话，没有办不成的事。”

从指导员的口述中，我知道这位支书过去是全心全意和边防连协防苏修，现在他又全心全意地在为自己积累财富。作为一个新的文学形象，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提议去看看这位支书。

指导员叫来副指导员，由他陪同我前往。去支书家的路上，副指导员告诉我：“去年，政策放宽，是他带头第一个进山，社员搞回的蘑菇、猴头，打的獐子、狍子都要拿些来孝敬他。”

三

十多分钟就到了支书大兴土木的场院。院墙是用粗大的圆木围成，高三米，把两亩多地围了一圈。我们进到大院，天色还未晚，十多个木工正在忙活，有的在解板，有的在烤料。我来到工场中央，和一个正在拉皮尺量料的小青年搭话：“你们盖房盖了多长时间了？”

小青年停下活计站起身来说：“个把月了。”

“还要干多久？”

“难说，至少还得个把月吧。”

“你们每天来多少人干活？”

“有时来十几个，有时二十多，反正我们都排了班轮流来。”

“有工钱吗？”

“小青年笑了：“哪能要钱呀，给老支书干活，都是帮忙。”

“管饭吗？”

“管，中、晚两顿。”

“你们用这么多材料是批准的吗？”

“我们支书在县里说得起话，要是我们也像这么干，得坐三年牢。”

“你们可以申请嘛。”

“那得等太阳从西边出来。”

正说话，一个50开外的老者，手捧大烟袋走了过来，副指导员指着来人悄声告诉我，这人就是老支书。说着，副指导员迎上前和老支书打了个招呼就介绍我：“北京来的部队首长，特地来看看您。”

我注视他，支书身体十分壮实，一边吧嗒着关东烟，一边向我点头，说：“欢迎欢迎，稀客贵客。”

他那张被酒催红的脸上堆起了笑意。

我歉意地对他说：“刚才我们有两位同志到这里来说话不周，冒犯了您，我来向您赔礼道歉。”

“不，不，不敢当啊。他们把我当成了地主资产阶级了，可我不是啊。我多盖了几间房子，都是组织批准的，我绝不会乱来的，我没有越过党的政策。”

“我刚才听指导员说，您盖房是为了接待游客，很有头脑嘛。”

“过去，政策规定不准上山，不敢动山上的一草一木，现在进山打松果，采蘑菇，打点小野物都允许了，我们都按规定办。”

我问起大队的生产状况和民兵的组织工作，老支书说：“我们主要靠山靠江靠地里的庄稼饱肚子。”他管的民兵有130多人，昼夜配合边防连游动警戒。老支书回答得兴致勃勃，又说，现在两岸关系缓和，他的民兵仍在坚持常备不懈的值班制度。

我趁机问：“你盖房要用多少料？”

书记说：“这些料都是冬天从山上伐下来的，有300多棵吧。”

这在内地，相当于建造一座小工厂的木材。在漠河建房，房墙全用粗大圆木相互刻扣端头码成，当地人称之为木刻楞。但我不能质问，转了个弯说：“为什么全都用木料盖房？”

“首长哟，”老支书算开了账：“要是烧砖，还要到加格达奇去拉煤，十块砖就是一棵树的价钱。我们靠山吃山，采伐了树，还可以补种，不会坑国家的。”

“县委一下就批给你这么多料？”

“县委可没给我规定数字，我的需要凭自觉，有林业站监督，不会浪费的。”

“你看，你还有两厢房没盖，还得用多少料？”

“还得用100多棵。”支书的回答直率，嗓门放大了。

副指导员怕我惹火支书，打圆场说：“老支书是老革命，组织上对他有照顾，多用几棵树不是问题，给县委说一声就可以了。漠河接待工作做好了，县委也光荣。”

“您的新家将来就成了漠河的第一宾馆了。”我夸耀说：“对来住宿的人还要收费吧？”

“当然收费。”支书理直气壮地说：“我还要搞一些配套设施。比建房用费大得多，起码得保住本吧。”

我抬眼注视已盖成的正屋，是幢两层俄式建筑，朝山式的房顶，全用松树皮铺成，既协调又美观，还用整木支起飞檐，屋脊上有装饰动物，门阁厚重高大，都是传统的雕花，工艺十分精巧，真有点宫殿模样。我问支书：“这么漂亮的建筑，谁给你设计的？”

老支书兴奋地说：“我儿子跑到加格达奇（地委所在地）都不行，到哈尔滨找到省建筑设计院才帮了忙，其实都是些老旧图纸，我们拿回来自己拼凑成的。都是儿子在摆弄，要求房子的建筑一定要有品位。”

老支书像是和我拉近了距离，邀我们去他家坐坐。他老的住家在新建大院后面，他领着我们穿过木栏，走过一晌菜地，来到老支书住了二十多年的院落，也是厢房，用参差不齐的木板围着，约两百来平米，四间屋，与普通人家无异，住房兼客室，客室的陈设有八仙桌，条桌，高低柜，椅子和木沙发。正中墙是毛主席像，像旁是一副简明的对联：兴安岭对我家生财，黑龙江向子孙流金。它准确地表达了漠河的富饶和主人的心境。在屋角的矮柜上，放置了一台让人眼亮的索尼电视机，9寸的，这在北京也是稀罕之物。我问支书：“你们这里有转播站吗？”支书说：“哪有什么转播站啊，我是思想先行买来放着。”

我还看到一台上海出的水仙牌单缸洗衣机，在这里也是时兴产品。支书说让它洗衣不合算，用来盛米面倒是好东西。支书借题发挥：“有人骂我是暴发户，我没偷没抢，装备一点现代化有什么不好？”

他的话似有可指，可能是刚才二位作家出言不逊，让他心存芥蒂。

副指导员担心支书升火，转圜地对我说：“你去看看支书的储藏室，你就知道我们支书有多大的本事。”

支书没有拒绝：“可以参观，我有的都是战备物资，是为大队民兵服务的。”

支书老屋后面是菜园，约半亩地，不到种植季节，地头堆放些柴火和给瓜果支架的树枝。在地边上，有三个隆起的土堆，像暗堡。支书抱开了一处堵窖洞口的高粱秸，透过光线，我低下头向窖里探望，窖里全是酒，30斤装的坛子摞着挤在一起，把五六平米的地窖塞得满满的。我盘算，上千斤酒的酿造，需高粱至少要七千斤。支书见我有狐疑，解释说，高粱是公社拨的。民兵冬天执勤，每夜要喝一顿酒，由我烧制保管，公有公用。他又引领我看第二窖，窖里是从山下采的蘑菇、猴头、蕨菜，还有猎获的野生动物。支书告诉我，都是各家各户上山后给我送来的，其实我哪能一家享用，都给了民兵们做下酒菜。第三窖是土豆、红薯，支书说：“这一窖百分之百是我地里产的，有民兵们的劳动成果。”

支书的快速致富使他拥有一方土地爷的权力资源。我和老支书告辞时，他说：“我的文化不高，一生都是听党的安排，党现在要我走致富路，我的儿子就帮助我动脑筋，说我一带头，有了样板，大家就会跟着学习。”

我不能不疑惑，一般老农民能有这位支书一样的福分？我说：“你这样带头，村里的人反应如何？赞不赞成？”

“有人赞成，有人观望，都怕当新生地主。我就不怕，有党的号召我怕什么？人人都有了钱，穷事就少了，我当支书的也少费口舌了。”

他的话很流利，我还是想让他说具体的：“大家都能像你一样走上致富的路，哪怕花上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功夫，能做到吗？”

“党的政策好了，肯定能做到。”支书很世故，依然不深言其他。

四

在回连的路上，我和副指导员聊起农村的变革，副指导感慨良多，说：“农民文化低，靠单干没有前途。我倒赞成恢复建国初期的生产互助和初级社的生产方式，农民能得到明白的分配。现在是一大二公，地里的产出一半都给人收走，说是三级所有，实际是干部所有，尽管党的政策放宽，所有制不改变，老百姓依然受穷。”

副指导员来自农村，和我有感情上的沟通，我问他对老支书的看法，他直言不讳地说：“过去地主和佃农之间还有个四六开，三七开的租约，老支书拥有法权，可以不由分说地直接占有。你不看见了吗？他上山伐的林木，有县委点头，他动用建房的劳动力，不用给一文报酬，是大家真的支援吗？不，农民有事就得问他求助，要他高抬贵手。有人说这是等价交换，我看是利用公权对别人劳动成果的剥夺，比地主还地主。他掌握的民兵如家丁，社员经常向他进贡，进贡的多少与你一家平安的程度成正比。别看他是漠河的一方土地爷，对县，对地委他在岁末年节也要去上贡，这种人际关系代替了正常的组织关系。我们这位支书和他所领导的支部，就是我们常说的‘战略堡垒’，为从上到下的官僚体制服务。”

我说：“你们怎么对部队进行时事教育？”

“只能按你们总政部署的说，经济放宽，市场搞活，人人达到富有，反正我说我的，空对空，战士们听不听由他自己，我们多年来就是这么搞形势教育。”

到底是山高皇帝远，我敬佩这位副指导员的直率。

回到住地，我们又议论起这位支书，武汉军区作家老刘有一番异乎寻常的言论。他说，要尊重他的创业，也许不道德。但他的致富是靠“自发的力量”。你们骂他造小宫殿，我认为他是在用先进文化在影响这个穷山村，“仇富”观念是阶级斗争的后遗症。老刘要我们去读读《国富论》，人们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会更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效益。

我仍在疑惑，转型期先富起来的尖兵们，是不是从权力走向了权贵？

芦花维权

——一个农妇向政府讨公道的故事

站在我面前的芦花形容憔悴，她是我老伴的远房亲戚，是带着一腔冤情苦水来北京上访的。芦花家住烟台市远郊的莱山镇，老两口种了7亩地，成年儿女做些小生意，家庭和美，孰料灾星降临，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她丈夫姜振林被110关押致死，这一命案是六年前和邻居的口角酿成的。

邻居开肉店，每天要进货，货车总是堵住她家的门，她和老伴姜振林向邻居老板好说，请他卸货后把车开到村边去停放，让她家方便进出。好话说了一堆，老板不理睬。

命案发生在1999年11月3日。这天的午夜，猛然一声巨响，把正熟睡的芦花夫妇惊醒，他俩赶紧起床一看，自家的院墙被邻居的送货车撞倒了。邻居老板来了，连道歉赔偿的话都没说一句，就让驾驶员把车倒走。芦花儿子心气难平，卸下货车的车牌号作为上告证据，老板当即招来他的三个兄弟和一个伙计，把芦花夫妇一顿好打。姜振林这年已59岁，体质瘦弱，芦花53岁，体重180斤，哪有还手之力，打得芦花夫妇趴在地上动弹不得。110来了，不由分说，就带走芦花夫妇，随后又抓了躲开的儿子。

老姜要给所长陈述前因后果，所长不听，说：“抓你们来派出所进行传讯，是你儿子偷走了人家的车牌子。”

老姜和他抗争，站在一边的110一边打老姜一边审问，还做笔录。

所长一看老姜倔，把他和儿子留做人质，关到了禁闭室，放了芦花。

芦花临走想安慰老姜几句，一个110把她带到禁闭室前，芦花从门洞里见老姜被铐在一张单人床的脚腿上，蜷伏在地，浑身颤抖，

还不住地呻吟。她悲恸已极，喊了几声，老姜不应，芦花高喊，老姜啊，你一定要挺住，共产党是讲理的。芦花怎么也没想到，这是她老两口最后的生死诀别。

一

这一夜发生了什么？芦花无法得到证据。十天后的派出所通知他：姜振林已自杀身亡。

芦花只有小学文化，一生没有离开过田头灶间，面对丈夫不明不白的死，呼天抢地哭喊着求助四邻。好心人劝她，“别再和他们斗了，赶快找门子，能得到一笔安葬费了事。”芦花善良憨厚，丈夫之死，在她的心里搅动起火山熔浆一般的痛苦和愤怒。她是老贫农，相信党是无私的，请人提笔帮助写出申诉，到烟台法院指控莱山镇派出所草菅人命。检察院一个月后答复了她三条：

1. 经省、市两级法院鉴定，姜振林系自缢而死。
2. 姜是和邻居斗殴后被传讯的，没有刑讯逼供。
3. 干警无违法行为，不予立案。

芦花无法接受这一判决。她明明看见老姜被铐在一张床的脚腿上，禁闭室是空空的，连根绳头都没有，怎么自杀？老姜遍体鳞伤，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绳印是哪来的？他一只手能自杀吗？仅为一场口角纠纷值得自杀吗？再说，既然找来法医鉴定，为什么不让家属参与验尸？

芦花带着种种质疑，求助烟台市的报社、电台，她告诉记者们，一个没权没势的农户，为什么为一点小事赔上了老命？公道在哪里？她散发了丈夫尸体伤痕的照片，分头给了市人大、市政协、市委书记。三个多月没人受理。

有人给芦花出主意：你上北京去，中央会给你伸张正义的。芦花决心豁出自己的一切，只要有一条路可觅得机遇，连生命也不会吝惜。半夜里，她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个人就上了火车，径直奔来北京。

二

芦花来北京住进了我家。我看了她的申诉信，写得很通顺，有一股强烈愤懑的感情。我通过在高检的朋友，让她到高检的信访二室去见一位受理人。

受理人热情地接待了芦花，听了她的口头申诉，又仔细看了申诉信和烟台政法委的裁定，当着芦花的面，他给山东省检察院通了电话，要他们认真的经手处理。放下电话又告诉芦花，你马上去济南省检察院直接找×××，还让芦花带上一封由他签署的意见信。

芦花怀着欣慰的心情到了山东省的检察院，那里接待她的纪检干部依然十分热情，也开出意见信，让她回到烟台检察院接受处理。

芦花以为她通了天，烟台检察院怎么也得拿出个说法，她天真地等了三个月，仍然是无音无信，她去催问，开始检察院左推右挡，最后摊牌了，说：我们坚持认定你丈夫是自杀的。

这年7月，芦花又来到北京，她已心力交瘁，苍老了许多，她向我们讲起她正在被人“推磨”，说：已逼上梁山了，就得和他们干到底！看得出，她胸中的怒火正在积蓄。

她单打独斗的状况让我感动又忧虑，左思右想，想起我邻居老金，原是总政军事法院退下来的，他曾为“两案”当过审判员，大案小案都参与审理。我上门去给他叙说了我这位亲戚的案情，请他拿个主意。

老金和我有十多年的交情，我们之间无话不说，他听我说罢，轻松地说：“这事好办，你让她拿出10万元，我替她摆平。”

我火了：“人家老头给整死了，还要拿黑钱打官司，岂有此理！”

老金揶揄我：“你老刘不谙世事，还是一根筋，现在谁不讲利益？你要解决命案，就得把票子铺到天安门。”

“为什么一开口就是10万？人家只种了7亩地，别说今生今世拿不出，就是来生也还不清。”

“我是看在你老兄的面子上提出个最低价格，要是别人，少说也要百八十万的。过去有句老话，‘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你啊，枉读诗书。”

老金的数落，代表了当前社会的一种信息，尽管不入耳，却引起

我浓厚的兴趣，我刨根问底：“你要10万元去怎么打发你的朋友？”

老金开襟见怀说：“你放心，我不会要你分文。我可以告诉你内幕，你千万别传出去。你亲戚的状子告发的是110，你去找法院、检察院是摸错了门，公安部和110是垂直关系，如果让公安部某人出来说话，动用公权力就会为你消灾弭祸。”

“就是说，他们是通过权力干预来处理的。”

“老兄啊，讲什么人治、法治哟，能制住人的就是法律。”

“你给我细说，他们为什么只凭打个招呼，说几句话，就产生比法律更大的效力？”

“好吧！我兜底地告诉你。公安部离退休干部现已有四百多人，都是些老资格。过去，他们都是从阶级斗争观点办案的，走后门说人情的，只是些政治利益的人际关系，很少人亲近过人民币。而今眼下就不同啦，他们看到接班人把收受的一捆捆钞票揣进自己的口袋里，眼红了，心热了，更不甘晚年受困，便自行组织起来，为全国来自四面八方的诉讼充当代理人，还美言说成是转型期国家司法的一种发展和创新。公安部领导睁一眼闭一眼，让老干部也得点利益，否则，新老关系没法摆平。他们没有正式组织和称谓，只是心照不宣，私下分工承包案件。按参与者本人过去的人际关系和现时的活动能力，组成北京小组、山东小组、江苏小组、四川小组……凡来自各地区找上门的，都向他们索要佣金，还名正言顺地叫诉讼代理费、工作费等。这笔费怎么分配，据我所知，他们的上、下、左、右都有份额。别看这帮老家伙不在朝为政，个人能量惊人，只要你的钱到位，没有办不成的事，给你摆平了官司，还减少了你的经济损失，甚至还可以免除你的刑罚，这就是收你银子的回报，你还得称颂他们无量的功德。你亲戚的这桩命案，到他们那里，处理起来小菜一碟，你这边掏给人家10万，回头他们有办法让你从那边回收20万，吃不了亏。当事人受到刑事处分，你出了口恶气，何乐而不为？”

老金这番言论，让我恶心又开了眼界，难怪社会上议论：中国有“三害”——黑狼（公、检、法）、白虎（医疗卫生）、眼镜蛇（学校、教育）。这些狼虎借助官僚体制和法律的缺失，生财有道啊！

三

这道门栏芦花是无能跨越的，我惊惧地看到，中央各部委、军队都有类似的潜规则，求助社会舆论，无用也无济于事。我苦思冥想，我向芦花提出：“你要是能把单打独斗的勇气坚持下去，我有大闹大解决的思路。”

芦花说：“孩子都成家立业了，我已无牵无挂，只求讨个公道来祭奠孩子他爹。”

我说：“你回去后，找一块纸板写上‘还我丈夫’四个大字挂在胸前，披麻戴孝，每天去市委门前站立，地上也用纸写了几百字，说明你老伴被迫害致死的过程。他们来抓你，再让儿女出来前仆后继大造声势。”

芦花回到烟台果然按我的主意行事，那天上午，她一身缟素，胸前挂上“还我丈夫”的大牌子，地上铺上张大纸，写的是丈夫被110刑讯致死的过程。

顿时，好几百人来围观，边看边议，芦花的遭遇撩起过路人壅塞已久的怨恨，纷纷历数110多年来的罪孽，责骂办案的没有天理良心。有人佩服芦花，鼓动她舍得一身刚来对付官僚。

警察来了，正义的人们都围住警察说理，一直持续到中午，来了三车警察，硬把芦花拖上卡车，不是抓她去公安局，而是把她拉回莱山镇的家里。

第二天，她又来到市委门前站立，神态更是坚定不移，警察们很快赶来，又把她强行带回村里。警察不走了，堵住了她家的门。夜里，芦花全家出动，溜出了后门，再次到市委前继续抗争，又是一阵和警察扭扯，硬是给拽上车拉回了村。警察包围了村子，昼夜不离人，让芦花有翅也飞不出去。天天劳累又夜不成眠的芦花病了，发高烧，警察见势不妙，急忙送她去医院，打了一天吊针，半夜芦花拔去针头跑了，她不再去市委门前，她去找人帮她把申诉信印了两万份，走上大街，见人就给，口里高喊着“警察杀人”“还我丈夫”。芦花困了就睡在街头，饿了就啃烧饼，无顾忌地四处撒传单，足足让烟台市热闹了好些天。

这是座开放城市，街道执勤的警察面对突如其来的事件也懵了，

不敢当众抓人，只是劝说。

这正是 16 大召开前夕，此时此刻，社会稳定为要，烟台市委面对这个孙悟空式的人物，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指示政法委书记出面安抚，妥善处理。

政法委阎书记来到芦花家，代表市政府、市委表示慰问。一见面，阎书记抱拳说：你闹腾够了，该听听我的意见了。阎书记提出：“人死了，责任由我们政法委来承担，我们同意给你一笔抚恤金，你说个价，我全权处理。”

芦花见书记上门，又具有诚意，心也软了，说：“意见只有两条，一是赔偿抚恤金 48 万元（这是芦花离开北京前，我一笔笔给她算出来的）；二是惩办莱山镇逼死我丈夫的 110 当事人。”

书记带回芦花的要求，两天后回复芦花说：“我让莱山镇来处理你的案子，他们成立了专案组，组长是信访科刘科长，你直接去找她。”

芦花找到刘科长，提出，丈夫死于非命，要求厚葬，要赔偿金 48 万元；家里已缺劳动力，要求给儿子安排个工作。同时，划给几间宅基地。刘科长答复她，经我们研究，抚恤金给你 40 万，其他要求不予支持。惩办凶手还要调查清楚再定，无法马上给你落实。”

芦花和我通了话，我告诉她：“你接受下来，这是 16 大召开前你的最大机遇，不要再去生枝节，往后拖对你不利。”

芦花说：“我不是图钱和他们斗争，我只求给我一个公道，对我死去的老头也是一个安慰。”

四

芦花得到了 40 万元，给儿子买了辆卡车跑运输，又修整了残破的住房，接替丈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耘。她把丈夫的骨灰放在地头，盖了个小庙，每天看上几眼，慰藉他的在天之灵。

芦花的坚持和抗争值得人们崇敬。她是普通的农村妇女，身上闪耀着农民质朴坚毅的光辉。政府的“恩赐”，不幸中的万幸，是她用非常手段，以命搏命换来的。

档案沉重，背负它跋涉军旅 60 年

封建王朝对干部的任免，大都能做到唯才是举。通常是以贤良与不肖为标准，所谓贤良，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者，在庸平者中选择其德才资的综合素质任之，不计较是出身寒微还是来自豪门，即使贰臣也一视同仁，从没有按阶级把人分为三六九等。

自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建立，党政军干部队伍突增，大量热情澎湃的学生、社会青年参军参干，国民党起义投诚的军人和留用的旧职人，亦大批划归革命阵营。要他们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必须搞清楚谁是依靠对象，谁是团结对象，谁是利用对象，就得细察每一个人的立场、观点、出身、社会关系……浩繁的政审工程，动用几十万的人力资源，花费多年时间的内查外调，即使查遍你的祖宗三代、远亲近戚，也不会终结。“血统论”成了任用干部的基本政策，党的组织者一直认为，阶级斗争具有长期性，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还在不断地滋生，每次政治运动之后，被清洗的打入另册，在位的，认定为可用之人，个人档案的内容也随之增添新页。可以说档案注定我们的安身立命和此生的荣辱贵贱。

我党我军建立的人事档案，都是个人的政治史。它虽记录有学历简历，有功过奖惩，更多的是政治思想言行，和让你改变人生的社会关系。共和国吃皇粮的人迄今有 7000 万，人人都有自己的档案，这是苏联老大哥阶级专政的经典传承。档案内容一般不会让本人知晓，而我有幸知道我的档案是怎样厚起来的。

一

1949 年 12 月，我从学校参军。穿上军装的第二天，班长拿来一张军人登记表要我填写，栏目中有姓名（别名）、性别、出生年月、籍贯、民族、文化程度……那年才 18 岁，不谙世事，对家庭出身、本人成分、社会关系、是否参加过反动组织和会道门……都不懂，我要班长解释，班长问我：“你家经济来源靠什么？”

我说：“开茶馆，赚的钱刚够全家吃饭穿衣。”

班长说：“你的家庭出身就填小业主，本人成分填学生。”班长又问我：“你参加过反动组织和会道门没有？”

我说：“什么叫反动组织？”

班长说：“比如，三青团、一贯道……”

我说：“没有。”

“你父母兄弟、亲戚朋友的政治面貌如何？”

我愣住了：“什么是政治面貌？”

“他们参加过国民党吗？是地主资本家吗？是教徒吗？干过反对共产党的事没有……”

我说：“一个舅舅是地主，一个舅舅当过保长，还有一个远房亲戚当过国民党的营长，父亲参加青帮，叔父是哥老会大爷。”

班长说：“这就是你的社会关系，你都填上。”

就这么一张纸，建立了我的原始档案。

按今人的常理，档案是向用人单位提供知人善任的依据，而我们的档案，却不看重你的学历、资历和技能，而是看你的出身、成分，你的社会关系是否符合党的标准。从而判断你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度。

最初，我不在意档案，只把它看成是一种户籍形式，两年之后，才感受到它的巨大威力。

1951 年的春天，我所在的部队投入了朝鲜战争，休整期间，志愿军政治部指示各级政治机关，立即进行一次阶级队伍的清理。师政委给我们宣读志愿军政治部的指示时说，因大陆刚解放，国民党残余势力猖獗，仅重庆市在“313”的大逮捕中，就抓了反动分子 7200 余人，镇压了近千人。师政委特别指出，我们师参军参干的，

大都来自重庆，这是国民党经营多年的巢穴，本人的家庭、亲友，不少是和反动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理复杂的社会关系，对巩固和纯洁无产阶级军队是非常必要的。

师政治部把我们这批学生兵集中在几个点上开办集训队，要求人人过关，个个洗澡，干干净净地干革命。我们每天坐在防空洞里，以班为单位开会，一是自己“脱裤子露丑”，二是揭发检举他人。每人翻肠倒肚地说上一天，把自己的家庭、亲友参与干过的事，眼见的、听来的、怀疑的，连八竿子打不着的，都得如数家珍般地抖搂出来，再由别人分析你所说社会关系的亲疏和真实性，你必须回答各种疑问。自我揭露的越多越革命，你要是说得含混不清或有抵触情绪，革命立场坚定的人就会群起责难，说你阶级立场还站在反革命阵营。

我们都是些十几二十的年轻人，家人亲友干了些什么，哪能知根知底。有人被追逼如审讯，几宿不能入睡；有人为过关，不得不编造情节。有一位老兄，写了十几页纸的交代，列出20多位亲友的反动罪行。他在会上说，这都是我猜想的、听来的，是真是假你们调查去。集训队指导员是师组织科的干事，他在队前表扬了这位仁兄是大义灭亲。一些单纯的人，见他的“革命性”得到党组织的肯定，也激发出一股莫名的政治热情，纷纷效法，毫不留情地对自己亲人进行彻底的“揭发检举”。我们班大概只有我反其道而行之，我从祖父刘晓村说起，他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归国后正赶上四川同志会反对铁路国有化风潮，清军入川镇压，坐镇重庆的熊克武知道我祖父与清军统帅端方有旧谊，请他出山劝阻端方罢兵，祖父去到万县见了端方，端方要留下他做幕僚，祖父决不背离川人的使命，半夜雇一小舟逃离。后来祖父在泸州开办四川的法政学堂，又和蔡锷结为金兰之交，支持云南的护国军。

我的交代遭到了全班的指责：谁要你来光宗耀祖？为什么不揭发你家的坏人坏事？指导员也在会上批评，说我故意干扰这场全国都在开展的阶级斗争，宣布把我给“挂起来”。

过些天，指导员交给我一封揭发信，是揭露我干的一件坏事。那是我入伍后的第一次政治学习，学的文件是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社论号召我们一定要把红旗插遍大江南北，活捉蒋介石。学习会上，

我和一起参军的陶德齐，都不同意把国民党的倒行逆施都扣到蒋介石的头上。陶德齐是蒋介石秘书陶希圣的侄子（陶希圣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代蒋写《中国的命运》一书的执笔人），他理直气壮地说，老蒋领导过北伐，打过小日本，他的功过是非应是二一添作五。

年轻气盛，好打抱不平，是年轻人的天性，而军干校的领导都以阶级观点来衡量我们，大队政委说我觉悟不高，组织小会批判就了事，却不放过陶德齐，认为他出身反动家庭，又追随他伯父的反动信仰，中毒深，是蒋介石的孝子贤孙，对他大会批、小会斗，要他用书面做出深刻的检讨。

陶德齐在学校早就参加了我党的外围组织，我们之间有着兄弟伙的义气，他人品好又热情，每次反蒋游行，学校队伍都是他牵头组织。这么一个进步青年，仅因有点独立见解，就陷入又屈辱又难堪的境地。陶德齐对我说，国民党不民主，靠民主起家的共产党来了更不民主，我们还有生存的地方吗？

一天，我们到重庆南岸海棠溪去扛粮，他叫住我说：“我得马上走，回家。”我惊愕了：“这是开小差啊！”陶说：“我是志愿参军的，也可以志愿离开。”我说：“你得跟区队长说一声啊。”陶说：“说了我就走不脱了。”他的决心已下，我无法阻拦，马上找来几个要好的同学到一家小面馆，一人一碗阳春面，我说：“给你饯行。”吃罢，陶脱下军装交给我，我们又送他上了轮渡，回头我把陶的军装交给了区队长，区队长气急败坏地大喊：“你们怎么就让他走了？开小差是反革命啊！”

揭发我的人是真的，没有编造事实，他的结论是指责我“协助反革命分子叛逃”。

在学习班的会上，我挨了一天的批判，由组织科来人向我宣布处理决定：从副排级降到正班级。

姑念我是刚入伍犯的法，少不更事，处理轻微，如若是老兵，开除党籍军籍，军法从事。

清理队伍学习了一个月，光我们一个师就清查有各种政治瓜葛的 200 多人，集中送回国处理。一路上，有人上吊，有人跳进了鸭绿江，有人拉响手榴弹……当年，我们这伙年轻人，都是反蒋的急先锋，穿上军装成了真正的革命者，又经历了一年多战争生与死的考验，转眼

间一批人竟被划入反革命的阵营，给打发回原籍，心中都罩起了浓云。

多年后，我回老家和他们相聚，他们中有的已是小学教师，有的是工会干事，或是事业单位的办事员……个个都已老气横秋，心理失衡，念念不忘自己的档案，像沉重十字架一样，经历了文革的再清算，又背负它进入风烛残年……

二

我庆幸没脱下军装，自我感觉还有几分殊荣，可不走运的事纷至沓来。就在清理阶级队伍后第三年的1953年秋，空军第一航校来前线挑选飞行学员，我的文化考试和身体检查都合格，政审却过不了关。接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来招收学员，我又遭淘汰。我私下询问团的组织股长，他看过我的档案，我问他：“我究竟算什么样的人？”他坦率地告诉我：“你的档案里已有组织结论，把你列入了可用而不可重用的人。”

战争结束，回到国内，军队迅速转入现代化建设，工农干部大都不适应，被处理转业，我们这批小知识分子，应运成了当然接班人。组织部门查出我在学校参加过“海盗社”，我辩解，那是学生中的文化社团组织，受西方电影影响，崇拜海盗，认为他们是劫富济贫的正义化身。审查我的组织股长说，那更反动，要我写进“是否参加过反动社团和会道门”一栏里。我的档案本来就够灰色了，又给添上一笔锅烟墨，列入另类。按不可重用的原则，是不能当主官的，只任命我为副连长。我工作十分勤奋，被评为建军先进分子，到北京晋见毛主席的，全师就我一人，这份难得的荣耀在我脚下垫起了阶梯，从北京回来就升为训练队副队长，宣传处副处长，反正都是副职。

1962年，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军队再次对干部进行政审，我的战友又一批被清洗。一次，我去师部开会，路过干部科门口，顺便进去看看老刘，他是我在干校时的班长，根红苗正，出校后分配到干部科，此时此刻，他正在里屋清理档案。我们师1500多干部的历史全都堆放在这间密室的十多个书架上，像病历一样，按建制按单位有序地排列。我还注意到门楣上有“非专人

莫人”的字样，我只能站在门外叫他，他见我突然造访，紧张地走出来带上了门。我知道，这是违反保密规定的，我带着歉意说：“我来开会，顺便看看你。”我问他：“又要审干了吗？”

他说：“科长让我准备。这一回，该轮到咱们这批兵的二茬了。”

“二茬是什么意思？”

“就是过去审干时留下的尾巴，社会关系不那么清楚的，这次都有可能被清理，我们科已提出了 200 多人的名单送审。”

老刘还告诉我，“军委已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干部队伍允许有中农（小业主）成分占 2.4%，地富（资本家）成分占 0.8%，其他有在旧军队干两年以上的、有海外关系的和五类分子沾亲带故的都得走人。比如，我熟悉的你们连的排长小周，他哥哥曾经在国民党空军场站干过机械师，上尉军衔，这次，小周就被列入排查对象。”

“可他表现相当好啊，是我们团的先进分子。”

“老兄啊，先进归先进，政治归政治，这些年来不断在政审，你还不不懂吗？再说，军事院校每年都要来一批军官，他们有技能，政治又清纯，比你我都强吧。”

“那我就该是第三茬了？”

“有可能，等着吧。”

我万万没想到，两个月后，老刘犯了泄密罪，判处他一年半的有期徒刑。

那些年，人际关系紧张，开会发言，个别谈心，都得处处设防，言论失范，轻则批评教育，重则追查你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档案里的白纸黑字，留下你终身的遗恨。

我们这批政治不干不净的人，只能责怪自己时运不济。

三

文革开始，我参加支左，看到红卫兵造反派掌握了干部大量的档案，在白区工作的、被捕的、被俘的，数十万干部受到审查。让我震惊的是，文革的审干是史无前例的，1967 年 6 月 28 日，中央专门设置了专案组对付高干，周恩来挂帅，下有三个办公室，一办主任是

汪东兴，负责审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二办主任杨成武（杨被打倒后由叶群、康生接管），专办军队领导干部。三办主任谢富治，清查部委和社会团体的著名人士。仅查军队的二办，下面就有 51 个小组，如邓小平专案组、贺龙专案组、许光达专案组……

老干们的档案一旦被政治斗争利用，就要影响他们的处境。要是被人打倒，墙倒众人推，揭露你历史的污秽，包括道听途说的，集聚起来的材料足有半尺厚；当你官复原职，又飞黄腾达，会有人帮你冲去档案里的污泥，还给你添彩增辉。比如审查邓小平，最初是大将张云逸揭发邓在百色起义前后，畏惧战争，逃跑过三次。言之凿凿。邓复职握持了党国和军队的权力，他逃跑的说法不了了之。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一生最清白，装司造反派硬是从他档案中找到了疑点，说他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搞军运时有变节行为，从兰州军区调来一个副军长是专案组成员，每审问一次，这位副军长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许几乎被打死。贺龙专案组的副组长告诉我（组长是叶群），1930 年代初，蒋介石派大员熊贡卿到湘鄂西根据地招安，贺龙答应回归，要老蒋给他一个军长职位，老蒋不干，说你反叛我时是师长，我只能恢复你师一级。贺怕露丑，枪杀了熊贡卿。

这位副组长还说，审查贺龙的历史，由中央文革小组，和碰头会成员 30 多人，聚集在西山叶剑英家看了一天揭发材料，从中挑出薛明、萧克、廖汉生三人揭发的材料报给毛泽东。其中还有贺的前妻蹇先瑞的揭发未列入。

“913”事件之后林彪成了过街老鼠，揭发批判材料堆积如山。专案组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把集中的材料捆成十大捆，送到西山军委档案馆，堆了半间屋。林没有邓小平那样的时运，他已陷进十八层地狱。

四

用档案整治人，历来在基层层出不穷，甚至到荒诞不经的程度。1968 年，我在支左中就见到一个小青年的档案，至今还让我思绪萦怀。

那是 1967 年，我所在的 12 军进入安徽支左，当时，各省都大

兴土木，为毛泽东歌功颂德，建起“万岁馆”。安徽省的“万岁馆”由省军区运筹，要求 12 军也派人参与，政治部派我去负责宣传组的工作。宣传毛泽东得有一批能写会画的干将，我从全省的大专院校、文化馆站和军队机关，搜罗了十多个小有名气的画家、教授和军队的文化干部。有人向我推荐，郊区公社宣传站有个小青年，画毛主席像很有功力。百闻不如眼见，我上门拜访，小青年姓徐，20 岁，说话腼腆，一说就笑，笑起来一对酒窝很甜美，我看了他临摹的《毛主席去安源》，确实让我欣喜，形象绘制逼真几乎不走样，我问他：“你是美专出来的？”

他摇摇头说：“我高中还没毕业。”

“那你绘画技法是谁教你的？”

“到处学呗，反正我心中最热爱毛主席。”

小徐纯朴，谁见谁爱，我找到站长说：“小徐我要了。”

站长脸上出现难色，他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悄声地说：“他有政治问题啊，你们是‘万岁馆’，要的人是高标准突出政治的，他去你们那里肯定不合适。”

我吃惊地问：“为什么？”

“他咒骂过毛主席。”

我既震惊又疑惑，问：“这么年纪轻轻的，会有这种事？”

“你不信去看看他的档案就知道了。”

我来到公社的档案室，要出了小徐的档案看，仅三页纸，一张是简历，两张记录了他的“罪行”。说的是 1967 年的一天清晨，小徐还在睡觉，广播站开始广播毛主席最新指示，小徐被吵醒，张口就骂：“像杀猪猪叫……”

我问公社干部，这个揭发材料是怎么来的？

这位干部说，是广播员揭发的，我们当时就关押了小徐，让民兵天天押着他下地里劳动，晚上就开批斗会，大家都认定他犯了对毛主席大不敬的辱骂罪。他年轻，出身好，才没蹲监狱，小徐也为自己做过辩解，说他睡懵了，吵醒过来根本不知道是毛主席的声音。他检讨、痛哭，谁敢为他说不是？至今还在劳动改造，不让他下地了，在文化站画毛主席像将功赎罪。这份材料，就这么装进了他的档案里。

我找到公社书记，斩钉截铁地告诉他：“小徐我要了，有政治问

题我来负责。”

书记一看我是军人，又来自省革委会，不敢说二话，只诺诺的表示：“我们服从，最好能给我们一个借调令。”

我说：“可以。”

小徐来到我身边，如鱼得水，他睡在办公室，每天早早地起床后，就做清洁卫生，等我们上班，已是窗明几净，还给几个房间打好了开水。我给他搞了间特大的画室，让他把“毛主席去安源”放大到高十米，准备开馆时放在正门。他在三角梯上爬上爬下打格子，勾线条，差不多每天都忙到十一二点才睡。

小徐使不完的劲感动了我，我突发奇想，让小徐搞创作。我给他看了手中毛泽东在1958年视察安徽的材料，我叫来小徐给他材料看，记叙的是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带着张治中、罗瑞卿、谭震林一行，从武汉坐船到安庆登岸，视察了安庆市一中，当天下午驱车到合肥，沿途看到了安徽人民的大跃进景象，又参观了舒茶公社，视察了合肥钢铁厂，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又组织了合肥20万人欢迎，毛兴奋不已，到蚌埠写下了“沿途一望，生气勃勃”八个字给了省委副书记李任之。

我告诉小徐：“我正要派出袁晖教授采访，你是不是也跟他沿毛主席到安徽走过的路再走一遍，收集些素材，以毛主席的题词为主题创作出一幅反映安徽大跃进的油画来。”小徐惊喜万分，马上表示愿意干。我让他把放大毛主席去安源的大幅画停下来，马上出发。

半月后，小徐回来了，灰头土脸的，一见我就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曾希圣不像话，太坏了，什么“生气勃勃”，全是假的，这老头儿当了省委的第一书记，还骗毛主席。”我惊愕地问：“怎么回事？”小徐说，从安庆到合肥181公里，毛主席是9月16日上路的，曾希圣想展示自己的政绩，早就做了布置，让公路两旁的住户都穿上新衣到地里劳动，有的装着锄地，有的装着捆庄稼，有的蹬着空水车还喊起号子，主席竟时令不分，看不出在做样子。舒茶公社是种茶制茶的，他们把茶厂的工人全赶跑了，让省公安厅的人去当“工人”制茶给主席看，主席也辨不出真假来。到蜀山公社，给主席看的一株三米高的棉花树上，长出了14斤棉花，天知道，棉花骨朵是用胶水

粘上去的。

也是采访所得，小徐说起曾希圣主政安徽还干过一件缺德事。……副省长张恺帆在无为见到饿死 32 万人的惨象，取消了公社的公共食堂，曾希圣给毛奏了一本，毛把张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我警告小徐：“你见闻的事到此为止，别再告诉第二个人。”

小徐点了点头，愤然地走进了他那间偌大的画室。

这事不知怎么给小徐公社的领导知道了，书记径直来到“万岁馆”向我要人，话也直白，说，我不能让小徐再闯祸了，我担不起这个责任。他又去找市革委会，政工组的领导是我的顶头上司，他是部队的宣传处长，他要我放人，我理解处长，放走小徐后，我和处长争辩，明明是省委书记的一场欺君之罪，为什么我们不出来纠正？

处长说，你别忘了，两年前你们不是批斗过我吗？我的档案，你们不信，派人到我家乡调查，没人敢为我证明，人们的思维方式都是向左看齐。在我们中间像小徐这样的年轻人恐怕还算是少数，中年、老年的历史状况，组织上又能搞清多少？只能是挂着等待有朝一日历史的公正……

我的血往脸上涌，脑际里闪现出文革开始时批斗处长的一幕幕情景：那天副处长把我们几个干事找在一起，展示一份档案给我们看，是处长叶耕的。副处长指着档案上的一段文字说，你们看看，叶在历史上有血债，他原是福建永定党组织城市工作部的，他们集体枪杀了农村工作部的 130 多人，他参加了屠杀，硬说人家都是叛徒，哪有 130 多人叛变的？恐怕他自己就是个叛徒。副处长又翻开一页，说，这段历史更不清楚，老叶说他从福建逃出来，在京沪线上东躲西藏，还化装成国民党少校，他在南京上海没有亲戚朋友，靠什么生存？不知干了多少坏事，要么给国民党抓住了，叛变了，穿上国民党军装抓我们的人。再有，他一个人就从武汉进了大别山，至今没有一个证人……

我们按副处长的推断，在批斗会上先让处长交代，他解释说，历史上福建党的城市工作部和农村工作部一直相互猜疑对方是叛徒，互不信任，互相残杀，他是在火并中逃出来的，只身到京沪一带找组织，靠福建老乡接济为生，他装国民党少校是生存的方式，决定去大别

山根据地，是自己从国民党报纸上判断的。处长越解释我们越是不信，那年月，左就是我们的立场。批判会一个接一个，每次处长都要掉泪，他怎么也说不清自己的历史，有口无凭，谁敢相信。

后来，军政委张文碧表态了：“不要再追了，重在表现嘛，人家能千方百计到大别山来过艰苦战争生活，就是对党的无限忠诚。”政委一言九鼎，总算有了个结论。叶处长进入支左的第一线，处理政治问题一直小心翼翼。在打发小徐回单位之前，我又找过处长，我说，能不能把栽赃他的揭发信从档案中抽走，他还年轻，不应背着黑锅干革命。处长严厉批评我：你可不能乱来，这是组织上的大事，应由他们公社党委讨论上报到市委组织部来处理。我无奈，只好让小徐听天由命。

小徐一直不得志，到1990年代，他已过知天命之年，才开了家小画店，卖些小幅的字画条屏，每月有几百元收入养家糊口，2000年因肝癌去世，享年不到60岁。

五

一次我和军长李德生在一起闲聊，说起“万岁馆”那个小青年的档案，引发了李德生说起自己的往事。他说：“1935年，我在四方面军十师交通队当班长，在党小组会上批评师政委多吃多占，正碰上四方面军打AB团，我就被定为“AB团”分子，要办我，幸好师长王宏坤保了我，说李德生文化都没有，是什么AB团啊，给开除了党籍，1936年才得到恢复，至今装在我档案里。”李德生很轻松地说，“不去计较个人得失，就是革命者最好的清白证明。”

我心想，你脱下军装到地方上试试，造反派对你会如何？你拿什么来冲洗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

一天，我和张文碧政委在大院一起散步，我提起叶处长的事。我说：“政委，为什么你的表态，连事实都没有，就给叶处长做了历史结论？”政委说，我是1928年当兵的，出身好，两年就当了的特务排长，打AB团，我奉邓发的命令，把指导员叶飞（相当于团政委）捆起来，准备抬到师部去处决。叶飞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和AB团

连边都沾不上，却硬给他定了性。送师部的那天，用一根铁丝套住他的脖子，再用一根毛竹剜出个缺口，卡住他的脖子，另一头顶住脚，让铁丝穿过毛竹再紧紧地缚住他两只脚的大拇指。这个刑具，比古人戴枷还痛苦，我们用一根杠子抬起他，叶飞受不了，死去活来地喊叫，半路上碰上了国民党一个连，我们把叶飞扔下悬崖就跑了，哪知半崖上的草丛荆藤把叶挂住了，没有摔死，国民党把他拉上来，见他穿的马褂长袍，问他，你是个地主？叶说：我是地主，给共产党抄了家，又把我抬师部去砍头。连长同情他，放了叶。

叶飞后来当了上将，他从国共两党中间两次拣回自己的性命。政委沉重地说，我杀的 AB 团不下几十个（错杀红 13 军的领导人也是由张执行的），没一个是真的。杀了他们，留下的档案不是文字的，都是各级保卫部门领导记下的传闻。解放战争我又当了军法处长，办过好多案子，杀人是很简单的事，没有什么司法程序，只要认定是现行，再查查档案，就报给党委，党委议一议就可以执行。我知道战争时期建的档案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再不讲政策，不知还会枉死多少人？

六

1972 年，我从 12 军调到北京《解放军文艺》杂志社，这里已属军事机关的最高层，阶级斗争氛围更为浓烈。我还保持野战部队那种不识时务的秉性，到职几年光景，就给单位惹了两场祸事。

一是 1975 年 8 月中旬，我去上海组稿。警备区宣传处长张同言要我去看他们正要举办的画展，想听听我的意见。展出的画有水粉画、水墨画、油画和素描等，都是文革题材，在几百幅画中我看到一幅题为《万山红遍》的宣传画：一个骑摩托的战士口袋里装有一本《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小册子，这是姚文元刚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画面表现的战士正准备出发宣传给部队，体现了我军闻风而动地贯彻中央精神。

我对这幅画表态说：“姚文元的这篇文章，主席在最近的政治局会议上（5 月 3 日）对它有批评。”我告诫张处长说：“四月份，姚文元向主席报告，他要把反经验主义列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主

要内容。这是对着总理来的，他们想继林彪之后扳倒总理，主席反对，警告江青不要搞“四人帮”，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江青用非组织活动，把延安整风时期毛主席批周恩来是‘经验宗派主义代表’的老账拿出来四处散发，你们不要搞这类紧跟形势的东西。”

张处长见我说的有来头，表示，我们马上换回来。原来，战士包里装的是毛主席最新指示，是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来审查提出改动的。警备区把我要改变画面的理由报告了马天水，马上门来问：“刘家驹是什么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代表中央的，他有什么权力来更改我们上海的决定？”马天水写信给王洪文，王洪文又将信批转给南京军区，要求彻查我背后谁是指使？上海帮为什么不放过我，因为我在他们的后院点了一把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于永贤是我的老上级，他一面告知我大事不好，一面把马的信和王的批示送到了总政。总政宣传部是主管我们《解放军文艺》社的，派人来找我谈话，指责我是在传谣，干扰了中央的部署，要我马上下放干校，后期再作出处理。

八个月干校生活后，“四人帮”垮了，我却没有被宽恕，回来后还是被撤销了副组长的职务。

七

文革结束，我终于查到上海警备区给南京军区的报告，全文如下：

南京军区政治部：

1月16日，接到孙主任（孙骥、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的电话指示，要我们将1975年9月间，调查处理《万山红遍》这幅画有关问题的经过情况，报告军区政治部。为此，我们进一步做了调查核实，现将当时的调查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去年9月10日，刘文学政委在警备区常委会上，向政治部主任邢浩和宣传处长张同言、胡定芳副处长传达了上海市委马天水同志对上海人民出版社“电话记录”的批示：“这个问题一定要彻底查清，像这样公开散布谣言，是不能容忍的，请警备区党委尽快查明，向南京军区党

委和市委正式报告”警备区党委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责成我们政治部查清。……

关于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没有正式听到上级有什么不同说法，只是前天总政《解放军文艺》编辑刘家驹同志来上海组稿，我们接待他时曾问他，当前上级对宣传文化工作有什么新精神时，他说，毛主席对理论问题和文艺创作很关心，最近对电影《创业》有个批示，毛主席说，当前学习理论，主要是批判修正主义，如果要提反对经验主义，同时也要提反对教条主义。主席说，春桥的文章很好。“土围子”这个比喻，是因为当时是解决敌我问题。第五期《红旗》有关文章已经体现了主席的指示精神……

宣传处召开了党委扩大会，张同言做了检查，邢主任指示张所犯的是政治性错误。

事情发生后，正准备报，刘文学政委传达了马天水同志 9 月 13 三日的指示，刘说：“马老打电话来了，这个问题不要我们查了，不要我们报告了，原批件退回康办。”

上海警备区政治部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从这封信还能看出，马天水是三个月后才得知毛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反对批经验主义的信息。9 月 13 日，马天水打电话给上海警区政委刘文学：“这个问题不要查了。”上海警备区政治部给松了绑，也不敢对我妄动了。

上海警备区在信里隐去了不少真实内容，特别是毛反对批经验主义的表述故意张冠李戴，说成是毛对《创业》的批示。根本不提马天水的改画是事情的导因。这封信还捏造了我说，“主席说：‘春桥的文章很好……’”读来似给我脸上贴了金，实则是为了开脱他们自己。值得庆幸的是，解脱了对我的“后期处理”。

这个故事算结束了，新的故事又继往开来。1986 年，解放军出版社聘我给他们写林彪传，我去到郑州，见到林豆豆，采访一月余，总政知道了，12 道金牌召我回京，领导找我谈话，说：“你哪壶不开提哪壶，林彪叛党叛国能立传吗？你要有自知之明，赶快罢手，自己保护好自己。”

我不甘心，又去找李作鹏，李一心想和林彪划清界限，向公安部告状说，刘家驹来找我是要为林彪翻案。他的揭发信从公安部转到总政，总政又派人来找我谈，要我保持晚节，并要我写检讨。我拒绝。正好我已过 55 岁，令我退出现役。

这些内容是否又装进了档案，不得而知。

八

从此，我以为无官一身轻，再不为档案所牵累。孰料，1989 年的“六四”事件，我又差点招祸。

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仅在经济问题上迈步，由于政治上没有作为，文革的乱象依然故步，深受阶级斗争之苦的广大群众的愤懑情绪日益高涨，到 1989 年初，全国各大城市学生纷纷罢课走上街头，向中央提出推进民主法治、反对独裁腐败的诉求。面对强大的正义呼声，中央领导认定是敌对势力的挑动，4 月 25 日邓小平讲话了，4 月 26 日《人民日报》宣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27 日，北京学生十万人游行抗议。接着数万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安营扎寨，绝食示威。邓小平下令平息叛乱。指令出动镇压的部队有：北京军区的 24 军、27 军、38 军、63 军、65 军；沈阳军区的 39 军、40 军；济南军区的 54 军；南京军区的 12 军；空军的空降 15 军。

6 月 4 日凌晨，我听到天安门方向传来剧烈的枪声，急忙从北太平庄奔向六部口。那里，四列纵队的坦克正和愤怒的群众对垒，坦克兵不断抛出发烟弹，数百名反抗的群众，叫骂着用砖头石块在迷眼的烟雾中奋勇还击。我从六部口、西单、复兴门、木樨地到公主坟观察战场，沿途街头狼藉，见到的死尸有 50 多具。

6 月 6 日我走访了卫生部副部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谭云鹤，他告诉我“六四”事件我军杀害群众和学生共 713 人，军人死亡 14 人。死者都经过他验尸，数字确凿，但不得传播。我缄口多年后，才把这坊屠杀的真实告诉了我的好友张望舒，他是从新华社国内部主任退下来的，在他的大作《历史的大爆炸》一书是写“六四”事件全景的，书中做了详细的记录，已公之于世。

20 年后，我参与写林彪传获取了不少真实的史料，总政却派人来约谈，要我和中央保持一致，不得对中央已定案的史实另说是非。

2015 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六条……“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歪曲党史、军史的……直接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这两件犯上的事，幸好发生在《条例》公布之前，否则又有几页处分的文字记入我的档案。

退休 20 多年来，我等老军一直在为医疗、住房和离退休待遇的不公，不断地向中央军委申诉，我是牵头人之一，曾发动一万两千多名军师两级老兵签名，总政领导很是震动，要维稳，又不敢贸然抓人，只好把我列为不安定分子。也许，他们期待我就火之后，档案转入阴司，由判官复议我的反党乱军。

代
跋

刘家驹

《炎黄春秋》的历史和“历史虚无主义”

2016年7月，中国舆论界发生了一件惊人听闻的事件，在最高握持意识形态者的指挥下，由所谓“主管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出面，劫收了《炎黄春秋》。劫收者上马后，迫不及待地自编自导出版了《炎黄春秋》2016年第8期、第9期，并宣布：该刊物已经无“毒”了。国内外舆论对此无法无天的侵权行为，呼喊出一片谴责声！

正版《炎黄春秋》已寿终正寝，我是“炎黄”的老人，有话要说：

《炎黄春秋》出生的渊源应从1988年说起。当时，郑州的一些文化人、社会活动家商议，准备在黄河岸边的一座山上塑造炎黄二帝巨像。筹委会成员不少在北京，他们从倡议建立塑像一事得到启迪，认为更应向海内外华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萧克将军担负起重任，于1990年在北京主持成立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数百名文史学者参加，还邀请了海内外一批闻人助阵，由周谷城担任会长，萧克任执行会长。1991年5月10日召开了成立大会，时任中央常委的李瑞环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讲话，讲话用了《阿房宫赋》中的警句，告诫领导层：不了解历史的人必将重蹈覆辙。他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研究会下面专设有学术委员会，筹备由几百名专业史学者编纂一部《中华文化通志》。通志分十大卷，工程浩繁，包括民族、民间、政治、军事、文化等整个社会史，规模超过《四库全书》。为此，又成立了向社会通俗地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炎黄春秋》作为会刊。

《炎黄春秋》的社长杜导正，是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副社长宋文茂，是原首都师范大学纪委书记，徐孔是前《农民日报》社社长，有过22年“右派”的经历，他俩都是抗战时期的老新闻工作者。总

编辑是洪炉，来自《解放军报社》。我是洪炉上门聘请的副总编辑。

编委班子来自党政军，有伍修权（原副总参谋长）、冯征（原总参政治部主任）、李宝光（原中国妇联副主席）、黑伯理（原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编委的参与度非常高，每一期稿件都要经过他们讨论后才发表。

《炎黄春秋》没有刊号（民政部不批），只好沿用刚下马的《炎黄子孙》的刊号。同时，吸收该刊社长丁洪章和主编杜卫东过来担任副社长和副总编辑。

办刊最大的问题没钱，我们就向新华社借了20万作为注册资金和印制费。办了两三期又没有钱了，老杜提出承包，我负责一三五——单月期，杜卫东负责二四六——双月期。杜卫东有《炎黄子孙》发行渠道可用，我找书商发，他们要求从封面到内容都要有花花绿绿。这当然不能迁就，我只好让老伴每期背上四五千册在北京满街撒，四五百个报刊摊，一个摊上放几本，卖完再回收钱。收回的钱不多，难以为继。《解放军报》一位老总上门来要求承包，结果发了三期也亏损，还打了一场官司。最后就四处化缘，我找了深圳一家房地产商，一年给我们两万五，但要求在刊物上挂个理事的名号。还有一个条件，他在深圳福田区盖了600多套简易房，深圳整饬市容，要拆迁他的建房，他让我找个权势人物保护。我去找张爱萍，给他写了个“福田居民小区”刻在一块巨石上。就这样维持了几年，发行稍有好转，转由邮局发行，《炎黄春秋》发行量由一万二、一万四向上攀升，逐渐走出了经济难关。

最大的难关是稿件组的编发，《炎黄春秋》是纪实性的刊物，中央指令要正面宣传我党我军的历史，效法《星火燎原》《红旗飘飘》，以“伟大光荣正确”为宗旨。《炎黄春秋》在严格的规范下如何发声？萧克虽为我们制定了批判地继承历史的运作框架，但仅是原则，每当落实到选用文章时，都要碰到不少具体难题。最大的担心是怕触动“红线”。当时，社会报刊不少文章对文革、对反右持批判态度，但内容大都是老账旧说，不敢涉及事件的深层。要把《炎黄春秋》办成一个有质量的高水平刊物，稿件的内容就应该新颖独特，对真实的追求必

须要有所突破，对历史事件的细节，特别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含糊不得。因此，核实、考证就成了编辑的重要工作。同时还要顾虑“政治风险”，斟酌取舍。

比如“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拘南京，少壮派孙铭九等人野心勃勃，为了把持东北军的大权，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枪杀了老派军人，67军军长王以哲。孙铭九等人的这一恶行竟然得到了中共高层的支持。我们从访谈东北军的老人和刘少奇给张闻天的书信中，得到了确实的证据。但是，为了维护党的“伟大”，只好对稿件昧心地不予采用。

又如皖南事变。我们查询史家，事件的真相是，我新四军不遵守国民政府规定的北上抗日的命令，而是向南行动，以拖延时间，企图在皖南赖着不走。蒋介石震怒，出动五个师狙击新四军军部，造成7200多人的无谓伤亡。我们至今讳言这一事件的真相。

再如三年“人灾”时期，安徽无为县饿死32万人。为弄清这一数字的真实性，我们和当年省委书记王光宇、副省长张恺帆的秘书，以及无为县文史馆工作人员多次交谈，确定史实无误，才以《无为天堂梦》的篇名，将文章发表在刊物上。

为了求真，我们一丝不苟，多次到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查询国共两党交往中一些秘闻的真伪。

《炎黄春秋》的几位领导是办刊成败的关键人物。我先说说总编洪炉。

洪炉是1945年的老兵，在军报做美术编辑工作。工作之余，他经常写些军史、党史的纪实文章。他对党史、军史有良好的认知能力。他之所以上门来收编我当助手，是因为我在《解放军文艺》任散文组副组长，熟悉军史。我俩的配合很默契，在选稿上有共同的心愿，都想突破“禁区”，尽力采用鲜为人知又有棱角的故事。洪炉很理智，因长期在军报干活，懂得报刊的生存法则，不会用“高精尖”的稿件撞南墙，选稿大都是用“打擦边球”的方式。几年间，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特殊人物或党内的各种奇闻逸事，只要不冒犯“天条”，大都是通过我俩协作捅向社会的。

洪炉还告诉我一个忘不了的“虚无”故事：邓小平没有参加遵义会议。这是洪炉的老丈人伍修权说的。

1935年2月16日的遵义会议，代表成员是中央常委和军团的领导人，还有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小平当时的职务仅是军委秘书长，不具有出席资格。伍老说，当时给邓的任务是搞会务，就是张罗与会者的吃住开会，会前会后清洁整理会议室，烧水泡茶，生火盆，或给代表传送电文。邓就住在楼下，和李卓然一起。会议期间，他到会一共两次，都是来传递电文的，第一次送来电文就走了，第二次，他坐在进门的门槛上烤火，等常委传阅签名，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开。后来杨尚昆到遵义参观会议旧址，有人问杨，小平同志参加会议没有？杨随意用手一指：“他就坐在那个角角嘛。”有人持异议，后来修改史料打了圆场，说他参加会是做记录的。从此，邓就“历史地定位”了。

老杜是个“三八式”的老报人，做过记者，在《羊城晚报》《光明日报》当过总编辑、社长。出任中央新闻出版署署长后，因为“犯错误”下台。他经历了新闻战线的险山恶水，虽“败落”了，萧克却看中了他的一身正气和敬业的精神，亲自上门聘请他出任社长。他应对官方封堵新闻的打压政策十分老练，一上马就给我们传授值得时刻警惕的经验教训。他的工作作风严谨，编前会上，他总是洗耳恭听，反复斟酌后才拍板。他担心我们越过“雷池”，用中央的“两个决议”作为组编发稿的准绳。同时，还向当局保证：1. 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不动摇；2. 坚持对人对事实求是不动摇；3. 遵守宪法不动摇；4. 全面推进改革不动摇。

老杜人品正直，和我们关系也非常融洽。但是，他的办刊思路我却不敢苟同；他强调《炎黄春秋》生存第一，对官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忍让。过分的谨小慎微，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劫收的命运。

两位副社长忙前忙后，辛苦备尝，就是胆气不足。他俩对史实史料知之甚少，一些重大稿件一到他们手里就给窝住了。他们到军事科学院或社科院找“拐棍”帮助审稿，结果大都会无理由地遭到枪毙。

我和杜卫东承包后，都要考虑社会效益。我俩组稿都有较大的作者资源，小杜团结的青年作者多，我以部队作家军史学者为主，还联系了一批“托派”“老右”“历史反革命”，我们要他们自己动手写亲见亲闻。往往写出的一些新奇的、骇人听闻的故事让两位副社长作难，怎么办？我们就先磨去棱角拔掉“刺”，再给他们审，通过了再返回些

原汁原味。

如报告文学《红色的恐怖》是前新华分社社长专程走访江西老苏区 16 个县，记录当年我党杀害了 7 万多“AB 团”。这部血淋淋的沉重历史很多人都知道，两位副社长却窝住不做肯定或否定。后来李锐来了一篇文章，也谈到这个问题，可是社里却非要我上门逼着李老把杀掉十万零五千人这个数字抹掉，李老坚决不干。

对读者的批评指正，我们十分重视，有错必纠，特别是重大史实的核查做得更为细致，如，1936 年，西路军残部在倪家营子败落，中央对脱险到达延安的高级将领怀有戒心，集中审查他们和张国焘的关系。许世友无法接受这一变相的审查，私下对王建安说，我们设法跑出去找块地方打游击，打出一片天地给中央看看，我们是不是在搞分裂。中央认定许世友带领王建安、陈再道、詹才芳等 20 多人要叛逃，抓捕许等 17 人，并给他们判了刑，许判了一年半，其余分别判一年、八个月、六个月不等。后来特赦。我们邀请莫文骅（时任总政副主任）、邓飞（时任抗大总支书记）等人座谈，他们仍坚持中央当时的判处没有错。我们认为，这是一场没有法律程序的审判，中央未改正的错误，我们在叙述这段史实中应予纠正。

我们处理军事斗争的稿件更为慎重。因军史是不容“抹黑”的。如：平型关战役，只歼敌八百三，是我们走访参战的作战参谋苏静提供的。

血战四平，我军损兵折将一万六，军史不记，由时任东野政治部副主任陈沂给我们证实。

解放战争中西府战役的大失利，军史轻描淡写，彭的秘书王亚志述说了战斗全过程，是彭总好大喜功，指挥失误造成的。

兰州军区在人灾时期，派出一个团到青海草原捕猎野生动物 43 万余头（其中不少是珍稀品种），作者赞扬这一壮举是为官兵在困难时期谋福利，大打牙祭。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生态的毁灭性破坏，原稿奉还。

如何编辑好一些特殊重大事件，我们有自知之明。如编发陈独秀秘书郑超麟的自述，他是中国“托派”创始人之一，史实十分珍贵。我们查看了 20 世纪 20 年代郑超麟在法国和后来在苏州蹲监狱的资

料。我们又请老编辑家楼适夷做指导。楼和郑是老朋友，熟知郑的生平，发稿时再让楼老审定。

《炎黄春秋》走上正轨，内容真实严肃，萧老的指导和管理起了关键性作用。萧为《炎黄春秋》制定了方针政策，关注我们迈出的步子，要求对重大的史实应作出缜密的考证。正式出刊前，多次和老杜谈话，要老杜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客观、科学、“不虚美”“不掩恶”，敢担风险。

《炎黄春秋》实行的是三级审稿制，社定稿后要报萧克，经常由我去送审。经过萧克逐字逐句的终审后再发表。

萧老管《炎黄春秋》像个编辑部主任。我第一次送稿，就被批评：“专家的文章你们就不能动吗？口水话就不能删吗？我的文章就不能改吗？”

有时候我们想迎合一下市场，发点花边新闻，萧老发火：“你们不要把《炎黄春秋》给搞得水性杨花的，那是历史！”

萧老特别强调文章的真实性，他要求我们坚守刊物对社会的诚信，说：

“不讲真话的文章没人会看的，上面不让你说真话，你就不说，将来会有人说，你们现在绝不可乱说。”

当时我们发表最多的是为“右派”“反革命”呼吁、辩诬、平反的文章。文章发出后，社会上的老左派不干了，三天两头来编辑部质问，向中宣部告状，说我们是为“右派”招魂。我在送审时给萧老谈到这个问题，萧老理直气壮地说：

“你告诉他们，稿件萧克都看过了，谁有问题都可以来找我萧克谈！”

那时候官方或军方的老家伙谁敢跟萧克较劲？那些年，《炎黄春秋》的生存就靠萧克砥柱中流。

萧克为陈独秀翻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段时间我们连续组织专家学者写有深度的分析关于陈独秀的文章，萧克很是关注，经常询问作者状况和史料的出处。

辽宁作者靳树鹏，编辑了一本陈独秀诗集，我送交萧克要他写个序，萧克特别高兴：“好啊！”他翻开看了说，“我在井冈山时，用过

这里面的好几首诗，不知道是陈独秀写的！你赶快把作者给我叫来。”我把作者从吉林叫来，萧跟他谈话，写了序。

继陈独秀之后，我们又为瞿秋白翻案。写瞿秋白的作者陆立之，是个老“托派”，和瞿是战友，六届四中全会被开除党籍。他亲见亲闻的文章写得很具体、很真实，连史家温济泽都很佩服。他把瞿的《多余的话》解释得非常清楚，认为瞿虽然对党有很深的意见，但绝不是写的投降书，那里面有很多话是针对周恩来讲的。瞿的亲属也给我们提供了印证。这篇文章萧克很赞赏。

对于这些推倒历史误判的大案要案，《炎黄春秋》能在政治“夹缝”中，把它们公之于众，是对社会难能可贵的贡献。

我们虽有萧克像托塔天王般的保护，仍然要受到抓意识形态的中宣部经常性的“询问”。

中宣部在它的出版局下设立了一个“文史期刊审查小组”，有12人，组长是原铁道兵“支左”的文化干部冯复加，我的好朋友。他专审《炎黄春秋》，每读一期他总是在电话里热情的赞誉一番，然后才点出些触动官方“红线”的情节和细节。他的意见像聊天，我回答也轻松：“下不为例。”

新闻出版署也照会过，我去了，他们看在老领导杜导正的情面上，归纳了一些问题委婉劝说我们。

我在《炎黄春秋》13年的时间，刊用稿约2600篇，由我组编发的有360多篇。因我长期在《解放军文艺》做编辑工作，作者资源丰富，到《炎黄春秋》后，建立联系的作者以军队作家、军史专家为主，同时，我与“托派”、地方上的“老右”“老反革命”等都有紧密的交往，我的通联队伍就有350多人，这些正直的老伙计们来稿踊跃，都热切期盼《炎黄春秋》伸张正义、推动舆论民主。

《炎黄春秋》的使命之一是为革命元勋、中央新老领导层及省部级干部在和那些在文革中被诬为“老右”“二月逆流干将”“走资派”的人们辩诬，为他们纠正历史上的不实之词，他们中有：陈独秀、瞿秋白、方志敏、李立三、罗章龙、包惠僧、张国焘、谢子长、古柏、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明、王稼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胡耀邦、乌兰夫、陈云、华国锋、胡耀邦、薄一波、程子华、陶铸、

万里、谭震林、赵紫阳、纪登奎、李井泉、周小舟、江渭清、任仲夷、赵健民、曾山等人。

《炎黄春秋》为遭受不白之冤的中共优秀将领纠错鸣冤，他们中有：刘志丹、赵尚志、李兆麟、恽逸群、贺龙、陈光、罗炳辉、彭德怀、刘伯承、罗荣桓、徐向前、萧劲光、黄克诚、陈赓、罗瑞卿、张云逸、许世友、王震、王平、张劲武、傅连璋、郭化若、洪水、韦国清、张震、万毅、陈少敏、杨勇、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秦基伟、王尚荣、萧向荣、张学思、韩练成、曾克林等人。

《炎黄春秋》为“托派”、数百名文化“右派”“历史反革命”申冤正名，他们中有：郑超麟、王兰西、刘仁静、一丁、陆立之、王实味、梁漱溟、柳亚子、王造时、林语堂、洗星海、巴金、冰心、夏衍、冯雪峰、钱钟书、傅斯年、张大千、刘海粟、张伯苓、沈从文、汝龙、傅雷、常书鸿、杨伯骏、艾青、梁实秋、沙汀、聂绀弩、贾兰坡、贺绿汀、侯宝林、谭鑫培、黄胄、郭小川、萧军、邹韬奋、陈香梅、胡乔木、吴祖光、新风霞、欧阳予倩、洪深、周旋、黎锦辉、任光、刘天华、张旭明、穆木天、许渊冲、陈学昭、钱俊瑞、王方名、赵丹、上官云珠、舒芜、孙瑜、李和曾、陶行知、费孝通、冯友兰、姚雪垠、李炳泉、李昌、王元化、王洛宾、罗广斌、范曾、郭影秋、廖沫沙、杨沫、蒋兆和、姚迪雄、赵以雄夫妇、裘莎夫妇、吕吉人、澹台京、傅小石、王锦波、陈源、杨朔、王莘、黄宗英、黄宗洛、白桦、穆青、公刘、樊斌、李慎之、黎澍、丁玲、陈企霞、金凤、李英儒、钱俊瑞、萧乾、顾工、刘晓庆、张艺谋、赵青、金庸、厉慧良、胡家芝、吴泽林。

我们还公正地评议社会人物，如：史良、马寅初、荣毅仁、胡适、顾颉刚、程思远、吴清源、霍英东、陈方安生、章乃器、刘师复、董浩云、何鸿燊、隆莲、赵寿山、赵祖康、张宗麟、董建华、骆明、吴觉农、严济慈、宋子介、杜斌丞、郭风莲、年广久等人。

我们还公正地评价国民党人，如：黄兴、莫德惠、蒋百里、顾维钧、张学良、蒋纬国、陈立夫、陈诚、傅作义、王云五、柳亚子、于右任、白崇禧、李宗仁、邓宝珊、续范亭、黄绍竑、史量才、吴稚晖、唐生智、邵力子、张自忠、吴国桢、范石生、司徒美堂、张灵甫、胡愈之、石玉英、张克侠、陈布雷。

同时，我们还用大量篇幅为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各种小人物申冤辩诬；并且刊发了专家和读者对人口、资源开发和经济状况的忧虑和建议。另外，我们还不断地向党和政府建言，希望尽快实行民主宪政。

《炎黄春秋》面世后，官方对这本异类刊物视如肉中刺，紧盯不舍。最初组织一些御用史家打压，用的还是文革语言，未能见效。后来，有一位官方史家终于找到“历史虚无主义”一词做大棒，因《炎黄春秋》用稿大多来自当事人亲述，有人就认定当事人讲述是随心所欲，史实不可信。于是就把“历史虚无主义”这顶大帽扣到我们头上，《炎黄春秋》刊发的纪实文章，成了他们手中的“罪证”。对此，我们提高警觉，奋起抗争。

2003年我离开《炎黄春秋》后，编辑班子的吴思、杨继绳等人在官方不断的打压下，不顾“天条”的管制，敢和监控者争辩抗礼，2007年发出谢韬以提倡民主社会主义评议大政方针的文章，表现了他们的锐气。该文直率地讲了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必须实行，这是党心、民心所向。此文的社会反响非常大。紧接着是2013年，《炎黄春秋》连续发了五篇披露我军丑闻的文章，摸了军队这只“老虎”的屁股。

第一篇是何方的《抗美援朝的得与失》，揭示了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的真相，以及我军以伤亡近百万的代价，为金日成火中取栗的惨痛教训。

第二篇是吴之理的《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还原了朝鲜战争中所谓美军的细菌战。事实上，根本没有此事。所谓细菌战，不过是中共高层在错疑之后以错掩错而有意发动的乱真宣传。作者是当事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长，他对这一事件的记叙翔实可信。

第三篇是洪振快的《延安时期的特货贸易》，揭露359旅当年在南泥湾大量种植鸦片，年产五、六吨，向民间出售，为边区财政赚取开支，坑民害民。

第四篇是赵晓玲写的《1933年四川的兵灾》，记述了红四方面军进川陕，为开辟苏区，大搞赤化，征粮派款，滥杀无辜。川军也来剿共清共，大开杀戒。仅一年间，国共两军兵燹通南巴，共屠杀群众111余万。

第五篇是我写的《我写林彪传的遭遇》，我访谈了林彪的老部下、

当事人和法律专家近百人。他们都认为“913”事件是不依法律程序的政治审判。林彪出走是被动的，中央认定黄吴李邱是林彪反党集团，根本不成立。《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一篇有先见之明的檄文。（成稿前，我走访过李德生秘书沈永权，他是“913”事件专案组成员，“亚疗学习班”的主持人。他肯定林豆豆在“913”前在北戴河见闻的交代是真实可信的。我还询问过他审讯王飞、李伟信、鲁珉等人的证言证词。）

人民解放军是党的骄子，是维系政权的“伟大长城”，这五篇重磅文章以不争的事实动摇了“定国神针”，《炎黄春秋》遭到厄运是必然的。

然而，当权者又能从打压中得到什么呢？

1946年2月，十九家民间团体在重庆较场口庆祝国共两党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成功，邀请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到会讲话，郭、李的讲话都强烈要求国民党认真实行民主宪政，国民党竟组织一群流氓砸烂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60多人，酿成著名的“较场口惨案”（打砸后我去看过现场）。人们对这一暴行郁积于胸，紧接着，东北传来“张莘夫事件”，重庆6000学生走向街头，抗议苏军的暴行。这年底，北京又发生了“沈崇事件”。数万学生上街高呼“美军滚出中国去！”第二年，国民党挑起内战，数十万学生组织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这些游行示威我都参加了，它们孕育了我的正义感。

国民党政治、军事双失利败落台湾后，仍不改对民主镇压的初衷，搞长期戒严，制造了“美丽岛”事件（《美丽岛》也是一本敢反专制独裁的杂志），拘捕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终于打压出了一个反对党——民进党。当前，这个独裁的百年老党，已被民进党逼到生死边缘。

我原寄望某领导人会站出来对本党的一系列历史错误事件作出公开的、诚恳的道歉，让我党出现生机，走向民主大道，可至今执政的衮衮诸公没有一个人有这种勇气，他们担心一说就垮台。我对这些“核心”“为首的”已绝望，只能告慰我敬爱的杜老和受委屈的同仁，时间是永恒连绵的，风雨过后就是阳光，我坚信，《炎黄春秋》有朝一日会起死回生。

